百问九一三

舒　云

１、为什么要把“两案”绑在一起？

审理“两 案”时，广州是最大的疑点。广州谁接飞机？就是没人承认。顾同舟不可能，丁盛不承认。九一三事件后，白云山有个林立果的“据点”，广州军区查了半个月，弄 不清，没发现证据，就没管。接华国锋班的湖南省革委会主任卜占亚说，湖南组织了几十列车厢和一批干部，到广州迎接林彪。这事株连了多少干部，后来卜占亚 说，他的这个交代全是假的，是被逼的，当时的交换条件是还当他的副政委。总政取证组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所以凡是没证据或证据不确实，只有一人口供作证，或 证据有矛盾，一律不定罪。黄吴李邱是否参与谋杀毛泽东，南逃广州？李伟信说，听于新野讲，黄永胜他们同意一起走。证据不足，拿掉。起诉的罪行减成５５条， 后来又减成４８条。中央的政策是打击主要的，不要打击面过大，宁愿不定，作为悬案，不要让更多的干部受牵连。１５个罪行去掉了，一月风暴、杨余傅事件、二 月逆流、抓五一六，冲北展的武斗，七二Ｏ事件，北兵南调，第一号令……这样去呀去呀，去了半天，这些都没有了。最后一稿，发现“大舰队”没证据了，四大将 与政变是什么关系？南逃计划他们知不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知不知道？都是疑点，查的结果证明他们不知道，“两谋”没牵扯他们。

这 一来，说不清了，拿不出具体数字和事例，让人信服、有血有肉的东西拿不出来。又不是政治宣言，必须实打实，轰动全军的事都拿不到起诉书上去。但是缺乏证 据，又必须审判，怎么办？邓小平拍板，一案起诉，分开审判，成立“两案”领导小组，下决心把“两案”合到一块。１９７９年底到１９８０年初，军队还搞军队 的，后来两个起诉书合在一起写，有的单独列，有的联合在一起。以公安部为主，军队提供情况，从全军抽人，保检法三家，组成“两案”办。审完后，还有十几个 军以上干部，有８个起诉，１３个免于起诉，免于起诉的一律师级待遇。

现在看，九一三事件是人造出来的，整个政治需要这个事件，才造出来的。以林彪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根本不存在。毛泽东能和江青分开，林彪为什么不能和叶群、林立果分开？

王年一说，九一三事件是党内最大的谜。虽然材料很多，但关键性的材料甚缺。对林彪事件的研究很不充分，总的说还处于较低的层次。由于官方的限制，好多问题说不清楚，要达到一定深度很难。

我们坚信，再大的谜也会有谜底，九一三事件一定会大白于天下。

２、林豆豆为什么坚持“绑架说”？

张清霖回忆：我们在下边看，闪着灯的三叉戟就在头顶，向南飞，往西，又往北，飞得很慢，响声消失了。林豆豆特别镇静，问我，你好多事猜得很准，飞机会怎 么样？我说，飞机会掉下来。什么时候掉？出了国境就会掉下来，我分不清往南往北，全凭预感。林豆豆说怎么会掉下来？我说首长不知道，到一定时候不能不告诉 首长。首长知道后，不让去苏联，空中搏斗，飞机会掉下来。林豆豆说，真要掉下来就好了，首长就超脱了，再也不会痛

苦了。如果没掉下来，真飞到莫斯科，还没 等首长下飞机，就会被活活气死。我说，不管是死是活，只要到苏联，就可以利用。林豆豆一直看着飞机消失的方向，没掉一滴眼泪。非常奇怪，我认识林豆豆后， 她每天要测体温，每天都神经性低烧。就在那天晚上，再也不烧了，一直到现在，再没低烧。

１９８０年审理“两案”前，成立了总政取证 组。批林七八年了，林豆豆是重要证人，取证组到河南找林豆豆取证。听她一谈，大惊，她的材料有变化，说法跟原来完全不一样，原来并没有说“劫持”。林豆豆 解释说，当时说他们走了，没说这么细。张清霖说，林豆豆印证。取证组的工作人员回忆：河南省委搞的录音，录了７０多个小时，整理出６小时。

林豆豆说：林彪是好人。林立果、叶群是坏人，还整了她。看林立果和叶群行动反常，绑架是肯定的，报告过，并不知道叛国。取证组的工作人员说，那时没林彪 是好人这个调。８０年代初突然来这个调，根据这个行吗？我都不敢继续往下搞了，请示“两案”办，与原来说的不一样。“两案”办让记下来。光女儿的口气有变 化，最后没采纳，如果第二个活人在，也行。没有，死无对证，历史不好写，就在这。“文革”不是一风吹掉，各有各的账，各有各的背景。为什么林豆豆这么说？ 取证组分析，一开始那种情况，不敢说也可能。九一三事件突然出来，说真话会受限制。审了七八年，经过考虑有新的说法，也不奇怪。现在把林彪说好点，对她有 好处。没第二个人说绑架走的，我个人不敢下这个结论。林豆豆的证取了，没用，只她一个，只能是看法。林彪内勤小陈、小张也不敢变。中央不采纳是对的，没新 的证明，等着后人把所有的材料翻出来。

于是“两案”还是用以前的结论。

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

林豆豆始终坚持“绑架说”，从未改过口。

９月１３日早９时，林豆豆给周恩来打电话，张清霖和空军保卫处长杨森在旁边。这时周恩来已经知道飞机坠毁，他没说，只问你是林豆豆，怎么样？
我现在还好。
你爸爸（林彪）知不知道这事。
他不知道，是林立果绑架的。
要跑，为什么要跑？
毛主席在南方打招呼，要整黄吴李邱，要搞掉首长。

周恩来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嘛（周恩来装着对毛泽东南巡也不知道）。张清霖回忆：九一三事件后我们就没有进住的房子，当时什么东西都没拿。八三四一部队 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问洗漱用具要不要拿，我们说一样东西也不要，原封不动。给我们捎来的皮鞋还放在那里，没动。我们请求中央保护现场，把叶群的一箱东西保 留住。后来叶群的那个箱子，被汪东兴处理过。

过一两天，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与我们在５６楼谈了半小时，问有哪些事。林豆豆对他说，首长是被绑架的。林立果要跑， ９月８日说不行动，一切过了国庆节。王良恩问，你爸爸知不知道。林豆豆说，不知道，他是被骗推上车的。

张清霖回忆：我们不相信张宏，信任姜作寿。中队长萧奇明“陪”我们散步，过一段，不说林副主席了，改口林彪。我对林豆豆说了这个变化，她没吭声。１０月 ３日晚，姜作寿单独找我们谈话。林豆豆的意见叫杨森一块走，姜作寿说杨森与你们不一样，他单独走。姜作寿一直在专列上“陪”着我们，在北京哪个车站，３０ 多岁的谢静宜带着黑颜色车接我们，送到玉泉山，车窗户用布挡着，从此被软禁。这以后，本来是“功臣”的林豆豆由被江青、康生定为林彪留下的“钉子”，设立 了专案组，林豆豆被逼得死去活来，但是并未改口。至于她写的“绑架说”的材料怎么无影无踪了，怎么变了调子？那只能问往上送材料的专案组了。

林豆豆和张清霖被关到玉泉山，一直提要见毛泽东和周恩来。

１９７２年初毛泽东让周恩来见。周恩来拖了8个月，才接见林豆豆，他说晚一点也好。但并不是林豆豆要求的个别接见，在座的有汪东兴、纪登奎、李德生、张 才千、田维新、杨德中等，成了一场集体谈话。周恩来问九一三事件的情况，严厉批评林豆豆：“你还认为林彪是让林立果绑架走的吗？他是副统帅，别人怎么命令 他？”

由此可见，林豆豆一直坚持“绑架说”。

“两案”总政取证组的工作人员说：家庭矛盾和政治搅到一起，林豆豆 没证据推翻，被坏人劫持，敢信吗？可是谁又能反驳呢？审判九一三事件，死者不在审理范围，取证组转向几个大将。当年批林批孔的材料，大部分被推翻。集团就 不是，剩下大将有啥罪定啥罪。错的也没纠正，过去就过去了。当然，现在这个调子并不一定永远站得住脚。

３、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为什么大病一场？

其实，九一三事件前，毛泽东身体就夕阳西下了。

１９７１年9月１２日傍晚，林立果要到北戴河去，走前他在候机室对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说，最近中央内部路线斗争很激烈。胡萍对１９７０年九届二中全会并不 是很清楚，他想，庐山会议后中央有谁？陈伯达、周总理、康生三个常委在北京，那是谁？陈伯达在庐山被打倒，就剩康生和周总理，是周总理？搞不清，也不好 问。林立果说，毛泽东南巡，病得很重，说话很困难，咳嗽厉害，有时喘不过气来，很危险的状态。事后胡萍说，他当时相信毛主席病得很厉害。因为前两个星期， 毛主席身边的汪东兴来，叫准备个飞机到海南岛。说主席一到冬天，气管炎就犯了，那里气候好，他去看看。

据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１９７１年毛主席就身患重病。保健医生说：主席现在患肺心病，从入冬以来就不好，开始由感冒引起支气管炎，每日阵咳，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双脚浮肿已经有好几个月。

１９７２年1月１０日下午举行陈毅追悼会，考虑到７９岁的毛泽东病重，没有安排他出席。但毛泽东１月１０日中午临时决定出席陈毅追悼会。他别的衣服不愿穿，执意穿睡袍，回来后毛泽东病情加重。

１９７２年１月２８日零时，医生摸不到毛泽东的脉了，好在虚惊一场。２月上旬，毛泽东由于肺心病导致严重缺氧，突然休克。张耀祠说，主席休克那天，我没记住，不是９日就是１０日，不敢记，制度规定不许记。时间长就忘了。

护士长吴旭君首先发现毛泽东休克，医生随即赶来。北京阜外医院心内科主任、心脏病专家胡旭东把手贴近毛泽东鼻孔，发现呼吸停止。他马上进行人工呼吸。几 分钟后，毛泽东恢复心跳，慢慢睁开眼睛。张耀祠说：李志绥（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是知识分子，就这点不好，自高自大，病情知道了，不敢下决心。我批评他，你 是医生，病情你知道，还不下决心。李志绥怕。主席不愿意吃药打针，受罪的是主席。主席不同意是主席的事，提建议嘛，病一拖，老人经不起。杭州主席病重，与 抽烟有关系，南巡身体就不大好。他死大概也死在肺上，解剖时发现肺部有两个泡。如果不那么累，不抽那么多的烟，按医嘱吃药，主席还会活下去。

那么，毛泽东这场大病和九一三事件有什么关系呢？

张耀祠说，九一三事件对毛泽东是很大的刺激。

对毛泽东来说，抽烟、讳疾忌医和九一三事件比起来，是九牛一毛。如果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再重的病，也会慢慢康复。只有九一三事件，将毛泽东打倒在 地。毛泽东心里清楚，看透他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林彪，一个周恩来。周恩来是决不能当接班人的，选林彪接班，也只是个幌子。毛泽东并不真心想让林彪接班，他 也知道林彪接不了班。林彪虽然比毛泽东年轻，但林彪的身体比毛泽东差得远，绝对活不到毛泽东之后。给林彪看过病的解放军总医院专家非常奇怪，为什么毛泽东 选病魔缠身的林彪当接班人，他接得了班吗？而现在，刚树起的接班人突然逃往国外。如何圆场？也许毛泽东并不担心如何向世人交代，而是如何收拾文化大革命的 烂摊子。

这是他一生中两件大事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啊！

无疑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的病情更加雪上加霜。

毛泽东越来越明白，林彪自我爆炸，也炸碎了文化大革命。

林彪死了，文化大革命在人们心中也死了。

如此，毛泽东再无回天之力。

沉痛悼念九一三事件的牺牲者！为他们默哀，愿他们早日回家！

４、２５６三叉戟的黑匣子为什么迟迟没有露面？

２５６三叉戟半夜摔在蒙古温都尔汗的荒原上，机上的九人全部遇难。最先赶到现场的是蒙古人，接着是苏联人，他们到底是如何勘测事故现场的，没有见到正式 文本。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几十个小时后才到，不要说现场已经被救火者和蒙古人、苏联人破坏，就是原始现场，没有内行，也只能看个大概。而中国关于２５６三叉 戟失事原因，是１９７２年

以王海为首的五人专家组关在屋子里研究外行的现场照片确定的。

结论是２５６三叉戟因为油不够了，迫降野外没有成功。

但是，事实确是如此吗？

目前惟一的知情者就是２５６三叉戟上的两个黑匣子。

而去现场的中国大使馆官员，根本不知道飞机上还有黑匣子。不过就是他们提出，蒙古人给不给还是另一回事。也有人说，黑匣子找到也没用，不能说明动机，为什么迫降？另外一个东西，话音录音器是不是好，也不敢保证。

西方国家６０年代以后开始陆续装黑匣子。过去老式飞机上没有黑匣子，出事很难查，由于电脑发展，飞机的技术信息编成密码，飞机的一切动作全部被记录下来。黑匣子有个好处，能抗高温和强烈振动，保证信息能拿出来。特别是英美等国，专门有一套机构研究。黑匣子很复杂，你用它的飞机，出事要找它翻译，要花很多钱。后来中国飞机出事，还是送英美破译，苏联搞黑匣子很晚，是另一套。

不知道为什么苏联人至今仍对２５６三叉戟保持沉默，３８年了，真沉得住气！蒙古人或多或少说了一些，中国的知情者也在说，而苏联，只有个别退休的苏联克格勃官员在凤凰卫视胡说，说听当地老百姓说，２５６三叉戟飞到了苏蒙边境。这明显是个谎言！听当地老百姓说，强大的苏联雷达干什么吃的？２５６三叉戟飞进蒙古，虽然中国的雷达够不到了，但还是知道２５６三叉戟的飞行时间。从地图上看，赤塔距离中蒙边境４１４号界桩８００公里，而赤塔距温都尔汗约６００公里。而２５６三叉戟１点５５分飞进蒙古境内，２点３０分坠毁，３５分钟２５６三叉戟飞了１３００多公里，这怎么可能？２５６三叉戟在国内飞行距离是整个行程的三份之二，时间也是三份之二，而在蒙古境内飞行三份之一的时间，飞到蒙古温都尔汗，正是三份之一的距离。所以２５６三叉戟不可能飞到苏蒙边境，再返回温都尔汗。这么长的距离，２５６三叉戟的油量和时间都是不可能够的。

现在看，２５６三叉戟的黑匣子被苏联人拿走了，而且已经破译，透露没有与地面通话的内容。但是，有没有机内说话的内容呢？应该是有的。

如此说来，２５６三叉戟的失事原因，只有苏联人心知肚明，但为什么苏联人对２５６三叉戟的黑匣子一直秘而不宣呢？极有可能黑匣子披露的机内说话内容与中国官方的说法不同，否则没有必要沉默。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韩国，为顺利签署俄韩基本条约，亲手将１９８３年被苏联击落的韩国民航００７客机的“黑匣子”交给卢泰愚总统（韩国人发现“黑匣子”是假货，但最终找到原件，并移交事故原因调查国际委员会）。

为什么２５６三叉戟的黑匣子不能归还？

更何况苏联已经解体，克格勃已经不存在，有什么必要还保留近４０年前的２５６三叉戟的遗物呢？

２５６三叉戟黑匣子浮出“水面”，或许会震惊世界。

５、为什么中国没有提出派专家到现场调查？

１９７１年9月２９日，蒙古广播电台播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喷气式飞机一架，于９月１３日凌晨１时５５分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２时２５分在肯特省依德 尔莫格县，东经１１１度１５分，北纬４７度４２分，由于不明原因坠毁。在中国飞机坠毁的地方找到烧得残缺不全的九人的尸体、枪支、文件和物品，证明这架飞 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军飞机。已经让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代表们去现场观看了失事飞机。就中国飞机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一事，蒙古方 面向中国方面表示了抗议，并要求做出正式解释。

消息发布前的下午，蒙古外交部二司司长策伦达勒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强调这并不 是政府声明，而只是一般消息。并表示：在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的时候，中国飞机越境，我们感到很遗憾。蒙古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云登也在参加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国 庆招待会时，主动向许文益大使通告。

看来蒙古方面并没有什么恶意。中国方面如果提出到现场勘测，并提出要回２５６飞机的遗体遗物，蒙方也不会阻拦。要是按现在的观念，飞机是英国的飞机，如果是机械问题，还应该向英国要求赔偿。

但中国方面一开始就没有到现场的意思。至于向英国索赔，更是连想也没有想。三叉戟是从巴基斯坦买回的二手货，巴基斯坦有了更先进的波音飞机，对三叉戟不 再感兴趣。而西方封锁中国，中国能得到三叉戟，也很了不起了，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如此一波三折，中国根本没想到找英国赔偿，更何况中国那时认为钱是资本主 义，到了１９７６年唐山大地震，还拒绝国际援助。那时只想息事宁人，决不可能把事情搞大。

１９７１年9月２２日凌晨，周恩来听完坠机 现场赶回国内的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一秘孙一先的汇报，让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公安部部长李震和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根据现场 照片和示意图，分析飞机坠毁的原因。几个人中，只有李际泰是飞行员，但他没有飞过三叉戟。李际泰认为“三叉戟是因为油不够，迫降没有成功。在场的人认为有 道理，周恩来就此得出“自行坠毁”的结论。

１９７１年9月２３日，中国驻蒙古大使向蒙方说明：我们民航飞机迷失方向，误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自行坠毁。中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

看来，中国政府只要“机毁人亡”就足够了。至于为什么“机毁人亡”，完全没有必要知道，根本谈不上派专家到现场调查取证。

周恩来到西郊机场看与２５６三叉戟一个型号的２５２三叉戟，并让专家确认摔在蒙古温都尔汗的确是中国的２５６三叉戟。

１９７１年国庆节凌晨２时，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空军参谋长梁璞、孙一先等也到

西郊机场看飞机，分析迫降的可能，自圆其“说”。

飞机失事的原因可以放在一边，机上的九具遗体也不管吗？

蒙古９月的白天还比较热，遗体需要尽快处理，蒙古提议就地安葬。

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向蒙古方面要求把遗体运回来。

蒙古方面当时不知道飞机上的人员身份，他们只是强调是军用飞机。由于中方道歉，也没再多发难。但蒙古人很“狡猾”，要求中方提供机上的死者名单和身份。 周恩来总理考虑，苏联当时还不知道林彪叛逃，怕因运回尸体问题同蒙古争执，可能提醒苏联，就同意了蒙方建议，要求就地火化。但因为蒙古没有火化习惯，于是 就地安葬。

２５６三叉戟的遗物也要了，但中国坚持飞机是“民”，而蒙方坚持飞机是“军”，是“军”是“民”，中蒙两方没有达成协议，要遗物也就不了了之。

３８年了，温都尔汗的坟堆早就被风吹平了。三叉戟上九个人涉及七个家庭，七个家庭的家属如果提出要求，相信我们的人民政府是会考虑的。因为中国政府曾经索要过遗体。而现在再提出来，蒙古政府不会再有什么理由不答应了。

至于前苏联方面拿走的林彪和叶群头骨，相信只要中国政府出面索要，俄国政府也没有理由拒绝。

６、２５６三叉戟到底是“军”还是“民”？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６日，中蒙双方关于２５６三叉戟的第一轮会谈开始，蒙方强调据乌兰巴托中央机场气象台报告，９月１３日２时，肯特省伊德尔莫格县上空没 有危险的气象气象情况。飞机失事原因，是在没有外来影响下，出于自身的不明原因降低飞行高度，试图用腹部着陆时，右翼撞地，造成严重损坏，因而发生爆炸而 失事。……上午１１时，第二轮会谈开始，蒙方强调２５６三叉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驾驶的，……孙一先看了蒙方起草的纪要，认为蒙方采取友好合作态度，安 排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官员到现场视察和善后处理，但却坚持在纪要写明是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空，以及没有外来影响坠毁，无非是为了在今后两国交涉中占据 有利地位。假如是被苏、蒙军队击落，则可以推卸责任。

中国方面则坚持认为是民航飞机迷失方向，误入蒙古。

蒙古方面认为：现在我方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所以没有必要，没有根据这样写。

许文益大使说：根据我的理解，蒙方不认为这架飞机对蒙古有什么不好的行动，因此，这架飞机乘什么人，做什么用，那是很次要的问题。你们方面提到这架飞机 上有军事人员，一般说我也不反对，但另一方面，根据现场判断，飞机上也有非军事人员。我认为这是很细小的问题，我曾跟司长讲过，我们的民航有的是军人驾驶 的，我不知道蒙古民航是否也是军事人员管理和驾驶的，但我知道有些国家是这样的。蒙方坚持认为：我们的材料证明他们

都是军人，我们从里面找到的东西，没有 能证明是民航飞机。

许文益大使说：我不反对说里有军人。孙一先补充说：但第一，这里面有非军人，第二不能说军人驾驶的飞机不是民航飞机。许多国家的民航是由军队管理和领导的，我在蒙古工作多年，也看到蒙古的民航也是军队领导和管理的，而且驾驶飞机的人，都是现役军人。

蒙方还是认为飞机没有证明是中国民航。

孙一先说：飞机上写着很大的“民航”字样。

所以，中方不同意写上全部是“军人”。

而蒙方坚持要写上全部是“军人”，最后没有达成协议。

２５６三叉戟为什么要刷上“中国民航”的字样？这说明，它就是作为民航飞机而用的，虽然是专机。

７、为什么中国强调迷航，误入蒙古境内？

２５６三叉戟是专机，专机没有固定航线和固定时间。

九一三事件突然发生，中国高层首先要保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能让林彪在飞机上的事实扩散。不要说外国，就是当时处于核心指挥位置的空军指挥所里， 除了李德生外，所有在场者都不知道外逃的大飞机上有林彪。不要说当时在指挥所的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和参谋长梁璞等，就是多少了解一些内情的空军副参谋长王 飞也不知道飞机上有林彪。

空军航行局局长尚登峨与没来得及上三叉戟的第一副驾驶陈联柄通过电话，陈联柄和没上飞机的机组人员只知道他们没上飞机，但飞机上有谁不知道。第二副驾驶康廷梓在三叉戟起飞后，在山海关调度室反复问八三四一部队的大队长姜作寿，飞机上都有谁？姜作寿没说。

现在看，只有八三四一部队在北戴河的领导张宏和姜作寿以及林豆豆、张清霖和林办的工作人员，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张耀祠、汪东兴等极少数人外，许多当事人都不知道林彪在飞机上。

当时的中国高层领导认为，只有保住密，才能把引发战争的政治事件化解为一般的民航事故，迷航嘛，误入蒙古，这种情况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按蒙古说的是中国军用飞机，那事情就大了！

世界上第一个关于空中立法的多边公约──１９１９年《巴黎航空管理公约》正式确立了领空主权原则。公约第１条明确规定：缔约各国承认每一国家对其领土上 的空间具有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权。基于这一原则，公约规定：一缔约国的军用航空器未经特许不得飞越或降落于另一缔约国的领土。１９４４年《芝加哥民用航空公 约》第三条的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用于军事、海关和警察部门的航空器，应认为国家航空器；一缔约国的国家航空器未经特别协定或其他方式的许可并遵照其规 定，不得在另一缔约国领土上空飞行或在此领

土上降落。

２００１年４月１日上午,美国一架军用侦察机飞抵中国海南岛近海海域上空侦察。它违反飞行规则,突然转向,在海南岛东南１０４公里处与对其进行跟踪监视的中国飞机相撞,致使一架中方飞机坠毁。事发后，受伤的美国军用侦察机未经中方允 许，擅自进入中国领空，降落在海南陵水机场，严重侵犯了中国领空及领土主权。中国政府就此向美国政府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此举严重侵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和 国家尊严，给中国国家和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国际法上的全部责任。

２００１年４月６日，《联合早报》特 约发表阮次山先生的文章：《从国际法观点分析中美撞机事件》。阮次山认为：４月１日发生的中国战斗机和美国ＥＰ－３Ｅ型侦察机在海南省附近撞机事件，从美 国政府，布什总统到国务卿鲍威尔，从美国驻华大使普里赫到太平司令部的总司令布莱尔，都试图从国际法角度，“框”住此事件，一再重申，这次撞机事件纯属意 外。因为如果不“咬死”此事件属于意外，美国就必须负起此事件的责任，也就承认中国对意外事件有司法管辖权。这架美国军机受损过重，必须紧急降落海南岛的 陵水机场，这种行为符合１９４４年的芝加哥国际民航公约规定，不属于侵入中国领空的行为。美国政府用此基本底线划出其对此意外事件的“国际法轮廓”，主要 策略是：避免中国当局运用国际法的“管辖权”原则去处理此事件，因为，如依据国际法“管辖权”裁定的三大原则：（一）国籍（即出事飞机的国籍归属）；　（二）发生地；（三）意外事件受害者国籍。作为事件的受害国和肇事飞机的降落地国，中国拥有无可置疑的管辖权利，包括对有关事实进行调查的权利。

国际条约是国家之间的协议。一般说来，条约只对缔约国有拘束力，而对非缔约国并无拘束力。中国是国际民航组织的创始成员国之一，旧中国政府于１９４４年 １１月９日签署了《芝加哥公约》，并于１９４６年２月２０日交存了批准书，成为国际民航组织的创始成员国。１９５０年５月，我国政府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和国 际民用航空组织，要求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１９日，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通知我国政府，国际民航组织第７４届理事会通过决议，承认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的代表为中国驻国际民航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１９７４年２月１５日，我国政府致函国际民航组织，承认《芝加哥公约》并从即日起恢复参加国际民航 组织的活动。

虽然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中国还不算《芝加哥公约》成员国，但除了国际法，还有国际习惯。国际习惯出现在国际法之前，虽不 成文，但经各国不断重复而具有法律拘束力。国家对领空具有完全的、绝对的、排他的主权。有权禁止外国航空器进入其领空，对擅自飞越的航行器，国家有权采取 警告、驱逐、追降、紧追等必要措施。对侵入的外国军用航空器，国家有权将其击落并向有关国家提出抗议，要求其承担责任。

如果按照国际法，２５６三叉戟作为军用飞机，坠毁在蒙古境内，蒙古有管辖包括调查权。如果是民航飞机误入他国，则是个一般事件，可以按照国际法处理。

军用飞机与民航飞机在国际法上是有明确区分的。

中国民航误入蒙古失事，中国有权提出派出专家调查飞机失事原因。

做出正确的事故结论必须由认可的专职机构承担物证分析工作，这是世界各国共同遵循的规则。

飞行事故原因调查是工程技术调查，由飞行事故调查机构的专家进行。飞行事故责任调查是行政、司法调查，由行政或司法部门进行。

国际民航组织颁发的《飞机事故调查手册》指出："调查一起飞行事故的主要目的在于搞清楚与该次事故有关的事实及环境条件因素，以便确定其可能的原因，从 而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防止类似的事故及其导致因素的再次出现。"在每次事故调查中，只有科学地查找到导致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才能制订出有效的预防措 施，达到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的目的。

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５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从北京飞往韩国的ＣＡ１２９航班在韩国釜山坠毁。空难 发生四个小时后，国航发表声明，全文如下：此次航班上载有旅客１５５人，机组１１人。其中韩国旅客１３５人，中国旅客１９人，乌兹别克旅客１人。据韩国方 面消息，４４名幸存游客和机组人员正在抢救中。事故目前处于调查分析和善后处理阶段。我公司对此次事故非常悲痛，并对所有遇难乘客的家属表示最深挚的哀 悼。为做好此次事故善后工作，公司立即启动了应急处理程序，成立了以公司最高层领导为首的应急处理小组，并派出工作组前往韩国处理空难事故。对于国内国外 旅客的善后工作，公司也做出了安排。我们将按照国际通行的民用航空器事故调查程序，配合有关方面，尽快查清事故原因。同时，我们也会根据国际公约和国际惯 例以及有关民用航空法规，进行善后工作的处理。

当然，根据国际法有关规定，航空器包括军用航空器在飞越他国领空时，受领空地面国管 辖，应遵守该国法律和规章。飞机在国外失事，按照国际惯例，应该由飞机所有国负责调查。可是，２５６三叉戟却没有派专家到现场进行事故调查。如果中国方面 提出派专家调查事故原因，被蒙方拒绝，是另一回事。而中国政府连提也未提！

顺便再说一说关于赔偿的事情。

华沙公 约是１９２９年由各国在波兰首都华沙所签定的公约，它是全球有关民航机空难与赔偿责任的始祖。以后又出现海牙条款、蒙特利尔公约、瓜达拉哈拉公约 （１９６１）、瓜地马拉城条款（１９７１）、蒙特利尔补充条款（１９７５），等一连串或为修正条文，或与货物赔偿有关的规定。华沙公约第２５条规定，若空 难责任属航空公司、机场或飞机制造公司者，旅客可以提出赔偿诉求。２０００年，新加坡航空公司在台湾发生误入跑道的空难事件后不到四天，即向死者家属主动 提出每位４２万５０００美元的赔偿。

如果２５６三叉戟的调查结论是由于英国三叉戟的机械问题引起，死者家属当然有权向英国索赔。

８、毛泽东为什么问三叉戟上有没有活人？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天还没亮，中国情报部门就侦听到三叉戟坠毁。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立即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报告毛泽东。以后，李德生在空军指挥所说：毛主席听到这个消息，拍着手，高兴地笑了。

林彪的大红旗离开北戴河别墅，疾驶过八三四一部队二大队大队部，大队长姜作寿到路中央拦车，差点儿被撞。中队长萧奇明愤怒极了，他飞快地追车，他忘了这 是防弹大红旗，连开两枪。萧奇明是神枪手，他的两枪打在司机头部位置，但因为车向前移动，这两枪的弹着点正在林彪的位置上。如果不是防弹玻璃，林彪就被打 死了。毛泽东得知非常生气，说打死了怎么办？到底是谁害谁？打死了林彪就说不清楚了。因为没有后果，汪东兴说算啦，萧奇明没有被处理。

９月１３日白天，中国政府已经得知三叉戟坠毁，但是机上是否还有活着的人，不知道。９月１４日中午１２时２０分，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将机毁人亡的情况报告 外交部。很快汪东兴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想了一下，问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一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油了？还是把机场看错了？汪东兴说，飞机 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毛泽东又问，飞机上有没有活着的人？汪东兴无法回答。

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官员到坠机现场，亲眼看到三叉戟上的人员全部死亡。消息传回国内，据说毛泽东破例喝了红葡萄酒，笑着说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林彪没摔死就不是帮忙。

毛泽东为什么关心三叉戟上有没有活着的人？

１９５５年中国租用印度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参加万隆会议。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机场加油时，被台湾特务往油箱里放了一颗小型的定时炸弹，使之坠 毁于公海。机毁了，但人未全亡，机上乘员中有三人侥幸活了下来。他们提供了飞机坠毁前的各种情况，对顺利破案提供了极重要的帮助。如果三叉戟上有活着的 人，三叉戟坠毁的真相就会揭露无疑。

９、２５６三叉戟是先起火后坠落吗？

９月１３日早晨5时多，中国边防检查站报告，一架飞机在温都尔汗爆炸。

空军副参谋长白云回忆：沙河机场直升机起飞后，再没有什么情况。天快亮，地面指挥所侦听到蒙古内部报告，在哪个位置看见一个发光点，发现有亮光，可能是 爆炸。我马上联想到２５６三叉戟，位置与飞机有什么关系？李德生叫我看，时间和火光有没有关系？追降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是蒙古打下来的？指挥所议论， 我们找了几个人，时间、位置这些资料都不完全，时间报来有没有误差？好多悬案，只能是可能……

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回忆：２５６三叉戟出 去后，有个情报，有个大型目标从中国方向入侵。这有两种含义，这不是歼击机，是不是轰炸机是个问号，准备作战完全来得及。以后就没有什么消息了。我从空军 指挥所下来之前，又是地面报告，大型目标着火了（在空中着火），掉下来了。不是先下来，后着火。这个情报非常可靠，是技术侦察，后来说的和情报对不上。当 时有这个反映，看见一团火球，分析是我们的民航飞机。蒙古边防部队看出来，向上报告，他都搞不清是什么，说空中不明物体燃烧降落下来，消失。不是雷达观察 到的，是肉眼看到的，雷达看不到火光。肉眼看空中一团火，空中着火。

总参某部情报室主任佟长仁回忆：９月１３日凌晨，值班员叫我去， 向我报告，是不是空军有飞机起飞？我问过空军值班室，是不是我军飞机迷航？答复我军没有飞机起飞。只能估计是民航，与民航没有直接关系，也不需要我们核 实。空军、海军都没有起飞的飞机。值班员并不了解是林彪的专机，只知道蒙古境内有架飞机坠落，不是咱们雷达亲眼看的，通过其地面反映出来的。是不是国内飞 机迷航越境？过去有过迷航，中蒙边境紧张，是不是他们击落的？只能推测。几个小时后，总理办公室传达，全国所有的飞机一律停飞，山海关机场关闭。很奇怪， 更细的不知道。到中央５７号文件传达，才知道林彪出事。

关于三叉戟空中起火，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２３日，《环球时报》（《人民日报》主 办）记者敖其尔报导：住在坠机现场三公里的拉哈玛大娘，最早发现２５６三叉戟坠毁。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２时，她看见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 机，绕图门山转一圈后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飞行，大概不到２０分钟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

看来，空中起火是２５６三叉戟急急忙忙带油迫降的原因所在。

温都尔汗几位目击者说：先看见飞机着火，然后才坠落。

中国专家说：蒙古老百姓年老眼花，把飞机上的灯误看成火了。

飞机迫降，不放起落架，前灯打不开，但可以打开机翼上的着陆灯，这是飞机上主要的大灯。飞夜航主要靠大灯，两个着陆灯相当亮，碗大的白色灯，可以把大地照得与白天一样。目击者还没有老到老眼昏花的年纪，怎么能把"灯"和"火"看成一回事？

很可能２５６三叉戟就是空中起火，先起火，后迫降。

１０、２５６三叉戟会不会像"克什米尔公主号"一样，被定时炸弹炸毁？

关于右机翼上的大洞，有人说，如果导弹直接命中，飞机就粉碎了。飞机没在空中解体，说明并不是导弹打的。也有人反驳，导弹直接命中目标少，一般都是接近目标就炸。弹片磨擦，这就有可能不发生空中解体。

如果是导弹碎片击中，出现没穿透的大洞，有没有可能呢？

可是，为什么洞周围的毛刺，有的朝里，有的朝外呢？

油箱内部爆炸的可能性极大，三叉戟机翼两边，各有两个内外组油箱。官方的说法是油箱里的油冲出来发生爆炸，造成大洞。但这个说法很让人怀疑，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造成的爆炸呢？

曾在空军司令部编研室任职、看过空军档案馆全部档案的陆文至大校认为：因为没有中国专家到达坠机现场，现在分析也分析不出问题。总之，２５６三叉戟的事故原因不明确，飞行的速度、姿态，都不清楚，分析原因很难。还有没有别的事，只能估计。

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始终怀疑，飞机是不正常掉下来的。有一个问题，右机翼的大洞无法解释，是不是内部有什么争斗？但他认为带炸弹的可能性不大。

可能性不大不等于没有可能，这是一个谜，总要猜一猜。在２５６三叉戟起飞前，有两个人站在右机翼上加油。２５６三叉戟起飞时，油箱的油盖没有盖上。会不会 有人顺手往油箱里面放一个小型的定时炸弹呢？因为２５６三叉戟右机翼的大洞是出现在机翼的油箱上，所以考虑是往油箱里扔了小型定时炸弹。“克什米尔公主” 号就是特务在地面把伪装成中药包的炸弹扔进油箱，造成飞机坠毁。因为小型炸弹威力不大，所以飞机能带火在空中飞行２０多分钟，建立空中航线。又因为带火迫 降，火越来越大，来不及把剩下的油耗光，只好冒险带那么多的油迫降，爆炸就在所难免了。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后，台湾并没有放弃爆炸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机。１９５７年，台湾行动特务欧德钦企图入境炸毁周恩来总理的出访专机，从云南畹町入境，即被畹町边防站查获。

其实，飞机飞在天上，一块抹布，甚至一颗小小的螺丝钉，都可能成为炸弹。如果抹布丢到飞机发动机里，很有可能造成空中着火。飞机飞在空中，如果出现机械故 障，最危险的是发动机着火。五、六十年代的飞机操纵系统都是直接式，只有三叉戟的操纵系统使用了液压助力装置，除了个别飞机可以扔掉发动机外，企图空中灭 火是不可能的。

１１、蒙古在２５６三叉戟飞到蒙古上空时，知不知道？

蒙古的官方说不知道，其实蒙古是知道的。１９９８年２月１５日，蒙古原外交部副部长云登接受《朝日新闻》的采访，说林彪乘坐的三叉戟低空越境，因为飞得太低，蒙古雷达没有发现。但是因为飞得太低，声音太响，蒙方一开始便掌握了该机的飞行轨迹。

第一次蒙方向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交涉时，说“深入”。蒙方到现场勘测后，并不认为这架飞机有对蒙古不友好的行为，否则蒙古外交部也不会邀请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到现场视察。

蒙古政府始终没有声明２５６三叉戟是侵犯！

至于蒙古个别官员说“侵犯”，这种口语并不代表蒙古政府的行为。

无论如何，２５６三叉戟坠毁蒙古境内的性质，决不是劫机，也不是“侵入”，而是政治避难所致。蒙古政府非常清楚，２５６三叉戟并没有对蒙古有战争行为。

黄永胜大儿子黄春光时任北空防突办副主任，事发时不在，第二、三天他才知道。防突办参谋说，三叉戟越过国境后，蒙古认为突然袭击，中共大型飞机进入我国领 空。蒙古顿时乱了套，苏联指挥蒙古军队，找这个找那个，找不到蒙古指挥官。就是一等战备，２４小时战备值班，导航台也没有人，塔台也没有人，只是飞行员准 备。又是那个点，吃完夜餐，非打瞌睡不行。手忙脚乱，还没找到领导，大型飞机就发生爆炸了。

空军副参谋长白云回忆：9月１２日是我在指挥所值班。值班首长是有情况在指挥室，没情况就回家。夜里１２时，我看没事就回去了。回家不久，打电话叫我，雷 达看见飞机，查

这飞机是怎么回事？这是专机师前一天调到山海关机场的。航线向北，向温都尔汗飞，过国境就看不见了。不久李德生到指挥所来了，怎么总政李主 任来了？我与他有过几次接触，但不好直接问。说是毛主席党中央派来的，李德生来一定有重大问题。我叫参谋长梁璞来，一起分析这情况，要不要打下来？也不知 道飞机上有谁？也没办法查。李德生心里有数，不说，他请示周恩来，如果把副统帅打在国内，怎么向全国交代？过一个多小时，天不亮，技侦八团报告，听到蒙古 人通话，温都尔汗有一架大型飞机失火掉下来了，这是最早得到的飞机爆炸的消息，技侦八团因此记功。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问，有没有可能 失火掉下来？给大使馆打电话，到现场看。可是不好由我们提。不久，蒙古外交部抗议。我们故意说不可能，那你们到现场看。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官员到坠机现场， 看地面不平，撞了，一排人从飞机上掉下来。９月１４日，李德生才说林彪在飞机上。

１２、２５６号三叉戟飞越国境后，往回返了吗？

自由撰稿人、澳大利亚汉纳姆采访时，苏联官员告诉他，２５６三叉戟坠毁时，不是在寻求庇护的路上，而是正向中国方向飞行。

２５６三叉戟飞越国境后，是不是往回返了？很难说。因为我们的雷达在三叉戟飞出国境后不久就跟踪不到了，三叉戟在蒙古境内的航线，只有靠蒙古和苏联的雷达 了。而到目前，蒙古和苏联并没有明确说明。虽然２５６三叉戟选择迫降是从北向南，而不是它的飞行方向从南向北。但这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选择迫降场，需要 在迫降场上重新建立航线。

但是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山海关到温都尔汗的直线距离，按三叉戟的速度，一个小时就足够了，甚至都用不了，为什么飞机飞行了将近两个小时？

山海关到乌兰巴托的直线距离１３００多公里，三叉戟飞行时速８５０至９３０公里。２５６号三叉戟在中低空飞行，阻力比较大，航速慢。三叉戟只飞到一半的速 度，５００多公里。为什么飞得这样慢？机上虽然有雷达，但机上雷达由领航员操作，如果潘景寅又要充当驾驶员，又要充当领航员，他看反射波，不一定能看得 懂。潘景寅一个人无法计算准确的航向，又没有地面导航，只能盲目往前飞，所以飞得弯弯曲曲。大方向正确，但具体飞到哪里，心中不一定有数。虽然潘景寅多次 飞过这条航线，但没有领航员，又是夜间，没有更多的地标。更何况不仅没有导航的“眼睛”，更没有通信的“耳朵”，他怎么飞？不要说那么大的飞机，就是一个 人骑自行车，蒙上眼睛、耳朵，你怎么骑？飞得慢耗时多是理所当然的了。

１３、是李作鹏放跑了林彪专机吗？

１９８１年1月２３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出台，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的罪证之一是“放跑飞机”。

１９７２年4月7日，山海关机场场站副站长赵雅辉、场站参谋长佟玉春、场站油料科科长王学高、场站机械师周振山、场站油车司机刘三儿等五位目击者，联名写 出目击材料，７月２日被中央专案组收入林彪材料之三，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１９７２］２４号下发全党。赵雅辉等五人写道：我们在现场亲眼看到林彪、叶群、 林立果及刘沛丰等人仓惶逃命的情形。１９７１年9月１３日零时２２分，林彪一伙乘坐红旗轿车，极高的速度开到停在机场

的三叉戟飞机附近。车还未停稳，林彪 一伙就急忙下车。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快！快！快！飞机快发动！飞机快发动！叶群披头散限，林彪光着秃头，慌慌张张地 跑到飞机驾驶舱门底下，在没有客机样子的情况下，慌忙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一个一个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叶群往上爬的时候，林彪紧跟着往上爬， 林彪的秃头都顶着了叶群的脚。他们没等机组人员上齐，连副驾驶、领航员、通信报务员都没上机，飞机滑行灯也没敢开，机舱门还未关上，飞机就急促起动，强行 滑出。在滑行中，右机翼撞坏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刮掉了机翼上的铝皮，撞碎了机翼上的绿色玻璃灯罩和有机玻璃等。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信保障的 情况下，便在一片漆黑中，于零时３２分，强行起飞。

李作鹏获释后，得到一本中共中央文件中发［１９７２］２４号文件，他在上面有大量的批注，其中在《林彪、叶群等仓惶逃命目击记影印件原文》上，用重重的铅笔批注：由此可见，并不是由于一人指示可放飞造成的恶果。

是李作鹏放跑了林彪专机吗？

１９８１年1月２３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出台，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的罪证之一是“放跑飞机”。

是李作鹏放跑了林彪飞机吗？否！

１９７２年4月7日，山海关机场场站副站长赵雅辉、场站参谋长佟玉春、场站油料科科长王学高、场站机械师周振山、场站油车司机刘三儿等五位目击者，联名写出目击材料。

７月２日，这篇目击记被中央专案组收入林彪材料之三，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１９７２］２４号下发全党。

赵雅辉等五人写道：我们在现场亲眼看到林彪、叶群、林立果及刘沛丰等人仓惶逃命的情形。１９７１年9月１３日零时２２分，林彪一伙乘坐红旗轿车，极高的速 度开到停在机场的三叉戟飞机附近。车还未停稳，林彪一伙就急忙下车。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快！快！快！飞机快发动！飞 机快发动！叶群披头散发，林彪光着秃头，慌慌张张地跑到飞机驾驶舱门底下，在没有客机梯子的情况下，慌忙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一个一个往上爬。第一个上去 的是刘沛丰，叶群往上爬的时候，林彪紧跟着往上爬，林彪的秃头都顶着了叶群的脚。他们没等机组人员上齐，连副驾驶、领航员、通信报务员都没上机，飞机滑行 灯也没敢开，机舱门还未关上，飞机就急促起动，强行滑出。在滑行中，右机翼撞坏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刮掉了机翼上的铝皮，撞碎了机翼上的绿色玻璃 灯罩和有机玻璃等。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信保障的情况下，便在一片漆黑中，于零时３２分，强行起飞。

李作鹏获释后，得到一本中共中央文件中发［１９７２］２４号文件，他在上面大量批注。在《林彪、叶群等仓惶逃命目击记影印件原文》上，李作鹏用重重的铅笔批注：

由此可见，并不是由于一人指示可放飞造成的恶果。

李作鹏感谢替他辩护的律师张思之，但他在当时写的一首诗中说张思之边鼓敲几声。张思之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其中有一个意思说如果他如果敲鼓中心，他也会被判１６年。

律师不敢为李作鹏辩护“放跑飞机”，但其实，“放跑飞机”这件事根本不能起诉，２５６三叉戟是强行起飞，不是被谁放跑！当然，强加到李作鹏头上的有关“篡改周恩来指示”等罪名也是会真相大白的。

李作鹏虽逝世，但他留下了回忆录，让我们耐心期待！

１４、苏联对２５６号三叉戟如此重视，事前知道吗？

１９７１年9月１３日零时２２分，林彪、叶群等从工作梯登上２５６号三叉戟。海军山海关机场的目击者不知道是林彪，说是一个“秃老头”，一个“胖女人”，都上去了。

九一三事件后，国外传闻纷纷，说林彪并不在坠毁的２５６三叉戟上。

苏联事前对２５６三叉戟一无所知。

九一三事件这么大的事情，飞机怎么掉下来？时任新华社东欧组资深记者的杨达洲回忆：１９７１年9月１４日一上班，军代表到《参考新闻》编辑部紧急动员，指 定东欧组收听俄语广播，并要求俄语室盯住塔斯社，特别注意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收听敌台是总参三部和广播部门的事情，新华社没有这份业务，这是为什么？ 很快我们得知中国民航飞机掉在蒙古，再后来知道是林彪座机。蒙古也很紧张，不知道怎么回事，中国一架民航飞机突然掉下来，也不知道里面是林彪。当时苏、蒙 都不知道林彪跑了。最敏感的是西方记者，两三天后发现问题，怎么中国国内的民航机场都关闭了？又很快发现新华社门口墙皮上白底黑字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给 涂掉了。那些天西方记者老在新华社门口、外交部、钓鱼台、中南海这些关键大门的外面转，写了报道，猜很可能林彪出事了，这才引起苏蒙方面的重视。

１９７１年，苏联俄国远东研究所研究员、曾长期担任苏共中央国际部中国处处长的库里克说：苏联首先没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谁摔下来了？因为不久前，中国对林彪还是大加赞扬的。

所以，苏联人第一次到２５６三叉戟坠机现场时，并不知道机上有林彪。但很快苏联人发现，林彪不再露面，黄吴李邱也不露面。苏联马上反应过来，又赶快派人到２５６三叉戟坠机现场，挖开坟墓，取走了林彪和叶群的头骨。

《真理报》派驻新中国的第一位记者、曾在苏共中央社会主义联络部国际部任职，现任俄国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的杰留辛说：我们确切知道１９４１年林彪曾经 到苏联治过病，作过牙的模型，有医疗档案，有牙的照片。后来我们派了一批医生到坠机现场，给整个尸体作了检查分析，并拿到林彪当年治过病的医院进行对照， 主要根据牙的模型，这才确定林彪在２５６三叉戟上。

１５、２５６三叉戟的坠毁原因到底是什么？

在关心三叉戟乘机人员死因这件事上，中国最不积极。蒙古人建议是否法医解剖，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到坠机现场看后，认为死因十分明显，就是飞机失事，不必再折腾了。双方商量就地埋葬。

在中、蒙、苏三方中，只有与飞机最没有关系的苏联人最积极，几次去现场，并把尸骨带回国研究。据澳大利亚记者汉纳姆报道：苏联人说，他们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找到了真正的死因。但是苏联人不公布，说既不能告诉中国人，也不能告诉蒙古人，只有勃列日涅夫等四个人知道。

按苏联人掌握的坠机现场，似乎林彪的死因不是中国公布的因为没油，迫降没有成功。而七、八十年代后，苏联和中国的紧张状态慢慢融化，直到现在成为友好邻邦，完全没必要为九一三事件撕破面皮。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苏联保持沉默呢？

因为死因蹊跷，至今快４０年，仍众说纷纭。

英国通讯社来自莫斯科的消息，林彪身上有蜂窝般的弹洞。

新华社记者杨达洲说：贝尔格莱德是新华社重点分社之一，１９８５年我由新华社派驻贝尔格莱德，年底宴请南通社领导。南通社社长沙拉勒维奇与我差不多的年 纪，在北京就认识，处得不错。聊到林彪，那时他是驻蒙古和朝鲜、中国三方的记者。蒙古与外国交往很少，难有熟人，南斯拉夫二号人物访朝鲜和蒙古，到乌兰巴 托，蒙古通讯社请他吃饭。听到聊２５６三叉戟的黑匣子，比较关心。蒙古记者的爱人在座，她通中文，是蒙古公安部中文处处长。２５６三叉戟的黑匣子先在蒙古 人手里，后到了苏联人手里，破了。之后蒙方老提抗议，害怕说是它打下来的。这样，蒙古公安部的中文处长才有机会听到黑匣子。

蒙古公安部中文处长说听见黑匣子里有吵架声，有枪声。

杨达洲认为：这飞机一般不会掉下来，判断飞行员潘景寅不同意跑到伊尔库茨克，林立果逼的，应该为烈士昭雪。杨达洲赶紧写了内参，由新华总社发在给政治局委员看的《参考清样》上。

新华社后来驻蒙古的记者王义民说：九一三事件时蒙古没有新华社记者。周恩来总理指示密切注意各方面的情况，外电反映都控制在极小范围里。他认为１９８５年新华社的那篇内参，完全是捕风捉影。

２５６号三叉戟上发生枪战了吗？

中国到现场视察的外交官仔细看过尸体，尸体上没有发现枪洞。三个机械师和飞行员都没有武器，机上有枪的只有林立果和刘沛丰。林立果的手握着腰上的枪，没拔出来。

苏联退休的克格勃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坠机现场发现的所有的枪都没有发射过子弹。这句话不对，李文普从北戴河到山海关的车上下来，林立果打了他一枪，只不过这一枪打在右前车门把上。

只有这一枪。

１９７２年，空军五人专家小组分析三叉戟的坠机原因，上边特意让找尸体上的弹洞。曾学过三叉戟修理、时任空军机务部参谋的金华说：我关在地下办公室里三天三夜，仔细看了２５６三叉戟坠机现场的照片，洞多了，但没有发现弹洞。

１６、李德生为什么被派到空军指挥所？

九一三之夜，李德生打着总政治部主任的旗号，被毛泽东派到空军指挥所。

李德生任总政治部主任是林彪提议，毛泽东批准的。可此时李德生也兼着北京军区司令员。

１９７１年1月２４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指示，在华北会议上宣布中央决定，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这是毛泽东“挖墙角”，“掺沙子”的重要措施。可是李德生先前的总政主任并未免掉，那么应该是兼，谁前谁后？一笔糊涂账。

１９７１年9月１２日中午，毛泽东秘密回到北京，在丰台车站接见了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谈话结束后，已经是下午３时多，毛泽东单独交给李德生一个 任务，立即从３８军调一个师放在南口。南口是北京的战略要地，这是对付即将发生的九一三事件的一个极端重要的军事部署。

李德生说：毛主席对林彪一伙可能要搞武装政变的最坏的情况都估计到了。

李德生和纪登奎立即回到北京军区，和政委陈先瑞等领导研究布署军队行动。

忙完，这就到了晚上。李德生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恩来主持的小型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这时，李德生的心情还没平静不下来，他紧张、忧 虑，脑子里一直转着毛主席中午接见时的谈话。他想：斗争还没有完，林彪到现在也没有认错的迹象。这场斗争的前景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是向好的方向转化， 还是继续向坏的方向转化呢？

会议进行到晚上１０时多，突然工作人员请周恩来接电话。

周恩来一直没回来，讨论停止。

午夜零时后，周恩来把李德生叫到小电话间，说林彪要乘飞机跑，你赶快到空军指挥所，代替他坐镇指挥。李德生极为震惊，事情终于发生了！

他立即坐车来到空军大院，直到九一三事件发生后。

李德生本来是不离开空军指挥所的，９月１４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叫他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晚上9时李德生回到空军指挥所，笑着宣布：大好事，飞机炸了。这时明 确了，但指挥所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２５６三叉戟上都有谁。正在空军指挥所值班的空军作战部参谋朱秉秀说：９月２８日李德生正式传达才知道，西郊机场似乎知 道得早一些。９月１３日早晨，直升机向怀柔飞去时，吴法宪向在场的专机师领导（时念堂、马兰藻、曹庆章以及标图员）

宣布：林彪及叶群、林立果等乘坐的 ２５６三叉戟投敌叛国，根据侦听部队报告，飞机已经在蒙古国内坠毁。

１７、２５６三叉戟是不是被打下来的？

李德生赶到空军指挥所时，２５６三叉戟已经起飞。

标图版上，一条向北的线，过了承德，到了内蒙古上空。李德生不断用电话将飞机的高度、位置、方向报告周恩来。

空军参谋长梁璞说：这架飞机飞行不一般，情况异常。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往北，马上要出国境到蒙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

２５６三叉戟的飞行高度３０００米，这是海拔高度。实际上还要减去地面的实际高度，当地海拔６００米，也就是说，２５６三叉戟才飞２４００米左右。这样低 的飞行高度，边境的雷达监视只有几十公里，飞机坠毁到国境线外３６０公里左右。空军报告：飞机的飞行高度在２５００至６５００米之间。飞如此之低，就是为 了逃避歼击机的攻击。

空军参谋长梁璞多次请示李德生，对２５６三叉戟采取什么措施？如果将其击落还来得及。再拖延下去，附近机场的战斗机就追不上了。李德生说：吴法宪也请示过，毛主席不同意打。李德生再次请示，要不要打下来？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他去吧。

１时５５分，２５６三叉戟飞出国境，下降到２５００米，左右拐弯。

２时３０分，各条线路同时报告，飞行目标消失。

据时任空军作战部部长的鲁珉说：在２５６三叉戟建立的这条航线上，没有设置地对空导弹部队。

这一点担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的林立果十分清楚。他不会去撞“枪口”。

而且在２５６三叉戟飞越国境前，空军的歼击机也没有起飞。

就是说，中国没有对２５６三叉戟采取任何军事措施。

但是，蒙古或者苏联驻蒙古的军队有没有采取军事措施，还是个谜。

１８、２５６号三叉戟野外迫降为什么没有成功？

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２５６三叉戟的失事原因是野外迫降没有成功。

时任空军作战部参谋的朱秉秀认为：抱着一线希望迫降，没成功，摔零碎了。没山丘可能迫降成功，右机翼碰到山丘，那么大速度，顶翻了。先烧后炸，谁也没有逃 掉。特别晚上无照明，成功的可能性很少。向左偏一点，没准就迫降成功了。距坠机现场６０公里是温都尔

汗土机场，要飞到那里，油是够的。土机场也比沙丘好， 因为三叉戟的两翼与机肚几乎是在水平线上，不适于野外迫降。

空军司令部编研室陆文至大校说：三叉戟有自动驾驶仪，如果地面情况特好，特平，有可能不起火。现在根本说不清，尽量让油少一点，当然不能保证不起火，起码 烧不了那么大。为什么迫降？分析飞行员心态不好，思想斗争非常激烈，领航没上去，航线也不正常，又不能不考虑飞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的后果。当时什么心 态？是不是想同归于尽？如果迫降成功，也表明他不想去。油没有烧干，并不是只有迫降一条路，为什么带油迫降？绕上三圈，油就可以耗一些，把油放掉再迫降， 为什么没采取？

现在看２５６三叉戟出境没想那么周到。潘景寅一个人忙不过来，当时状态很容易紧张。内行人说，这么高速的飞机，又是在晚上，又是在异国，一个人迫降，再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成功。确实，这种三叉戟夜间野外迫降，从来没有成功的先例。

曾任空军作战部领航处参谋的刘振华说：当天他不在指挥所值班，事后听说飞机一直飞出去，没有飞回来。运输机是个机组，要有领航员，空勤组齐全才能飞。因为 专机有时要自己在空中临时选择航线，如果偏出，领航员要提醒。不像民航，民航是固定航线，地面导航又齐全，上不上领航员无所谓。一般苏联老式飞机还有领航 员的位置，美国飞机根本就没有领航的位置，领航员只能临时坐在正副驾驶之间。

朱秉秀说：飞机事先要与机场约好波段，要不通不了话。电台波长知道，调到频率，很容易。

吴德认为，最大的问题是飞机上的“联络员”没带上，没有“联络员”，通信联络不上，飞机到了温都尔汗找不到乌兰巴托了。可能还有油不够了，温都尔汗是一个草原，飞机就迫降了。

飞行员实施野外迫降动作，没放起落架，打开了前开缝翼。但迫降动作没有做全，没打开减速板，致使飞机迫降速度过大。第一次没爆炸，跳起来，第二次折断右机 翼。使馆官员看过现场后说，机翼在飞机降落时，折断了一个，以后飞机冲出了１０００多米，机身因此破裂、着火。人可能是被猛烈的冲撞甩出来的，草地上一片 狼藉。

如果机组人员全，就可以从容分工。

很多人说：如果领航李成昌在，如果通信陈松鹤在，２５６三叉戟就会安然无恙。

１９、 ２５６三叉戟迫降是因为没油了吗？

从蒙古温都尔汗到乌兰巴托２９０公里，相当于北京到山海关。对于每小时飞行几百公里到一千公里的三叉戟来说，确实没有几步远了。

当然正在空中飞行的２５６三叉戟来说，油确实是个大问题，一滴油难倒英雄汉。刚起飞速度不大，仪表上指示的速度与实际速度不完全一样，顺风和顶风，以及温 度、湿度都会影响到速度。往西北飞顶风，空气密度大。９月风还小，春天飞上海，３００公里顺风，那就省油了。平时地面没感觉到有多少风，空中也有１００多 公里的风，从山海关往伊尔库茨克飞，正是顶风，所以速度上不去，耗油也大。国内随时可以落地加油，可在夜间的国外，

你上哪儿加油去？虽然到伊尔库茨克与到 广州的距离差不多，林立果没算过这个账，高度、速度都不正常，三叉戟飞３０００米，太低。但三叉戟可以飞到９０００米，高度越高，越省油。

空军作战部参谋朱秉秀回忆：２５６三叉戟非常意外，未知数太多，飞机上有多少油？多少人？什么人？加油、载重、航程成正比，都没有具体资料。李德生坐在那里，指挥所谁敢乱“放炮”？但心里都疑问多多，知道问题严重了。

在山海关机场，２５６飞机油加进去了吗？

官方的说法是没有。但到底有没有？还是一个谜。因为三叉戟起飞前，两辆加油车正在加油。肯定是加油了，但加进去多少没有公布。先是压力加油，起落架上有个 油嘴，小机场油嘴不配套没加上。但还可以重力加油，从上面加，人要站到机翼上去。在三叉戟起飞前半小时，两辆加油车就去了，而且右机翼上有两个人，所以很 可能加了油。

朱秉秀说，到山海关，消耗多少油能计算，但山海关油车加了多少不知道。山海关机场没加完油，但加了多少？很难计算。油不能加得太满，太满压飞机，油也不能飞到一滴没有，没油了，马上往下掉。可是油耗不尽，飞机若爆炸，可就不得了了。

山海关加了多少油怎么查不清呢？要查也应该能查，查加油车就能知道。

三叉戟正在往国境线上飞，在空军指挥所的李德生专门问，三叉戟有多少燃油？空中耗油量是多少？根据飞机位置，还有多少航油？还能够飞多长的距离？

三叉戟在迫降时有多少油，这是个关键问题。

官方的说法是潘景寅一个人，没有领航，没有通信，也没有副驾驶，心情又非常糟糕，搞不清飞机的位置，油又不多了，只能赶快迫降。那么，油量不够是惟一的坠毁原因吗？据专家说，油绰绰有余。如果不是没油，那为什么要急急忙忙迫降？为什么不把油耗到最低限度再迫降？

１９６５年6月，第二届亚非会议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召开，周恩来率团出席。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坐我们自己的专机出国访问。在开会前，他还访问了巴基斯 坦、伊拉克、苏丹、坦桑尼亚等国。6月１９日，飞往阿尔及尔。刚起飞，空军指挥所接到外交部紧急通知，阿尔及尔发生军事政变，通知专机返航到开罗，以防不 测。因为起飞不久，剩油较多。为了减轻着陆重量，确保安全，专机在埃及飞行指挥中心规定的空域盘旋了半个多小时，耗去多余油量，才安全降落。

很多人判断三叉戟飞到乌兰巴托油是够的，飞伊尔库茨克油也够。为什么掉下来？当时没传达。是机械故障？还是机组人员不愿意，借口油不够？

时任空军作战部领航处参谋的陆文至说：三叉戟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飞机，仪表很完整，无人操作也可以飞到目的地，中途摔下来，怎么回事？按常理不至于在那地 方摔。油把人烧焦，油炸的一样，证明还有油。大飞机滑个百八十公里没有问题，不是没油，说没油是此地

无银三百两。飞行员出身的空６军副军长薛伦说，油量也 够，飞行员技术也挺好，不应该迫降，这真是个谜，正常迫降也不至于这样子。软草地不应该这么严重，散地２００多米长，不应该。曾任北空参谋长的方国俊说， 中央不是统一口径了吗？依我们飞行员的说法，非正常死亡。

如果还有油，为什么在野外迫降？

２０ 毛泽东为什么不让拦截２５６三叉戟？

可以肯定，２５６三叉戟深入蒙古不是被劫机，不是入侵。
但是，２５６三叉戟是自己掉下来的，还是被打下来的？有人怀疑是不是我们在边境打下来的，甚至越境打下来的。

空军副参谋长白云说：问题重大，我打电话叫参谋长梁璞来。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来电话，飞机跑了，是不是打下来？叫我们把所有的对空台都打开，呼叫返航。 梁璞和吴法宪几次通话，还可以打，歼击师有值班飞机。吴法宪请示后说不准打。指挥所一直紧张，打不打？做好备降准备，好多事情做。刚有点闲，直升机又上去 了，又开始紧张。命令打直升机，直升机速度低，打也困难。情况不明了，以后才清楚，林彪怎么在飞机上？吴法宪也不一定清楚林彪在飞机上。

吴法宪为什么提出要打？空军参谋长梁璞也提出来要打？

打？怎么打？空军指挥所作战参谋没有提出打。空军作战部值班参谋朱秉秀说：打要有准备的时间。飞机起飞不那么简单，根本来不及打。２５６三叉戟飞那么 低，３０００米，甚至３０００米以下。讲打，真正落实打，技术上不能解决。赤峰机场不在引导范围，远航作战达不到。当时高空作战的夜航大队是歼五、歼六， 没装备空空导弹。加上半径限制，也够不到，吴法宪弄不懂。对付直升机完全有手段，打三叉戟没有手段。朱秉秀断言，从技术角度看，当时没有条件打。打Ｕ２， 都是２万米的高度。而三叉戟高度太低，导弹制导不了，无线电抓不住。而且三叉戟选择的航路沿途没有地空导弹部队。看样子，林立果仔细研究了航线，如何躲过 地面导弹和空中歼击机的打击。三叉戟速度也不比歼击机慢，拦截也不可能。它自己建立的那条航线上，没部队，没机场，拦截不到。作为工作人员，只能摆出具体 情况，供首长参考。李德生出出进进，就坐在我身边，也不需要作更多报告，指挥所里有红机子，直接对主席，也可以找总理。李德生到指挥所，三叉戟已经起飞。 三叉戟与直升机不一样，直升机当时报过来了。三叉戟起飞时，我们还糊涂，没有判断，怎么会出现这情况？不知道怎么回事，实际情况不掌握。飞出国境，雷达消 失，还怀疑是不是着陆温都尔汗？没判断摔，李德生拿电话向总理报告飞机消失，什么位置他没有判断。李德生在指挥所三天三夜。当时记录，我记了很多，来来往 往，最后把我的记录本调走，这个本子现在哪里，我不知道，王洪文调走的。调我的本，也应该调标图，没见到公开，应该还在。

我多次采访过时任空军作战部部长的鲁珉。他说：绝对不是中国打的。当时中国只有空

军装备从苏联进口的地空导弹，发射最远距离４０公里，怎么可能打到深入蒙古境内３００多公里的飞机？

吴德说：不是我们打的，我们没有打，蒙古方面也没有打。飞机出境后，我们的雷达很快丢了目标。飞机进到蒙古纵深，边界都看不见了，肯定不是我们打的。

２５６三叉戟开始向西，以后向东，最后突然向北。吴法宪一一报告给总理，２５６三叉戟飞到赤峰附近，１时１２分，吴法宪打电话请示是否对飞机进行拦截。 汪东兴请示毛泽东后，回吴法宪，不要派飞机阻拦。吴法宪说拦截是一种政治表态。专机叛逃，空军司令员的责任非同小可。管它能不能打，先表个政治态度。不是 我不积极打，而是上边不让打。如果上边说打，我先组织力量，打得了打不了再说，是不是这样呢？吴法宪后来解释，我说的拦截，不是打下来的意思，而是要截回 来。周总理说这要请示毛主席，答复是让他去吧。飞机向西时，吴法宪要胡萍叫专机师用报话机喊话，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飞。喊了１５分钟，没有回答。到凌晨１ 时，周恩来问飞机到什么地方了？吴法宪回答，离中蒙边境还有１００多公里，高度３０００米。……１时５５分，飞机飞越国境，雷达看不见了。

有关这些作战的情况毛泽东并不一定清楚。而吴法宪请求的是要不要拦截。但毛泽东坚决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他去吧。

难道毛泽东胸有成竹？

难道２５６三叉戟被做了“手脚”？

至于蒙古打没打？我们并不清楚。就是蒙古没打，驻蒙古的苏联军队会不会发射地空导弹？说不清楚。因为中国的事故调查专家应该到场，却没到现场，无法得出更准确的结论。苏联人不“坦白”，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只能和苏联人一样沉默。

２１　２５６号三叉戟飞到北戴河上空了吗？

９月１３日凌晨，北戴河林彪别墅的工作人员听到了飞机响声。这可能吗？北戴河在山海关机场的东北５０公里，上空没有航线，３４师师长时念堂说：三叉戟起 飞后，再也没有返回山海关机场。飞机时速５００公里，早超过了北戴河的范围。但是如果飞机建立起落航线，北戴河就能听见。９月１２日晚上林立果乘三叉戟到 北戴河，在外面乘凉的林办工作人员就听到了飞机落地的声音。２５６三叉戟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先向西南，右转弯，对着北京方向，到迁安（这是飞行员潘景 寅的老家）改向西北。

时任北戴河北京军区疗养院外科护士的杨桂兰回忆：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凌晨她起床给儿子换尿布，忽然听见房顶轰 隆隆响，大得好像房顶上开过去拖拉机。杨桂兰是飞行员家属，她对飞机起飞并不陌生，但她说在北戴河半夜听见飞机声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所以她根本没有当成 是飞机声。北戴河北京军区疗养院和林彪别墅是邻居，住在林彪别墅附近的人听到２５６三叉戟起飞也是真实的。

林彪警卫秘书李文普也清楚 地听到了２５６三叉戟起飞的声音。李文普自伤后，被八三四一部队的卫生员简单包扎，经外科医生出身的张清霖检查，之后很快被八三四一部队的

官兵押送到北戴 河北京军区疗养院。咚咚咚砸开急诊室的门，值班的外科医生询问是枪伤，也没多问，直接进手术室清创。因为子弹没有留在体内，手术时间不长。而手术中间，手 术室的人都听见了飞机起飞的巨大声音。外科医生正忙着，没有注意其他，而在旁边的护士发现病人李文普听见飞机声后明显一愣。

李文普的心理活动应该是这样的，奇怪！林彪飞机怎么起飞了？林彪飞机怎么能起飞呢？八三四一部队不是拦截不让走吗？林彪在飞机上吗？作为贴身警卫的他没有跟着林彪走，会对他怎么处理呢？反正枪走火，自己负伤进了医院，没法鞍前马后了。但会对他怎么处理，他心里没有底！

李文普的情绪沮丧极了，黑着脸，一句话不说。

八三四一部队派来看守李文普的官兵要求给李文普找一个单间病房，要大一点，因为八三四一部队的两个人，一个官，一个兵，２４小时每时每刻要监视李文普， 并要求无关的医护人员不能进来。住院的几天中，李文普在枪口下吃饭，在枪口下上厕所。我问过八三四一部队的负责人，最初是把李文普当作敌人了吗？回答不 是，只是为了保护李文普的安全，不能让他死了。言外之意他再自杀怎么办？

几天后，连主管医生也没有通知，八三四一部队就悄悄把李文普带走了。护士整理房间时发现李文普床垫底下有几张写满字的纸，赶快交给领导。３８年后，这些目击者只记得大概意思是枪走火。

李文普是走得匆忙，还是故意留下点什么把柄？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我采访北戴河北京军区疗养院前，没有任何人找过接触李文普的医护人员谈话，问过这些事。只是看过李文普遗留纸片的几位医护人员被办了学习班，直到传达九一三事件后才被放回家，但要求他们对谁也不能说。

２２　谁知道２５６三叉戟飞向哪里？

在空军指挥所、北京军区指挥所、北京军区空军指挥所，以及西郊机场调度室的人们都异口同声，三叉戟飞出去是一条直线。北京军区作战部参谋刘建林说：飞机 从山海关起飞，一条特别直的直线，直奔蒙古。搞不清敌机我机，没说打，请空军重新再标一下，还是一条直线。一点弯都没有。空军指挥所作战值班参谋朱秉秀 说：当时根本判断不出来，不知道林彪在飞机上。传达禁空令，只是感觉问题大了，直到９月２８日李德生传达，才知道林彪在飞机上。２５６三叉戟从山海关往北 飞，航向推测向国外，一根直线，直向乌兰巴托。空军雷达兵部部长傅英豪事后画航图，基本上是之字形，山海关、迁安、多伦、贝勒庙、伊德尔莫格、温都尔汗。

但是，谁也不知道２５６三叉戟飞向哪里。

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回忆：那时太紧张，没想到这局面，林立果和周宇驰要跑。９月１２日下午说广州、重庆、东北，飞这三个点。林立果说，明天还要送大家去广 州。我们开会到夜里１２时，会没开完就作废了，但还是到广州。半夜我的秘书孙水森说，调度室说林

副主席要回来（北京），飞机起飞了。我看情况有点紧张，就 去了指挥所。李德生先进去，我后进去，看飞机向西，拐大弯，向正北，很快就要出去，我去时还没转弯。我当时不知道林彪在飞机上，梁璞说，是刘沛丰、林立果 他们。标图板是一块大荧光屏，墙上标图，桌上也标，高度、方向都一清二楚。航向很乱，过了遵化才发现目标。慢慢朝北飞，又向西，后来朝北，当时判断飞机可 能出境。２５６三叉戟飞的不是国际航线，飞国际航线要转华北，通过二连浩特。梁璞好像非常奇怪，说很不正常。２５６三叉戟没在航线上，就像火车没在轨道上 一样，当然异常。

李德生坐到荧光屏前５分钟后，目标就消失了。李德生来，王飞觉得很反常，全国的雷达全部开放，更从来没有过。很快 ２５６三叉戟过了国境，短程雷达只有一部跟踪出去。雷达掌握不连续，出境后高度下降，判断想找地方迫降。掉下去也知道，雷达再远也能看到。飞机没高度，就 是掉下来。

王飞也没多想，更没想到逃跑。他认为这事与自己没有更多牵连，就回家睡觉。第二天，李德生在空军司令部找王飞谈话，有半个小时。怎么回事？这几天干什么了？王飞就哼哈，什么也没说，怕说错了。以后就没有谈。几十年后，王飞说，现在看李德生有准备，但当时很随便。

王飞回忆：９月１４日中午我看到中央文件，紧急战备？雁门关、长城以北、嘉峪关，三北部队要提高警惕。不就是林立果跑到广州去了吗？我觉得没有那么严 重，晚上李德生开会，说空军出了问题，空军应该组织起来，找几个人负责，曹里怀、梁璞、王辉球、白云……我当时想，我一定有牵连，知道要糟糕。开完会不到 １２时，我在司令部看文件电报，１２时多回家。正要洗澡，副司令员曹里怀打电话叫我到办公室。我去了指挥所，曹里怀把李德生的一个纸条给我："王飞同志， 请到我处谈一谈。"曹里怀说李主任找你谈，好好谈谈，没什么事，谈清楚就行了。我出来上汽车，从此失去自由。

王飞被抓后，说十五贯，娄阿鼠。

纪登奎听娄阿鼠这个名字陌生，急忙说娄阿鼠是谁，快把他带来，不能让他跑了。

９０年代我采访王飞时，说起这事他还在笑。

《十五贯》是昆曲代表作之一，在昆曲中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原剧由清朝朱素臣所著，后由陈静执笔，据此和小说《醒世恒言？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改编，浙江昆苏剧团１９５６年首演。

内容是无锡县肉铺老板尤葫芦借十五贯本钱作生意，他对女儿苏戍娟开玩笑说这是卖她的钱，女儿信以为真，连夜逃走。赌徒娄阿鼠闯进尤家，为还赌债盗走十五 贯钱并杀死尤葫芦，过后反诬苏戍娟谋财杀父。苏戍娟与不相识的客商伙计熊友兰同行，而熊友兰正好带钱十五贯，于是被邻居扭送县衙。知县过于执听信诬告，定 苏戍娟勾结熊友兰盗钱杀父，判苏、熊二人死刑。监斩官况钟觉得内中有冤，力争缓斩。他乔装算命先生，套出娄阿鼠杀人的口供，杀人者伏法，蒙冤者昭雪。

《十五贯》强调了况钟注重调查研究、重事实、重证据、秉公执法的作风，深刻揭露

了封建吏治的黑暗腐朽，发人深省。１９５６年５月１８日，《人民日报》发 表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称赞它是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良好榜样。同年，昆曲《十五贯》摄制成彩色戏曲艺术影片，被诸多剧种 移植，在民间流传很广。

可惜办理九一三案子的纪登奎没看过。

１９８０年审理“两案”，要不是因为王飞的“精神病”，他就成了主犯。

直到现在王飞仍是保外就医，没判，但一直是犯人身份。

除了“娄阿鼠”，王飞脑子里还响着一句话：赵树理说公鸡会下蛋，我就说亲眼见。

２３　　２５６三叉戟上四位飞行员怎么能算病故？

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２日，总政治部签发三份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

这三位“病故”军人是：李平、邰起良、张延奎。

熟悉九一三事件的朋友都知道，这是２５６三叉戟上的三位机械师。

当过飞行员的朋友都知道，飞行员有一点点小病，都是不能飞行的，更不要说为当时中国的一号专机飞行了。

这三位机械师身强力壮，怎么能算病故？

１９７８年春夏之际，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重新主管中央军委工作。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平反冤假错案时，邓小平说：清查“四人帮”体系。林彪的问题也要重新审理，在揭批“四人帮”中必须联系林彪。

这样，总政治部重新翻开林彪案卷，发现没上飞机的五位２５６三叉戟机组人员已经被处理复员，而四位已经殉职的机组人员还悬着。对他们怎么处理？在当时那 种情况下，处理者认为肯定不能算烈士。张延奎的家人被告之，就按病故。之前张延奎一直被当成叛国、反革命，家人早就胆战心惊了，现在能给一张《革命军人病 故通知书》，谁还敢再多问一句为什么。

张延奎终于被承认革命军人了，但是张延奎父母只得到２００元抚恤金，却仍然没有享受到每月应该 得到的几十元补助。上边说，等着吧，县民政局会找你们。一直等到１９９１年，仍没有人上门。张延奎家人托人四处找，才最终找到补助，但以前的不给补了。张 延奎的父亲才领到几年的补助，就去世了。

张延奎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军队，一直是优秀学生和战士。小学、初中他都是学校的尖子，平时老实 极了，只知道学习，别人打他骂他，他从不还手还口，也不跑，任人打任人骂。１９５９初三上半年，张延奎等５０名同学到沧州体检飞行员，只有两位同学进到复 查，但最后也被打发回家。张延奎初查就被刷下来，腿上有一个小包。下半年初中毕业，全校只

有张延奎一人被保送沧州师范学校。１９６１年上半年，张延奎再次 体检飞行员，这回顺利通过。１９６１年6月，张延奎和沧州师范同学于景瑞一起进入空军航校，之后又一起分到空军３４师，同在沙河机场当机械员，负责里二飞 机的保养。当兵十年，张延奎只回家一次，２０天假他只休了七天，就急着要回部队，说别人保养他的飞机他不放心。张延奎的单位年年寄一张奖状回来，家人一直 以他为自豪。

１９７０年中国引进四架三叉戟，张延奎和于景瑞又一起被调到１００团，张延奎担任２５４三叉戟空勤机械师，于景瑞担任 ２５６三叉戟空勤机械师。四架三叉戟都是旧飞机，２５４三叉戟飞的时间最短，本来是把２５４三叉戟作为林彪专机的，但发现２５４三叉戟的机头被小鸟撞了一 个坑，于是林彪专机就换成了２５６三叉戟。１９７１年8月中旬，２５６三叉戟空勤机械师于景瑞到庐山疗养。9月１２日，２５６三叉戟从西郊机场到北戴河 时，就临时换上了张延奎。

张延奎事先并不知道，9月１２日这个星期天他是准备回家的。他结婚还不到一年，爱人在王府井百货大楼上班， 家安在城里的一间小平房里。屋里又潮又暗，天又渐渐冷了，而爱人这时已经怀孕，张延奎说被子太薄，我从机场带一床被子来，合在一起。爱人左等右等， 9月 １２日张延奎没有回家，而且以后也没有了消息。

在四位牺牲的飞行员家属中，我最先找到的是飞行员潘景寅的家属。潘景寅是１９８０年 １２月２３日才发给《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比三个机械师晚了两年多。要不是潘景寅家属凭着邓小平“飞行员是个好人”的一句话，这个病故通知书也拿不到。 ３４师有关复查组的人说：因公通知书没有了，我们这个复查组马上要解散，你就签了吧。潘景寅家属就签了。

潘景寅的《革命军人病故通知 书》是这样写的：潘景寅同志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特向各位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而努 力奋斗。而张延奎的《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是另一个版本：张延奎同志，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在蒙古温都尔汉（汗）随机坠毁死亡。除由我军妥善安葬悼念外，特向革命家属表示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发扬革命传统，将革命进行到底。并请向山东省庆云县革命委员会申请抚恤，享受病故军人家属优待。落款是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明眼人一眼可以看出，这张《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非常矛盾，到底张延奎是随机死亡，还是病故？至今又过了３１年，应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了，应该给张延奎和另三位飞行员烈士称号。

既然张延奎的病故通知书上说“我军妥善安葬”，那就理所当然应该由中国政府向蒙古要回张延奎等三位机械师的遗骨，安葬在他们本人的家乡。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３日，正值八月十五的晚上，我走出张延奎家人的大门，看见满天莲花般的云朵，一轮磨盘大的圆月正在云中穿行。微风从枣林吹来，我想云是遮不住月的。

２４　英国三叉戟是如何进入中国的？

１９６１年８月４日，哈特菲尔德出厂第一架三叉戟１Ｅ型，１９６２ 年１月９日试飞。１９６３年初，四架三叉戟投入试飞计划。１９６５年１１月三叉戟１Ｅ 型获得适航证，陆续生产１５架，其中四架１３９座。主要用户有科威特航空公司、伊拉克航空公司、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锡兰航空公司和塞浦路斯航空公司。

三叉戟（Ｔｒｉｄｅｎｔ）是英国霍克西德利公司（后并入英国宇航公司）生产短、中程喷气客机。为什么叫三叉戟？飞机设计了三套独立的飞行控制系统和三台 ＲＢ１６３－２５ ＭＫ５１１－５喷气发动机、单台推力５０。７千牛。三叉戟１Ｅ型设计现代，发动机后置，机翼外形干净。机翼前缘后掠３５度，这是当时商业 飞机的最大后掠角。它的总体设计也很新颖，机尾３台涡轮风扇发动机。机舱内噪声很小。因为发动机的推力线靠近机身轴线，当一台发动机失效时，造成的偏航力 矩也较小。所有飞行操纵都是动力操纵，由三套完全独立的液压回路执行，每一套压力系统由一台马达驱动。机翼外各有两副机轮的主起落架可以机翼主梁为轴翻 转，先翻转９０度和伸长１５厘米，然后再收入机身，而不是收入机翼下表面。双前轮向左偏置，并且侧向收放。所有燃油箱都置于机翼中。三叉戟可在满油出航后 不久，再飞几个短程航段后再重新加油。

５０年代末，中国民航引进第一批伊尔－１８和子爵号飞机，主要用于专机飞行，１９７０年７月２０日，毛泽东从武汉紧急飞到上海，就是坐的伊尔--１８，这是 毛泽东最后一次坐飞机。子爵号有四台螺旋桨，是当时中国最高级的飞机，因５０年代末中央决定毛泽东不再乘坐专机，子爵号就作为林彪专机。
那时美国 封锁中国，中国买不到先进飞机。巴基斯坦则购买了几架比三叉戟更先进的波音，不想再用三叉戟了。经协商，７０ 年代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从巴基斯坦转口四 架旧三叉戟用作公务专机。潘景寅带队到广州改装，由巴基斯坦飞行员带飞。１９７１年夏，子爵号淘汰，林彪专机确定为三叉戟。２５４三叉戟是巴基斯坦总统座 机，但因为飞行时机头被小鸟撞过，不能再作为一号专机，于是决定改装２５６三叉戟。四架三叉戟已经在巴基斯坦飞过好几年，一些机件老化，必要的备件买不 到，只好拆东墙补西墙。西郊机场修理厂和２５６三叉戟机械师一起，开始大规模维修。四架三叉戟的飞行时间不一，把另几架三叉戟好的零件拆给２５６。除把普 通客舱拆掉，隔出单间，设置卧室、办公室外，还按林彪怕风、光和绿颜色的习惯，精心布置机舱，整整改装了三个月。

１９７１年９月６日，２５６三叉戟才最后改装完毕。

九一三事件后派到３４师的总政工作组成员刘岩回忆：１９７１年８月潘景寅试飞，去过山海关，也飞过较远的航线。但他始终对自己的落地动作不满意。９月１１ 日，潘景寅再飞东北航线，经沈阳二台子机场，再到长春，接回在长春解放军医院治疗小儿麻痹的大女儿。有人看潘景寅情绪不好，询问他。潘景寅回答说飞机落地 还是不理想。９月１２日傍晚，林立果坐２５６三叉戟从西郊机场到山海关机场，９月１３日凌晨林彪第一次坐三叉戟１Ｅ型，机毁人亡。

中国进口的三叉戟中，至少有三架三叉戟机毁人亡。除２５６三叉戟摔在蒙古温都尔汗外，一架三叉戟借给中国民航，飞往桂林，机上１００多位中外乘客，飞机在 落地时撞山，所有机上人员全部身亡。另一架摔的三叉戟是３４师一位机械员，因为没有提干，他私自开动三叉戟，飞机拉起时摔在西郊机场跑道南头。

英国航空公司共生产三叉戟１１７架，中国陆续购买３５架。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１３日，第一架三叉戟２Ｅ从英国飞往中国，四天后到达广州机场。三叉戟２Ｅ的主 要用户是中国民航，它是１Ｅ发展型，１９６８年２月交付使用，共生产５０架，中国购买２０多架。从１９７４年起，中国民航从北京、上海和广州始发的１５条 国内航线陆续改用三叉戟，替换原来使用的伊尔－１８和子爵号。到三叉戟２Ｅ型，更加先进，翼展增大１．５８米，装有全翼展前缘缝翼，载油量增加，航程增 大，可载１１５名乘客，是世界上第一种能在恶劣气象条件下具有全自动着陆能力的民航客机。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３１日，中国民航的三叉戟全部退役。

２５ 邓小平为什么说２５６三叉戟飞行员是个好人？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１６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右下角刊登新华社电：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 尔和夫人，回答了客人提出的问题。１１月２４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一版《就当前国内外一些重要问题邓小平答美国记者问》。

正值中国审判"两案"，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问："根据调查，飞机失事是自然的事故，是由于飞机维修不好呢？还是别的原因？"邓小平 回答："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的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 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这段对话，表面看邓小平所问非所答，人家美国记者明明问的是飞机失事原因，而邓小平回答的却是飞行员是个好人。但细一想，邓小平的回答也没错，虽然没有正 面回答飞机失事原因，也算是不是回答的回答。邓小平排除了飞行员潘景寅的问题。也许邓小平还不知道，自从１９７８年春夏他提出复查林彪一案后，２５６三叉 戟上的三位机械师都平了反，而潘景寅家属仍戴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凭着邓小平"飞行员是个好人"这句话，经过潘景寅家属一年的上访，潘景寅也得到了一 张《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

虽然邓小平是"个人判断"，但一言九鼎，"解放"了潘景寅和他的家人。

邓小平说的"另一架飞机"，是３４师的直升机，飞行员陈修文以生命为代价飞回来。虽陈修文被公认英雄，但也一直悬着，追悼会一直未开，陈修文的骨灰只能保 存在３４师干部科的档案柜里。１９７８年陈修文家属给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写了一封信。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７日，中央军委授予陈修文"忠诚战士"称号。空军 领导机关在北京举行了命名大会，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宣读了中央军委命令。空军政委高厚良在大会上解释了为什么时隔七年才授予陈修文称号：１９７３年党中央就 指出，空军广大指战员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陈修文烈士在林彪死党逃跑的直升机上，勇敢地同叛徒搏斗，就是一个范例。九一三事 件后，中央军委领导同志曾多次指示要宣传陈修文同志的英雄事迹，但被"四人帮"蓄意阻挠破坏，以致对陈修文同志的命名和宣传延隔多年。

九一三事件中两位驾机起飞的飞行员性质是一样的吗？

有人说：邓小平搞错了，另一架直升机和２５６三叉戟的性质不一样，直升机被飞行员陈修文飞回来了，没有飞到蒙古。而２５６三叉戟飞进蒙古，虽然机头方向朝着中国，但毕竟是

坠毁蒙古温都尔汗。

那么邓小平凭什么说２５６三叉戟“飞行员是个好人”？

当然，三叉戟主要是林立果看上的，不是林彪看上的。１９５８年林彪还没到军委工作，坐飞机到昆明疗养。他觉得飞机比较好，又快，从那以后就开始坐飞机了。 以前林彪的专机是英制“子爵号”。１９７０年中国从巴基斯坦进口的四架英制三叉戟，这是中国第一次拥有的大型客机。它航程长，可以从北京直飞海南岛、广 州。一投入使用，就“马不停蹄”，中央领导开会都喜欢坐。江青坐得最多，邓颖超、谢富治、丁盛、湖南第一把手华国锋都坐过。３４师１００团政委安治樑说， 确定三叉戟给林彪，时间不长。9月6日，２５６三叉戟改装好，被固定为林彪专机。随着飞机改装，进行人员选拔。机组是专门挑的，都是１００团最拔尖的人 物。就那几个飞行员，团党委提出意见，报师党委批准，执行专机任务不是一年半年，谁技术怎么样也摸底，政治审查也常常进行。这一次执行任务，领导上掌握， 和飞机一样，人员也有备份，２５６三叉戟的备份是副团长李克修。机组早就组建，没任务飞别的飞机，拉别的首长。临时有变动，不是固定的。最后一次飞往北戴 河，三叉戟飞行员中的一、二、三号种子全去了。第二副驾驶康廷梓有经验，一看加油量就知道是飞广州。

林彪专机，和别的专机不一样，需要特别改装。要按照林彪的生活标准，隔出单间，安上一张床。搞好后林彪夫人叶群来验收，说这床首长很满意。还要保持舱内一 定的温度，多少度，穿多厚，单间怎么保持温度，都有讲究，前后左右全是温度计。镜子也要仔细贴上乔其纱。洗手间的台灯要一开就亮，专门为林彪设计的变速 灯，罩上绿金丝绒，光特别暗，所有的管子都要包上。林彪在飞机上很少吃东西，也很少说话，上来讲一句，下去讲一句，例行公式一般。林彪握手软绵绵的。目睹 林彪上专机的人说，现在看，好多事林彪不一定知道。他身体不行，面黄肌瘦。到机场，坐汽车来，车停在飞机门口，很热的天，用风衣蒙着脑袋，有风时还把叶群 的头巾蒙在头上。从汽车里出来要扶下来，再由两个警卫员架着上飞机。而最后一次上飞机，什么也不顾了，9月中旬的北戴河已经很冷，林彪光着头，帽子从床上 拿起来了，都没来得及戴。

如果说林彪都不知道，给林彪开飞机的潘景寅能知道吗？

邓小平也是常坐专机的人，他知道飞行员就和自己的司机一样，上了车才告诉到哪里，司机怎么能知道首长什么事？更何况２５６三叉戟如此紧急，他推断飞行员潘景寅不知情。

也许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２５６三叉戟机毁人亡，当时周恩来、毛泽东等得知后眉开眼笑，认为这是最好的结局。

所以，不管坠毁的主观还是客观原因，邓小平都认为飞行员潘景寅是好人。

２６、 为什么潘景寅没有把２５６三叉戟飞回北京？

9月１２日２２时多，林彪女儿林豆豆报告八三四一部队“林立果和叶群要劫持林彪”后，八三四一部队驻北戴河的副团长张宏立即上报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张宏 说：据林彪女儿林豆豆报告，林立果密谋要坐停在山海关海军机场的飞机外出，到什么地方没有听清楚。汪东兴

立即报告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周恩来立即 打电话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和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请他们查问，并让八三四一部队进一步调查。

吴法宪回忆：大约２３时，周总理突然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调了飞机到山海关机场？我回答没有。周总理再次追问究竟有没有，我说绝对没有。周恩来仍然告诉 我，还是要查一查，我说好。放下电话，我立即打电话到空军３４师，问师长时念堂有没有调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出乎我的意料，时念堂告诉我，三叉戟专机被调到 山海关机场了，并说是胡萍副参谋长调去的。我立刻感到有问题了，因为平时任何专机的调动，都必须经过我来批准，但是这次三叉戟的调动情况我竟然不知道，而 且是周恩来亲自查问过来的。我立刻问，胡萍在哪里？时念堂回答，在西郊机场。我立刻要胡萍听电话，胡萍向我解释说，是飞机改装以后的试飞，所在他没有报 告。我又追问，为什么要飞到山海关，而不去其它地方？胡萍没有答复。

在胡萍生前，我曾几次采访过他。胡萍告诉我，吴法宪说了假话。

１９６５年刘亚楼逝世后，林彪提议空军政委吴法宪改任空军司令员。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吴法宪越来越红，担任了军委办事组副组长，九届一中全会进入中央政 治局。虽然吴法宪还兼着空军司令员，但他成天在中央转，很多具体权力不得不下放。那时毛泽东、林彪经常在外地，尤其是夏天，林彪到北戴河，每天都有专机送 文件之类的事情。吴法宪对胡萍说：林彪在北戴河用专机不用经过我，你派就行了。所以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２５６三叉戟从西郊机场起飞到北戴河，胡萍就派了 飞机。但是，吴法宪始终没有对“专机权力下放”承担责任，胡萍由此背上“资敌罪”的黑锅，晚年双目失明，双耳失聪，双腿不能行走。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０日， 原空军副参谋长胡萍在空军总院含冤逝世。

吴法宪关于时念堂告诉他三叉戟在北戴河也不对。时念堂刚从阿尔巴尼亚回来，还没有接师里的工作。他根本不知道２５６三叉戟到山海关的事情。吴法宪后来是从胡萍那里得知２５６三叉戟到了山海关机场。

吴法宪报告周恩来：山海关海军机场确实有一架三叉戟，是夜航试飞，出了故障，飞不回来了。周恩来命令：飞机就停在山海关机场不许动，修好后立即飞回北京。

吴法宪回忆：我告诉胡萍，飞机要立即调回北京，胡萍说好。可是过了五分钟，胡萍打来电话，飞机发动机故障，正在检修。我当即告诉胡萍，飞机修好了立即回北 京。放下胡萍的电话，我马上打电话给周恩来，报告了我和胡萍通话的内容，以及我要胡萍立即把飞机调回北京的措施。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指示飞机返回时不准带 任何人到北京。我又立即把周恩来的这一指示传给胡萍。

这一段话基本真实，空军副参谋长胡萍为什么不让２５６三叉戟飞回北京？

因为在九一三事件前的一段时间，空军３４师一直在搞“划线站队”，所谓“正确路线”代表是林立果，“错误路线”代表是吴法宪。因为吴法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 挨了批评，下庐山后他给毛主席写了检讨，引起林立果不满，认为吴法宪是“叛徒”，政治上靠不住，所以要求空军３４师以吴法宪“划线”。胡萍搞不清上边的斗 争，但他认为，毛主席说吴法宪犯了错误，没有说林彪犯错误，当然要听林彪的了。所以胡萍让服务队孙副队长告诉正在西郊机场工字房的空军党办副主任周宇驰， 总理查飞机了，要他打电话告诉林立果早点想办法。同时胡

萍给正在北戴河的潘景寅打电话，说发动机有故障，飞机不能回来，好留下供林彪使用。

吴法宪回忆：过了不大一会儿，周恩来又打电话找我，说叶群给他打来电话，说副帅要到大连去转一转。周恩来问她有没有调飞机，叶群说还没有调飞机，等一会 儿，我给吴胖子打电话，要吴胖子调飞机来。周恩来告诉我，可能叶群很快就会给你打电话，先不要答复她，你就说要请示周总理。不久，果然叶群打来电话，林总 要到大连去，让胡萍来一下，如果你能来也好。我说胡萍因病正在住院，再说他的飞行技术也不行，还是让时念堂去吧？叶群不同意，说时念堂不熟悉，还是让胡萍 来吧。他又不是什么大病。我告诉叶群，调动飞机的事情，我不能决定，要请示总理。同叶群通完电话，我又立即打电话报告周总理，同时提出我要立即到西郊机 场，去进一步追查飞机调动的问题，周恩来同意了。

这一段回忆也不完全对。胡萍确实在３０１医院住院，这是对的。但是据周恩来身边的人回忆，叶群先是说山海关没有飞机，但马上说是有一架，是我儿子飞过来 的。至于胡萍的技术行不行，吴法宪十分清楚，毛泽东第一次坐空军的飞机，机长就是胡萍。周恩来第一次出国，机长也是胡萍。

周恩来同意吴法宪去西郊机场后，又派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杨德中也去西郊机场。

吴法宪带着秘书张叔良，警卫员薛邦喜，从空军大院出的办公室出发，到西郊机场大约是９月１３日零时左右。吴法宪回忆：这时胡萍还没有回医院，正在和空军３４师龙参谋长谈话。见到我，龙参谋长走了，我问飞机调动的情况，胡萍说的还是和电话里说的一样。

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后，坐在沙发上听情况。

传达中央５７号文件后，空军３４师服务队副队长小孙写了一个揭发材料：我看到胡萍接了一个电话后，神色有些不对头，我不知是谁打给他的电话。反正他接到电 话后，特别紧张，对他叫来的几个人说：如果吴司令查问２５６三叉戟去山海关机场是谁安排的，你们就说是潘景寅安排的。对其他几架飞机的事，只字不要提，你 们要保守秘密。大约是晚上１１点左右，吴司令员来到机场。在吴司令员到达候机楼时，胡萍悄悄对我说，你赶紧去工字房，找周宇驰，告诉他吴司令已来机场查飞 机的事，事情已是很复杂了，我在这里应付吴。我赶快跑到工字房，工字房里的灯光很暗，门口的车库停着一辆伏尔加。正当我要敲门时，周宇驰走了出来，我急忙 将胡萍说的告诉他，他听后说了一句，好吧，就赶快回屋了。我又悄悄回到候机室，向胡萍点了点头。这时我看见胡萍已是满头大汗，脸上呈现出沮丧的样子。一会 儿，胡萍又到我跟前说，你再去工字房，叫周宇驰给我写个条，告诉我怎么办？我现在打电话不方便，快去快回！我急忙跑向工字房，当我到工字房时，屋里已没有 灯光，那辆伏尔加也不在了。我又急忙跑回来向胡萍报告，他听后长叹一声，说快把准备好的东西都撤了，全部撤了，明天飞机不飞了。

周恩来在与叶群通话时，说他要到北戴河看望林彪同志。叶群劝周恩来不要来。而周恩来布置空军３４师师长时念堂准备两架专机，机组人员跑步到候机室待命。

叶群听说周恩来要来北戴河，当然慌了。

吴法宪回忆：正在这时，周恩来打来电话，说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北戴河，向

山海关方向开去，临走时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我顿时感到问题严重 了，我估计车从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需要个把小时，我就要秘书张叔良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到三叉戟飞行员潘景寅，我在电话里命令潘景寅，要绝对忠于毛主 席，飞机绝对不有起飞，不管什么人命令都不能起飞。当时在电话里，潘景寅满口答应。当我打电话把潘景寅的表态报告周恩来时，他却告诉我，林彪、叶群已经上 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

这里吴法宪又说了假话。虽然潘景寅不可能对质，但也不能信口胡说。

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命令都不能起飞。怎么可能呢？周恩来的命令是五人联名才能起飞，还包括林彪。当时林彪还是党中央副主席，吴法宪怎么敢下如此命令？他事后这么想还差不多！

２７、　明明是专机，为什么要说训练飞行？

　　吴法宪回忆：周恩来查问三叉戟是不是去北戴河了，我马上给专机师师长时念堂打电话。正在家里睡觉的时念堂说不知道。第二次吴法宪又打电话问，时念堂说，可能是胡萍调的飞机。胡萍是空军副参谋长，还兼着专机师的党委书记，因为他当时正在住院，所以吴法宪没找他，其实胡萍此时正在候机室，最后吴法宪了解到是 胡萍调了一架飞机。

吴法宪电话里说，飞机要调回北京，胡萍说我查一查，没说潘景寅去了。

胡萍心里很紧张，林立果走前讲中央两条路线斗争很紧张，要提高警惕。到底是谁？别把我夹在里头。胡萍知道吴法宪在庐山上表现不好，他搞不清怎么一回事，离 他远一点。胡萍说他们训练飞行到山海关。吴法宪说，叫他们回来。胡萍告诉潘景寅，问你就说训练，别把我陷进去。５分钟后，胡萍回电话，说飞机发动机故障。 吴法宪说周总理要求飞机修好后立即返回，返回时不准带任何人。

周恩来过去从来没问过林彪的专机，突然查问，非同小可，吴法宪吓得魂都没有了，他忘记了他说过的话。胡萍回忆：九一三事件前一周内吴法宪打电话，林彪那里 要动一动，作个准备。林彪动都是临时，打个电话说走就走，用飞机比汽车还方便。又两天，李文普打电话，主任说这两天准备走。到哪？说到青岛或大连，或到广 州，没个准。胡萍说，行，早了解情况早告诉我，我好作准备。林立果让我为首长准备好飞机，这几天要离开北戴河，要绝对保证首长的安全。胡萍说，我干这角 色，不是一天两天。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叫我开会，怎么把所有的中央委员都送去，哪省哪省，要一个名单，就拉这些人，别人不让上， 保密。我回来，给空军副司令曾国华汇报，他说我怎么不知道？大机群活动，二三十架飞机，没上头命令，我敢这么干？过去吴法宪不止一次交代，凡是到北戴河的 飞机，以训练名义。吴法宪还交代，林彪在北戴河，他要专机就不要通过我了。

林彪在北戴河，天天有专机来往，天天报告吴法宪，吴法宪管得过来吗？这也不能算吴法宪的错，你如实向周恩来反映不就完了吗？为什么把责任全推到下面？吴法 宪的心态可以理解，本来因为庐山的事情他就心里发毛，现在三叉戟再出事，他会吃不了兜着走，甚至枪毙。所以吴法宪当然想上推下卸，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胡 萍说，我冤屈在哪？我是管专机的，吴法宪有个交代，林彪住在北戴河，每天要用飞机，你直接安排，注意保密，飞机呼号临时改变。林彪坐的那几架飞机，都有准 备。电话一来，马上就出发。从北京送到北戴河，吃

的喝的用的，还有文件，几乎每天都有来往的飞机，为他们服务。飞机太频繁，容易泄密，吴法宪有交代，凡是 到北戴河的飞机，由你掌握，要注意保密，改呼号，具体以训练名义去，内部都很平常，别的首长也这样。改航线是外行，到北戴河，不能说到上海，实打实，一起 飞，沿途雷达都要看，上北戴河，你说去上海，根本不可能。

所以２５６三叉戟申请的航线是２５２号。空军航行局局长尚登峨通报北京军区空军，指挥所调度室要保密。因为胡萍交代过。９月１２日２２时左右，胡萍打电话 叫尚局长到西郊机场，明天２５２号从山海关起飞到广州，可是航行局向外发航线时，把航线发到西安，也可以多发几条到其他地方的航线，林彪要动，注意保密。 专机飞行一向神秘，“文革”前江青到上海，不但正常任务派遣程序被取消，连飞行实施过程中飞行员起码的空中通信也被限制，只准按下发话纽，而不能讲话，至 于飞机上拉的是什么人，根本不知道。声东击西，这在全国最重要的专机任务中司空见惯。

空军３４师参谋长龙振泉说：星期天快下班时，我 在办公室，潘景寅临走对我说，我要出差，出任务了，你别跟他们说。回家我喝了两盅酒就睡了，晚上叫我去，叫我保密，上面来查，你就说训练飞行。我说谁来 查？他说不知道。上边有人查，你就别说别的，就说训练，专机发训练也有，经常的事，为了保密专机说训练，我也没觉得奇怪，专机也好，训练也好，我不掌握， 训练我可以掌握，专机是老曹的事。到了１２时什么时候，吴法宪来了，进来就问，潘景寅飞行干什么去了？训练飞行，啊？训练飞行吗？潘景寅没说是任务啊？我 不清楚，本来调度室应该说，也没跟我说，作战科也没说，我哪知道。吴法宪发脾气，这你不知道，干什么吃的？马兰藻（专机师政委）来了，吴法宪问他，他听说 有专机任务，怎么飞了？到哪里？什么任务？他也不知道。吴法宪又发脾气，干什么吃的？都不知道，这个那个说一大顿。马政委召集会，每人都表态，我就知道训 练，我没说。胡萍在场，他也没表态。到候机室等着，门口喊，杨（德中）政委来了。来回几个电话，山海关飞机就起飞了，就乱了。吴法宪在小电话间又骂又嚷， 怎么起飞了？我心说，他起飞，我管不了。吴法宪骂完我，有事还找我，我就忙起来了。

三叉戟飞出国境时，吴法宪接到禁空令，在专机师当 面向专机师师长时念堂交代，三个机场，都不准飞机起飞。凌晨2时， 周恩来打电话问吴法宪在什么地方，吴法宪说在西郊机场。周恩来说我派中央警卫局政委杨 德中去协助你，吴法宪明白这是监视他了。这时时念堂报告，沙河机场起飞了一架直升机。吴法宪命令不准起飞，打下来。周恩来表示同意。吴法宪卖力的表现并没 有挽救他的命运，他还是被关进了秦城，判了重刑。

２８、 胡萍给林彪派专机怎么能算“资敌罪”？

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培养的第一批优秀飞行员，空军第一个给毛泽东开飞机的机长。胡萍空中生涯２０多年，是空军专机的元老级人物，他长期 担任空军３４师师长。１９６９年调到空军司令部担任副参谋长后，仍分工管空军３４师，并担任空军３４师党委书记。胡萍为专机事业操碎了心，他飞专机、管专 机从来没有出过事，没想到却被突然的九一三事件狠狠绊倒了。

１９７１年9月１３日早晨，九一三事件刚发生几小时，吴法宪揭发说：都是胡萍这小子干

的。所以九一三事件第一个被关押审查的就是胡萍。胡萍坦然地说：你们 尽管查，要查出是我制造阴谋，我负一切责任，我并不知道阴谋。我不是想当官的人，我更喜欢飞行业务。我承认我有私心，怕打倒，怕站错队，可是话说回来，又 有哪一个人愿意被打倒？又有哪一个人不希望保住晚节？专案组不听胡萍申诉，说不可能不知道，你当了反革命还不老实。１９８２年3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事法院判决空军副参谋长胡萍为林彪提供飞机，造成严重后果，被判为“资敌罪”，有期徒刑１１年。

给林彪派飞机怎么能是算“资敌罪”？任何人的行为都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制约，此时林彪是党中央惟一的副主席，是上了党章的毛泽东“接班人”，“亲密战 友”，并不是敌人。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专门交代，林家要用飞机，要全力保证，而且要秘密。林彪儿子林立果坐飞机到北戴河，根本不可能告诉胡萍他要叛逃。当周 恩来通过吴法宪查问三叉戟，并要北戴河的三叉戟飞回北京。胡萍并不清楚这中间的严重后果，他以为是吴法宪捣鬼。胡萍回忆：庐山会议很紧张，但我不知道细 节，林立果让周宇驰跟我们说吴法宪在庐山怎么不好，要我们警惕他，不要跟他走，那时刘少奇还说倒就倒，更何况我们。他们玩了圈套，现在想可笑，不能离开当 时的时空。林立果利用我，空军干部部副部长何汝珍对我说，叶群问他，胡萍这小子靠得住靠不住？何汝珍说，这个你放心，绝对没问题。我想为什么叶群问这个？心想跟他们打交道要小心。因为九届二中全会后，很多人都知道吴法宪犯错误了，空军以“反吴”和“保吴”划线。所以我通知周宇驰，总理查飞机了。但这一切都 是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的。这是“好人犯错误”，而不是“坏人办坏事”，这怎么能叫“资敌罪”呢？

审问胡萍，说逃跑是他主谋，就挖这个。胡萍说：我可以派飞机，但我怎么知道他们往哪里跑？我没有什么交代，确实不知道，我编也编不出来。查我，我也不知道 谋害毛泽东。那时我在３０１住院，左肾怀疑癌症，切片检查，发现是结核。本想马上手术，又想还是等凉快点再做。我住院没什么事，就等手术。１９７１年9月 8日晚上，林立果从北戴河回来，到候机室，周宇驰也在。林立果从兜里拿出林彪手令让我看。飞机要移动，几个关口，必须经过调度室批准，才可以放飞。他们也 知道用飞机要从我这里过，但他们搞什么名堂，我不知道。9月１２日午睡后我回机场。１８时多，周宇驰打电话，林立果要到北戴河，点名要２５６三叉戟。去北 戴河正常，林彪在那里。我打电话给飞行员潘景寅，潘景寅不在，我又给第一副驾驶陈联炳打电话，由他转告。本来三叉戟应该牵引到候机室门口，林立果不让，说 我们开车过去。主要怕浪费时间，他们都安排好了，直接到停机坪。我没过去，后来听说他们拉了很多东西，搬上了飞机。

9月１２日夜里，吴法宪对我说，准备两架飞机去北戴河，没说谁去，我以为吴法宪去。后来我发现杨德中腰里别着枪，我才想有点问题了。已经把吴法宪看起来了，他去北戴河可能性不大。我一直有问号，后来才知道是周恩来准备去。

２５６三叉戟飞出去，我很奇怪，不是航线。我还在想，他出国干什么？肯定是雷达报错了。9月１３日，我准备回医院，我有车，可吴法宪说，用我的车，张秘书 送你。实际上监视我，怕我跑了。李德生问吴法宪怎么回事？吴法宪说，都是胡萍这小子干的。林彪走前，吴法宪交代过准备飞机，李文普也打过招呼，过去都是这 样办法，一出事，都推了。没上边指示，我敢作主吗？伊尔－１８拉警卫，一架拉汽车，两架直升机，用于视察，林彪一出动，都是这样，这就五架，还有一架空飞 上海，我不知道要接谁。非说你搞阴谋，我为他们辛辛苦苦服务２０多年，谁知他们搞这玩意。硬说三叉戟飞苏联的阴谋是我搞的。周总理为我说话，说不要追了。 杨德中是公安部九局副局长，我与杨德中关系很好，他来看我。第二

天专案组说，你要老实点，不要以为总理给你说好话。周总理不死，他一清二楚，了解我，我的 结局会好点。那天早上就把我关起来，杨德中把我送到中央警卫团的营部，住两夜，送亚疗。总理说了，让你好好揭发黄吴。我没头没脑，什么黄吴？我一字没写。 又住两天，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念文件，我才大梦初醒，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根本不知道是阴谋，出了事，没理可讲，我说有什么用！

２９、 九一三事件中禁空令是什么时间下达的？

中共中央在处理九一三事件中有两个禁空令，“禁飞”和“禁空”。第一个禁空令是“禁飞”，只是一般通知，周恩来的“禁飞”令还不是那么严格，起码２５６三 叉戟还可以起飞。周恩来的第二个禁空令是“禁空”。当２５６三叉戟飞越国境时，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下达禁空令，不准任何飞机起飞。同时全军紧急战备。并要各 军区空军一律听从大军区司令员指挥，避免再有飞机外逃，或有人调动飞机轰炸北京。

“禁飞”令只是针对停在北戴河的２５６三叉戟。周恩来打电话给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让他查海军山海关机场是否有一架三叉戟。核实后周恩来命令，山海关这架 飞机要起飞，如起飞，要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六人的命令。此时周恩来在军中并无职务，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给军队下达命令，如果没 有军委主席毛泽东的特别授权，再借给周恩来几个脑袋他也不敢。坊间关于联名还有另两个版本，一个是五人联名，一个是四人联名，总之是联名吧。

空军作战部值班参谋朱秉秀解释：有没有“林”，他记得很清楚。因为是朱秉秀负责向下传达的，肯定有“林”。因为向下传达，涉及成千上万的人。如果没有“林”，事情马上就会暴露。

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也接到了周恩来的“联名”命令。朱秉秀回忆：周总理命令吴法宪要停在北戴河的三叉戟飞回来。因为说三叉戟有故障，周总理命令吴法宪，三叉 戟停在山海关那里，待修好后立即回来，不准带任何人来北京。周总理又在电话里命令吴法宪，决不允许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有飞机来，你我都要掉脑袋。

吴法宪命令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打开所有的雷达，决不允许飞机飞到北京来。

２５６三叉戟飞越国境时，周恩来下达“禁空”令。同时周恩来今天晚上的各种飞行都停止，包括部队的夜航训练。

吴法宪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打电话给空军指挥所，让通知各军区空军、指挥所立即停止各种飞行。吴法宪还亲自把周恩来的“禁飞”令传达给北京军区空军、沈阳军 区空军。因为１９６９年珍宝岛战斗后，中苏关系这是中国军队防范的两个重要方向，其它军区空军由空军指挥所传达。

朱秉秀回忆：那时空军指挥所里很有意思，你注意观察，副参谋长白云代理梁璞在指挥所，没事人一样，特别轻松；梁璞来得晚一些，也“趾高气扬”。

朱秉秀没有提到副参谋长王飞，王飞是后来到指挥所的，白云说他没有在指挥所看见王飞，王飞肯定是去了。当时江腾蛟打电话给王飞，想问问怎么回事，王飞着急地说，我在指挥所，

我在指挥所。王飞心里有“鬼”，话都说不出来，手直哆嗦。

朱秉秀回忆：我虽然不知道三叉戟上有谁，心里还是有点数。当然不敢往林彪身上想，想党办那一伙人，那时还不叫“小舰队”，叫调研组。我们是中间派，看他们两派斗。后来直升机起飞，西郊机场报过来，是周宇驰和于新野，这就更清楚了。

３０、 ２５６三叉戟强行起飞，李作鹏何罪之有？

特别法庭副庭长伍修权说：李作鹏的要害问题，我们抓的是九一三事件中，由他放跑了林彪的座机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中说： 在９月１２日晚１１时３５分和１３日零时６分，李作鹏两次打电话给山海关机场下达命令。１２时多，周恩来接到张耀祠的报告，林彪已经离开住地，向山海关机 场去了。周恩来询问派出的部队能否先到机场，张耀祠不能肯定。周恩来再一次叫李作鹏命令山海关机场，不准停在机场的任何飞机起飞，要设法阻拦。零时２０ 分，海军航空兵山海关场站站长潘浩已经发现当时情况异常，打电话给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这时李作鹏仍然没有采取任何阻止起飞的措施。

李作鹏在法庭上坚决不承认这一条罪状。

山海关机场调度室没有给２５６三叉戟起飞令，２５６三叉戟是强行起飞。李作鹏是海军第一政委，远在北京海军大院，按工作程序应该是山海关机场制定阻止起飞 的措施，上报李作鹏批准。如果李作鹏不批准山海关机场的阻飞措施，当然应该由李作鹏负全责。可是，山海关机场包括已经到机场的八三四一部队，都眼睁睁地看 着２５６三叉戟晃晃悠悠地起飞，束手无策。

而李作鹏只是原原本本地向机场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这有什么错？更何况周恩来告诉李作鹏传达“四人”联名命令时一点风声也没有透，没有告诉李作鹏山海关的 “风云变幻”，林彪想去哪？全没讲。谁能想到林彪飞机跑到国外？想都不敢想。李作鹏的大儿子李冰天说：如果李作鹏事先知道出这样的大事，他还有心思在海军 种“自留地”？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也根本没考虑问题的严重性，他只是照本宣科，一字不差地把总理指示传达给山海关机场。如果周总理哪怕多透露半句， 李作鹏也会给山海关机场强调得更多。以后李作鹏在关押期间给周恩来写了三四封信，全都石沉大海，周恩来生前没作任何解释。当然，一种可能是周恩来没收到李 作鹏的信，被专案组扣下了。另一种可能就是周恩来根本没法解释，只好沉默。以后李作鹏给很多军史研究者说，以他在法庭上最后陈述的四个半小时录音带为准。

这里有个问题，李作鹏是海军政委，虽然他也是副总参谋长，但调飞机这一类的事情应该归海军司令部，再往上应该是海军司令员管，李作鹏为什么直接打电话通知 山海关机场？让秘书办不行吗？或者让司令部通知？你只是一个政委，也不是司令员，军事指挥上没有你的事。但李作鹏是一个办事认真的人，因为是周恩来亲自通 知的，责任重大，所以李作鹏亲自通知山海关机场。

电话由李作鹏、李作鹏夫人董其采和朱秘书三人记录，核对后，还特意给周恩来复诵了一遍。复诵时用的是董其采的记录稿，周总理肯定地回答“对”，传达也是按这个记录稿念的。

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时，李作鹏已经吃安眠药睡下了。处理完给山海关的电话，他接着又吃了安眠药，这一次睡得比较踏实，后半夜被叫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时还没睡醒。但一听说开会，他马上清醒了，政治局从来没有在后半夜开过会，是不是与昨天晚上总理那个不让飞机起飞的电话有关？

中共中央［１９７２］２４号文件第十八条，是关于李作鹏篡改中央命令的阴谋和山海关机场值班记录、值班员的说明。说李作鹏两次篡改中央关于“联名”的命令，将四人指示放飞才放飞，篡改成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

在法庭上，李作鹏不承认“篡改总理指示”。但机场几位当事人都说他“篡改”了，成了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飞机起 飞。之后李作鹏打电话要山海关机场值班员修改值班记录，值班员坚持不改。李作鹏又将山海关机场电话报来的值班日记，亲笔加以篡改，另行誊抄，报送中央，掩 盖他篡改中央命令的罪行。

李作鹏在中共中央［１９７２］２４号文件这一张纸上批：根本无此事。我向周总理报告原文为什么不敢发表？李作鹏在影印的“值班日记”边上批：这是（我的秘书）刘继祥同山海关机场进行校对的记录，他报告我，与我修改处相同，可以同刘继祥当面对证。

可是庭审时，却不允许李作鹏的秘书刘继祥出庭。

２００９年我采访了刘继祥，他说中央２４号文件的这个电话记录稿是我写的。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４日海航五师师长张兆龙从山海关机场电话汇报，我接的。张兆龙 是飞行员出身，他是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从师部坐火车赶来的，所以电话报告结结巴巴，我说这样不行，你整理一个稿子，给我念，我记录后报告首长。下午张兆龙组 织人整理好稿子，他一字一句念，我记录，然后我念给李作鹏听。我念到第一次李作鹏电话指示，李作鹏和董其采都没有动作，而念到第二次李作鹏指示时，李作鹏 和董其采都从沙发上跳起来，说不对，不是这样说的。这才在我的记录稿上有改动。

一人放飞和四人放飞，很可能在电话里有误解。

其实这本来不算什么。

因为实际上，不管是“一人”还是“四人”，都没有让飞机起飞。

换句话说，如果林彪要起飞，李作鹏拦得住吗？既然是关系到副统帅，你周恩来为什么不亲自打电话通知山海关机场？既然让李作鹏通知，为什么不告诉事情的来龙 去脉？为什么吴法宪知道情况，不与李作鹏通气？如果命令林彪的警卫部队拦截，一百个林彪也走不成，为什么不命令？

一大堆问号堆在心里，李作鹏坚决不承认三叉戟起飞的责任应该由他承担。其实，山海关机场的跑道灯没有打开，调度室也没有给起飞指令，２５６三叉戟是强行起飞。不管是一个人还是四个人都没有让飞机起飞。但罪名还是加在了李作鹏的头上。

３１、 山海关机场为什么没有采取阻止起飞的措施？

零时１８分，“大红旗”只用了平时一半多一点的时间，就到了山海关机场。林彪等人没等客梯车开来，舱门也没关好，零时３２分飞机就慌慌张张起飞了。

机场的滑行道和跑道平行，平时跑道是空的，以便随时迎来送往。准备起飞的飞机一般先停在调度室前的停机坪上，得到调度室的起飞命令后，先滑到滑行道，再滑到跑道头。而２５６三叉戟起飞时，只有起落架上的滑行灯打开了，机场没有打开跑道灯，调度室也没有给起飞命令。

山海关机场是歼击机训练的小机场，滑行道不宽，而三叉戟又太“胖”，加上滑行时动作太急促太猛烈，像个醉汉，还没有对正跑道就先拐了弯，一个主轮偏出滑行 道，压进了黄豆地，将黄豆地轧出一尺多深的沟，轧断的黄豆秆立即被气流吹跑了。幸亏三叉戟马力大，要不非“窝”在黄豆地里。三叉戟从黄豆地里“挣扎”出 来，又轧坏了两个跑道灯。在正常情况下，大飞机应该从联络道开到跑道尽头才能起飞，而三叉戟在跑道头５００米处就强行起飞了。场站参谋长佟玉春一看飞机没 挡住，就向空中打了两枪。

八三四一部队也追了，一路追到山海关机场，这时２５６三叉戟并没有起飞。但是，机场乱成了一锅粥，却没有一个人上前拦阻。

要制止强行起飞，只有采取最根本的措施——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最简单的办法是把两辆大卡车开到跑道上。或者把加油车开到跑道中央，三叉戟转弯就转不过 来，这时挡住，就挡住了。场站倒是派加油车去堵了，但三叉戟“气势汹汹”地滑过来，加油车上的两名干部先躲了，开加油车的新兵刘三儿也开着车躲开了，让出 了一条通天大道。

话又说回来，谁敢拦？油罐车撞坏，机翼灯也撞坏了，地面上的人们已经吓得半死。这不是一般的飞机，这是专机，撞坏了中国第二号人物的专机，非蹲监狱不可， 搞不好小命也没了。除非下死命令，讲清楚，机场才敢拦阻。可上边的命令并不是一定要挡住，非常含糊，只是不让起飞。从上到下都不明确，不让起飞，可是它强 行起飞又怎么啦？这是专机，林彪的专机，本来山海关机场就没有管理的权力。谁能想到它会强行起飞？急急忙忙，通知不让起飞，所有的人都没有认为是紧急情 况。事后翻过来想，赶快打电话给机场，把飞机封起来，开车到跑道上，几个措施都没有采取，到时候就没说话的余地了。

事后看，整个事情非常像一个精心的“策划”，也拦了，也追了，也禁止起飞了，但这一切，仿佛是“欲纵故擒”，就是要让你成惊弓之鸟。只要起飞，没有考虑的 余地，必死无疑。上天容易，可你不能永远呆在天上，你总要落地，你往哪里落？事先没预报，机场频道不知道，怎么落地？如果被当成敌机打下来呢？一般导弹就 可以打下来。而且越境后，越往北飞越是山。到伊尔库茨克远了，茫茫黑夜，也不一定找得到伊尔库茨克。虽然有自动领航设备，可就你一个飞行员，你忙得过来 吗？那个预料中的结局似乎在起飞前就注定了。

３２、 机组人员不全，潘景寅怎么就起飞了呢？

吴法宪回忆：周总理打来电话，说林彪乘车离开北戴河，临走还开枪打伤了警卫员（这是误传）。吴法宪感到情况严重，不过还可以挽救，北戴河到山海关还有几十 分钟的车程，他马上叫张秘书打电话给潘景寅，告诉他飞机不能起飞，潘景寅满口答应。胡萍也给潘景寅打电话，飞机一概不准动。可为什么飞机还是起飞了呢？有 人说：如果不飞，那就是英雄飞行员，立功了，整个１００团都要立功。事后看，这话也不一定对。但是，从当时的情况看，潘景寅怎么可能不起飞呢？林彪的红旗 车开进了机场，潘景寅听见有人喊，首长都到了，飞行员怎么还没有到？潘景寅慌忙跑出门，一路跑向２５６三叉戟。因为事先林立果有过加油的电话，三个机械师 已经被潘景寅叫起加油。他们打开三叉戟的舱门，叶群迫不及待从工作梯爬上了飞机，林彪也跟着上了飞机。叶群命令快起飞，潘景寅敢不起飞？不要说先前潘景寅 已经被灌输吴法宪有问题，就是老吴没有问题，老吴毕竟只是空军司令员，而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啊，该听谁的，不言而喻。

机舱门还没有关上，飞机就滑动了。

五个正在跑向飞机的飞行员都呆住了。他们是：第一副驾驶陈联柄，第二副驾驶康廷梓，领航员李成昌，通信员陈松鹤，服务员魏秀玲。只差了一、两分钟，他们就上飞机了。

三叉戟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运输机，发动机启动快，除了利用地面专用的启动车外，也可以利用飞机自带的压缩空气进行启动，不受地面专用设备的影响。据第二副 驾驶康廷梓分析，当晚就是利用机上设备启动的。而且中央发动机启动后，就可以一边滑行，一边利用中央发动机的压缩空气对另两台发动机进行启动。这样就大大 地节约了在停机坪的时间。还有只要滑行中做好驾驶舱内的各种检查，飞机一旦进入跑道后，不需要停机，就可以加大油门直接起飞升空。第二副驾驶康廷梓认为三 叉戟的起飞没有任何疏露。起飞前的各种准备工作，如加油等，离不开机械师，连飞机舱门的钥匙都在机械师身上。但一旦飞机起飞动作完成，平稳飞行，机械师的 作用就不大了。到了天上，全靠潘景寅一个人"拳打脚踢"了。

为什么潘景寅没有等机组上全就飞了呢？

这是性格使然，性格决定命运。

潘景寅性格急，遇事紧张，又不果断。和他一个机组的飞行员说：每次飞行，潘景寅的脸都红极了，下飞机满头大汗，别的飞行员就不这样。５０年代末潘景寅在沈 阳出过一次小事故，天降大雪，跑道还没有扫出来，他急着飞。在同组飞行员劝说下，又停了一会儿，他还是执意起飞。起飞时，跑道不够，飞机冲着跑道上一个大 雪堆扎进去，要不是副驾驶马和使劲一拉驾驶杆，机头翘起，飞机就一头钻进雪堆里了。但飞到天上，发现一个起落架被雪堆撞坏了。机组几个人商量，先在空中转 耗油，差不多了再落地，用一条腿侧着落地。这样，飞机冲到跑道头，撞坏了一点点，没有机毁人亡。

很多内行人都说：如果机组全上，２５６三叉戟摔不了。

有人说潘景寅知道逃跑，故意拉下了机组成员。但种种迹象表明，潘景寅事先并不知情。否则从西郊机场起飞前他不会吃安眠药。９月１２日下午，潘景寅想抓紧时 间睡一会儿，他吃了三片安眠药，去理发室理发，理完发安眠药正好发挥作用。没想到还没有出理发室，出发命令就到了。首长要飞机，不光林家，都是随叫随到。 专机没有起飞时间，首长来了就

是起飞时间。但过去从来没有首长到了飞行员还没有到这样的事情，所以都是机组先到机场等首长，都养成习惯了。没有首长到了而 机组还没到的先例。所以，这一次潘景寅更加紧张，让起飞，就快快起飞吧。

如果不起飞，一切都解决了。就是飞，也不能一个人飞啊。怎么就一个人把飞机飞上天了呢？叶群和林立果再催，也要等机组人员全上来再飞啊。大型飞机一个人完 成几个人的操作，这可是创下了中国航空史上的记录。大飞机可不比汽车，再急也不急这几分钟嘛。机组好多人没上去，一个人怎么能飞？又是夜里，再大胆也不敢 飞啊。如果潘景寅拖延，林立果可能打死他吗？林立果也要想想，打死了飞行员，谁会飞三叉戟？他能开"大红旗"，可是他都没开，因为车上坐的是他的父亲。更 不要说三叉戟了，他只会坐，不会驾驶。所以他敢打死潘景寅吗？不敢。当然最后鱼死网破，他打死潘景寅也不是不可能。不过还没到那个程度，潘景寅稍微解释一 下，再等个一、两分钟，机组就全到了。如果等一等，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飞不成了。另一种可能是机组人员全都上去。如果机组人员全在飞机上，分工合作，靠着 集体的智慧，飞机就有可能成功迫降在温都尔汗的土机场上。

时任空军航行局局长的尚登峨回忆：9月１２日下午，胡萍对我交代：林彪专机要到山海关，林彪要动一动，阶级斗争很复杂，还要派一些飞机，你要掌握一下。那 天晚上１１时多，我处理完西郊机场申请航线的事情，刚回到家，值班参谋傅本理打电话问，吴法宪来电话，问山海关飞机是什么飞机？谁飞的？我拿电话请示胡 萍，胡萍说：你别管了。尚登峨就睡觉了，突然被电话铃惊醒，山海关的飞机强行起飞？就潘景寅一个人。再重复一遍，这时起飞不到四、五分钟。我吓了一大跳， 赶快起床，平时到办公室要十分钟，我五、六分钟就跑到了。我给山海关打电话，副驾驶陈联柄说，潘景寅一个人把飞机飞走了。什么？一个人？我们机组没上去。 你慢点说，飞机上还有什么人？还有三个机械师。不可能？我不相信，反复问。我是飞行员出身，飞行２０多年，军用运输机都是两个人飞，只有一名飞行员就飞上 天，还没有先例。我吓坏了，这是林彪的专机呀，怎么一个人就飞了？机组都有谁？现在你身边还有谁？陈联柄说，潘景寅把机械师叫起来加油，等调度室老李叫我 们起床时，飞机已经开车滑出，没来得及加油就起飞了。这飞机起飞前，并没有到调度室办手续。

这时参谋长梁璞来了，尚登峨让陈联柄把详细情况给参谋长报告。他看标图，搞不清楚往哪飞。调去的是林彪的专机，他嘀咕最大的是潘景寅怎么一个人就飞了？飞 机上还有谁？根本没想到林彪在上边，一点没想到。只想是不是劫机？梁璞叫他下去，李德生在指挥室，问潘景寅的情况，什么时候入伍的？什么时候入党的？文革 以来的表现怎样？……尚登峨说，有些我能回答，有些我也答不了，我还要给西郊打电话，同时看标图。越看越不对劲，脑子里热乎乎的，问号很多，谁搞鬼？既不 是广州，也不是重庆，怎么往蒙古方向飞？国境线除赤峰有个机场，没有可降落之地。尚登峨忽然想起，经副参谋长王飞同意，周宇驰要过航图，并让划出到伊尔库 茨克的航线，顿时不祥的感觉弥漫全身，他马上报告了参谋长梁璞。梁璞让他再画出同样一张航图，交给李德生。

飞机上的无线电是不是开着呢？正常情况下，飞机开车后，滑行前，必须打开机上所有的通话设备。因为飞机的一切活动必须得到机场调度部门的许可，方能进行。 有时开车前就要将电台先打开，与指挥台进行必要的信息沟通。当时空军指挥所通知，北京周围所有机场都打开跑道灯和夜间降落设备，用超短波电台对空呼叫，要 三叉戟到北京落地，北京地区所有机场都可以随时落地。电台开关就在飞行员头顶部，轻轻一拨就可以打开，地面的声音就可以充满整个机舱。吴法宪叫胡萍拿着话 筒喊，以周恩来的名义，叫他回来。山海关机场、

西郊机场和空司指挥所，所有的对空台都在呼叫。

从雷达标图看，三叉戟无动于衷，直接飞向中蒙边境，向西一段是山区，飞机爬高，越来越慢。胡萍分析，潘景寅不是不敢，机组人不够，他忙不过来。那时对上面的矛盾也搞不清楚，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想：究竟是怎么回事？非常奇怪，这是往哪里飞呢？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潘景寅的心理状态，飞往国外，是他始料未及的。现在整架飞机包括林彪的命运全掌握在他一人手中，他肯定更加紧张。三个机械师可以商量，但毕竟又

没有飞行员内行。至于怎么落地，只好听天由命了。

３３、　起飞前，潘景寅知不知道要飞向哪里？

在２５６三叉戟上天前，潘景寅肯定不知道是要飞出国境。他只知道往南走，突然在空中改变，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像这样上天前根本不知往哪里飞的事情，以前 也有过。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０日，专门从北京调两架专机到汉口，没说谁用，一架有床有桌子，一架有座。突然毛泽东坐汽车来了，直接上了潘景寅的这架飞机，潘 景寅赶快从飞机上下来迎接。那时潘景寅是副团长，另一位机长王进忠团长也被调到这架飞机上。潘景寅根本不知道去哪里，到了天上，毛泽东才说去上海。

如果飞国内，潘景寅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国内航线，到哪都有保证，可是怎么让飞蒙古的乌兰巴托？他哪里想到林彪一家（除林豆豆）要跑到国外去。不执行吧？这 是林副主席的命令。半夜里慌慌张张飞国外，机组的人员都不全，就催着起飞，这决不正常！潘景寅飞伊尔１８出国很多，每次都要准备很长时间，哪有到了天上， 才说去国外的。何况我们与苏联的关系已经到了刀枪相见的地步，这不是叛逃吗？

２５６三叉戟机毁人亡，我们不知道林立果是怎样骗潘景寅的。但雷达显示，三叉戟起飞后的转弯航迹非常不正常，延迟了４分钟，而且以后的转弯动作所用的时间 也是平时的十倍。６０度用了６分钟，是平时转弯的好几倍。飞机上的转弯感觉不到，只能从仪表上读出来，又是夜间，仪表板红光照明，比白天读表更困难。潘景 寅变速很慢，转弯坡度很小，迟缓，不规则，而且过了头，超过１５度，再飞就成了３６０度，掉头回山海关去了。２０分钟后，才稳定在３２５度的航向上。

１００团政委安治樑回忆：我对潘景寅印象很好，他当大队长，我作为保卫干事负责审查他，不错。后来他当团长，我当政委，商量工作，双方印象都很好。这个人 很正直，没花花点子，很老实，很稳，不大说话。声音不大，软软的，一说话就脸红。9月１２日刚吃过晚饭，6时多，山海关来电话调飞机。我刚回到北边宿舍， 又马上到机场。老潘对我说，老安，我刚吃了两片安眠药，想休息了，这劲还没过。9月１２日午后，潘景寅向２５６三叉戟机组下达命令，准备执行林彪专机的任 务。因为你不知道首长什么时候用飞机，只能见缝插针抓紧休息，所以潘景寅下午就吃了安眠药准备睡了。他没想到晚上走，我嘱咐副驾驶陈联柄关照一下。天黑下 来，灯开了，我们在停机坪等林立果来。等了一个小时，我和潘景寅闲聊，他情绪正常，一点不紧张。

九一三事件后有人有反映，潘景寅情绪低落，上边斗争那么厉害，他多少知道一点。潘景寅

与周宇驰一块调到空军，所以关系很好。潘景寅到航校学的飞行，比正常 学员晚来一段。表面上很老实，有心计，想问题比较多，有些思想不暴露。从技术上说，潘景寅不那么精干，技术很一般，实际上技术不如１００团副团长兼参谋长 的李克修，也不如副驾驶陈联柄和康廷梓。但潘景寅因为职务高，被定为林彪专机的飞行员，李克修就成了潘景寅的“备份”，而陈联柄和康廷梓则成了副驾驶。

潘景寅的心态，现在已经无从知道，但从航迹似乎可以反映潘景寅的心迹，他的思想斗争一定非常激烈。老婆孩子都在北京，北京有他温暖的家，他为什么要跑到国 外？跑到国外他算什么？飞机肯定是开不成了，那他能干什么？想回国也不可能，返航？返航也不好办，首先就违抗了命令，何况油也不够了，真是进退两难啊。

３４、　苏联外交官凭什么说２５６三叉戟是被打下来的？

２００９年第１０期《炎黄春秋》发表阎明复文章《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介绍前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中文名 字顾大寿）新出版的回忆录《我的中国生涯》（俄文版），这位前苏联外交官披露林彪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被击落。蒙古人民共和国空军在雷达里发现一架中 国军用飞机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空，错误地把它当作是侦察机。”

到底是蒙古军队还是前苏联驻蒙古军队打下来的？没有说。

到底是怎么打下来的？还是没有说。

为什么不提２５６三叉戟上的黑匣子？

这是真实的吗？我认为这位前苏联外交官有关九一三事件的回忆是矛盾的。

这位前苏联外交官顾大寿的名字是毛泽东１９５７起的。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由苏联铁道部派遣来华，在长春铁路局任翻译，以后由苏联外交部派遣到驻华使馆，历 任苏联驻天津总领事馆秘书长、苏联驻华大使馆首席翻译、一秘、政治参赞、党委书记等职，在华１２年。他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后苏联驻 华使馆派他到温都尔汗去实地查看现场的经过：“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空军在雷达里发现中国一架军用飞机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空，错误地把它当作是侦察机。蒙 古国的外交部立即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馆发出照会并表示抗议。又通过苏联驻中国的大使馆，将这件事情通知给了苏联方面。苏联外交部得到这些情报后，委托 苏联驻华使馆立即弄清楚所发生的情况。托尔斯基科夫大使派我和使馆两位年轻的工作者去蒙古，实地了解所有的情况。我问大使，为什么派我去调查这件事情？开 始大使说，因为我是参赞，这件事是属于我的职责范围。后来告诉我，苏联外交部得到林彪出逃的信息，因为我在中国工作的时间较长，而且认识林彪本人，我可以 在死者中确定有没有林彪的尸体。为了不引起中国的不满，我们乘坐北京到莫斯科的火车去蒙古国。列车先经中国的内蒙古，然后进入蒙古国的领土，在约定的地方 下了火车。迎接我们的是苏联武官巴兰诺夫将军。他把我们送抵温都尔汗，林彪的飞机就是在那儿坠落的。到了那里后，我们什么也没看见。蒙古人把飞机的残骸和 死者的残骸照了照片，然后挖了一个大坑，把所有的东西都埋到里边去了。后来，为了辨认死者，他们又把大坑挖了开来。

首先，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对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发出照会并表示抗议。根据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二秘孙一先回忆：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４日，蒙古外交部突然约见中国驻 蒙古大使许文益，受政府委托通知中国飞机坠毁，并提出口头抗议，要中国政府就中国飞机深入蒙古领土的原因做出正式解释。

其次，不是“又通过苏联驻中国的大使馆，将这件事情通知给了苏联方面。苏联外交部得到这些情报后，委托苏联驻华使馆立即弄清楚所发生的情况”。而是苏联人 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中国飞机坠毁，到了现场。而且明明是苏联人连续两次到坠机现场，拍了照片，拿走了飞机发动机和黑匣子。后来又挖开坟墓，拿走了林彪和叶 群头骨。这位前苏联外交官居然说是蒙古人挖开坟墓！还含糊地说是蒙古人打下来的。
前苏联外交官顾大寿的这段回忆说明，他到现场时，什么也没看见，林彪等人已经埋葬了。可是，顾大寿说是蒙古人照了照片，把所有东西都埋到里面去了。后来，他们又把大坑挖了开来。

既然顾大寿说“到了那里后，我们什么都没看见”。怎么又在回忆录中说飞机上发生过枪击？说“我们在飞机的舱壁上发现子弹的弹孔，这些弹孔的边缘全都是向外 翻的，可以断定子弹是从飞机里面射击的。这说明机舱内曾经发生了搏斗，还使用了武器。至于在飞机坠毁之前，机舱里面发生过什么事情很难说。但是，可以肯定 飞机坠毁不是由于机舱里面的射击所致，因为飞机坠落下来，着起火来，并发生了爆炸。”

看完这段回忆录，我专门问过王中远老师。他时任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翻译，比顾大寿先到坠机现场，并亲手掩埋林彪等人遗体。他说他没有发现弹洞，飞机已经解体，散了一地，不可能发现弹洞。

另外可以肯定，飞机上的四位飞行员都没有枪。

关心九一三事件的朋友可能还记得，２００４年９月１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驻莫斯科记者采访过退休的前苏联克格勃头子扎格沃兹丁将军，他当年验证了林彪、叶群 的头骨。扎格沃兹丁将军还谈到２５６三叉戟坠毁前的飞行路线，说飞到了苏蒙边境。还说现场验证了飞机上发现的所有枪支，没有一支枪发射过子弹。

那么，顾大寿说的机舱上的弹洞由何而来？

顾大寿回避了苏联人两次到坠机现场，除了拿走林彪和叶群头骨，还拿走了发动机和黑匣子。

为什么只字不提黑匣子？

看来这位吹嘘亲临现场的前苏联外交官也有可能满嘴谎言。

３５、 ２５６三叉戟真的是苏联打下来的吗？

前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中文名字顾大寿）说２５６三叉戟是被打下来的，我相信这句话是真的。但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 京诺维奇（中文名字顾大寿）说的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空军打的，这不对，不可能是蒙古空军打的，有能力发射

地空导弹的军队只能是前苏联驻蒙古的军队。当然是击 伤，而不是击落。因为２５６三叉戟采取了迫降措施，而空中又没有散架。这也可以解释２５６三叉戟空中着火，以及来不及耗油就紧急迫降的原因。

１９６０年5月２７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访问蒙古。5月３１日，中国与蒙古签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中蒙技术援助协定》，并发 表联合声明。之后中蒙两国交换地图，谈判划定蒙古从中国独立后一直未定的中蒙边界。１９６２年１２月，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访问中国，１２月２６日签 订两国边界条约。虽然如此，但因为１９６０年中苏交恶，蒙古紧跟前苏联，也开始与中国为敌。１９６３年7月，蒙古与前苏联秘密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 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很快苏联派出许多勘测小分队，借口到蒙古铁路两侧及以东找水，实际上为苏军进驻勘察阵地。１９６４年，蒙古赶走中国援蒙工人，引进 苏军建筑旅，在乌兰巴托等地修建了大批营房。１９６５年，苏军第二个建筑旅秘密开进蒙古南部，在中蒙铁路沿线修建军用机场和各种设施。１９６６年1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访问蒙古，同蒙古签订为期２０年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这个军事同盟第五条规定：缔结双方将在 保证对方的防御力量方面互相提供援助。为保证两国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共同采访包括军事方面的措施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

这之后，前苏联驻蒙古军队的活动开始公开化。

１９６７年3月，蒙古和苏联的国防部长秘密签订在蒙古境内部署苏联军队的协定。４月，前苏联陆、空军作战部队开进蒙古，１９６７年１１月7日，蒙古庆祝十 月革命５０周年，乌兰巴托举行大规模阅兵式，不仅有蒙古军队，也有苏联驻蒙古军队。苏军的履带式装甲战斗车，榴弹炮、加农炮，反坦克火箭，防空导弹以及 ８０余辆坦克，磨蹭了半个多小时，才依次驶过检阅台。

１９６８年，苏联驻蒙古军队加紧在蒙古中东部构筑军事基地和机场等设施，其中一个现代化军用机场在乌兰巴托以东３０多公里的那来赫矿区附近的草滩上，还有 两个现代化军用机场在中蒙铁路沿线。此外，还修建了多处防空导弹阵地，以及大型野战后勤基地。到１９６８年底，驻蒙苏军的兵力部署基本就绪。１９６９年４ 月，中苏珍宝岛战斗后，中苏关系更加恶化，苏联进一步在蒙古增兵。驻蒙陆军达到两个摩托化步兵师，三个坦克师，拥有坦克１８００辆，战车和装甲车２５００ 辆，大炮１４００门，统归集团军指挥。集团军司令部设在乌兰巴托东北的乌兰花，司令是彼得洛夫斯基少将，不久升任中将。部队部署重点在乌兰巴托及其以北， 距离中国边界２４０公里的重镇沙音山达也驻有苏军。驻蒙空军有两个歼击轰炸航空兵师，三个直升机团和一个运输机团，除了乌兰巴托等四个大型机场，还修建了 三个野战机场。共有固定翼飞机１９２架，直升机１２３架。苏军驻蒙的防空部队有两至三个防空导弹旅，三个雷达团，拥有可携带核弹头的近程地地导弹发射器 ２２部。此外还有一些特种部队。

苏联驻蒙军队占据了５５座兵营，共有8万多人，作战部队有5万多人，包括2个摩托化步兵旅，2个独立团，１１个独立营。防空部队是苏联驻蒙军队的重点，有一个歼击机团，一个雷达团，一个高炮团，2个防空导弹营。

苏联驻蒙古军队如此巨大，又经常演习，耗费了前苏联天文数字般的军费。直到１９８８年

１２月，前苏联戈尔巴乔夫宣布两年内全部从蒙古撤军。

时任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二秘的孙一先回忆：我于１９６５年去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任职，１９７３年回国，其间曾担任临时代办两年半，经历了中蒙关系严重恶化的 全过程。在蒙古，我亲眼看到苏联作战部队的坦克、大炮和飞机轰隆隆开进蒙古边境，看到苏联控制蒙古的所作所为。我是深深同情蒙古人民的。

虽然１９７１年，中国和蒙古的关系渐渐缓和，8月２０日，中国驻蒙古大使在空任五年后，许文益上任。但紧接着发生九一三事件，苏联驻蒙古军队并不清楚上层 的变化，他们的职责是保卫蒙古的安全。２５６三叉戟飞越国境，进入蒙古境内几百公里，目标大，飞得又慢，当然被苏军雷达误为侦察机，被导弹击中是毫无商量 的，但苏联很快发现打错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苏联如此积极，却如此沉默了。

３６、　周恩来凭什么得出“自行坠毁”的结论？

１９７１年9月１９日晚，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向外交部报告，二秘孙一先于２０日乘４次列车离开乌兰巴托回国。在这天上午，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收到国内另外一个 指示，要求注意观察蒙方和驻蒙苏军有无战备动作。孙一先到乌兰巴托市周围走马观“花”，总的印象是蒙军和驻蒙苏军都有异常。乌市西区陶拉盖图的北山沟，导 弹发射架都装上了防空导弹，探测和搜索雷达一直在旋转。市区苏军的军用汽车比往常增加，铁路两旁的苏军基地也格外繁忙。距乌兰巴托市５０多公里的大型后勤 基地，载重汽车进进出出。几十个战备油罐群，都被铁丝网圈了起来，还站上了岗。距乌兰巴托市１００公里的巴彦机场，停在滑行道边的歼击机都脱掉了“衣 服”。飞机不断起落，却不像是平常训练。乔依尔车站以北２０多公里有苏联空军的一个大型机场，在密闭的列车里都能感觉到轰鸣的刺耳。

中国民航飞机坠毁，为什么驻蒙古的苏军也凑“热闹”呢？

中国边防城市二连浩特，车站内外军人也明显增多，干部都佩戴着枪。集宁停靠的一列军用列车正往下卸军车和重型武器。边防站的王站长告诉孙一先，现在是一级战备，孙一先想，难道真与那架失事飞机有联系吗？

周恩来对孙一先说，你谈谈现场情况，有没有带地图来？孙一先把自己标的现场位置图拿出来。周恩来问：离伊尔库茨克有多远？直线距离７００多公里。山海关在 什么地方？多伦呢？贝勒庙呢？周恩来从山海关到温都尔汗，用力一划，微微点了点头。孙一先大为吃惊，那架失事飞机不是迷航，而是叛逃！他猜想可能机组人员 里有叛徒。

这时已经是9月２２日凌晨１时，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和空军副司令员兼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来了。总理只介绍了李德生，让孙一先继续汇 报，按提纲讲。孙一先感觉周恩来似乎对失事飞机不大感兴趣，闭着眼睛打了一个盹。他想，总理太累了。周恩来听完孙一先的汇报，指示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 主持研究飞机是怎样坠毁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也参加。他们拿着照片到东大厅，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公安部长李震等一起分析研究。

李际泰是飞行员出身，仔细看过照片和现场示意图后，认为飞机可能是因为燃料将要耗尽，

被迫紧急着陆，失去平衡，右翼向下倾斜，触及地面，肚皮与沙土磨擦， 骤然升温，引起油箱着火，从而导致整机爆炸。从当时的情况看，飞行员驾驶技术很好，选择了惟一的处理办法，虽然不排除机件失灵，或被地面防空武器击伤而紧 急着陆，但这些可能性较小。在场的都是外行，一致认为李际泰说得有道理。
杨德中认为有必要找一架同类型的飞机，并与驾驶员及有关地勤研究一下。

符浩建议，看飞机时，应该把到过坠机现场的孙一先带上。

三叉戟是英国原德？哈维兰公司研制的中短程的三个发运机的客机，根据欧洲各航空公司提出的第二代喷气客机的要求研制。１９５７年设计，１９５９年开始生 产，１９６２年１月首次试飞，１９６４年春投入航线使用。一共四种机型，共生产了１１７架三叉戟，其生产线于１９７８年关闭。三叉戟ＩＥ型是加大航程型， 增加了燃油量，载客量也增加到１１５人。中国先后进口了３０架三叉戟，用于民航飞行。现在我国进口的三叉戟都已经淘汰。航空博物馆存有一架三叉戟。

１０月１日凌晨２时，一行人去西郊机场看２５２三叉戟。

空军参谋长梁璞听说飞机是擦地皮着陆起火爆炸，有点意外，说在夜里能找到这么一大块平地难度相当大。潘景寅的驾驶技术还是比较高。１９７０年从巴基斯坦飞 回这批三叉戟，是他带队飞回来的。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向国内写的飞机失事报告，分析周围无高大目标，迫降场的选择合理，着陆点到燃烧区有几十米距离，以及死 者躯干烧伤不重，无高空摔折等，看来飞机不像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梁参谋长同意这个分析，认为迫降时速度可能很快，肚皮和右翼尖同时着 地，猛一擦地可能“飘”起来。

周恩来根据李际泰等人的纸上谈“机”，得出“自行坠毁”的结论。

这是息事宁人。也就是说，２５６三叉戟坠毁由中国负全责。也许这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但３８年后再看，这决不是科学的结论。

３７、 空勤机械师李平的腰带上是否有枪眼？

李平，３４岁，天津人，１９５７年兵，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入党。时任空军３４师１００团三大队机务中队副中队长，２５６三叉戟主管机械师。１９７１年9月 １3日随机牺牲。李平的家在天津，三个小孩，老大是女儿，１９６３年４月出生；老二是儿子，１９６５年９月出生；老三也是儿子，１９７０年１２月出生。李 平牺牲时，女儿８岁，大儿子６岁，小儿子还不到１岁。李平爱人王淑珍是天津标准件厂工人，她生前每年清明，都要给李平烧一些纸，她惟一的愿望就是把爱人李 平的遗骨接回来。

有人说李平的皮带上有枪眼。据说李平的皮带曾拿到西郊机场辨认，因为李平的腰不好，皮带是特制的宽皮带。但到过坠机现场的孙一先说，现场没有拿回一件东 西。１９７２年，

上边也怀疑２５６三叉戟上是否有搏斗，让从现场照片中寻找尸体上的弹洞。空军专家组成员金华被“隔离”在地下办公室里，三天三夜，他仔细 看了所有现场的照片。金华说：照片上洞多了，但没有发现尸体身上有任何弹孔，5号尸体（林彪）没有外电所传的蜂窝状窟窿，李平身上也没有弹洞。

李平的技术非常好，是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机务干部。参军前他已经有工作，会修手表，会做像章。李平母亲是家庭妇女，李平父亲是蹬三轮的工人，李平报名参军 连父母也没有告诉。他个子不高，体检时要不是悄悄踮了一下脚，就被刷下去了。在３４师战友的记忆中，李平心灵手巧，能说会道，也很会唱歌，是个活跃分子。 李平爱好摄影，那时很少有人照相，而他拥有两台照相机，孩子们经常看爸爸洗照片。所以，李平留有几张他自己的照相机拍摄的照片。

九一三事件前，李平回过一次家，走时什么也没有说。李平爱人王淑珍什么都不知道，可是一直联系不上李平，１９７２年，她去３４师询问，部队也没有明确说，只说李平执行任务。１９７８年给了病故通知书，答应三个孩子养到１６岁，每月每个孩子给１５元。１９９３年底，李平爱人王淑珍又找部队，那时部队也 穷，１９９４年6、7月，部队来人送了一点钱，两三千元，说是补助，并答应孩子养到１８岁。再后来，工厂不景气，王淑珍１９８６年办了退休。又赶上房子拆 迁，要交赞助费，王淑珍又去找部队，部队给天津民政部门出了个介绍信，减免了前期赞助费近一万元。

李平爱人王淑珍每月工资４０多元，要养三个不懂事的小孩子，还要养几个老人，连吃饭都不够。孩子们上学连两元钱的学杂费也交不起，大儿子初中二年级就工作 了。而那时，政治压力更大，虽然空军３４师没有明确结论，但林彪飞机摔在蒙古家喻户晓，老百姓搞不清怎么回事，传言很多。李平的几个孩子在学校成绩优秀， 但却迟迟戴不上红领巾。终于三个孩子长大了，建立了家庭，其中两个孩子有了稳定的工作，而王淑珍却积劳成疾。１９９７年她因脑梗塞住院，以后每年都要住一 次院，２００５年１１月逝世，享年６９岁。

３８、 为什么蒙古对中国人去坠机现场一拖再拖？

１９７１年9月１４日１１时５０分，蒙古外交部来电话，同意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三个人去现场。并说专机已经准备好，下午即可动身。可是这时中国驻蒙古大使 馆还没有给国内打通电话，到失事现场事关重大，没得到国内指示前，不能冒昧行动。于是大使馆借口尚未准备好，请求推迟起飞时间。午饭后不久，蒙古外交部又 来电话催，说专机已经准备好，１３时左右出发。

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还是请求推迟。

一直到１８时，终于盼来国内指示，要许文益大使亲赴现场，详细观察飞机失事的原因，飞机残骸可以拍照取证。如有尸骨应要求带回，没烧完的文件物品要求转交我们，写明清单和收条，并注明如有蒙方取走的物品和文件，也希望查出交还我们。

这封电报有意回避了飞机的性质和死亡者的身份，但许文益已经感到“事情”比预想的还要严重。如果是一般的失事飞机，使馆工作人员去看一看就行了，没有必要“惊动”大使。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先报给蒙古外交部的人员名单，只是二秘孙一先和两名翻译。

此时蒙古外交部已经下班，许大使决定打破常规，紧急约见额尔敦比列格。

额尔敦比列格晚上有外事活动，会见安排在２０时。

许文益大使说：奉政府之命，失事飞机可能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对此我们表示遗憾。对蒙古政府愿意提供飞机并指派领事司长陪我们到现场视察，表示感谢。我将亲自率有关人员前往现场，请蒙方给予帮助。

额尔敦比列格马上问：误入之说，是否是正式答复？

许文益大使说：可以这样认为。

这是否是最后答复？

为什么这样紧追不舍？许文益大使也警觉起来。他思索了一下，说这是我国政府在得到使馆的第一次报告后给我的指示，是正式答复，但我理解不是最后的答复。

额尔敦比列格问：失事飞机是从哪里到哪里？朝哪个方向飞？是怎样迷失的方向，误入我国领土的？
许文益大使坦率地说，目前为止无法答复。并反问：蒙古方面是否有飞机失事的进一步材料提供给我们？
额尔敦比列格也非常谨慎，说暂时没有。

其实这时候蒙方是明知故问，他们已经从２５６三叉戟内的航图上看到了标出的航线，知道飞机是从河北的北戴河穿过失事现场，一直到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茨克。大概是他们想从中国大使嘴里套出更多的话来，或者看他知不知道更多的情况。

许文益大使希望明天上午动身，额尔敦比列格表示同意，让他们作好明天赴现场的准备。他对中方未能及时派人赶赴现场有点抱怨，说飞机失事两天了，等你们到现场大概要６０多个小时了，天这么热，如果尸体变化太大，我希望你们不会提出更多的问题。

许文益大使马上将约见情况报告国内，翌日凌晨得到国内指示，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火化有困难，可拍照取证，就地深埋。竖立标志，以便以后把遗骨运回国内。

这时候蒙古也有些“明白”了，先是迟迟不动身，然后紧急约见蒙古外交部副部长，中国大使要亲自出马，还想要回尸骨。看来外电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飞机的乘员中肯定有不一般的人物。

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翻译王中远回忆：当时我们感觉到不是一般的事件。具体往谁身上想，谁也不敢想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林彪。林彪红得发紫，谁敢想林彪呢？ 后来知道，所有的人都很震惊，为什么震惊？都写进党章了，老人家还信得过谁呀？反过来，又想为什么？那么多高级领导人，出生入死，都打倒了，就这个写进党 章的接班人跟老人家，究竟为什么？

现在轮到中方催促蒙方了。蒙古人似乎不那么着急了，借故一推再推。

孙一先回忆：９月１５日早上８时，我们每半个小时就催问一次，询问什么时候到现场。蒙方先说不知道，后来又说温都尔汗天气不好，不能接受飞机降落。其实天空非常晴朗，万里无云。拖到１３时３０分，蒙古外交部终于说，专机１４时３０分以后可以起飞。

原来从赤塔飞来的苏军直升机眼下正在坠机现场，不能让他们同中国人“撞车”。直到苏联人在现场“折腾”够了，中国人才被允许前往。后来才知道，苏联人９月１４日去了一趟，９月１５日又去了一趟，所以推迟了我们前往现场的时间。

蒙方也调整了“战略部署”，组织起一个庞大的视察班子，有边防内务军事务管理局处长桑加上校，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高陶布，外交部二司专员古尔斯德，国防部副 处长达木丁上校，边防内务管理局桑加上校等官员，还有航空、法律、法医等方面的专家，法律专家达希泽伯格，民航局专家云登少校，法医莫尤，卫生组组长桑加 道尔吉大夫、卓乃大夫，肯特省检察长乌尔金道尔吉，以及报纸和蒙古通讯社的记者，以及电影摄制组等等，足有几十人，看来蒙方也是相当重视的。

一架伊尔－１４飞机送中国大使等四人和蒙古的庞大班子去坠机现场，起飞时间１４时４５分，航程３００公里。１５时４６分，到达温都尔汗“土机场”，飞行时 间是６１分钟。温都尔汗“土机场”确实简易，没有塔台，只有几间平房，几辆电台车。在草地上垫了层红粘土，就成了跑道。机场周围看起来非常平坦，没有土 包，也没有高树。但是没有夜航设备，也就是说，到了夜间，和草原没有什么两样。

王中远回忆：我们在机场坐两辆嘎斯６９，直奔坠机现场。

孙一先回忆：我们的汽车从温都尔汗出发，沿东北方向的沙土公路和克鲁伦河，行驶一个小时，转向东北，进入丘陵草原。一路上荒无人烟，除断续的馒头形土包 外，还有二三十米高的石头山，汽车在丘陵间颠簸，常被高高弹起。向东北方向走了不到一小时，离开沙土公路，拐入正北一条草丛小路。这里很少有车辆通过，车 胎压得枯草吱吱直响。小道左边是一连串较高的山丘，右边是一片向上的漫坡，坡顶是烧焦的草地。

下午近１８时，大使许文益和孙一先、沈庆沂、王中远到达位于温都尔汗西北的坠机现场。

３９、　为什么叶群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２５６三叉戟坠机现场的九具遗体完整，大多仰面朝天，四肢叉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模糊不清。九具遗体分成非常明显的三堆，孙一先由北向南，把遗体编成１ 至９号，从各个角度拍下来。事后查明，机尾位置有三具遗体，１号是林彪座车司机杨振刚，２号林立果，３号刘沛丰。机头和机尾中间有四具遗体，４号特设师邰 起良，５号林彪，６号机械师张延奎，７号主管机械师李平。这个位置似乎是在位于前舱的高级房间里。

机头烧成灰烬，驾驶舱的火势最猛，铝合金机壳都烧成了灰。位于机头位置的是８号叶群，她占据了副驾驶的位置，９号是飞行员潘景寅。潘景寅个子高大，体格魁 梧，衣服基本烧

光，只剩下裤腰碎布及一截腰带。两手掌及手指烧焦，鼻子和眼睛全部焦糊，头发烧焦。胸部左右锁骨上下，各有一大片皮肤绽裂，腹侧及两腿也烧 焦了。潘景寅的姿势是仰面朝天，头朝向东，向着烧毁的机头。两臂上伸过头顶，手心朝前，两腿叉开，左腿挺直，右腿弯曲，脚跟蹬地，像是要挣扎着站起来，看 来死前非常痛苦。王中远回忆：潘景寅烧得最重，奇怪的是与他在一起的叶群烧得最轻，虽然同在机头，叶群可以躲。而潘景寅操纵飞机，火再大也只能坚持。再一 个潘景寅穿着军装，叶群不一定穿军装，里面至少不是的确良（７０年代初军衣布料是的确良，遇火贴在身上燃烧，以后就换了布料）。所以叶群简直就像卧在那里 熟睡，有的皮肤烧红了，有的皮肤还没有改变颜色，还是白的，只不过烧光了衣服。叶群的头发基本完好，面部没有烧黑，只有额前略有焦糊，右颧骨连着眼角处， 烧焦了银元大的一块。左嘴角被火烧歪，露出上排白牙。眉毛烧焦但没有脱落，眼睛半睁着，似乎向前看，两臂贴地斜伸，手心向上。左臂内侧绽裂酒杯大的伤口， 肌肉外翻。估计这位“空中小姐”不年轻了，有３０岁左右。

奇怪？为什么叶群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当然，２５６三叉戟上没有副驾驶，没有领航员、通信员，飞行员只有潘景寅一个人。正常情况下，三个机械师在飞机降落上 帮不上忙，可是这是特殊情况啊。无论如何三个机械师总比叶群熟悉飞机，为什么潘景寅不叫三个机械师其中一个帮助他，而允许叶群在身边呢？
舒云分析：进入蒙古境内后，要与地面通话，或收听蒙方广播电台，确定飞机位置，语言就是一个大问题。九人中只有叶群精通俄语，蒙古当时驻有大批的苏联军队，蒙古人把俄语作为主要外语。如此，叶群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担负领航的重任。

孙一先回忆：机头灰烬前方８０米处，烧焦的草地头，有一个从根部炸断的起落架，起落架上完好的轮胎，滚到南边２００米处。它的后面朝北偏西的一条弧线上， 散布着三堆尸体，机尾被远远甩到机头的右后方，靠近烧焦的草地边。看来机上人员和机尾都是在机身炸开的一瞬间甩开了的。但它们并不在一条直线上，令人有些 不解。机尾离机头大约６０米，最远一具尸体离机头大约５０米，说明飞机爆炸的猛烈。从机头到机尾这条东南到西北的斜线上，与三堆尸体朝北偏西那条弧线，大 约成３０至４０度的夹角，全是飞机上的残片。我们都没有处理过飞机爆炸，想象不出来现场是个什么情况。正常死亡见过，追悼会，死者经过化妆。去前有预案， 我到医院要些手套，消毒品，带去也没用，我们没碰尸体。九具尸体并不像通常飞机失事那样，摔碎烧焦，而是有头有脚基本完整。大多是皮肉挫裂，骨骼折断，烧 伤严重，但没有烧焦。由于燃烧时一氧化碳中毒，尸体皮下呈樱桃红色，亮晶晶如蜡人一般。好在蒙古９月天还比较凉，尸体没有太大变化，要是７、８月就……

引人注意的是遗体都没有戴手表，也没有穿鞋，这说明机上乘员都做好了迫降的准备。因为飞机迫降，冲撞扭曲得很厉害，乘客必须把身上的硬东西，如手表、钢 笔、眼镜、手枪等取下来，以防冲撞时扎入人体。也不能穿鞋，紧急出口放下充气滑梯，穿鞋可能把充气滑梯扎破，或一旦被绊住要翻跟头。

可是，林彪一向害怕生人，那为什么在准备迫降时，林彪让素不相识的三位机械师保护他，而不让儿子林立果或司机杨振刚保护他呢？儿子和司机也同样身强力壮 啊。当然也可以这样考虑，大型飞机在野外迫降非常危险。过去林彪一家都是尽量避免坐同一架飞机，这次三个人“挤”到了一起，又赶上危险的野外迫降，要死别 全死，分在机舱的三个地方，没准还有哪位命大者能“侥幸”。可是林彪不让儿子保护，为什么也不让司机杨振刚保护？

４、５、６、７号遗体的分布是这样的，５号林彪脸朝东偏北。４号邰起良、６号张延奎、７号李平脸朝西，围成半圆，完全是保护５号林彪的姿势，６号张延奎胳 膊前伸，手心内扣，像要抓住东西。他两腿斜叉，膝盖向上，脚心朝下，做蹬地状，像紧紧抱着什么。四具遗体中，只有４号邰起良是趴着，脸被摔烂，两腿叉开， 脚心朝上，两臂下弯，右肘横伸，手心朝上，像背着什么。７号李平两臂横伸，小臂上擎，右手心向上，左手心下扣，也像是在保护什么。

机尾的三具遗体，刘沛丰和杨振刚外伤严重，林立果被夹在中间，稍好。与三位机械师保护林彪一样，刘沛丰和杨振刚也是在保护着林立果。

遗体分布证明机上没有发生搏斗，倒好像发生了大火。

４０、 潘景寅从西郊机场起飞前为什么吃了安眠药？

可以肯定，在２５６三叉戟最后一次上天前，飞行员潘景寅只知道往南走。突然在空中改变，他似乎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３４师师长时念堂回忆：２５６三叉戟突然起飞时，我正在师指挥所里，从航迹上
看，潘景寅缓慢地绕了大半个圈，才向北京方向飞，到了河北迁安上空，才向北。

林彪座机从山海关机场的雷达上消失前，留下了１５分钟的航迹。据拉下的机组人员回忆，他们在山海关机场调度室看到最初航迹中有一个很不正常的转弯。６０度 足足浪费了６分钟，是平时转弯的好几倍。按说飞机起飞，应该迅速进入预定航线，然后保持直线，持续爬高，到达预定高度后，改为平直飞行。这样标在地图上， 只能是一条折线，折角的大小取决于起飞航线与航向之差。但是为什么“折线”变成了过程很长的“弧线”呢？飞机上感觉不到转弯，只能从仪表上读出来，又是夜 间，仪表板红光照明，比白天“读表”更困难。但也不应该是平时转弯的好几倍，与正常航迹相差那么大啊。

第二副驾驶康廷梓从航迹上分析，林彪座机飞行员潘景寅好像非常犹豫，变速很慢，转弯坡度很小，很迟缓，而且不规则，差点过了头。一个可能是故意迷惑地面， 另一个可能是潘景寅不知情，以为飞广州，突然转向北京方向，他没有思想准备。由于起飞后操纵动作延迟了４分钟，这就产生了不正常的转弯。２４０多度转到 ２８０度，继续增大，到了３１０度，朝向了西北。但是并没有稳定在３１０度上，又减小了航向，往西偏北继续飞行了十几分钟，超过１５度，再飞就成了３６０ 度，掉头回山海关去了。直到最后稳定在３２５度的航向上，在唐山以北的迁安向北，经承德、多伦及贝尔庙附近，飞进蒙古。为什么要往国境线飞？在飞行员的心 目中，国境线太敏感，因为空中并没有明显界限，飞行中如果要绕过雷雨区，也是宁可往国内多靠一靠，也别“不小心”飞出国去惹上“国际麻烦”。

林立果既然想外逃，当然怕被歼击机打下来。所以肯定要采取声东击西的措施。先向北京飞，造成回北京的假像。然后突然北飞，你歼击机再想起飞就来不及了。

上天前不知道往哪飞的事情，以前也有过。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０日，武汉７２０事件，毛泽东被“困”在武汉。周恩来专门从北京调了两架专机到汉口，一架有床有 桌子，一架只有座，没说谁用。两个机组的人员列队在飞机旁等着首长。突然看见毛泽东坐汽车来了。毛泽东没有犹豫，也没有任何人指点，直接上了潘景寅的伊尔 －１８飞机。那时潘景寅是１００团

副团长，团长王进忠在另一架伊尔－１８飞机上，被临时调到潘景寅飞机上，组成加强机组。因为是潘景寅的飞机，所以潘景寅 飞正驾驶，王进忠飞副驾驶。到了天上，毛泽东才说去上海。

还有一次是１９６９年林彪一家去江西井冈山，回来时本来是要到南昌。而叶群不想让林彪到南昌，怕江青找麻烦。上了天叶群命令去北戴河。林彪奇怪怎么飞了这么长时间，还不到南昌，叶群说马上就到北戴河了。

舒云认为：潘景寅起飞前并不知道飞越国境，航线在国内，潘景寅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国内航线，有地面导航，没有领航员也不怕，可以通过地面导航保持航线。凭一个老飞行员的经验，如果飞广州，油不够了也不怕，中间随时可以落地加油。所以他敢于一个人起飞。

可是"林副主席"怎么命令飞蒙古的乌兰巴托？大半夜的，强行起飞，机组人员还不全，这是怎么回事？潘景寅飞伊尔－１８时出国很多次，也几次飞过苏联这条航 线，每次都要准备很长时间，哪有到了天上才说去国外的？何况我们与苏联已经刀枪相见撕破了脸皮，难道是叛逃吗？潘景寅的心态，现在已无从知晓，只能等着黑 匣子"浮"出水面才能略知一二。但缓慢的航迹似乎可以反映他的心迹，他的思想斗争一定非常激烈，他哪里想到林彪一家（除林豆豆）要跑到国外去？

如果潘景寅事先知道内幕，他绝对不会吃安眠药。１００团政委安治梁回忆：９月１２日下午，２５６三叉戟从西郊机场起飞前，潘景寅对我说，我刚吃了安眠药。 因为这是临时起飞，潘景寅下午吃了安眠药，想抓紧时间休息，怕晚上有飞行。没想到刚吃了三片安眠药，还没有睡，飞行任务就来了。

林立果怎么可能要把他的"三个方案"告诉"司机"呢？现在看，"三个方案"中，上策谋杀毛泽东，中策南逃广州（香港），似乎是林立果的主意，下策北逃苏联似乎是叶群的主意。叶群去过苏联，会俄语。

可是潘景寅又不能违抗"林副主席"的命令，真是进退两难啊。

如果说潘景寅不知情，那为什么他不回答地面的呼叫？这也是后来把潘景寅打成反革命的一条"过硬"理由。吴法宪命令专机师拿着话筒喊，以周恩来的名义，叫他 回来。山海关机场、西郊机场和空军指挥所，所有的对空台都在用超短波电台对空呼叫，要三叉戟飞回北京，北京周围所有机场都打开跑道灯和夜间降落设备，随时 可以落地。那么，三叉戟上的无线电是不是没打开呢？正常情况下，飞机启动后，在滑行前必须打开机上所有的通话设备，因为飞机的一切活动必须得到机场调度室 的许可，才能进行。电台开关就在飞行员头顶部，轻轻一拨就可以打开，地面的声音就可以充满整个机舱。如果无线电打开了，潘景寅马上就会明白了怎么回事。

但是，潘景寅为什么没有像直升机飞行员陈修文一样，把三叉戟飞回来呢？

从雷达标图看，北戴河向西一段是山区，三叉戟爬高，越来越慢。

副参谋长胡萍非常奇怪，这是往哪里飞呢？２５６三叉戟在唐山以北的迁安开始向北，进入承德、多伦及贝尔庙附近，最终飞进蒙古境内。

４１、　潘景寅一个人能“扛”起２５６三叉戟吗？

空军３４师的飞行员回忆：潘景寅在九一三事件前情绪低落，有人问他，他说落地总解决不好。潘景寅一直当领导，飞行相对飞行员就少，再加上性格的原因，在改 装的三叉戟飞行员中，潘景寅技术不如团参谋长李克修和副参谋长陈联柄。只是因为潘景寅职务比他们高，李克修和陈联柄才成了潘景寅的“备份”。

潘景寅是作为干部飞行员培养的，开始飞行时岁数较大。曾在一次起飞时遇到“下马威”。自有飞机以来，飞行事故多发生在起飞和降落这两个阶段。飞机起降时高 度低，容易撞上障碍物。万一飞机发生故障，飞行员也没有处置的时间。对飞行员来说，飞行高度和速度是飞行员的生命，飞得越低，速度越慢，越危险，稍犹豫就 会发生等级事故。所以起落是飞行员的生死关。

那是１９５６年或１９５７年，到沈阳执行任务，潘景寅是机长，马和是副驾驶，赵政彬是空中机械师，机上还有空中通信、领航等。正赶上一场大雪，跑道中间的 雪扫掉了一段，前面跑道上还有雪堆。潘景寅看了看，认为可以起飞，就滑出去了。滑了一段看跑道不够，又退回来，继续等了好几个钟头。因为没有扫雪机，全是 人工扫，好不容易扫出１０００米的跑道。空中机械师赵政彬认为跑道还不够，但潘景寅认为够了。按一般情况是够了，可是超压起飞，就起飞了。潘景寅用了加速 度，到了雪堆跟前飞机还没有拉起来。眼看着飞机冲着雪堆扎进去，幸亏副驾驶马和身强力壮，用力拉了一把，螺旋桨把雪堆打得飞起来。飞机终于被拉起来了，平 安上了天。该收起落架了，表示起落架收起来的显示灯不亮。试了几次，都不行。原来雪堆把起落架上碗口粗的螺杆撞断了。空中机械师赵政彬建议先完成任务，因 为飞机刚起飞，油还很多，必须耗掉一些才能降落，这样落地就是起火，火也不会烧得很大。

空中飞行了两个小时，几个人想办法，如何安全迫降？救护车、灭火车也早早停在跑道尽头，预防万一。落地时，赵政彬对潘景寅说，歪一点，用好的起落架接触地 面。飞机一落地，赵政彬立刻把发动机关掉了，飞机虽然向一边偏，但总算没有人仰机翻。空军来人调查，算了个三等飞行事故。这件事非常典型地说明大型运输机 出现问题要一起商量。如果不是大家努力，也可能就成了机毁人亡的一等事故。

分析潘景寅这几次险情，起飞时他太着急，落地时他又太着急。而这两个弱点恰恰造成他最后一次飞行成了不归之旅。如果他起飞时稍稍停一停，或者机组人员全上 去，或者被警卫部队拦下，都走不成。而落地时，如果他不那么着急，再扩大一点盘旋范围，不就可以落在温都尔汗的土机场了吗？

时念堂回忆：潘景寅是专机师副政委，内向，不那么开朗，话极少。他的优点是非常沉稳，但也由此带来脑子有点“木”。他飞伊尔－１８时，就飞得不精。 １９６９年潘景寅驾伊尔－１８飞往山海关机场，“撞”上雷雨，下不来了，怎么也对不准跑道。那次我在后舱，上去把潘景寅换下来，这才让飞机落了地。陈联炳 对我说了好几次，叫我快点飞三叉戟，我们

说了不算，意思是潘景寅不行。

还有一次，空中发动机告警，潘景寅抬手就要关发动机，空中机械师把他的手打掉了，说你再看看。因为空中发动机报警，有真有假，潘景寅定睛一看，果然是假报 警。如果空中关机，虽然还有一台发动机，总是增加了一半的危险。这又一次说明，大型运输机上多一个内行，就多一份安全的保证。

康廷梓认为，因为是外行，叶群和林立果的技术准备仓促，没有得到重要的机场资料，尤其缺乏蒙古边境的军用机场数据。机场数据包括机场的位置，跑道方向，跑 道两侧导航台的设施，跑道的距离，电台的呼号频率及其它联络方式等。军用机场资料是绝密材料，不是与飞行有关的人员无法得到，得到了也看不懂。即使叶群问 到了蒙古边境机场的分布，没有具体标到航图上，也不行，飞行员只能根据航图飞。

在林立果的准备中，最有用的就是周宇驰要到一份北京到乌兰巴托的航线图，以及三北地区的雷达分布图。周宇驰要蒙古周边的电台频率，这是对的。只有掌握了广 播电台的地理位置，飞行中罗盘一旦接收到广播信号，罗盘指针就会自动引导飞机飞到电台上空。但这是领航员的工作，潘景寅不能离开驾驶台半步。三叉戟上特设 师邰起良会使用领航员的罗盘接收设备。

三叉戟起飞前的各种准备工作，如加油等，离不开机械师，连飞机舱门的钥匙都在机械师身上。但一旦起飞动作完成，飞行中不发生故障，机械师就无用武之地了。 所以三个机械师包括邰起良在机舱后面保护林彪，不可能帮助潘景寅操作。叶群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她懂俄语，所以她“大摇大摆”地坐到了潘景寅身边，冒充领航 员。可是，叶群再“聪明”，又怎么可能引导三叉戟飞向平安？也就是说，在近两个小时的夜航中，没有人可以与潘景寅商量，一切的一切全由潘景寅一个人“扛” 着。面对如此困境，再胆大的飞行员也会缩手缩脚。飞机一动就孕育着危险，哪怕万分之一的不小心，也可能导致机毁人亡。

航空专家通过数字分析发现，如果飞机持续夜间飞行，执勤时间越长，飞行员发生飞行事故的概率也越高。“不眠时间段”越长，存在的“隐患”就越大。特别是在 一天的后半段，也就是下午至午夜、午夜至清晨，比前半日存在的危险更大。所以飞行事故多发生在下午或夜间，特别是机长在决策和程序方面的错误明显增多。为 此，世界民航界对飞行机组的值勤时间和飞行时间及年龄限制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

在飞行这个复杂的系统中，飞行员始终是核心。当过“老飞”的人都知道，飞行是一项繁重的脑体并重的特殊劳动，劳动强度非常大，对飞行员的生理和心理要求极 高。长久以来，四分之三的飞行事故都是由于人为表现不佳引起。七情六欲、疾病、疲劳、不舒适或焦虑等，都会影响人的主观能力及与客观环境的匹配和适应，从 而产生不良的行为。所以飞行员睡好、吃好和心理平衡，是飞行安全的重要保证。

偏偏潘景寅在那一天晚上睡觉、饮食和心理都不好。从西郊机场起飞前他匆匆在候机楼吃了“盒饭”，到北戴河落地吃了一顿夜餐。也就是说，潘景寅两顿饭都没有 吃好。而又一天中连着两次开飞机，傍晚执行了一个航班，从北京到北戴河，虽然是短途，不到一个小时的飞行，但加上飞行前的准备和飞行后的收尾，时间也拖得 很长。之后他布置机组休息，他却没休息。因为他下午吃了安眠药，到了半夜，药劲早过了，更加清醒，所以一夜未睡，一直

坐在调度室里，连着接了好几个电话。 没吃好倒也罢了，没想到原来说第二天早上的飞行提前到半夜，而且那么慌乱，连机组人员也没到齐就飞上了天。

茫茫黑夜，上天就上天吧，夜航也不是一次两次。可是，为什么飞往蒙古？潘景寅心里的斗争没有办法不激烈。老婆孩子都在北京，北京有他温暖的家，他为什么要 跑到国外？跑到国外他算什么？飞机肯定是开不成了，那他能干什么？想再回国也不可能。可是，又不可能永远在天上飞下去，油不多了，降落到哪里呢？飞机上还 坐着"林副主席"，实在是心力交瘁啊。面临"弹尽粮绝"和"走投无路"，就是三头六臂，一切也已经无可挽回了。

４２、　大型军用运输机能一个人飞吗？

空军航行局局长尚登峨回忆：１９７１年9月１３日凌晨，２５６三叉戟第一副驾驶陈联柄给我打电话，说潘景寅一个人把飞机飞走了。什么？一个人？我简直不敢 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慢点说，飞机上还有什么人？除了潘景寅，还有三个机械师。不可能？我不相信，反复问了好几遍。我是飞行员出身，吃飞行这碗饭２０多年， 只有一名飞行员就飞上天，还从来没有先例。大型运输机不像歼击机，一个人就可以飞上天。大型军用运输机必须两个飞行员飞，一个正驾驶，一个副驾驶，配合操 作，就是本场训练，飞起落这样简单的科目，也应该全体人马都上，一个都不能少。更何况外场，又是夜间。

林彪专机这次飞行配备了三名飞行员，多配了一名副驾驶。而潘景寅，不仅"丢"下了两名副驾驶，还"丢"下了领航员和通信员。

歼击机在空中飞行的时间短，没有那么长的航线，光凭地面导航就完全可以。运输机航线长，加上空中有风的影响，飞机可能会偏离航线。所以除了地面领航外，必 须要有空中领航。尚登峨吓坏了，这是林彪的专机呀，怎么一个人就飞了？机组都有谁？现在你身边还有谁？陈联柄告诉我，潘景寅把机械师叫起来加油，等调度室 老李叫我们起床时，飞机已经滑出，没来得及加油，也没有到调度室办手续，就起飞了。这时参谋长梁璞上来了，我让陈联柄直接报告参谋长。

２５６三叉戟从西郊机场到山海关，开完飞行总结会，已经很晚了。因为第二天一大早还要飞行，所以机组除了潘景寅都抓紧时间睡了。要不是特设机械师邰起良打 了个电话，机组的五位成员还在沉沉的睡梦中呢。邰起良打电话给调度室，说首长都到了，机组人员怎么还没到？调度室主任李海彬急了。

零时２０分左右，领航员李成昌和同屋的第二副驾驶康廷梓被重重的砸门声惊醒，外面有人喊，快上机场，首长已经到了。机组的五位成员几乎同时从睡梦中惊醒，从床上蹦起来。

飞行员有个习惯，两只鞋尖一律朝外，蹬上就可以跑出去。可是，第二副驾驶康廷梓以紧急集合般的速度套上衣服，一只脚伸进皮鞋里，第二只脚还未来得及伸到第 二只皮鞋里，就听见飞机发动机启动的声音。怎么会？他连鞋带也没系，衣服也没扣，就疯了一样冲出门。他的航行包就在飞机上放着，没拿下来，省了一道手续。 黑暗中，他看见机组的两个老同志陈联炳和陈松鹤跑在他的前面。

刚跑出十来步，就听到发动机启动了，紧接着是加大油门的尖叫声。李成昌急得马上百米冲

刺，还是晚了几十秒钟。在距离三叉戟还有５０多米时，飞机滑行了。要 是英制“子爵号”，发动机性子慢得像“老牛”，响半天，才能发动起来。偏偏三叉戟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运输机，发动机是个急性子，启动快。紧急情况下，除利 用地面专用的启动车外，还可以利用飞机自带的压缩空气启动，不受地面专用设备的影响。内行人说，开车，滑行，起飞，机械师肯定帮了忙。平时机械师不管操纵 飞机，但因为机组不全，三个机械师至少有两个在前面操作。潘景寅利用机上设备启动中央发动机，然后一边滑行，一边利用中央发动机的压缩空气启动另外两台发 动机，这就大大节约了起飞时间。只要滑行中做好驾驶舱内的各种检查，飞机一旦进入跑道，不需要停机，就可以加大油门直接升空。

被“丢”下的五位机组人员，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傻了一般，望着停机坪。眼看着三叉戟沿着跑道东头的滑行道越滑越快，接着就嗖地飞上了天。其实就差一两分钟。是不是在梦中？不是，专机确实是起飞了，停机坪上空空的，飞机早就没影儿了。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李成昌顿时涌出一身冷汗。作为专机领航员，专机飞走了，你却没上去，万一因为没有领航员，专机出了问题，那可成千古罪人了。李成昌 越想越害怕，四下望望，这才发现身边还有三个机组成员，两位副驾驶陈联炳、康廷梓和通信员陈松鹤也被专机“丢掉”了。

机长潘景寅在机组准备飞行的会上，安排得好好的，第二天一早起来到机场做准备，然后吃早饭。没想到才睡下两个小时，一切全变了。２５６三叉戟编制了九名机组成员，四位重要人物没有上去。

服务员小魏因为要提暖水瓶打开水，动作稍慢了一步。她提着两个暖瓶，望着空空的停机坪，着急地说，我开水还没打，他们怎么就起飞了？

四位垂头丧气的“难友”顿时觉得自己失了职。陈联炳问，怎么办？李成昌是党小组长，潘景寅不在，他就是机组的头儿，他说上调度室。在调度室，陈联柄向空军航行局报告。所有的人都惴惴不安，潘景寅要把三叉戟飞到哪里去呢？

４３、　　苏联人为什么对温都尔汗坠机现场最积极？

２５６三叉戟是中国的飞机，坠机现场是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也就是说，中蒙双方应该是最关注的。但是奇怪，中国人最不积极，蒙古人还算积极，而与坠机现场毫 无关系的苏联人却最积极。苏联人三番两次到温都尔汗坠机现场，拿走了他们想拿走的所有东西。为什么苏联人比中国人和蒙古人更积极？

九一三事件中，后起飞的直升机迫降后，缴获了大量的机密文件，２５６三叉戟随身有没有带机密文件呢？中国高层一时搞不清楚。但中共中央在给中国驻蒙古大使 馆的第一个电报中，就提到未烧完的文件物品，要求蒙方转交我们。因为在视察现场，蒙方提出，是否只看不取，待视察完毕，统一移交，许文益大使同意了。但最 后没有达成协议，现场遗物一件也没有移交。

蒙方一口咬定，在这架飞机上除９名遇难者的遗体外，没有发现装有其它货物的痕迹。但是很清楚，苏联人和蒙古人在中国人到来之前，已经初步整理过现场，大的 东西没动，小件

如枪支等都归到一堆。林立果从北京到山海关机场时，蓝色"伏尔加"拉了两趟箱子。"伏尔加"的后备箱特别大，能装不少东西。２５６机组人员 回忆：当时装上三叉戟的大大小小的箱子有２０多个。到山海关机场时，除刘沛丰时刻不离身的几个手提包外，别的箱子都没有卸下。刘沛丰那几个宝贝手提包肯定 是上了飞机，而且还多了好几个包。皮箱子不会烧毁，飞机上的机械师邰起良穿的皮茄克几乎完好就可以证明。这２０多个箱子都"不翼而飞"了，在谁手里？蒙 古？还是苏联？不知道，不过最大可能是被苏联拿走了。

关于２５６三叉戟上的２０多个箱子，里面究竟装了些什么？苏联和蒙古至今都没有吐露一个字。但是可以肯定，关于林彪座机的坠毁，蒙古人和苏联人比中国人知道得更多。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新华社没有派驻蒙古的记者。１９８５年１月８日，新华社驻贝尔格莱德分社记者杨达洲从贝尔格莱德发回一条电讯。南通社社长米哈伊尔？色拉 诺维奇最近对记者谈到蒙古方面向他介绍的有关林彪在蒙古摔死的情况。杨达洲回忆：年底宴请南通社领导。南通社社长色拉诺维奇与我年纪差不多，他曾任驻蒙古 和朝鲜、中国三方的记者。在北京我们就认识，处得不错。色拉诺维奇说，１９７５年，当时任南共联盟中央执行书记的多兰茨去朝鲜和蒙古访问，指定当时任南通 社驻京记者的他随团采访。到蒙古后，蒙古通讯社原驻京记者、当时任蒙古党中央某局局长的那木斯莱邀请色拉诺维奇夫妇到家里做客。那木斯莱的妻子自称是汉学 家，在蒙古公安部主管中文处。据那木斯莱的妻子讲，她从头到尾参与处理林彪飞机案。黑匣子先在蒙古人手里，因为蒙方老提抗议，害怕中国说是它打下来的，这 样，她才有机会听到黑匣子。从"黑匣子"的录音带上可以判断，机上人员在激烈争吵。跟地面导航站之间也有争论。过几分钟吵一阵，还有射击声。她断定飞机上 有林彪，但最初苏联人不相信，后来他们要走了黑匣子。

不管怎么说，那木斯莱妻子说的黑匣子里的声音不对，二五六号三叉戟始终没有与地面通话，怎么可能与地面导航站吵架呢？新华社驻蒙古的记者王义民认为：完全是捕风捉影。

据澳大利亚记者彼得·汉纳姆的文章披露：苏联人说，２５６三叉戟的黑匣子找到了。但克格勃鉴定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与地面的通话。确实，２５６三叉戟 就没有与地面通话。如果有地面领航，２５６三叉戟完全不必冒那么大的危险迫降野外。但是，有没有机内说话的内容呢？

苏联人卖了个"关子"，没有说有，也没有说没有。到底有没有呢？因为摔毁在１９７１年9月１３日凌晨的这一架三叉戟不是一个简单的飞行事故，而成了政治。 加上本身这一架专机就是高度机密，致使黑匣子更加复杂化。不管怎么说，只要黑匣子能开口"说话"，中共党史上最大的谜底就可能被揭开。

４４、 景寅为什么不叫机组一起准备飞机？

２５６三叉戟慌慌张张起飞了，却"丢"下了五位机组成员。带着一大堆问号，五位机组成员又往调度室跑，看哪儿飞。目标２９０度、１００公里，目标３１５度、１５０公里，２５０公里……不久目标消失，五名机组人员茫然回到山海关机场招待所。

不过在调度室，他们总算搞明白了一件事，飞机上只有机长潘景寅和三个机械师。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急急忙忙地起飞？没等机组全上去就慌乱起飞，能保证安全吗？

专机组都知道，准备飞机从来都是全机组一起准备的。飞机落地首长走了，机组还不能走，还要检查飞机，查得很细，每个地方都要查到。检查完了还要塞上各处的 “眼”，罩上蒙布，才能回去休息。飞机尤其是专机，不像汽车，上了车就开。飞机复杂得很，冬天夜里那么冷，要提前一个小时准备好，加温开车。准备时间起码 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打开蒙布，取出塞好的“眼”，然后发动机试车，每个部件检查到，良好了，才能放心。剩点时间还要拿抹布和汽油，里里外外擦。然后 在机场待命，等待首长。要是发现故障，那时间更长。试车排除故障，排除不了，任务没了，一天也是它，两天也是它。那时设备陈旧，不像现在换上个部件就完 事，那时得慢慢修。所以专机组最辛苦，没白天没黑夜。要是在家，还好一些，地面有一套设备，机械师都在。在外场，就靠机组几个人，必须全体到外场，大家一 起上阵。对于专机组来说，无论干什么，都是机组人员一起行动。可以说，这是一条铁的“纪律”。很奇怪，为什么潘景寅只叫住在同一房间的三个机械师起来准备 飞机，没叫其它的机组成员呢？

９月中旬的北戴河，晚上已经很凉，康廷梓只穿了布飞行服，感到挺冷，睡觉时就顺手把窗户关上了。虽然关上了窗户，但是只隔一道墙，他睡觉又轻，应该能听见潘景寅叫三个机械师起床，为什么一点也没听见呢？说明潘景寅叫三个机械师的动作很轻。

是故意不叫，还是因为太匆忙？因为机上的四名机组人员全部死亡，黑匣子又一直没有露面，所以只能是猜测。有人反映九一三事件前潘景寅情绪低落，说他表面上 老实，但很有心计，想问题比较多，有些思想不暴露。潘景寅以前爱说，自从反右时差点儿被打成右派，从此就十分谨慎了。［１４］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当然 不愿意夭折自己的政治生命。有人说他与周宇驰是航校同学，又一块调到空军，所以关系很好。可是并没有查到潘景寅和周宇驰搞阴谋的事实。有人认为是“精心安 排”，潘景寅负有“特殊使命”，故意不叫全体机组人员。还有人猜测林立果打电话给潘景寅，说机组人员越少越好，人多了不好骗。怎么不好骗？上了天，又是黑 夜，飞到哪里你怎么知道？

三叉戟装有各种先进的导航设备，但潘景寅一个人在空中驾驶飞机，不可能腾出手来再测量航线的资料。１点５０分飞越国境，是地面雷达提供给指挥所的，潘景寅 在空中，不可能那么准确。虽然“大方向”没错，但在长达１０００多公里的飞行中，中间没有导航点对飞机的航迹进行校正，又没有地面领航和空中领航，还没有 通信联络。而且又是后半夜，大部分电台广播都已经停播，地面上又黑乎乎一片，想准确地飞下去实在是太困难了。

按照逻辑，如果潘景寅知道飞往国外，他无论如何也要让全体机组一起上。或许潘景寅知道上边斗争激烈，但他做梦也想不到“斗争”会表现在他的飞机上。从林彪 座机看，潘景寅傍晚执行了一个航班，从北京西郊机场到北戴河，虽然是短途，不到一个小时的飞行，但加上飞行前的准备和飞行后的工作，也很疲劳。之后他布置 机组抓紧时间休息，他却一夜未睡，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虽然第二天一大早还要飞长途，但潘景寅并不担心，他知道机组还有两个技术高超的副驾驶陈联柄和康廷 梓。有他们两个撑着，潘景寅完全可以放心。本来开完飞行后总结会已经很晚了，而林立果半夜突然命令给飞机加油，潘景寅当然要考虑，三个驾驶员都休息不好， 这飞行安全怎么保证？能让他们再多睡一分钟也好啊。所以他轻手轻脚只叫了三位机械师起来加油，让两位副驾驶多睡一会儿。但没想到，林彪的“大红旗”超速来 到山海关机场，致使一个机组被生死永远相隔。

４５、　如果三叉戟“赖”在山海关机场呢？

现在想，如果飞机“赖”在机场，会是个什么情况？时任苏共联络部中国处处长库里克后来说：我们感到最为庆幸的，是林彪没有真的飞到苏联来。如果林彪真的到了苏联，中苏之间的麻烦就大了，也许不仅仅是一场边境冲突了。

有人说，如果不飞，潘景寅就是英雄飞行员，甚至整个专机团都要立功。或许２５６三叉戟摔在国内，空军３４师不会牵连那么多的人。那么，潘景寅为什么要慌慌张张起飞呢？空军３４师师长时念堂说：“鬼”催的，一个人怎么飞？没法飞，迫降是必然。

叶群和林立果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潘景寅也看见林彪上了飞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叶群命令快起飞，潘景寅怎么敢不起飞？为什么不飞？说到底，你飞行员不 就是相当于汽车司机嘛。首长要专机，不光林家，都是随叫随到。专机没有起飞时间，首长来了就是起飞时间。每次都是机组先到机场等首长，都习惯了，从来没有 首长到了而机组还没到的先例。

只有一个飞行员和三个机械师，就把这么大型的运输机“捅”上了天，实在不可思议。不要说调度室没有给命令，跑道灯也没有打开，而且两个副驾驶和领航员、通 信员都没有上来，飞行条例规定，机组不全不能起飞。不要说专机，就是普通的航班，也从来没听说机组人员还没有到齐就飞了的。本场训练，飞起落这样简单的科 目，也要等机组人员齐了才能飞，更何况是在外场，又是夜里。飞机缺少副驾驶、领航员、通信员，一个人怎么就敢大黑天的起飞呢？

叶群和林立果再催，也要等机组人员全上来再飞啊。急也不急这三两分钟嘛，大飞机可不比汽车，如果潘景寅拖延，林立果有可能打死他吗？林立果也要想想，打死 了飞行员，谁会飞三叉戟？他能开“大红旗”，可是他都没开，因为车上有他的父亲林彪。三叉戟他只会坐，不会驾驶。所以他敢打死潘景寅吗？当然最后“鱼死网 破”，也不是不可能。不过还没到那个程度，潘景寅稍微解释一下，等个一两分钟，机组就全到了嘛。

潘景寅可以说发动机有故障，要修一下。虽然林立果学过开飞机，但三叉戟这样的复杂大飞机，他再有本事也挪动不了。潘景寅也完全可以借口机组不齐，不能起 飞。大型飞机又不是汽车，一个人就开了到处跑。飞机飞了，还要保证安全。没有安全，飞上去不等于集体自杀吗？这点道理林彪一家也不是不懂，以前坐飞机，一 家人从不坐在一架飞机上，不就怕全家覆没嘛。潘景寅把没法飞的道理讲了，他们肯定不会再“催命”，前后差不了几分钟，毕竟“安全第一”啊，再急也会“耐 心”等机组人员到齐。

潘景寅的二女儿潘鹭回忆：爸爸喜欢唱京剧样板戏。他手巧，做了很多毛主席像章。“文革”初很多人造反，他就自封“保皇派”，绝对服从上级。那时弟弟潘鹏一 两岁，爸爸抱着他看游行队伍，他学着喊打倒打倒。爸爸马上制止，说别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你爸爸就是个“保皇派”。 潘景寅家乡的人说，老潘忠实，胆大，偏偏又不善于“演讲”。由此他打破了中国航空运输史上的记录。

本来空军司令部想把潘景寅调到机关的，调令都来了。１９６９年我国从巴基斯坦首批买进四架英制三叉戟，编号２５２、２５４、２５６、２５８。因为这批三叉 戟，潘景寅没走，以民航身份参加了与巴基斯坦的购机谈判。之后，１９７０年６、７月，潘景寅带着西郊机

场包括飞行员在内的各工种３０多人，到广州学习三叉 戟的飞行和保养。潘景寅由巴基斯坦飞行员带飞，进行了三叉戟的改装。行政上潘景寅是专机师副政委，在机组中年龄、资历都是排行第一，业务方面更是三叉戟的 技术权威。所以，他当然是中国三叉戟的鼻祖。

吴法宪回忆：周总理打来电话，说林彪乘车离开北戴河，临走还开枪打伤了警卫员（这是误传）。我感到情况严重，不过还可以挽救，北戴河到山海关还有几十分钟 的车程，我马上叫张秘书打电话给潘景寅，告诉他专机不能起飞，潘景寅满口答应。胡萍也给潘景寅打了电话，飞机一概不准动。

按说，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命令潘景寅不要起飞，就不应该起飞了。但是，吴法宪从１９７０年的庐山会议后，被批了整整一年，没完没了地写检讨，空军很多人都知 道吴法宪已经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了，还说吴法宪反林彪。在吴法宪和林彪面前，潘景寅当然听林彪的，而不会听吴法宪的。性格即命运，作为全心全意的“保皇派”，在那个关键时刻，叶群让起飞，潘景寅怎么可能不起飞？如果他稍微想一想，跑？往哪儿跑？既然有人要抓“首长”，跑到天涯海角也没用。可惜潘景 寅非常紧张，“首长”让起飞，就快快起飞吧。可是上了天，飞到哪里你怎么知道？

机毁人亡，有着一系列的偶然。进口的四架三叉戟虽然是旧的，但这是我国第一次拥有大型喷气式客机。它航程长，可以从北京直飞海南岛或广州，不用中途落地加 油。而且发动机在后面，噪音小。一投入使用，就“马不停蹄”，中央领导开会都喜欢坐。江青、邓颖超、谢富治、华国锋、丁盛等都坐过。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也看 上了三叉戟，而林彪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坐三叉戟。１９５８年，林彪还没有到军委工作，坐飞机到昆明疗养。他觉得飞机比较好，首先是非常快，从那以后就开 始坐飞机了。那时林彪的座机是“子爵号”，涡轮螺旋桨，时速４５０公里，比三叉戟慢一半，野外迫降，危险肯定比三叉戟小得多。

一个老飞行员的常识告诉他，只靠１２吨半的油，如果飞到广州，油不够了，也不怕，中间可以随时落地加油。没有领航员也不怕，一个人也还多少有些把握，可以 通过地面导航保持航线。可是他哪想到要在夜里飞往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盲人骑瞎马，稀里胡涂上了天，可是怎么稀里胡涂下来呢？
２５６三叉戟在起飞时，似乎就注定了机毁人亡的命运。

４６、 为什么中国没有要２５６三叉戟上的黑匣子？

关于２５６三叉戟的坠毁过程，也许永远没有人会知道了吧？

且慢，还有神秘的黑匣子。人都死了，惟一能“说话”的黑匣子没有“死”。飞机从起飞到摔毁１１８分钟，差两分钟就是两个小时，在这“长长”的一段时间里，飞机里发生了一些什么？因为始终没有公布飞机上的黑匣子，有些说法就无法令人信服。

飞机失事，首先就是尽快找到黑匣子，这是每一个调查组首要的任务。２５６三叉戟是在飞出国境４０分钟后坠毁的，黑匣子的作用更是非同一般，怎么就没人提及呢？

或者我们那时根本不知道飞机上还有黑匣子，至少到现场的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官员们对黑匣子一无所知。最先到现场的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二秘孙一先说：中国人没 有拿黑匣子。当时我们对飞机并不认识，更不知道黑匣子，那时我们没有专业知识，不懂，想不到提这方面的要求，国内也没有索要黑匣子的指示。所以，在对蒙古 交涉时，我们连提也没有提。以后研究这架三叉戟，也从来没有提过黑匣子。到了１９７２年，空军专家分析三叉戟的失事原因，只是凭着照片从技术上分析，仍没 有提及黑匣子。很久以后，人们才知道大型喷气式飞机上都装有黑匣子。

国际上关于空难事故的调查，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事故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发生的？详细经过如何？二、如果机组的人活着，采取了哪些应急措施？三、分清事 故的责任，是人为的，还是不可抗拒的？四、事故的教训经验。五、为了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应当采取哪些措施？为了使制造厂家和用户都能从事故中吸取教 训，参加调查的不仅有民航和飞机的用户，而且也有厂家代表。不管空难发生在何处，都会引起世界广泛的重视，并立即组成联合调查组。在调查中不允许有任何弄 虚作假的行为，每一个细节都必须水落石出。

但是，由于空难中首先丧生的往往是驾驶人员，这给事故调查带来困难。因此，飞机上的黑匣子就成了不可多得的宝贝。黑匣子直径３０到４０公分，像个圆球，在 安装和定位装置等方面都具有最大的自我保护能力，长时间在火中也不会损坏，以使记录的数据能够被保存和复原。最初黑匣子是黑色的，因为失事后黑色的物品不 好寻找，就改成桔黄色，以求醒目。但因为黑匣子叫顺口了，就一直叫黑匣子。

黑匣子又叫飞行数据＼语音记录器，是按时间顺序记录飞机飞行全过程信息的记录仪，尤其是飞机在特殊事件中的行为信息。为发现隐患、查找事故原因提供不可缺少的依据，也为训练飞行员和进行飞机设计提供必要的真实参数，所以是不可缺少的机载设备之一。

过去老式飞机上没有黑匣子，出了事很难查清。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人们已经重视飞机的记录，５０年代起安装在飞机上的是简单的记录器，只能记录几个参数。由于计算机的发展，６０年代西方国家开始在飞机上装黑匣子，把飞机上的技术信息编成密码，记录下来。

现代飞机上一般有两个黑匣子，机尾一个，机头一个。机尾的一个记录飞行数据，能持续监控和记录１００多项，包括飞机的高度、速度、爬高速度、垂直加速、飞 机磁偏角、发动机及工作状态、稳定性能、承受重量、外界温度、气压、风速、机舱内环境等，对飞机事故高发区的起飞和着陆的记录更加详细。机头的语音记录器 记录飞行员的谈话信息，驾驶员的每一个举动，每一句话，每一次与地面塔台的联络、都有详尽的记录。到飞机失事止，至少保留前３０分钟的所有信息。这无疑是 飞机失事原因的不可缺少的判断材料和分析事故发生过程的宝贵依据。两个黑匣子对照，在不同高度、不同阶段、不同飞行状态下驾驶舱内所发生的一切，尤其是飞 机起飞后和迫降前两个最为关键的时刻就可以再现出来。

黑匣子能抗高温和强烈振动，保证信息能拿出来。

所以，２５６三叉戟上的黑匣子肯定在！

黑匣子肯定不在中国人手里，不是在蒙古人手里，就是在苏联人手里。

蒙古有人以个人名义说过，黑匣子刚开始在蒙古人手里，后来被苏联人拿走了。苏联人不管是官方还是个人，都没有提到过，好像这架三叉戟上从来就没有黑匣子一 样。只有澳大利亚记者汉纳姆调查九一三事件时，到苏联采访时听说２５６三叉戟的黑匣子没有与地面通话的声音。看来，苏联人已经“解剖”了黑匣子，也得知了 黑匣子里的秘密。

４７、 苏联为什么还在“收藏”２５６三叉戟的黑匣子？

林彪座机坠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飞机故障？操纵错误？机内搏斗？导弹击毁？人为破坏？油箱爆炸？还是飞行员疲劳？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派专家进行事故调查，目前惟一的知情者只能是那个黑匣子。

２５６三叉戟的黑匣子被苏联人“收藏”快４０年了。苏联早已经解体，当年不可一世的克格勃也早“死”了，为什么２５６三叉戟的黑匣子仍秘而不宣，不还给中国？

因为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过！

如果要，苏联人会有三种选择，给或者不给，或者干脆说谁拿你们的黑匣子了？不管怎么说，我们总算知道了苏联政府的态度。而现在，苏联政府对２５６三叉戟的黑匣子是什么态度，我们根本不知道！

现在想，林彪虽然官至老二，红得发紫，却是一个“孤家寡人”，从来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利为谁谋过私利。而他的老部下也因九一三事件断了官运，所以，高层中没 有人替林彪说话。不像刘少奇，有个难兄难弟，第三次登上高位后，替刘少奇平了反。如果刘少奇不平反，“他”也平不了反！

其实，林彪平不平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事求是！而黑匣子，是九一三事件实事求是的前提之一。

关于黑匣子，有人说２５６三叉戟上没有装，这似乎不可能。更多的人包括三叉戟机组的人员都肯定飞机上有黑匣子，不可能不安。空军必须设备齐全，设备不全不 能上天，更何况是第一号专机。但这一切都是假设，遗憾的是从三叉戟的公开材料里找不到关于黑匣子的记载。到底２５６三叉戟上有没有黑匣子？谁也没见过，这 就使问题复杂化了。不过，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些资料中找到一些线索。中国民用飞机如伊尔－１８、安－２４、三叉戟和波音７３７等都装有黑匣子，但结构简单， 记录参数较少，一般记录5至9种或十几种参数。英制三叉戟在６０年代中期投入航线飞行。现在这种飞机是远远落后了，但在１９７１年，还算时髦。但是我们是 从巴基斯坦购买的，并没有直接与厂家沟通，因此对三叉戟的性能并不那么清楚。

三叉戟从ＩＥ型开始，已经在机尾装上黑匣子。在２５６三叉戟摔毁的照片上，可以看到飞机尾翼高高翘起，说明黑匣子应该完好。更何况黑匣子有一层厚厚的“保 护”，火中水中都可以安然无恙。苏联人两次到坠机现场，一切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包括飞机上的发动机，包括林立果从北京带上飞机的２０多个箱子，以及手 令、航图等，全被苏联人“一网打尽”。人们推测黑匣子在苏联人手里，苏联人在拆走发动机的同时，拿走了黑匣子。苏联人连三叉戟上的主发动机都能拆走，一个 小小的黑匣子更不在话下。据彼得？汉纳姆的调查，黑匣

子是被苏联拿走了。为什么苏联人这么沉得住气？他们连林彪的头颅包括假牙病历都公布了，黑匣子为什么 不公布？当然，没有公布的还有他们两次在现场拍下的一批照片以及他们拿走的三叉戟上的那一批箱子。

为什么时隔近４０年，２５６三叉戟黑匣子仍不露面呢？

三叉戟飞行员康廷梓在进行三叉戟理论学习和飞行训练时，教员没有提及黑匣子。因为黑匣子与飞行员飞行无关，正常飞行时它“袖手旁观”。而且它“藏”在前舱 顶上，只露一个小小的网状口，连个电门也没有，不出事谁也想不到它。就像平时放在房间里的灭火器，一旦失火才成为“英雄”。如果黑匣子像保险丝一样可以拔 下来，或许可能被破坏，那黑匣子在关键时刻就“冲”不上去。所以谁也不能拿下来看看，更不能人为控制它。但也正因为这种不可能，黑匣子正常不正常无从知 晓。只有在出事后，黑匣子送到实验室，由专家打开，才能知道黑匣子是不是正常工作。至于密码能不能被破译？破译的密码能不能解开？都还是未知数。英美等国 专门有关于黑匣子的研究机构。黑匣子很复杂，你用它的飞机，出事要找它翻译，要花很多钱。苏联搞黑匣子很晚，是另一套。也有人说，黑匣子找到也没用，不能 说明为什么迫降？另外话音录音器是不是好，不敢保证。

当然，黑匣子也不是“神仙”，１９９９年，埃及航空公司飞机失事的两个黑匣子先后从大海里打捞上来，对语音和数据“左”分析“右”分析，也没分析出所以然 来。只知道失事前飞行员发现了飞机的某个问题，而且正在设法解决。不过直到飞机失事，飞行员也没有弄清飞机究竟出了什么故障。美国有报纸说飞机员要自杀， 遭到埃及政府的强烈抗议。

或者，有了黑匣子，事故结论也不一定就能非常精确。但是，有了黑匣子，总是可以知道２５６三叉戟最后半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果这个黑匣子在苏联手里，也有几种可能，或者破译，或者不感兴趣，扔在一边。如果破译，是不是应该请英国人帮忙？可是没有。要是说苏联人不感兴趣，恐怕 也不会。他们为什么又第三次去温都尔汗荒原，把林彪和叶群的头颅拿去进行分析呢？很可能他们不相信中国人公开讲的那些结论，还要独立证实一番。那么他们可 能独自破译，有结果或者没有结果。随着时间推移，如果这个神秘的黑匣子仍“活”在世上的话，那么，２５６三叉戟上最后半小时的录音恐怕就会让九一三事件真 相大白。

４８、 蒙古政府为什么紧急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

中国大型飞机坠毁蒙古境内，死亡这么多人，这在蒙古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２５６三叉戟的坠毁地点在蒙古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１０公里处，离中蒙边界至少 ３５０公里，是蒙古的纵深地带，离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不远。在坠机一天多以后，９月１４日上午８时，刚上班，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电话通知中国驻蒙古大使 馆，半个小时后，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敦比列格受政府委托，紧急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

时任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翻译王中远回忆：蒙古方面说，有一架中国飞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出事故，有９个人，当时提出口头抗议，让我们做出解释。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十年，九一三事件正好在“文革”中间。受极左影响，中国一直反修，

反对苏修、蒙修，与苏联处于敌对状态。蒙古紧跟苏联，军事配合，制 造很多事端，两国关系非常紧张。那时蒙古每天的广播都有反华的声音，只要集会，必定要反华。我们翻译注意听，只要听见“反华”两个字，后面就不听了，拍屁 股就走，这样的退场很多。

以前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连大使都没有，长期缺任，由二秘代办，后来来了参赞当代办。到１９７１年，两国关系开始缓和，不再像１９６９年珍宝岛战斗后剑拔弩 张，双方重新互派了大使。１９７１年8月２０日，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乘坐北京到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抵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刚到任才２０多天，因馆务繁忙， 他还没有拜会蒙古的这位外交部副部长。在这种情况下，蒙古突然约见许文益大使，这是非常反常的。就是正常约见，也应该事先有拜会，没有拜会不能约见。而这 次，事先也没有预约，显然事情又重要又急迫。

孙一先回忆：但是，完全没想到是中国喷气式飞机失事。

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都很吃惊，猜测，很多猜测。

一般讲，军用飞机、战斗机不可能上九个人，太多了；而客机一般也不会只有九个人，又太少了。看来这架飞机非同寻常。不是战斗机，又不是客机，是不是专机？这么大的飞机，至少不是一般人，肯定是首长。

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敦比列格为了显示友好，没有在会客室谈话，而是把许文益大使请到他的办公室，并摆放了糖果和烟茶，。他首先对还未正式拜会就紧急约见 表示歉意，然后说受政府委托通知：9月１３日凌晨２时左右，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十公里处，有一架喷气飞机失事。

额尔敦比列格说：这件事我们通知中国大使馆迟了一些。因为事情发生在夜里，我们知道得也比较晚，有关部门也是到上午才知道。昨天虽然天气不好，我们派人去 出事地点了解了中国喷气式飞机失事的情况。经多方查证，飞机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乘员九人，包括一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对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 土，我代表我国政府提出口头抗议。可以认为是侵犯了我国领空，我有关方面正在继续调查，我们保留对此事再次进行正式交涉的权利。

蒙古首先抓住主动权，把责任和可能的责任推得一乾二净。蒙方不明原因，推托也是可以理解的。小国嘛，中苏对立，它夹在中间，怕咱们做文章。虽然是摔了，但你是军用飞机，毕竟还是侵入了人家的领空，先下手为强嘛。

可是越境的飞机没有攻击行为，而且机毁人亡了呀。

许文益大使是老外交官了，外交经验丰富，处理过很多重大事件，他思索该如何回答。

额尔敦比列格放缓了口气，说我第一次与您正式见面，很遗憾提出这样的问题。希望大使转告中国政府，并希望你们近期内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的原因给予正式解释。

许文益感谢他的通知，说对于副部长提出的口头抗议，在我没弄清楚和了解事实真相之前不能接受。但我可以把此事转告我国政府。还说正当中蒙两国关系刚刚开始 正常化的时候，

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空失事，这当然很遗憾。但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我不知道蒙古方面对失事飞机采取了什么措施？另外出于友好方面 的考虑，请蒙古方面帮助了解，这架飞机是因为什么原因误入蒙古境内的？今天我与副部长第一次见面，但我希望这不会影响我们两国关系的改善。

最后，许文益大使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派人到出事地点看看？

额尔敦比列格作了一些解释后说，飞机失事近两天了，但只发现九名乘员的尸体，当时没有一个人活着。现在天气还热，较长时间保存尸体比较困难，需要以某种方式掩埋。大使提出派人到现场，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这是你们的正式要求？

许文益大使说，可以这样理解。

额尔敦比列格说，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对于中国飞机进入我国领土的原因，相信大使会做出努力，使中国政府近期做出解答。希望使馆尽快通知派什么人去，何时动身？
如此这般，似乎蒙古发现了失事飞机的某些秘密，急切想知道更多。

蒙方对这次飞机失事的态度还比较克制，虽然口头抗议，但语气缓和，很快同意并安排我们到现场视察。

９点３０分，许文益回到大使馆，决定立即向国内报告。

当时大使馆没有电台，只能通过蒙古电报局。但蒙古电报局说，线路不好，最快也要四个小时以后。急中生智，许大使想到大使馆有一条直通北京的专线，那是５０ 年代中苏关系友好时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架设的高频电话线，北京和乌兰巴托也顺便安装了一部。后来中苏关系恶化，专线电话也就关闭了。半个小时后，要通了北 京，但北京电话局说外交部的机器坏了。许大使决定先打国际长途电话，通知外交部有重要情况报告，要求启用专线电话。

经过一番周折，１４时２０分报回失事飞机的情况。

４９、　为什么说２５６三叉戟是中国民航？

这个问题其实不言而喻。

２５６三叉戟的残骸上，清清楚楚地刷着巨大的四个红字：中国民航。

１９７０年初，中国从巴基斯坦引进四架英国三叉戟后，立即在这四架三叉戟上刷上“中国民航”的字样。在与巴基斯坦谈判引进时，也是说要作为民航用途。如果 谈判时，说军用，巴基斯坦不可能、也不敢卖给中国。因为当时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封锁中国，巴基斯坦不可能得罪强大的西方国家，而独独讨好在世界上孤立 的中国。

所以，九一三事件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在与蒙古外交部交涉时，坚持２５６三叉戟是“民用”，这是坚持国家利益。如果说“军用”，那就是卖国贼了。

更何况，２５６三叉戟的性质是专机，但还是“民用”，并不是“军用”。因为“军用”的性质是用于武装军队，言外之意就是侵略，而２５６三叉戟不是。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强调２５６三叉戟是“民用”，是“误入”，这是底线。

如果有谁敢对蒙古说２５６三叉戟是“军用”，那就是承认中国入侵蒙古。

想来也没有中国人想当这样的卖国贼吧？

蒙古外交部强调２５６三叉戟是“军用”，但并不硬气，因为２５６三叉戟残骸上的“中国民航”四个大字并没有毁掉！他们看见了。否则，蒙古绝对会提出书面抗议，而不是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

５０、　中国人在２５６三叉戟坠机现场看到了什么？

看来坠机现场的火烧得很大

爬上漫坡，首先进入眼中的是倒梯形的焦黑草地。

站在高处望去，２５６三叉戟是由北向南迫降，着陆点正好在盆地中央，坠毁在盆地南半部。飞行员对迫降的地点有选择，飞机从低向上走，以此增加一定的阻力。

这是一块被牧民称作苏布拉嘎的不太规则的长方形盆地，除了西边是向下的漫坡，其它三面都是起伏的土丘。盆地南北长３０００多米，东西宽８００多米，平坦得就像人工铺成。到处是没膝的9月干草，草根盘结，脚踩到沙土上有种软绵绵的感觉。

许文益问：是否知道飞机失事的具体情况和原因。

蒙方说：飞机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故障。

在蒙方撰写的《现场调查纪要》中，说该机是在没有外来影响下，而由于自身的不明原因，降低飞行高度，试图用腹部着陆时，右翼撞地，造成严重损坏，因此发生爆炸而失事。

蒙古警察图瓦尼·久米第一批到现场，他看见三处大火。后来美国新闻记者问他，他不知道哪一处先起火。他从车中下来，没走两步，几乎被什么绊倒，地上是一具 背朝上的尸体。黎明时的现场是一幅可怕的场景，九具尸体散成一线，大火几乎烧光了他们身上的衣服，只剩下手枪皮套和腰带，当天从２００英里外的首都乌兰巴 托赶来的蒙古外交部副部长杜格瑟仁金？额德毕力格说，几乎不可能辨认出飞机上任何一个人。但飞机印记、毛像章、笔记本等，都表明这是中国人的飞机。

蒙古外交部司长高陶布进一步解释说，凌晨2点３０分左右，贝尔赫萤石矿的夜班工人听到一声很响的爆炸，随即发现东南方一片火光。连忙叫人，分乘两辆卡车到 现场灭火。蒙古政府有规定，草场着火，必须马上扑灭，否则要受罚。工人到达现场，火势还很猛，透过火墙看到失事的飞机。他们一面扑火，一面向温都尔汗当局 报告。伊德尔莫格县的牧民也赶来了，一齐把火扑灭，这才看见九具尸体。等省里来人，天已经快亮了，这才调公安部队看

守，并报告乌兰巴托。

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同志看过现场后说，飞机冲出１０００多米，第一次落地没爆炸，跳起来。第二次落地折断了右机翼，机身因此破裂着火。人可能是被猛烈的冲撞甩出来的，草地上一片狼藉。

从盆地中央开始，由北向南，呈倒梯形，约８００米，宽３０至２００米的草地全部烧焦，散落一块块飞机残骸，靠近焦土的南部，是散落的尸体。盆地中央，有一 道由北向南的Ｓ型擦痕，飞机着陆点以南约３０米长的草皮被机腹压实，说明飞机是肚皮擦地着陆。飞机弹跳了３０多米，才开始进入大片焦土。机身似乎失去平 衡，倾斜触地。西侧平行处，是右机翼划出的深约２０厘米的一道槽沟。再往南，擦地痕迹消失，进入燃烧区，飞机碎片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面积越来越广。最北 头飞机翅膀擦地的痕迹很重。飞机肚子擦地平衡，翅膀擦地产生高温，就产生爆炸，速度很快，一个翅膀擦地翻滚爆炸。标有“２５６”字样的翼尖断成两半，一个 断机翼上写有“中国”两个大字。

最显眼的是机头西北６０米处斜卧的机尾，有三层楼房那么高，是从中发动机的进气口处炸断的，只剩一段发动机外壳与尾部连结。再往前，逐渐看到机身的较大碎 片，机身的蒙皮，发动机底部的包皮，很大的弧形机身，连着摔碎的舷窗，炸瘪的发动机尾端喷口，一扇门从合页连接处炸开……

孙一先注意到一个炸掉大部分外壳露出内腔的发动机反推力装置，机尾没有着火，末端断裂处露出一大堆五颜六色的杂乱电线，有的电线露出铜丝，有一条粗电缆连 着一个碎片。机尾垂直舵没有损伤，右水平舵尖卷曲，左水平舵插在泥沙里，支撑斜卧的整个机尾。垂直舵前竖板上是喷涂的五星红旗，旗下方是机号２５６。

许文益叫多拍些照片，仔细观察失事原因，以便送回国内研究鉴定。

二秘孙一先爱好摄影，正好有了用武之地，他抓紧黄昏前的光线拍了好多卷。回国汇报时没带全部照片，只是挑了一些好的，剩下大量底片留在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这么多年了，不知道这些底片还在不在？

５１、　中国人提出要回２５６三叉戟乘员的遗骨了吗？

中国人提出要回尸骨，但不了了之。

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亲自起草给驻蒙古使馆的指示电，大意是：请许大使约见蒙古副外长，奉政府指示，讲明三叉戟迷失方向，误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 空，自行坠毁。中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对蒙古政府在寻找飞机残骸、埋葬死难者遗体和清理死难者遗物等方面所给予的协助，中国政府表示深切的谢意。应死难者 家属的请求，中国政府决定把九具死难者遗体运回中国正式埋葬，或就地火化，带回骨灰。为此，中国政府请蒙古政府惠予协助，并希望蒙古有关单位将死难者的所 有遗物交还我方。

因为９月的白天还比较热，蒙古方面建议就地安葬。

蒙古方面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人在飞机上，由于中国政府道了歉，也没有再为难。但他们很“狡猾”，要求中方提供死者名单和身份。周恩来考虑，苏联当时还不知道林彪叛逃的情况，怕因运回尸体问题同蒙古发生争执，会提醒苏联，就同意了蒙方的建议。

两天后许文益催问运回遗体，还催要死者遗物。

蒙方态度又强硬起来，反问为什么中方还未就失事飞机做出书面正式解释？策伦朝达勒司长说：今天已经是２５日，中国政府还未就中国飞机侵入蒙古领土一事做出 正式解释，对此只能表示遗憾。既然遇难人员的身份已经清楚，死者亲属是有具体人的，因而机上人员究竟是谁也就清楚了。希望中方将他们的姓名、年龄、职务和 照片提供蒙方。蒙古政府只有在研究中国政府的正式答复后，才能考虑对中国政府的要求予以答复，如果你们拖延答复，会不会产生不适宜的情况，我对此表示担 忧。

处理国际空难，哪有要死者职务和照片的？有点太“热心”了吧？还非要对方写一个为什么“误入”的书面材料。他们明明知道中国不会接受，为什么这样无理要求 呢？孙一先认为，看来，蒙方如此强硬，与飞机失事以来国际上的纷纷传闻不无关系。后来得知，此时苏联和蒙古已经揣测失事飞机上有大人物，究竟是谁还不能断 定。因为苏联要对死者尸体进行检验，所以蒙古当局千方百计阻止中国运回尸体。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国高层首先要保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能让林彪在飞机上的事实扩散。只有保住密，才能把引发战争的政治事件化解为一般的民航事故，迷航嘛，误入蒙古。所以中国没有坚持要回尸骨。

王中远回忆：国内没指示，我们不好行动，包括遗物。

在第二堆和第三堆尸体间，有一个方形食品柜，旁边是一堆搜集起来的杂物，有一堆鞋子，有飞行人员的两个图囊，一个烧剩一半，另一个基本完好。打开看，里面 的航图没有了，只有几支红蓝铅笔和黑铅笔。图囊旁是一堆手枪，一共六支，还有一支微形冲锋枪。子弹散乱放着，还有两个枪套和几个空弹夹，没有发现空弹壳。 还有一个６４开的小本子，后来才知道是林立果的“讲用报告”。

中国人问：为什么要一起堆放？蒙方解释怕丢失。

估计在中国人到达之前，蒙古人和苏联人对现场进行过整理。

机上的人不可能背空文件包走嘛。

许文益回忆：对现场的初步看法是，一、蒙古方面基本保持了飞机失事现场，他们用白布覆盖了尸体，并承认有些档已经搜集保管起来。草地上还拾到九块手表等， 个别烧坏，有的还很名贵，已单独保管起来。二、飞机是由不明原因紧急着陆，机上人员都作了紧急降落准备，但飞机着地时失去平稳，右机翼触地引起爆炸燃烧。 三、飞机的毯子上有巴基斯坦航空公司标记“ＰＩＡ”，说明飞机是从巴基斯坦买来的。但不知机上是何人，为何在蒙古失事？现场的情景使许文益感到问题重大复 杂。视察完毕，天已经黑透，蒙方一再提出蒙古没有火化习惯，尸体只能土葬，提出马上选择墓地，连夜挖墓穴，明天安葬。

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表示同意。

５２、　为什么高炮和歼击机都没有打下直升机？

９月１３日凌晨３时３０分，张家口地区某炮师接到军区空军命令，雷达开机，进入一等战备。副师长问：怎么没有演习背景？４时５５分，某团报，雷达发现目 标，发现敌机。是否装填炮弹？装填！严密跟踪敌机。敌机？不是演习吗？什么演习？这是打仗！你们作战空域无我机，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命令打掉它。几个炮营一 片混乱，火炮不能连动，指挥员无法协调配合。４时５９分，目标进入炮团火力范围，副师长下令可以射击。但阵地火炮故障，指挥仪无法正确指挥，５时零３分，　目标飞出。

这就是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乘坐的那架直升机。

９月１３日，天还没亮，在首都机场值班室担任值班首长的张瑞霭，睡中听见一片飞机声，走出室外，看空中歼击机乱糟糟地穿梭。非常奇怪，按规定，从国际机场 上空飞过要预报，可这么多歼击机却一点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去哪里的？要干什么？张瑞霭赶快跑到指挥塔台，打开对空联络器，耳机里全是回来吧，只有飞回 来，才是光明，才有出路。民航北京管理局的几位领导也都陆续跑来，不知什么事。以后才知道那么多歼击机是要拦截外逃的直升机。当天，所有的飞机实行军管， 路口、机库、停机坪飞机旁都由持枪战士站岗，机务人员检查飞机，机组执行任务，凡是接近飞机，都要经过岗哨检查，发放“通行证”，方能通行。

北京军区作战部参谋刘建林说，指挥所有情况，闹不清真假，一般不说，工作人员就执行。图板上看不出来。雷达清楚，我机来不及起飞。直升机在北京周围盘旋， 还是搞不清敌机我机，歼击机上去追降，敌机我机定不了，上边讲不能定性，敌我不能定性。实际上知道空军有情况，特绝密，很久以后才知道。
直升机起 飞１０分钟，场站给指挥所报告，梁璞问什么时候起飞的？１０分钟以前，为什么不报告？回答走以前不让报，周（宇驰）副主任让推迟报告。梁璞说，没有六个人 联合命令不准起飞，知不知道？知道，他拿了林副主席的命令。梁璞不好再说什么。赶快报告吴法宪。吴法宪报告李德生，说打下来。

李德生让八架歼六起飞。李德生从来没在空军工作过，根本不懂，那么多飞机，怎么起飞？又是夜间，自己撞自己。歼击师领导弄不清，问谁的命令？明明是外行 嘛。空军参谋长梁璞火了，吴司令的命令。吴法宪的命令？指挥员心里还打鼓，打直升机？直升机只有专机师有，那是专机，与中央头头关联很多，打专机干什么？ 这是有历史教训的，１９５５年，南海上发现英国一架运输机霸王号，以为是敌机，我们的两架拉１１轮番攻击，把它打了下来，又向人家道歉，又赔人家多少万， 挺大数字的美元，两个飞行员都判了刑。毛泽东下决心，飞行师长先撤职，后查办。当时普遍进行了教育，航空兵部队都知道。现在突然让打直升机，文革又那么 乱，梁璞传达，又不是吴司令亲口说的，可不起飞又不行。按二级战备的要求，打信号弹就开车，半分钟起飞。而这回三四分钟才起飞了一架，慢慢来，在机场上空 爬高。周围有山，撞山怎么办？撞电线怎么办？其实完全可以直接起飞，雷达引导就行。起飞半天了，标图板上还在转圈。梁璞火了，怎么总在机场转，还不出去？ 磨磨蹭蹭转什么？批评了以后，才飞出去。雷达引导，准确向直升机飞去，歼五甲离直升机很近，航

迹都重合了，就是报告没发现目标。按常规条件应该发现，你没 法批评，飞行员就是没发现，顶多是不主动。引导吧，汽油快烧完了，要返航。不让回？不让回，就摔了。回来吧，再起飞一批，两架，还是没发现。

虽然天还没亮，夜航独立大队的作战水平还是相当高的，头一年刚击落过一架敌机。梁璞说直升机上有坏人，一定击落。师值班员不能不考虑，究竟是什么坏人。本 来六人命令才能起飞，不长时间，吴法宪一个人命令就起飞了？文革以来有多少好人？判刑，受处分。敌人明确好打，打中央的专机还得了？只能“消极怠工”，最 终也没有发现。

天亮了，直升机主动在怀柔附近迫降。

５３、　为什么周宇驰逼直升机也往乌兰巴托飞？

周宇驰向林立果报告“禁飞”令后，离开工字房，开车回到空军大院的家中。这一段时间，叶群和林立果决定按第三个方案到苏联去。临去机场前，林立果给周宇驰 打了一个电话。周宇驰关着门，本来是听不见的，但因为窗户开着，加上线路不好，他重复了一遍，声音很大，所以周宇驰妻子王圣兰听到几句。上哪儿？上哪儿？ 哦，北上啊。于是周宇驰匆匆安排好了“后事”，说他暂时要离开北京，让他弟弟把他母亲带到西安去。几千元存款也取出来了，让他们带走。周宇驰和王圣兰把周 宇驰母亲和弟弟送到北京火车站后，周宇驰回到空军大院，把王圣兰放到楼门口，连车也没下，就飞快地走了。临走周宇驰扔下一句话，王圣兰也没听清，好像是别 等我。周宇驰的方向非常明确，就是“北上”。因为他知道禁飞令下了，不可能调大飞机了，而直升机飞不了那么远，所以他的目标定在乌兰巴托。

周宇驰拿着一张竖写的林彪手令，打电话找到在西郊机场待命的副大队长陈士印。虽然云雀直升机就停在西郊机场，但已经禁飞，他开不走，而且云雀没有直五飞得 远。只好到沙河机场“碰碰运气”，而且直五飞得更远。周宇驰对陈士印说，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吴法宪搞政变，我们被困了，毛主席下落不明，现在形势很紧 张，我们要赶快到北戴河林副主席那里汇报情况，你送我们一下。陈士印说，我改“云雀”后，很长时间没飞直五了，怕没有把握啊。周宇驰晃着手上的纸片，这是 林副主席手令，你不能怕担风险。陈士印说，那我再找个技术好的飞行员，这样更保险。这事要不要跟胡（萍）副参谋长说一下？按规定间断驾驶时间较长的飞行员 复飞，需要经上级批准。周宇驰说，现在胡副参谋长被困住了，没有办法与他联系。我们马上走，到沙河机场后，不要与别人讲，抓紧时间找到飞行员就走。陈士印 说，我没带图囊，怎么办？没关系，我给你准备好了。１时４０分将东西装上汽车，开向沙河机场。

周宇驰会开直升机，陈士印是周宇驰训练直升机的指挥员。１９７１年４月，胡萍对分管直升机的副师长下令，空军首长要求，在首长身边要求培养一名直升机飞行 员，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安排。三个多月，周宇驰飞了６６个飞行日，７５场次，１８４小时，掌握了空中飞行和领航的知识。陈士印把中队长陈修文叫起来，周宇驰 打开车厢照明灯，让陈修文看了手令，说有紧急情况，到北戴河，要绝对保密。直升机上了天，他马上命令往北飞。

３２０度？不对吧？陈士印首先质疑。对的，周宇驰肯定地说。我到底听你们谁的？为什么飞３２０度？这是上张家口、包头方向。去乌兰巴托。两个飞行员大吃一 惊，这是专机师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所有空勤人员的航行资料包里都不许有境外的任何资料，更没有境外地

图。我有，周宇驰掏出２００万分之一的地图，陈士印接 过来，放在两名飞行员之间。地图上有一条粗重的红线，北京、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北京到伊尔库茨克１７００公里，而直五最远只能飞３５０公里。按周宇驰 的要求，飞２６００米高度，爬高到３６００米。正好头顶上有歼击机飞过，趁周宇驰向窗外望时，陈修文将罗盘从３２０度调到１４０度，骗周宇驰罗盘坏了。空 中任何动作都可能造成飞机失衡甚至坠机，陈修文采用侧滑与倾斜相结合的动作，转弯半径大，但坡度小，不容易感觉出来。几次想降落没降下来，最后飞到怀柔山 区。这是平原与山区的交界地带，直升机在这里搞过野外迫降，技术上有把握。

在离地还有３０米时，周宇驰开枪打中陈修文左胸，没流多少血。陈士印大喊，为什么要动枪？３０米的高度也不得了，陈士印试探性向正前方推驾驶杆，没稳住， 第三次缓解，尾部和右轮先接地，还好，没侧翻。一旦坠地就要起火，机上的大量材料就会被烧毁。陈士印的双肩被周宇驰死死按住，６时４７分降落在沙峪，他迅 速关闭发动机和放大开关。陈士印看窗外有人影，迅速向右前方侧过头。于新野的枪响了，子弹顺陈士印的后背滑向腰部，却没有伤着老陈，只在他的夹克上穿了四 个洞，击中了周宇驰的手腕。飞行员体检时要求具备１８０度的视觉范围，以及飞行训练中熟练而全面的注意力分散，这使陈士印及时躲开，否则驾驶舱那么小，根 本躲不过这一枪。几个小时后，卫戍区把陈士印接走。

５４、　九一三之夜，林彪知道飞往苏联吗？

林彪临走对内勤小陈说：去大连。

到目前为止，只有李文普说林彪说到伊尔库茨克。除此林办工作人员再也没有林彪知道去苏联的证据。

也有人说，２５６三叉戟本来是想到广州去的，半路才改道往苏联飞。这话不对。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周宇驰在直升机起飞后，说“林副主席”已经坐三叉戟在乌兰巴托降落了，你们不要害怕，出了国境就行。因为林立果临去机场前给周宇驰打过北上的电话。

林彪不知道飞往苏联，不等于林彪家人也不知道。

实际上，林彪别墅早在几天前就开始做投奔苏联的准备了。

９月７日９时５０分，叶群让公务员通知在毛家湾的秘书李春生，把《俄华字典》、《英华字典》、俄语和英语会话等几本工具书找出来，叫送林豆豆到北戴河的飞机带来。当时离飞机起飞只有十分钟了，为了带这些书，飞机推迟了一个小时起飞。

９月７日２１时３０分左右，叶群叫总参二部参谋倪煜去讲课。倪煜专门给她讲各国的概况，按原计划，应该讲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或美国电影《巴顿将军》，可叶群 突然拿着《世界地图集》问，蒙古有哪些大城市？倪参谋回答说有乌兰巴托、沙音山达、苏赫巴托尔、科布多等。这些城市有没有北戴河大？听去过的同志讲，比不 上我国的中小城市，房子都是我们帮助盖的。叶群还多次询问中苏边境的情况，问蒙古哪些地方有苏联军队？中苏、中蒙边境地区有多少苏联军队？有哪些机场，机 场的位置等。看到叶群这么有“兴趣”，倪参谋为了讲得更清楚，还特意从总参二部要了一些图表资料。

９月８日９时，周宇驰打电话给空军航行局局长尚登峨，要一份北京到伊尔库茨克的地图。周宇驰还对情报部技术处副处长王永奎说，叫情报部给我搞一份我国周围电台的频率表，明天交给我。大概是太复杂，９月１１日，周宇驰又要简单的周围各国对华广播频率表。

９月９日下午，周宇驰在办公室对雷达兵部技术处副处长许秀绪说，林副主席要你给他搞一份雷达探测图和开关时刻表。许秀绪问，要全国的，还是要哪个地区的？ 周宇驰说，只要“三北”地区的。许秀绪报告了部长后，下午交给了周宇驰。由于雷达站很多，开关机的时刻表比较复杂，许秀绪只是把雷达开关的原则告诉了他。

９月１１日１１时多，叶群让毛家湾把全军副军以上的干部花名册和部队部署情况的登记表送来，说首长过几天要到大连，准备研究一下战备问题。叶群还让毛家湾送来一大堆呢子大衣等冬季服装。

因为九一三之夜走的太急，叶群专车的后备箱里，准备好的文件和行李并没有带走。

５５、 哪位外国记者第一个报道了林彪事件？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７日２０时３０分，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向国内报告，大使等人已于１９时回到乌兰巴托，并简要报告了现场情况和延长时间的原因。周恩来指示， 速派专人送有关材料回国，当面汇报详细情况。９月１８日凌晨１时，大使馆报告，决定派二等秘书孙一先送现场照片、目测示意图和有关材料回国，并当面汇报。 孙一先连夜整理出三个报告，《视察坠机现场概况》、《飞机与尸体状况》、《安葬死难者情况》。又赶写两个《纪要会谈情况》的报告，精心绘制现场测量示意 图，死难者尸体位置的放大图，在蒙古全图上标绘了现场位置图。还整理抄清了五次会谈记录，以及蒙方提出的两个《纪要》等。

向国内发去四个报告后，许文益大使请示，如果蒙方人员有意无意把中国民航飞机在蒙古坠毁之事散布到外国使团中去，有人问有无此事，我馆如何回答？几个小时后，周恩来亲自批准的外交部复电发来了，就说“国内正在查实，暂时无可奉告”。

大使馆在关于《纪要》会谈情况的报告中说，我们初步估计，由于双方存在分歧，制定文件可能不了了之，当然可能还要继续谈。我们准备同他们谈，继续交涉要求 归还遗物。９月１９日上午，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收到周恩来嘱咐发的电报，关于两个《纪要》问题，你馆暂不主动找蒙方继续会谈，等派人回国汇报研究后再说。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做得最好的就是保密工作。

９月１４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一位干部回国休假，把中国飞机失事的消息告诉了二连浩特边防站的王站长。因为这是大事，王站长立即向内蒙古军区报告，最后 报到北京军区和总部。周恩来得知，立即指示这个干部的所在单位将他隔离，并限令北京军区采取紧急措施，让得知这个消息的２６人谁也不许扩散。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没有立刻宣布，而是严格控制传达范围。９月１８日传达到党

内高级干部，９月２８日扩大到地、师一级。中国强调是民航迷航，主要 是严密封锁消息。只有保住密，才可能把引发战争的政治事件化解为一般的民航事故，迷航嘛，误入蒙古，这种情况合情合理。

因为中国“滴水不露”，使得国外只能是胡乱猜测，说什么的都有。

谜团越来越大，中国是怎么回事？“禁空”三天，不管军航民航，全部停飞。后来虽然飞机可以飞了，但仍然严格规定，所有的飞机不能进北京，南边的只能到徐州，北边的只能到沈阳，只有国际航班例外。

军队进入一等战备，休假者全被招回。一些外事活动也都取消了。原定9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九届三中全会停开，四届人大的准备中止。９月２２日，外交部声明，国 庆节的庆祝活动取消。国庆期间，尽管整个北京城像往常一样披上节日盛装，但借口节省开支和战备需要，天安门前的庆祝集会以及焰火晚会都被取消，而以游园代 替。这是建国２０多年的国庆中还是第一次。

中国太反常了，引起世界各国情报部门的注意。

新华社记者杨达洲回忆：１９７１年9月１４日，我在新华社东欧组上班。九一三事件这么大的事情，林彪座机是怎么掉下来的？林彪是不是还活着？这时还不知 道。军代表到编辑大小参考的参考新闻编辑部紧急动员，要求俄语室盯着塔斯社，组织收听广播。收听敌台，是总参三部和广播部门的事情，新华社没有这个业务。 当时指定东欧组收听，特别是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很快知道民航飞机掉在蒙古，再后来知道是林彪座机。

蒙古也很紧张，不知道怎么回事，中国一架民航飞机突然掉下来，也不知道里面有林彪，当时苏联也不知道林彪跑了。苏联远东研究所研究员、曾长期担任苏共中央 国际部中国处处长的库里克说，苏联当时没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谁摔下来了？因为不久前，对林彪还是大加赞扬的。我们感到最为庆幸的，是林彪没有真 正飞到苏联来。

这是政府的想法呢？还是个人的想法？

最敏感的是法新社驻北京的记者。他想起１９７１年８月，毛泽东接见外宾，林彪在场。但《人民日报》却分别发表毛泽东和林彪接见外宾的照片，好像分别接见似 的。他感到北京紧张、神秘，于是老在新华社门口、外交部、钓鱼台、中南海的外面转，发现新华社门口墙皮上白底黑字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给涂掉了，马上猜测 林彪出了事。９月１５日他第一个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危机，危机的挑起人可能是林彪。这才引起苏蒙方面的重视。

日本政府部门根据法新社消息称，这架飞机是被击落的，机内有被黜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他企图逃往国外未遂丧命。英国《卫报》１０月１日刊登记者莱斯卡萨 ９月３０日从香港发出的消息，说不管所传在蒙古发生的飞机坠毁事件的意义如何，这里的分析家却认为，从９月中旬以后，中国领导人中发生了重大问题，人们普 遍排除了早些时候关于毛泽东患病或去世的推测，而赞成环绕副主席林彪和政治局其它委员的地位问题的一些说法。林彪一些年来身体一直不好，从６月以后没有在 公开场合露过面。不管是因为生病或是国内的政治原因，林彪权威的削弱，都有必要使中国最高领导人重新排队。军事领导人最近几周引人注

目地没有露面，这使许 多分析家做出这样的推测，那就是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特别卷入了当前这场危机；另一方面，周恩来继续不断地在公开场合露面，并且看来已完全控制了局势，他可 能比以前更为有力。

因为摸不到真正的“底”，蒙方从失事现场回来后，一连几天没有动静。

９月２２日１５时３０分，蒙古外交部二司司长紧急约见中国大使。奉政府之命，要求中国政府在９月２５日前就失事飞机越境侵入蒙古领空一事，做出正式解释。 蒙方态度强硬，重新使用了“侵入”二字。许文益说，９月１４日已经奉命向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作了正式解释。二司司长说，那不够，要求你们９月２５日前用书 面形式给以正式解释，根本不提继续会谈的事情。

５６、　蒙古为什么公布２５６三叉戟失事的消息？

１９７１年9月２9日１５时３０分，蒙方再次以要事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对中国政府未就飞机失事原因做出正式解释表示遗憾。并称此事已在蒙古人民中间引起各种传说和议论，所以蒙古决定发表一条简短消息，以说明事实真相。

许文益说：对蒙古政府的要求，中国政府采取了严肃认真的态度，及时作了两次说明，希望在中蒙关系开始正常化的时候，不要做出与此相违背的事情。

蒙方强调不是发表政府声明，只是发表一条一般的消息。

两个小时后，蒙古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播出《关于中国飞机失事》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喷气式飞机一架，今年９月１３日凌晨１时５０分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 领空，在深入我国领空飞行时，于２时３０分在肯特省依德尔默格，由于不明原因坠毁。在中国飞机坠毁的地方找到烧得残缺不全的９人尸体、枪支、文件和物品， 证明这架飞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军的飞机。已经让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代表们到现场观看了失事飞机。就中国飞机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 一事，蒙古方面向中国方面表示了抗议，并要求做出正式解释。

９月３０日，蒙古各报纸和外语广播都报导了这一消息。蒙古《真理报》将这条消息登在四版很不显著的位置。

王中远回忆：蒙方９月２９日下午突然公布消息，我们也很注意，录音翻译出来汇报国内。中国飞机侵入蒙古上空，还是这口气。

许文益分析，虽然蒙古在我国国庆前发表这条消息，对正在改善的两国关系有不良影响。但从各方面分析，蒙古当局似乎无意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蒙方在我国国庆前 专门举行了庆祝中国国庆的电影酒会，还为中国大使安排了几场主要拜会，蒙方出席中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的领导人比上一年多，规格也高。

看来，蒙古还是想继续与中国改善关系。

根据国内指示，许文益对出席我招待会的外交部副部长云登表示，对蒙方发表的失事消息，不利于两国关系正常化表示遗憾。云登说，我们觉得应该把这一事件告诉群众，只发表了一个一般消息。我们对中国政府的要求到一定时候会给予答复。

王中远回忆：９月１７日我们回到乌兰巴托，马上转入迎接国庆。这对使馆来说是很大的活动。国庆招待会上，蒙古国防部外事处处长平时对我们很友好，问我林彪 还活着吗？当时我并不知道，包括外电都传出来，我们忙着根本顾不上，十一后传达才知道。国内指示，如果问起来，一切照旧。他点点头，很会意地走了，看来他 想从我这证实一下。

这说明蒙方已经从国际传闻和揣测中，猜到死者中有林彪。

国庆节前后，中共中央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文件逐级下达，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奉命停止向蒙方交涉。以后蒙方也没有再提及失事飞机。

２５６三叉戟如何失事，仍然是一个谜。

５７、 飞机失事应该怎样现场调查？

因为中国没有派事故调查组到坠机现场，使这个“一等事故”更加扑朔迷离。

按照“一等”的规则，应该立即封锁现场，在最快的时间内组成由机务、飞行、领航、调度以及空军机关的有关人员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奔赴现场。

在事故调查中，要从方方面面去获取信息，调查要包括与实施飞行有关的全体人员，飞行员、飞行指挥员、管制人员、机务人员、雷达、通信、导航、油料、航材、 警卫等。飞行的全过程中飞机与机上人员所处的各种条件，所遭遇的各种问题，包括飞行活动区域的天气情况，起飞和降落以及备降机场的状况，飞机空域、航路、 航线的状况，雷达、通信、导航的情况，机场起飞前的准备，检查、加注燃油、氧气等情况。前一次飞行飞行员对飞机状况的反应，起飞前的检查情况，飞行员飞行 座舱、身体情况、技术理论水平、思想状况、技术，以及机组配合等。逃生的飞行机组成员及旅客，飞行数据记录器，航空器制造厂家，目击者和空中交通管制人 员，都要调查到。

除了要求专业人员对现场录像、拍照和测量，还要化验尸体血样，看是否饮酒或服药，以及饮服的剂量。此外，还要搜集飞机残油包括燃油滑油液压油等，以此判明油料质量及机件是否有磨损等。

飞行事故的概率极小，平均十万次飞行也可能碰不到一次。但一旦发生，就非常严重。从理论上讲，飞行事故的发生有着严格的内在规律性，事故的“随机”和“偶然”只不过是“确定”或“必然”的外在形式。

事故现场是最重要的“资料库”。但它散在露天，由于撞击的高温，许多残骸面目全非，加上风沙、雨水、人为等因素，会很快消失或变态。越早，真实性就越强， 失去了及时性，也就失去了可靠性。事故现场残骸的分布和原始位置等，对判明飞机失事时的状态等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如果不及时加以准确地标定和搜集，被移 动，丢失或再次损坏，就难以做出准

确的判断。所以尽管空难突然，但调查必须迅速展开。

还要尽快对事故当事人和见证人进行调查。同样，距事故发生的时间越短，取证的材料准确性、真实性就越强。人的思维有用想象或用以往的经验来填补观察的特 点，同时又有按大多数人的说法来描述自己观察的特点。如果时间拖长，取证的材料可能更合理全面，但关键问题可能失真。而且目击者受专业知识等方面的限制， 只能提供一些现象。

我国对飞行事故的分类统计大致四类，按飞行事故关联的密切程度，分为直接原因、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调查飞行事故要做大量的工作，各部门、各方面的专家合 力，要研究各零件的不同特点，涉及到设计、制造、维修、使用各个环节。因此事故调查组要尽可能地掌握第一手材料，搜集信息要全，飞机残骸，飞行数据记录 仪、舱音记录仪、视频记录仪等，都能提供事故信息。没有这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勉强做出事故结论，必然缺乏公正性、客观性、科学性，就很可能是谁官 大谁的话就是真理。

搜集信息是繁重细致的工作。一架运输机，仅零部件就有几百万个，近百人参与，任何微小的疏忽，都可能导致空难。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２１日，美国泛美航空公司一架波音７４７客机在英国苏格兰城镇洛克比坠毁。事故调查人员走访了１３个国家，行程１５０万英里，访问１．４万人，拍摄了７３．５万张照片，电脑分析了 数千人搜集的１．６万件残骸遗物，才找到空中爆炸的确凿证据，包括能证明定时炸弹爆炸的性质、种类、生产国及该爆炸物使用量的证物，搞清了定时炸弹放在某 型录音机里，某型录音机放在飞机前部货舱的某国购买的某型号衣箱中，为事故结论提供了可靠依据。

现场调查后，还要在实验室对每一个破坏件进行研究，对操纵管理材料设计等都要进行综合分析和故障模拟。航空安全就像一块织物，一根线，甚至两根三根线断 了，都不会有事，但越来越多的线断了以后，危险就增加了。绝大多数飞行事故不止一个原因。不能孤立夸大某一个事实，而不顾及其它。技术、机械、飞行员生理 和心理、组织指挥、勤务保障、规章制度、工作决策、部门协调、人际关系等等缠在一起，其直接原因千差万别，更何况严重的后果带来的行政责任、经济损失、感 情纠葛，也会使客观的认识带来主观的影响。

这就使绝大多数飞行事故不止一个原因，前一个的结果导致后一个的起因，形成长长的“事故链”。调查飞行事故，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各种事实进行综合的 全面的分析判断。一切结论产生于深入调查之后，不能预先定框架。不到最后，你很难确定谁是“肇事件”，有的大空难拖了十年才搞清楚。在特定条件下，允许一 时做不出事故结论，不要勉强，更不能牵强附会，但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开始调查。
２５６三叉戟摔在蒙古境内，这给现场调查带来困难，但也不是不可 能。１９９３年4月6日，东方航空公司ＭＤ－１１客运班机从上海飞往洛杉矶，在太平洋上空发生强烈震荡，紧急迫降在美国阿留申群岛西米亚空军基地。我国民 航委托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进行调查。１９９４年4月２６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一架Ａ３００客机从台北飞往日本名古屋，降落时坠毁。有关部门迅速前往调 查，欧洲空中客车公司也很快派专家调查。

作为坠机事故调查，最重要的是保护现场，不能破坏，不能移动。可２５６三叉戟坠毁在国外，牵扯到两国甚至三国的关系。又因为２５６三叉戟是在凌晨坠毁，等蒙古官方去时天已经大亮，而且是老百姓救火之后。

蒙古人移动了尸体和遗物，苏联人又大拆大卸。

现场的破坏是绝对无遗的了。

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赴现场的人员都是外行，他们只是拍了一些照片，没有去注意飞机上尚存的仪表、油料等，也没有走访目击者，甚至连坠机的准确时间都不知道。

飞机坠毁的时间是蒙方确定的，因为蒙方收走了机上所有人的手表。

５９、　林彪警卫秘书李文普为什么中途下车？

李文普“创造”了“伊尔库茨克有多远”之谜，还“创造”了另外几个谜。

虽然林豆豆反复做李文普的工作，但李文普的意思是到紧急关头把“大红旗”锁在车库，说他已经做好林彪司机杨振刚的工作。实在不行，就在飞机上搏斗。林豆豆不同意，上了飞机，一切都将无可挽回。但李文普认为没办法不上车，首长要走，他一个警卫秘书怎么敢拦？

这话没错，那你李文普跟着走就是了，可为什么半路上你突然下车，不跟着走了呢？你是林彪的贴身警卫，历来是林彪到哪儿你跟到哪儿。是什么事情让你吃了豹子 胆，居然敢不跟着“首长”走呢？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使一直不相信林豆豆话的李文普独自一人下车，而且还自己打了自己一枪？

是不是８３４１部队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拦阻后，坐在“大红旗”副座的你内心发生了某种变化呢？你坐在司机杨振刚旁边，看得很清楚，８３４１部队的战士打着 背包坐在路边，大队长姜作寿拦车，差点儿被撞。这一切使一直不相信林豆豆话的你不仅突然“开窍”，而且还来了一番“苦肉计”。

在被中央专案组关押时，问到为什么跳车？李文普说，原来准备去广州，可在车上发现肯定不是到广州，这里面有鬼。总之李文普认为这回走不正常。

１９８０年，为审理“两案”，总政取证组到山西吕梁的矿山，找到李文普。他和“林办”的工作人员一样，在“监护”的审查结束后，到团河农场劳动，之后分配到部队，以后他申请转业，到山西吕梁的矿区。

总政取证组成员李唤劳回忆：事隔将近十年，李文普与原来说的基本一样。他说事先不知道他们往哪里跑，路过８３４１部队大队部的门口，大队长姜作寿一拦车，车里边的人慌了。李文普刚开始把林豆豆的话当成儿戏，但一看这个紧张阵势，马上感到不对。

姜作寿为什么拦车？还有人大喊停车。林豆豆向部队报告他知道，部队肯定向中央报告了。如果上边没有指示，他们怎么敢拦林彪的车？李文普上车前想与副团长张 宏联系，被林立果掐断了电话，也没搞清上边到底是什么指示。但从姜作寿拦车看，上边一定是给了“不让去机场”的命令。

这时李文普的脑子一团乱麻，林豆豆已经和他讲了那么多，“首长”还是上了车，如果出了事，

首先他跑不掉。８３４１部队拦车，叶群为什么不让停车？应该停 车，问问清楚。工作人员也不全，不该这么走！李文普对总政取证组说：当时我就是想下车问问怎么回事。我是警卫秘书，为林彪的安全，有权处理。但是车不但不 停，还打了我一枪。

８３４１部队二大队门口，大队长姜作寿一拦车，“大红旗”车里边人慌了。李文普刚开始把林豆豆的话当成儿戏，因为叶群吹过风，说林豆豆有精神病。但李文普 一看８３４１８部队拦车的紧张阵势，马上感觉到不对。大队长姜作寿为什么拦车？还有人大喊停车。林豆豆向８３４１部队报告了，８３４１部队肯定向中央报告 了，如果上边没有指示，８３４１部队怎么敢拦林彪的车？李文普上车前想与８３４１部队副团长张宏联系，接通了，却被林立果掐断了电话，李文普没搞清上边到 底是什么意思。但从大队长姜作寿拦车看，上边一定是给了“不让去机场”的指示。李文普脑子里一团乱麻，林豆豆已经和他讲了那么多，首长还是被骗上了车，如 果出了事，他跑不掉。为什么叶群不让停车？应该停车，问问清楚。再说，这么慌乱，林办的人也不全，不该这么走。李文普对总政取证组说：“当时我就是想下车 问问怎么回事。我是警卫参谋，有什么事处理，执行任务，不停，还打我一枪。”

原来，李文普跳车的思想如此简单。

６０、　大红旗车里谁会问“伊尔库茨克有多远”？

李文普为什么中途下车？据他自己说，他是听林彪问“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才中途下车的。李文普的这个证词成了证明林彪知道去苏联的惟一证据。这就使事情更加扑朔迷离了。

九一三事件后，专案组多次集中“林办”全体人员集体“排查”，不管在会上，还是会下，大家从来没有听李文普说过“伊尔库茨克”。到后来单独关押，才有了这个“铁证”。所以大家私下叫李文普是“王连举”（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的叛徒）。

试想李文普如果没有“立功”，怎么可能对他的处理轻而又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

九一三事件后，经过审查，周宇驰并没有拉妻子王圣兰“入伙”，专案组只要她承认９月１２日深夜是林彪亲自从北戴河给周宇驰打电话要他北上的。王圣兰说，我 只知道有人给周宇驰打电话，是谁打的不知道。专案组老是说，对不起来呀，你的态度不如周宇驰。实在挖不出“金银财宝”，１９７２年１月才告诉她，周宇驰回 家的第二天早晨就死了。因为王圣兰不会“编”，被步步高升，从学习班到看守所，最后被关到北京市第一监狱，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２１日才放出来。关了整整十年 不说，还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军籍。与李文普相比，王圣兰的问题不知要轻多少倍，但最后的处理却比李文普重得多，为什么？不就是因为她没有“顺竿 爬”吗？

那么“大红旗”里有人说过“伊尔库茨克”吗？

有人质疑，林彪怎么可能问“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在“大红旗”上的六个人，五个人都有可能

说，只有林彪不可能说。对于军事家来说，这简直是一句外行话。更何况苏联西伯利亚这座离中国最近的大城市伊尔库茨克，对林彪来说，有着一而再、再而三的缘分。

１９５０年7月1日，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成立，开辟了以北京为中心飞往赤塔、伊尔库茨克和阿拉木图三条国际航线，这是新中国民航国际航线的正式开航。也 就是说，北京到伊尔库茨克的航线是新中国最先开辟的国际航线之一。中国决定出兵朝鲜，派林彪和周恩来到苏联请求军事援助，他们坐苏联专机就是走的伊尔库茨 克这条线，并在伊尔库茨克落过地。既然林彪到过伊尔库茨克，并在伊尔库茨克落地，他怎么能不知道“伊尔库茨克有多远”？

林彪打仗前总要做到胸有“地图”。在东北，他常常五、六个小时甚至一天到晚骑在木椅上，一动不动，直到把地图全“吃”进肚子里。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５日，为 准备对付苏联的进攻，林彪到张家口视察。因为要看地形，飞机飞得比较低，也比较慢。林彪一直不说话，时而拿望远镜望山，时而拿放大镜看地图。突然说，前面 就是五台山吧？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说是，林副主席很熟吧？林彪说，走过，不过现在这一带变化了。他边听郑维山讲解，边拿放大镜从地图上找他熟悉的地名。

张云生回忆：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０日中午，苏联谈判代表团从伊尔库茨克起飞到北京。林彪平时１２点前午睡，因为怕苏联突然袭击，他习惯的午睡也不睡了，等 着苏联从伊尔库茨克起飞。何时经过乌兰巴托，何时进入中国领空，何时到张家口，何时飞临北京上空，何时在东郊机场降落。北京的报告一次次传来，秘书一次次 报告林彪，直到最后一次报告，苏联人从飞机上走下来，并没有发生突然袭击，林彪这才放心去午睡。

如果林彪策划政变，为什么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却不能像１９６９年“一号命令”那样，回忆出林彪那么多的“军事行动”呢？就算林彪老了，忘性大，说过的事情 转身就忘。但逃往苏联这么大的事情，就是忘了“有多远”，看一眼地图不就清楚了吗？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天天盯着地图看，不用尺子，也能大致看出“有多远” 吧？不要说林彪沉默如金，他那样老谋深算，怎么可能问“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就算他想问，他也要想一想，一车人中谁能回答他这个问题。

大红旗车里谁有可能问“有多远”呢？林立果不是军事家，但总是当过几年作战部副部长。他既然准备了从北戴河到伊尔库茨克的航图，而且一式两份（就像手令一 式两份一样，被林立果和周宇驰分别带上三叉戟和直升机），还能疏忽如此重要的“有多远”吗？“保镖”刘沛丰本来话极少，在那么多大人物面前，更不可能说 话。司机杨振刚也不可能问，他也不会关心“有多远”这样的领导考虑的问题。

说来说去，倒是叶群对“有多远”既一窍不通，又感兴趣。如果不是李文普编“故事”，真有人说了“伊尔库茨克有多远”的话，那这个人很可能是最沉不住气的叶 群。可叶群也不是大傻瓜，车里六个人，有两位是工作人员，除了李文普，还有林彪的司机杨振刚，他们一旦知道“首长”要外逃，还会忠心耿耿吗？周宇驰在调直 升机时，也是跟飞行员陈士印和陈修文说要到北戴河向“林副主席”汇报工作，哪里敢说外逃？当然到了天上往哪里飞，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大红旗”里的六个人，只有中途下车的李文普还活着，他说林彪说的“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没有旁证。在法律上，孤证不能算作证据。

６１、　是谁打了李文普一枪？

“大红旗”被８３４１部队阻拦后，叶群说，８３４１部队对首长不忠，冲！“大红旗”没有停，反而加速冲过去了。这时响了四枪，也有说响了三枪，也有说响了五枪。

李文普打了一枪，车里的林立果也打了一枪，这没有争议。中队长萧奇明到底打了几枪，还不清楚。

我们就认为是两枪吧。萧奇明的那两枪没有争议，弹着点在“大红旗”司机杨振刚一侧的玻璃窗上。而李文普的“一枪”和林立果的“一枪”打向了谁？

“大红旗”又没有飞上天，弹着点很容易找到。林立果的一枪打在车门把上，只有李文普的一枪没有弹洞，只有弹壳。

李文普、林立果、萧奇明的手枪不一定是一个型号。就是同一型号，从位置上也很容易判断。可是林彪一案经过十年，两拨人审理，却根本就没有审理“大红旗”的枪案！

谁先打的枪？李文普？林立果？还是萧奇明？为什么不调查？查这个案子也要“宜粗不宜细”吗？

“大红旗”从８３４１部队的拦车处又窜出约２００米，突然一个急刹车，姜作寿远远地看见车里跳出来一个人，站在车门边。有目击者听见李文普喊了一声，怎么个事嘛？几乎同时，“当”一声枪响。几秒钟后，又响了一枪。

李文普回忆：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我才知道不是去大连，是要到苏联去。脑子里第一个反映就是叛逃，我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家 属了吗？便决心下车，我本能地大喊一声停车，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 我不去！我转身朝５８楼方向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向我开枪。

事实是这样的吗？

张清林回忆：天黑，灯光又微弱，两边有树，也看不清前面的车。我们越追越近，大概在离“大红旗”１５米到２０米时，“大红旗”呼地开跑了。

“大红旗”的车门也没关，就加大油门，以每小时１００公里的速度飞驰而去。萧奇明最先赶到，姜作寿在他后面３０米。他们看见李文普半躺在地上，捂着左大臂的负伤处。这种时候，谁也顾不上负伤的李文普，姜作寿跳上随后赶来的大卡车，往机场追去。

李文普回忆：我自己捂着伤臂走回８３４１部队大队部，卫生员小陆给我包扎了伤口。

李文普坚决不承认张清林看过他的伤口，并给他包扎。

可是此时张清林在现场。他又偏偏是广州军区总医院的外科医生，专门学过野战外科，熟悉枪伤。试想，和平年代极少能见到枪伤，一般人都会好奇，更何况科班出身的野战外科医生呢？张清林借口卫生员小陆的包扎不好，重新打开，实际上他是想看看伤口。

张清林回忆：给我当助手的是８３４１部队的卫生员小陆，我们给李文普脱下军装。血流得不多，贯通伤，伤口位于左臂内侧，内下外上，前面的伤口细，后面的伤 口粗，因为子弹出口比进口要大，这说明是从前面打进去的。我注意到李文普的胸前有擦伤的血迹，看来子弹是贴着前胸的衣襟穿过去，左臂伤口的袖子上有一圈黑 印，明显是被火药熏的。李文普说，叛徒打我了，叛徒打我了。我一边包扎一边问，谁
是叛徒？李文普说，就是林立果。我一看就是自伤，我说了一句，李主任，你自己打的啊。李文普低着头，不再吭气。包扎很快，只有两三分钟，副团长张宏问我，怎么打的？我说自伤。

这个过程，张清林对林豆豆和杨森都说过。１９８２年，张清林去看李文普，说我当时给你包扎，我看了伤口，你是自伤。李文普坐在沙发里，埋着头，一句话也没有说。

其实，李文普去医院治疗枪伤时就写材料说“枪走火”了。

李文普回忆：简单包扎后，８３４１部队要送我到空军疗养院，我想女儿刚去那里当兵，不好说话，就说去北京军区疗养院。经医生检查，子弹穿过左大臂，造成粉碎性骨折。医生问怎么受的伤，我不好说林彪父子，这是重大机密，只好说“枪走火”。

也就是说，李文普开始也承认是自伤，后来才改的口。他“理直气壮”地说：我已经从林彪车上跳下来，干嘛还要自己打自己一枪？我在几年监护审查期里，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这一枪不是林立果打的。

李文普回忆：当时距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以子弹从前胸擦上左臂。受伤后，我倒在路边。

注意！李文普说的是“子弹”，他把“谁打的”和“子弹”分在两段里。上一段说林立果朝我开了枪，下一段说“子弹”打中了我。

玩过枪的人都知道，如果是车里的林立果开枪，不可能朝天，只能朝下。８３４１部队天天玩枪，非常熟悉弹道，看弹着点嘛。受伤前李文普是站在“大红旗”的右 边，子弹可能打到他的腿上，决不可能打到左上臂。８３４１部队向中央报告，车里面打了一枪，是林立果打的，子弹打在车的摇把底下，弹洞找到了，子弹壳也在 车里。

林立果和李文普虽然都是手枪，但型号不一样，弹洞不一样，子弹壳也不一样。李文普那一枪的子弹壳掉在车外面，但弹洞没有找到。

６２、 李文普那一枪的弹洞“藏”在哪里？

林彪办公室警卫科长刘吉纯回忆：九一三之夜，从山海关机场调度室出来，我看见８３４１部队副团长张宏带着部队也赶到机场，他已经把没有上飞机的机组人员都 集中起来了。看

机场已经没有我们的事，我们几个人就乘车返回北戴河。我以为李文普也在飞机上，下车后我才知道，他受伤住进了北京军区疗养院。反正也有车， 我和林办秘书宋德金就去看他。我一看伤处，就知道是他自己打了自己一枪。

李文普说“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

“大红旗”停车，李文普下车，到开枪，时间极短，李文普没有时间挪动。也就是说，李文普负伤的位置就在“大红旗”右边的车门边。

如果是林立果打的，怎么可能从“前胸”到“左臂”？李文普坐在司机右边，林立果的位置在第二排的右边。李文普下车后，如果面向车门，林立果的子弹只能从 “前胸”到“右臂”，而不可能是“左臂”。李文普如果背向车门，林立果的子弹倒是有可能经过“胸部”到“左臂”，可是对不起，这个“胸”是“后背”，而不 可能是“前胸”。难道李文普与别人不一样？左手在右边，右手在左边？或者林立果的子弹有特异功能，会拐弯，经过前胸，不往右臂钻，掉头直奔李文普的“左 臂”？

真是天方夜谭啊！

李文普下车后确实打了一枪，打的是谁？你敢打谁？李文普你一个那么老的警卫干部，敢向自己保卫的首长开枪？胆子也太大了吧？这时车里坐着的是中国第二号人 物，而你李文普又是专职警卫，竟敢向中国第二号人物开枪？如果“秋后算账”，你李文普还想不想活？枪毙你一万次也不为过，当然向自己开枪无所谓。

我们现在来分析李文普当时的心理，他想好了，在那种情况下，他让停车，已经触犯了“龙颜”。可是在他下车时，枪突然“走了火”，他受了伤，当然不能再“鞍 前马后”了，这就给自己找了个可进可退的万全之计。伤在哪儿？李文普也考虑好了，不能伤五脏六腑，只能冲胳膊腿打。在胳膊腿中，腿打坏了，走路成了大问 题，右胳膊也不行，右手拿枪，只好“委屈”左胳膊了，所以就冲着左胳膊上部打了一枪。

如果按李文普所说，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那么只能是李文普自己打自己。

李文普啊李文普，你真是一个从来没有骗过人的“老实人”啊，谎话漏洞百出，永远“编”不圆。可是你李文普，你承认你在林彪身边那么多年，对林彪还是有一定感情的。你“编”出这样的弥天大谎，就不怕老天报应吗？

九一三事件刚发生时的中央５７号文件说，林彪亲自开枪打伤跟他多年的警卫人员。林办秘书于运深九一三时在毛家湾值班，当天就被监禁在值班室。他是在监禁时 和林办所有人员一起听的中央５７号文件，听到林彪亲自开枪，第一反应是不信。林彪连握个铅笔都怕凉，要别人用手捂热了才能递给他，身边没有枪，怎么可能开 枪打伤警卫人员？

这个说法后来没站住脚，被官方认可的说法是林立果打了李文普一枪。李文普说：在审查时，从来就没有人说过是自伤。很有“道理”啊，可是为什么不鉴定？其实 是不是自伤很容易鉴定。而且当时的“枪战”，除了萧奇明的两枪，只是车里车外各打了一枪，其中一枪打在车上，另一枪打在李文普左大臂上。

还是那句 话,“大红旗”并没有随林彪一家上天,留在山海关机场。第二天８３４１部队把“大红旗”擦了一下，看了一下车，车上还捡到刘沛丰的钱包，里面有６０多元， 还有小孩照片、工作证。“大红旗”车在，李文普也在，从弹道上很容易鉴定出来，给李文普包扎和检查伤口的医生也不止一个，都可以证明，但这些鉴定都没有 做。官方认为，李文普没跟着走，就是好同志。如果鉴定，事情就复杂了。

李文普的枪伤就这样“含糊”过去了，没有权威的鉴定。

张耀祠回忆：我没有检查“大红旗”，这事过去就懒得检查。那个情况下不能说自己打的，那时怀疑他（李文普）是自己打的。他不愿跟他们走，下来就好交代了。

副团长张宏说：走火，不说什么事，不要鉴定。中央已经发了文件，与中央一个口径。

汪东兴说得更干脆，算了，小节，不再干扰。

李文普的枪伤在九一三事件中是小节吗？

６３、　为什么一直没有接到拦截“大红旗”的命令？

张清林回忆:没想到“大红旗”在门外３０米的地方停了一下,接着好像听见两声模糊的枪响。我和萧奇明还在往前冲，我说开枪，萧奇明真当当真开了两枪。 ８３４１部队的干部战士个个都是神枪手，萧思明的两枪全打在“大红旗”左侧的玻璃窗上。但“大红旗”是防弹车，子弹只在玻璃上留下两个白点。要不是高级防 弹车，那两颗子弹肯定打死杨振刚。事后，开枪一事受到周恩来的批评，没有明确指示，怎么能开枪呢？毛泽东更说得直接：如果打死了副统帅，那到底是谁害谁 呀！

手枪的最远距离是２５米，如果要打坏轮胎就好了。

其实“大红旗”车体高，底下是钢板，重五吨，轮胎都是“死”轮胎，夹层玻璃足有半尺厚，车体都是手工敲出来的，别说手枪了，手榴弹都砸不透。所以“大红 旗”十分笨重，毛泽东觉得不舒服，以后他坐苏联的“吉斯”。林彪试了一试，很喜欢，因为“大红旗”里面宽敞，拉开座椅就可以休息。于是，“大红旗”就成了 他的“坐骑”。

张清林回忆：我想跟着后面的汽车去山海关机场，拿枪把飞机破坏了，飞机就飞不走了。正好碰上豆豆的警卫、空军保卫部的杨森处长。杨森说，你在这里太危险，我去机场，你在这里保护豆豆的安全。我这才返回来。

刘吉纯回忆：我赶快回到９６楼，刚到楼前，林彪的车就出来了。因为没看见叶群的车出来，我跑到办公室，叫林办秘书李春生去看看叶群在不在。李春生还什么也 不知道，回来说没看见。叶群的内勤看见叶群只拿了一个小包，以为她还要回来，就守着一大堆行李等着。内勤说叶群可能在卧室，他再去看看。
林彪内勤 小陈和小张懵了好一会儿，奔到院子里，边哭边说：他们都走了，都走了……宋德金问：李处长呢？跟着一起走了。李春生不信，进去看了一圈，跑出来大喊：首长 走了！９６楼一片慌乱，去哪儿了？去大连。去大连为什么不带上我们？宋德金说：快快，快调值

班车。我一听更急了，感到问题的严重。还好院子里有８３４１部队的一辆“伏尔加”，正好宋德金出来，还叫上了李春生。考虑到只有我一个人有枪，还叫了一名带长枪的战士，直奔山海关机场。虽然司机开得很快，我们还是叫他再开快点。因为李文普半路下车，耽误了一会儿，我们都看见前面的“大红旗”了。

叶群司机小穆的妻子是叶群内勤，此时正在家休息。小穆还以为还是第二天早晨出车，听内勤说要走，拎上牙具袋，也顾不上妻子和行李，赶到９６楼。还没有下车，叶群内勤喊，主任让你到５６楼接豆豆他们去机场。小穆马上开车去５６楼，看见５６楼一片黑暗，以为人已走，掉头又回到９６楼。小穆跳下车对叶群内勤小孙说，你告诉主任，５６楼没有人，怎么办？小孙慌乱地说，他们早走了。小穆吓“死”了，他是叶群的专车司机，迟到了叶群准要骂他，他转身上车开着空车向机场追去。

刘吉纯回忆：我们的“伏尔加”追上了小穆。小张要开枪打，宋德金说：慢着，万一里面有豆豆，打错了人怎么办？要是打出去，小穆准没命。小穆看见后面“林办”的车在追，他怕叶群骂，开得更快。通往山海关机场的路上有两道火车线，前面两个车刚开过去，一列货车来了，因为没有路灯，离铁路十几米司机才发现，因为车速太快，“伏尔加”司机转了个大弯，栽到草丛里，侥幸没撞上。要不是司机年轻机敏，我们不是撞到火车上，便是翻到路边沟里，必死无疑，想起来真有点后怕。

等长长的货车慢慢驶过，但前边的“大红旗”已经跑得没影了。

８３４１部队的三部值班车都追出来了。

自从“大红旗”从北戴河开出后，８３４１部队遵照周恩来“劝阻林彪不要上飞机”的指示，先后组织了８辆车７０多人，由张宏副团长带队去追。２３时４５分左右，二大队副大队长于仁堂带着六名战士坐两辆吉普车先出发，到山海关机场控制飞机，不准飞机起飞。副团长张宏交代：要与机场取得联系，有问题请示中央后再定。

８３４１部队只接到“追”的命令，没接到“击”的命令。本来“吉普车”比“大红旗”先走几分钟，但一直没有接到拦截的命令，不但没有阻拦，反而给“大红旗”让开了大路。

过了海边大桥，“大红旗”就超过了“吉普车”。因为屁股后面有车追击，“大红旗”像受惊的兔子，更快地向前窜去。

开到机场北门，林立果冲着警卫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快把大门锁上。所以后面的“吉普车”怎么按喇叭，门卫也不开门，装听不见。后来“吉普车”火了，命令跟上来的卡车硬把铁门撞开，门扇都给撞翘起来了，现在痕迹还在。

林豆豆回忆：按照惯例，林彪上飞机前，８３４１部队要派人和先行车到机场布置安全措施，上飞机检查，然后武装守卫。除了派警卫同机跟随，还要派部队乘另一架飞机护送。如果目的地没有８３４１部队，要先乘飞机或火车前往布防。多年来，林彪非常厌恶这套繁文缛节，但为尊重８３４１部队的安全措施，从未脱离过严密守卫和跟随。但奇怪的是，这次却始终没有执行。

叶群司机小穆的车“咬”着“大红旗”进了机场，但乱糟糟的场面让他停住了脚步。事后有人问，如果叫你上，你上不上？小穆说：当然跟着上。“林办”惟一目睹三叉戟起飞的只有小穆，而偏偏他事先一无所知。等刘吉纯他们的“伏尔加”开到机场，飞机已经上天。

刘吉纯回忆：我到了山海关机场，痛骂８３４１部队的战士，你们都是死人，为什么不拦住？不是命令不准飞机起飞吗？你们等着挨整吧。我问于副大队长呢？战士 说在那边。我说赶快，上调度室。我埋怨于仁堂怎么叫他们上了飞机，于仁堂说他的车慢，被后面的车超了过去，他们也是刚到不久。因为只是向干部讲了，战士都 不知道林彪要跑，所以战士都站在那里不敢动。我想了一下，不应该埋怨他们，如果中央早下命令，他们是跑不了的。没有上面的命令，谁敢动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林 彪？

６４、　李文普为什么不相信林豆豆的话？

李文普说，１９７１年9月１２日是他一生最紧张、思想斗争最激烈的一天。

据李文普回忆，上午他把他的女儿和刘吉纯的女儿送到空军疗养院当兵。下午，李文普在平台乘凉，林豆豆突然对他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 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其实林豆豆与李文普谈了不止一次，谈得最深。而且在9月１２日以前就谈过，李文普似乎已经被说服，他 甚至和林豆豆交换“情报”。林豆豆认为，在林办工作人员中，能阻止林彪走的关键人物是李文普。

李文普承认林豆豆和他谈过，他感到突然，不相信。李文普说，林彪让我准备去大连，并没说要去广州；另外林豆豆与叶群感情不好，与林立果也有矛盾。叶群到处 散布林豆豆有精神病，现在冒出这么大个“阴谋”来，真把我吓了一大跳，我首先想这是林家母女又闹矛盾了。这个思想应该说是真实的。李文普问林豆豆有什么证 据，没有任何证据，我当然就更不相信了。我长期在林办，对林家真真假假的事见多了，听多了，就见怪不怪了。所以九一三事件前发生的诸多事情，我们都没有很 大的警惕，这也是原因之一。尽管李文普很吃惊，但心里还是没吃紧，他对林豆豆说，我有什么理由不让首长上飞机？如果他要上，我强行阻止，不让他上，能行 吗？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自己不去向林彪报告？只要林彪说句话，林办工作人员都会听林彪的指挥。你不敢向林彪查问，却要我阻止首长上飞机，把责任推给我们这些不知底细的工作人员。我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负不起这个责任。９月１２日晚上，李文普在值班室值班，林豆豆又把他叫到小厕所，再次讲了不能让林彪上 飞机。李文普还是说，没有证据，我怎好不让首长上飞机？
可是据知情人说，林豆豆要向林彪报告，李文普不同意。是李文普不同意林豆豆向林彪报告？还是李文普不同意林豆豆让他向林彪报告？反正李文普是不想去说。伴君如伴虎，从李文普的角度考虑，他不愿意向林彪报告似乎是比较可信的。

李文普５０年代就是林彪副官，管行政和内勤。那时林彪要选个警卫班长，将来升成副官。跟黄永胜说了，从东北来的警卫团找，就找到了李文普。李文普愿意来， 说光荣啊，就来了，当警卫班长，确实不错。以后李文普走了，新来的副官不太合适，林彪又叫李文普回来。在林彪眼中，李文普老实。李文普这样评价自己，文化 不高，头脑简单，对高层斗争不大关心，整天为林彪的衣食住行服务。但实际上他决不是“大老粗”。李文普在调来前是很好的副指导员。５０年代初能当上副指导 员，肯定是有一定的文化。而且从以后的很多事情看，李文普很有心计。李文普很得林彪的喜爱，但叶群却将他“恨之入骨”。叶群在很多事情上都

瞒着林彪。在杭 州，有一次毛家湾打电话说了一些林家的事。叶群不让告诉林彪。林彪知道北京打电话就问，李文普按叶群的话回答，林彪发了大火，说我枪毙了你！后来知道是叶群搞鬼，林彪又向李文普道歉。

９月１２日夜，周恩来下命令封锁飞机后，叶群知道有人向中央报告，而且中央已经采取了措施，再不跑就来不及了。李文普回忆，大约１１时多，叶群叫我到林彪 卧室，她叫我等着，她先进去跟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说今晚反正也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我说要了 飞机再走。叶群说，一会儿吴法宪坐飞机来，我们就用那架飞机。我们可以先走，到机场休息室等吴法宪。李文普认为叶群骗他，实际上吴法宪确实准备到北戴河， 因为周恩来要到北戴河，吴法宪陪他。只不过最后没来。叶群跟着李文普出来催他快调车，越快越好，说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了。林立果也对李文普 说，快点吧，有人要来抓首长，什么东西也别带了！李文普要通知８３４１部队，林立果把电话按下，哪里也不要告诉，部队也不要告诉。

李文普说，我当时怀疑为什么不让我调飞机，有些反常，心里越来越没有底。究竟往哪里走？我心里越发怀疑，给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打电话。胡萍也不知道林彪要上 哪里去，平时胡萍都是从李文普那里打听消息。胡萍说，９月左右，李文普给我打电话，说主任说了，他们在北戴河，最近准备去大连或青岛，还说到南边。林彪出 去常灵机一动，就像坐汽车一样。可坐飞机哪里是那么简单，弄不好出点事就严重了。胡萍为安全起见，希望早一点知道消息，他叫李文普给他打个电话，好早做准 备。现在李文普反过来问胡萍，林彪往哪里走，胡萍怎么能知道，只能说要走就走吧。

这时林立果叫李文普在叶群办公室门口看着，他给周宇驰打电话。因为线路不好，周宇驰没听清，林立果大声说了几遍“北上”。李文普说他听到了林立果说首长马 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那么“北上”李文普也一定听到了。可是“北上”还是含糊，对于北戴河来说，去大连也可以说是“北上”啊，何况林彪已经对他说了去大 连。但是，李文普深知，掌握大权的是叶群和林立果，但他又不能问，因为他知道，叶群和林立果能骗林彪。也一定会骗他。林立果叫李文普快点调车，当时那种情 况，林立果一个孩子，还没经历过这样的突变，做不到处变不惊。小战士说，林立果拿着枪，从这屋窜到那屋，举着枪，嘴里乱喊。这时，李文普心里的疑团越来越 大。他回到秘书值班室，给张宏打电话，说首长马上就走。张宏刚问怎么回事，电话就被林立果粗暴的压断了。

就这样，李文普带着越来越大的疑团上了“大红旗”。

６５、 林豆豆是如何向中央报告的？

１９７１年９月７日，林豆豆一到北戴河，就知道了林立果和叶群要挟持林彪到香港，或到苏联。至于李文普是什么时候知道林立果和叶群要挟持林彪的？有两种说 法。按李文普的说法，他是九一三事件前一天知道的，非常吃惊。按张宁的说法，林豆豆认为李文普可以阻止林彪上飞机，“九一三事件”前五天，就反复做李文普 的工作。李文普已经把前因后果全搞明白了。

不过我还是相信李文普的说法。事关重大，林豆豆也不敢把话说得那么明白。在“九一三”前几天，她确实做了李文普的工作，但只是想让李文普阻止林彪出行，至于去哪里，她没有说。应该是“九一三事件”前一天才说个半透，没有说去苏联，而只是说去广州，不行了再到香港。

林豆豆向８３４１部队报告也是这么说的。

听到林豆豆这样的说法，李文普当然大吃一惊。

６６、　林彪知道飞往蒙古吗？

１９７１年9月１３日凌晨，在山海关机场，在场的人都看见林彪自己爬上的飞机。可是，林彪知道是飞往蒙古吗？

中央专案组把最后接触过林彪的所有人都“圈”起来，但是除了叶群、林立果和林豆豆，没有人知道林立果和叶群的计划是逃往苏联。所以，不可能有人告诉林彪。

林豆豆要求李文普阻止林彪走，李文普拒绝了。

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接到北京方面的指示，让他去对林彪讲，当然不是讲去苏联，而是讲林立果和叶群要弄他走。张宏只走了几步，就被大队长姜作寿叫住，说我 们只是外卫，从来不进林家。林立果有枪，万一你去了回不来，我去不去找你？我去了，也回不来，部队谁管？这样，张宏就没有去。

叶群和林立果会对林彪说去苏联吗？

李文普承认，在林办，叶群经常说假话骗人。但他说，叶群大事不敢骗林彪。

什么叫大事？什么叫小事？叶群当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事，算大事，还是小事？应该算大事吧？叶群怕林彪不同意，让林立果和她一起骗林彪，没想到林立果跟林办秘书说了。在这样的大事面前都敢骗林彪，叶群还有什么事情不敢骗？

林办所有的人都在叶群指使下，参加骗林彪。有一次叶群去政治局开会，林彪问叶群去哪里了，林办服务员王淑媛说了实话，林彪大发脾气。叶群回来把王淑媛狠骂 了一顿，威胁说要赶走她。１９６８年，时任《空军报》记者的林豆豆到青岛采访，在老记者帮助下写了《三下九厂》，化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毛泽东看到， 查问是什么人写的。知道是林彪女儿林豆豆写的，在政治局开会表扬了这篇报道，叶群当然很高兴。以后毛泽东看到林彪，提起这件事，林彪不知道。回来冲叶群发 火，问叶群是怎么回事，叶群这才告诉他，但林彪仍然很不高兴。

１９６９年，林立果被任命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兼空军司办副主任，叶群也没有告诉林彪。

像这样骗林彪的事情不计其数。

１９８４年，张清霖开会到河南见到林彪的老秘书关光烈。他对关光烈说，林豆豆最佩服你，要你在，不会发生“九一三事件”。关光烈说，那怎么可能？我怎么能阻止？其实非常简单，直接跟林彪说就行了。问题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向林彪揭露叶群和林立果的阴谋，在上飞机前，林彪始终蒙在鼓里。

６７、 林彪哪也不去，为什么又自己上的飞机？

林彪内勤小陈说，叶群动员林彪走，说林彪说了“民族主义者”。

这就是说林彪不想外逃，可是他为什么又自己上飞机了呢？叶群和林立果不是“硬绑架”，是不是“软绑架”呢？骗林彪自己上飞机，既然不想去苏联，那就到大连避避吧。上了天，林彪怎么能搞得清“大连”还是“苏联”？以前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几次。专机人员说，好几次飞行都是瞒着林彪改变航向。１９６８年，叶群导演了林彪去井冈山，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九一三事件”。

那是个穿单衣的秋天，草虫子乱叫，浩浩荡荡去了五架飞机，一个团都出动了。为了躲江青纠缠，林彪到了北戴河。江青又要追到北戴河，林彪准备去太行山或五台山、井冈山等。李文普建议去井冈山，叶群说，程世清在下面尽骂江青和“秀才”们，江青正在批江西搞“复旧”，南昌起义纪念馆都是按中央文革的调子由“造反派”搞的，首长怎么能去江西？于是叶群让李文普安排去太行山或五台山或黄山，李文普说安排不了。叶群说，井冈山会师纪念馆把朱老总的名字恢复了，那就去井冈山也行。但叫李文普不要安排去南昌。就在叶群听说江青要到北戴河的前一天晚上，林彪和叶群连夜离开北戴河，临时住在山海关机场。叶群把去井冈山一事报告给周恩来，同时对８３４１部队说，并专门交代吴法宪不要让程世清知道，也不经过南昌，住宿都安排在机场，还规定到井冈山后，也不要程世清安排警卫，总之，不要程世清插手。

你在人家江西的地盘上活动，怎么能瞒住江西的第一把手？第二天，林彪到达井冈山，程世清还是知道了，并到山上与林彪谈过两次。程世清越说越气，大骂中央文革和“上海”。这正对林彪的胃口，可叶群对程世清说，首长身体不好，刚到山上，太疲劳了，大家请休息了。第一次谈了１０分钟左右，就赶走了程世清。叶群对李文普、张云生说，程世清这个人尽给首长吹“右风”，规定不准程世清再来见首长，也不准林豆豆接触程世清，并把当地的服务员全调开了。叶群看程世清还在山上，就对他说，首长说不要影响你工作，你下山去吧，首长来这里只是休息。把程世清“动员”走了。

林彪在山上住了半个月，叶群几次催他回北戴河，林彪坚持不肯下山，最后叶群只好让工作人员集体对林彪说谎。离开井冈山时，叶群规定李文普对程世清保密，限２０分钟做好准备，突然离开。临走，程世清赶来送行，叶群感到奇怪，问程世清怎么知道的。程世清说，你不告诉我，我就不知道了？叶群说，首长自己要走。程世清不信，要去见林彪，就自己“闯”进去，叶群让豆豆进去支开程世清，说要是首长听他的，又该闯大祸了。程世清对林彪说，这里空气好，你就在这里先养身体吧，你在北京尽受江青和“秀才”们的气，身体不会好，不要让江青和“秀才”们专了你的政，也不要听叶群的。你不在山上住，就去南昌看看吧。汪东兴说毛主席去南昌没有合适的房子住，叫修两栋房子。林彪说，你不要给我搞这些，我是不会去住的。叶群进来催，说南昌太热了，我们不去了，催促程世清快走。

林彪和叶群坐车下山，半路上被参加会议的干部围住，叶群当面对程世清说，这是你搞的鬼吧？叶群一边说一边下车，同开会的干部打招呼。到了吉安机场，程世清 又对林彪说，毛主席每次来江西都去南昌，你这次一定要去南昌看看江西的情况。东道主这么盛情，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林彪当然也很想看看南昌，立即叫李文普马上 通知去南昌。叶群凶李文普，你们的车为什么开那么快？为什么不等我？李文普说，这不能怪我呀，首长对你发大脾气了，已经叫我通知机组，决定马上去南昌，叫 不要等你。叶群急得小声说，可不能去南昌，重新通知机组改飞北戴河。

井冈山最近的机场在吉安，那是个小机场，还要到樟树机场换大飞机。李文普和林豆豆都对叶群说，这还要了解气象条件能不能飞呢。叶群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对李 文普说，快快快，来不及了，气象不好也得飞，对首长就说去南昌。接着叶群当面对林彪和程世清撒谎。程世清和林彪上了同一架飞机，叶群硬把程世清拽下来，推 他上另一架飞机，叫他先起飞，先去南昌安排一下。这很合情理，程世清先起飞走了。林彪、叶群坐的飞机按叶群的旨意往北飞，林彪在机舱里还问，什么时候到南 昌？因为有叶群“监视”着，林豆豆没法跟林彪说实话。飞了半天，林彪奇怪，说怎么南昌还没到？叶群说，不去南昌了，而是回北戴河。林彪发火，我已经通知去 南昌，你为什么改飞北戴河？航线不能改了，还是去南昌！战时的林彪说一不二，可现在不是战争年代了。叶群说，我早安排去北戴河了，不好改了，来不及改了， 这个机组什么气象都能飞。林彪说，航线要改，还是去南昌！叶群说，江青、“秀才”们正在江西批“复旧”，说程世清与“中央唱对台戏”，你不批转江青那篇大 文章，江青恨死你了，现在正要抓你。他们有造反派到处监视你，你如果听了程世清的话去南昌，江青知道你和程世清来往，那又要说你是搞“复旧”的总后台了， 又要说你手伸得很长，向地方伸“黑手”，压造反派了，又该整你了。你斗得过他们？你现在身体这个样！林彪说，我见见军队干部，光明正大，怕什么？他们要监 视，随他们监视去。我是南昌起义出来的，难道连南昌都不能去了？在争吵中，飞机继续往北飞，最终也没有到南昌。林彪有什么办法，只好“乖乖地”到了北戴 河。

这一次外逃蒙古是不是叶群故伎重演呢？

６８、 临上飞机前，林彪为什么吃了安眠药？

为什么半夜走？飞机的去向是哪里？为什么要往苏联跑？林彪知道吗？谜太多太多。叶群施加的影响太大了，这位“病元帅”的脑袋也不清楚，怎么走这么一条路？ 在那个惊慌失措的夜晚，林办工作人员只见叶群和林立果乱了阵脚，而林彪却稳如泰山，吃了安眠药，上床睡了。林彪一般在晚上１１时左右睡觉。内勤小陈说，９月１２日晚上，林彪吃了药，２５分钟起作用。虽然林彪还没睡，但已经迷迷糊糊。

晚１１时５０分左右，林彪对内勤小张说，马上去大连，不休息了。

注意！林彪说的是去大连！

秘书和内勤都知道，明天6时到大连去。林立果说，赶快走，到大连。警卫科长刘吉纯准备通知大连，刚要通电话，被林立果按下。干什么？打电话干什么？不是准备去大连吗？刘吉纯从来没见过林立果那么凶，瞪着凶恶的眼睛。

不管怎么说，到这时为止，林彪、叶群、林立果口径一致，都是去大连。

为什么到了天上，就变了呢？林彪知道是往苏联飞吗？叶群和林立果是怎样对林彪说的？如果叶群和林立果说是去大连呢？

曾在林彪手下当过参谋处长的中将苏静说，林彪这个人，打仗还是很厉害的，一个是巧，一个是细，而且很有创意。包括哪里有几挺机枪，哪里配备多少火力，哪里 埋伏一支预备队，小心极了，"前怕狼后怕虎"，方方面面考虑成熟，才"一锤定音"。这一点确实厉害，你想想，那个年代人的文化水平，他能把千军万马在这大 山川里摆得井井有条，用起来得心应手，很不容易呀。

而"九一三事件"的整个过程慌张零乱，哪里有一丝一毫的大将风度？

林彪对毛泽东的了解入骨三分，毛泽东处在绝对有利的地位，想取代根本不可能。说是"副统帅"，一兵一卒也动不了，拉一个排出门都拉不动。林彪不打无把握之 仗，不深思熟虑，决不出手。而且林彪的身体坏到离坟墓只有一步半了，成天坐在屋子里，既不打电话，也不召集人，怎么可能政变呢？从林彪的思想和言论中，他 并没有想取代毛泽东的意思。那么仓促的暗杀，只有毛孩子才能干得出来。林立果"嘴上无毛"，他身边的人大都在应付他，不敢出头。被指定的暗杀者心里有数， 替罪羊，真要成了，马上就杀人灭口。

"九一三事件"刚发生，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会上愤怒地说，吴法宪，你说说，林立果不过是个娃娃，你们为什么把他捧得那么高？甚至把兵权交给他？你们 为什么要这样做？吴法宪始终不敢抬头，不敢正视周恩来的目光，支支吾吾，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9月天已经凉了，而吴法宪却汗如泉涌，两手不住地交替擦汗。

"九一三事件"１０天后，这时"九一三事件"已经开始传达，周恩来到机场送柬埔寨宾努亲王，顺便在二号楼召集民航干部开会，吴德、吴忠也来了。周恩来说， 林立果还是２０多岁的娃娃，大学刚毕业就到作战部作副部长兼党办副主任，捧那么高。在上海，还专门给他修了一套很漂亮的房子，谁都不知道这些事，简直不像 样子。

很多人都说，做梦也没想到林彪会摔，这事不像林彪办的事。飞机上天容易，深更半夜，异国他乡，飞机落在哪里，下不来怎么办？火急火燎上天时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个"政变"看不出林彪参与其中的痕迹，只像是没有军事常识，没有指挥能力的林立果的"杰作"。

６９、 "九一三事件"是突然发生的吗？

警卫林彪的中央警卫团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说，可以说是突然发生的。

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说："九一三事件"很突然。突然在哪里？林立果想在上海暗害毛泽东，没办到。计划没出来，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紧张了。

其实，"九一三事件"是从毛泽东南巡开始的。

９月６日，叶群和林彪儿子林立果分别得到毛泽东南巡谈话的“情报”，开始策划。……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１３时１０分，毛泽东专列到达北京丰台站。

毛泽东完全是战争状态，他与提前约好的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谈话后，要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在南口布置一个全副武装师。

１５时３６分，毛泽东专列从丰台站开出，１６时５分到达北京站。

林立果几乎在同一时间，得到了毛泽东回到北京的消息。据汪东兴说，林立果立即给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说情况紧急，两个小时后飞往北戴河。并说他走后北京由周宇驰指挥。

奇怪？汪东兴怎么能知道林立果打电话的内容？

更奇怪的事情是谁这么嘴快？这个通风报信非同小可，直接导致了“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如果林立果不知道毛泽东回到北京的消息，就不会慌慌张张坐２５６三叉戟去北戴河。如果北戴河没有２５６三叉戟，林彪怎么可能半夜“机”叫！可是，把毛泽东如此绝密的行踪通风报信给林立果，为什么在“九一三事件”后没有得到任何处理！甚至好像世界上没有这位通风报信者一样。如果通风报信者是林彪一伙，“九一三事件”后怎么可能逃得掉？绝对是第一号死党。可是，被“九一三事件”层层“圈”起来的人成千成万，却没有这位通风报信者。换句话说，通风报信者并不是林彪一伙，而是有意为之！

林立果本来是不知道毛泽东何时到北京的。毛泽东离开上海后，王维国打电话告诉了他。林立果并没有特别惊慌，只是生气在南方的暗杀计划失败。至于毛泽东何时回北京，还不确定。毛泽东一路上可能在南京、济南、天津等地逗留，林立果认为他还有时间，却没有想到，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

汪东兴说：林立果探听到毛主席确实于９月１２日下午回到北京的消息后，对周宇驰等人说，现在情况变了，我们要立即转移，赶紧研究一个转移的行动计划。

汪东兴的书中没有说这位通风报信者是谁，但十之八九是汪东兴。因为能够知道毛泽东行踪的人极少，尤其是１９７１年毛泽东这次南巡，更是诡秘。现在看，能够将毛泽东行踪报告林彪的人只有汪东兴。也只有汪东兴的通风报信，能免除“九一三事件”的灾祸，别的任何人都不可能。

这是毛泽东打“草”惊“蛇”的步骤之一。

毛泽东的专列从来没有在白天驶进北京站。这次毛泽东白天到北京站，他也没有下车，一直耗到天黑才回中南海。毛泽东害怕有飞机轰炸中南海！

１７时左右，周恩来起床，进了卫生间，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报告毛主席回来了。周恩来有些吃惊，说原来计划不是这样的呀，主席怎么不声不响回来了？路上没停？杨德中说路上除了加水以外，直奔北京。周恩来问什么时候到的北京，杨德中说还不清楚。

周恩来很快带卫士张树迎到人民大会堂，２０时要召开政治局部分委员和有关部长讨论四届人大政府报告，黄吴李邱中只有黄永胜参加。

紧张气氛并不是林豆豆报告后才有的，周恩来一到人民大会堂，就得知情况紧张了。平时周恩来的两名卫士轮流值班， 9月１２日这一天的值班卫士是张树迎。但是 因为情况紧张，张树迎忙不过来，又叫来周恩来的另一名卫士高振普到人民大会堂来。这时高振普刚吃过晚饭，就匆匆来到人民大会堂。至此，他们和周恩来在人民 大会堂三天三夜，周恩来只合衣睡了两个半小时。

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说：我们跟主席出去，率１００多人的干部队，这个中队是专门为毛泽东外出服务的。除少数人看家，多数都跟着。事后看，林立果那一套能 实现吗？张耀祠说，不可能实现，林立果虚构，不可能的，他那些意图搞不成。还是个娃娃，把自己力量看大了。是他们的意见，不是林彪的意见。我们给部队都要 讲，８３４１部队一个一个都是精选的。主席外出都有一套方案，内卫是我们的，道路、山都是当地的。在哪一个省行走，由哪一个省负责，责任都在他头上，要把 桥看好，容易出事的地方要放警卫。以后江青告状，说８３４１部队不可靠，是林彪的人。毛泽东说，怎么是林彪的人？林彪一个也没带走？如果８３４１是林彪的 人，他干吗还要成立大小舰队？

７０、　9月１２日夜，叶群从什么时候开始紧张？

9月１２日晚上，林立果坐２５６三叉戟都快到山海关了，北戴河这边还没有派车去机场接。不知道是林立果打过电话了，还是叶群忘了，直到山海关机场询问，叶 群才匆忙吩咐派车。刘吉纯正向司机交代任务时，大飞机的声音就出现了。肯定是来不及了，来不及也得去接。半路上碰到林立果开着机场的吉普车，二话不说，林 立果换上接他的车开走了。这件事不大，但似乎说明叶群当时的心态已经杂乱无章。

叶群是最沉不住气的女人，但9月１２日夜里她一直在煲“电话粥”。因为原计划9月１３日6时去广州。时间还早，她与留守毛家湾的秘书于运深讲了半个小时， 然后和邱会作夫人胡敏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叶群刚放下电话不到１５分钟，２３时３０分，周恩来打来电话查问三叉戟，叶群又与周恩来讲了几十分钟。周恩来 问叶群有没有调飞机，叶群说没有，马上又改口说有，是我儿子飞来的。周恩来说，晚上飞行不安全吧？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 飞。周恩来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放下电话，叶群有些慌了，平时林彪用飞机，周恩来从不过 问。在这种非常的时候，为什么突然关心起三叉戟呢？还说要到北戴河来？

周恩来还在采取一系列的行动，要专机师准备飞机，他要亲自去北戴河。不久，叶群打来电话，告诉吴法宪，等一会儿，周总理很快会给你打电话。你能来也好。吴 法宪说让３４师师长时念堂去，叶群对时念堂不熟，提出还是胡萍来。胡萍在住院，在这种时候调动飞机，吴法宪不能决定，他还要请示周恩来。吴法宪向周恩来提 出，立即去机场追查。周恩来表示同意。吴法宪带张秘书和警卫员直接从办公室到了西郊机场。这时胡萍还没回医院，正与专机师的龙参谋长谈话。北戴河这边，叶 群也还没有“跳”起来，安静了半个小时。

这时，林立果接到周宇驰的电话，说西郊机场的飞机被“封”了，要“四人”共同下令才能起飞。叶群这才紧张了，她要问一问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能问谁？她 会问黄永胜。而黄永胜

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恩来召集的会议，讨论四届人大政府报告。而周恩来接到张耀祠转来的林豆豆报告后，专门要求参加会议的人员不许出 来，也不许接电话。叶群找不到黄永胜了。家里没有，办公室也没有，黄永胜能到哪里去？只能是被抓了。叶群彻底慌了，在走廊里跑来跑去，这屋跑到那屋，不住 地喊，有人要来抓首长了，再不走就走不了了，９６楼乱成一团。在此之前，叶群到林彪屋里好几次，刘沛丰守着门，谁也不让进，林彪内勤小陈、小张也不让进。 叶群连外衣也没穿，和林立果一起把已经服了安眠药的林彪从床上拉起来，前后没几分钟就坐“大红旗”走了。

周恩来已经接到８３４１部队的报告，为证实林彪是不是跑了，零点刚过，他要林彪的电话。军委总机马健英接通了１００号林彪的专线，没人接，２００号叶群的 专线，也没人接。这是不可能的呀？怎么可能没人呢？她以为线坏了，要通中南海总机维护线路的值班员，检测说电话是好的，有正常的铃声。马健英纳闷：怎么工 作人员也不见了？

７１、 是谁让林彪女儿林豆豆也上三叉戟？

当时情况非常紧急，前前后后，林豆豆报了四五次。为了不让“大红旗”去山海关机场，林豆豆和张清霖提出四条措施，一、调一辆大卡车来，把公路堵死，二、莲 峰山路不宽，两边都是松树，砍掉一棵大树，把路挡住；三、调２０名警卫战士拦截车辆；四、封锁去机场的道路。当时８３４１部队的领导同意，但当林彪等人即 将上车时，却一条也没有实施。

姜作寿回忆：林彪住在山上，就一个路口，卡车开上去，堵一堵，就把路堵死了，除非“大红旗”插翅，否则别想走。可拦截林彪的“大红旗”，北京不发话，根本 不可能，谁敢？上边没指示，我叫副大队长于仁堂先把“大红旗”看起来。现在想，林彪不跑还真没办法，谁敢上去拦？

２３时４０分，８３４１部队副团长张宏再次向北京报告，他们已经调汽车了，我们怎么办？张耀祠说：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他们走时，你们要跟上他 们，要特别注意他们去的方向。张耀祠回忆：因为这时还没有报告毛主席，中央还没有指示，我只能交代张宏注意去的方向。

北戴河这边的情况是什么时候报告毛泽东的？还是毛泽东没有态度呢？毛泽东不是在三叉戟还没起飞前就到人民大会堂了吗？周恩来得到北戴河的报告，第一件事就会报告毛泽东。

张耀祠刚放下电话，张宏的电话又来了，说林彪他们出来了，刘沛丰手里提着四个皮包，先上车，林立果、叶群、林彪都上了车，李文普上车后汽车开走了。

张清霖回忆：我又从屋外进来，林豆豆建议从反方向派部队拦截。向北京请示，还是迟迟得不到答复。张耀祠说，你跟张宏说。张宏接电话后，突然变了态度，叫我 别在这里指手划脚。我气坏了，都快发生火并了。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张宏声音很大，当着很多人的面，让林豆豆快上飞机，我在旁边，就这句我记得清 楚，“中央命令你们也跟着上飞机”，林豆豆冷静地问谁下的命令？没有回答。林豆豆趴在桌上哭开了，站起来，坚定地说：我死也不走，要走你们走。我把从战士 手里“抢”来的枪推上子弹，叫张参谋马上跟北京联系，一直没声音，林豆豆夺过电话，中间冒出汪东兴的声音：“早找我不就好了？”再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她把 话筒摔了，这时外面的枪声响了。

以后姜作寿说让他们也上飞机。

在北戴河的８３４１部队的上级是张耀祠，张耀祠的上级是汪东兴，汪东兴在毛泽东身边。

可张耀祠是另一种说法，警卫另有飞机，我没叫姜作寿他们上飞机，那一架专机就是林彪一家子。让林豆豆上飞机更不可能，我怎么叫她跟着走？据张耀祠说，三叉戟起飞后，林豆豆还两次打电话给他，准确时间没记清，当时很紧急。头一次说飞机起飞了，听到了飞机的声音。第二次她问飞机截住了没有。

林豆豆、张清霖和８３４１部队在场的姜作寿都听到了“让林豆豆上飞机”的指示，是谁下达的指示？因为“指示”是下达给张宏的，张宏已经去世。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可以从审查时看出来。张清霖说，负责审查我和林豆豆的谢静宜叫我们以“党性”保证不准再提这件事，这又是为什么？

７２、　张耀祠让副团长张宏去报告林彪了吗？

林立果９月８日走后，林豆豆让张清霖在楼下站岗，她一个一个找工作人员谈话。然后和张清霖转山看地形，忙了几天，到９月１１日看没有动静，以为林立果搞不下去，就睡了一天。９月１２日也没觉得什么，林立果突然从北京回来，一下子到了紧张的最高点。得知林立果和叶群要把林彪弄到广州去，林豆豆很着急，怎么办？她认为林立果的办法显然是死路一条。林豆豆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保住林彪。要保住林彪，就哪里也不能动，呆在北戴河最安全。

当然，直接告诉林彪，如果林彪想走，那谁也没有办法。如果林彪同意不走呢？

可是，谁也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都以为还有机会。

这样，凭林豆豆和在场秘书的力量不可能，不得不求助８３４１部队。

９月１２日夜间，林豆豆对李文普说，我们要赶快报告。李文普怕承担责任，说我不去，怕他们有事找。２２时３０分，刘吉纯领着林豆豆从小路去大队部。部队全睡了，大队长姜作寿和卫生员小陆在下象棋，刘吉纯把姜作寿叫出来，林豆豆有事跟你说，就把他领到树林里，刘吉纯说上边可能有事，我得上去看看，临走嘱咐林豆豆别回去了。

姜作寿听林豆豆说林立果和叶群要挟持林彪走，大吃一惊，要向北京报告。林豆豆不想向北京报告，但警卫部队行动必须得到北京的同意。姜作寿向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报告后，说北戴河还有个副团长张宏，应该向他报告一下。张宏很快被车接来了。

２３时多，副团长张宏给张耀祠打电话，说林豆豆讲，林立果、叶群正在商量挟持林彪今天晚上逃跑，还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林豆豆让我直接给你报告。张耀祠在汪东兴的秘书值班室接的电话，汪东兴和他的秘书都在场，张宏说一句，张耀祠重复一句。随后汪东兴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张耀祠听完张宏的报告后，交代了四条，一、派人严密监视林彪住所的动静；二、要组织好部队；三、要准备好汽车；四、一有情况及时报告。

８３４１部队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回忆：副团长张宏向团长张耀祠报告后，按照张耀祠的指示，准备报告林彪，被姜作寿拦住了。说情况复杂，平日林彪的家我们是 不去的，你要去，我就要跟你去。万一发生不必要的牺牲，部队谁管？张宏说，那怎么办？把林彪老婆和儿子抓起来，张宏表示胡闹。

这时林立果几次打电话找林豆豆，都被姜作寿挡住了。

可是据张耀祠说，他没有让张宏到林彪家去。

现在我们看张耀祠的四点指示，首先是严密监视。这是几十年后张耀祠的回忆，当时敢说"监视"吗？那时还是林副主席，顶多说去看看。这句话就比较含糊，张耀 祠的意思可能是"监视"，而张宏理解的意思是看看林彪知道不知道。于是，就有了张宏想去报告林彪的举动，如果张宏报告林彪了，林彪还能走吗？可惜没有实 现。

为了落实张耀祠"监视"的指示，姜作寿在山上转，注意林家的动静．这时林家已经格外"热闹"起来。很快"大红旗"冲下了山，姜作寿拦了，虽然没有拦住，但如果他不拦，李文普不会下车。

７３、 ２５６三叉戟从西郊机场起飞时有故障吗？

１９７１年9月１２日１９时４０分，２５６三叉戟从西郊机场起飞。

这绝对是临时行动。因为１６时左右，在没有接到起飞通知前，潘景寅吃了三片安眠药。他怕夜里有任务，所以准备在理发室理发后，抓紧时间睡一觉。没想到刚吃 了安眠药，在理发室理了一半发，起飞命令就来了。潘景寅在候机室对１００团政委安治梁说，我吃了安眠药。这非同小可，到这个时候又不可能再换人，安治梁交 代第一副驾驶陈联柄在飞行中多注意些。但是据康廷梓回忆：潘景寅并没有让出驾驶员的位置，他还是坐左座（主座），操纵飞机，第一副驾驶陈联柄坐右座（副 座），这一趟飞行４０余分钟，２０时２０分左右安全落地。

２５６三叉戟上机组九人，送林立果去北戴河。林立果带的人中，除刘沛丰、程洪珍外，还有林立果带的两个女兵小张和小袁。

据女兵小袁回忆：２５６三叉戟从西郊机场起飞时发生了故障。飞机升空后突然倾斜，机身摇摆，声音非常大，服务台上的茶杯暖瓶都滑到地上……

第二副驾驶康廷梓在２５６三叉戟上，他没有飞行任务，随便坐在给林彪准备的座椅上。康廷梓说飞机从西郊机场起飞时根本就没有发生故障，不管是起落架还是发 动机，都没有发生故障。至于小袁说飞机上升时，倾斜、摇摆、摔茶杯这件事是有的，康廷梓说：杯子从桌上滑落，大概是摔碎了一个。但那是飞机上升时的正常现 象，问题是空中服务员小魏没有把茶杯和暖壶固定好。２５６三叉戟突然起飞，东西来不及收拾好，也是情有可原的。后来在山海关机场的飞行后讲评会上，小魏还 专门为摔杯子做了检讨。

但是潘景寅有没有责任呢？我专门问时任空军３４师师长的时念堂。他说：摔杯子说明潘景寅起飞时紧张，一般情况下是不应该摔杯子的。我想：这是不是和潘景寅 服了安眠药有关？不过，飞机上升，飞机斜了，飞机里的桌子肯定是斜的，杯子不固定当然要坐“滑梯”了。既然飞行员康廷梓认为飞机上升时倾斜是正常现象，那 就应该是正常现象。

小袁回忆林立果不让她们两位女兵下飞机，可能也虚。普通飞机都不可能机组走了，让客人留在飞机上，更何况专机！专机在外，怕有人搞破坏，有严格的警卫手 续，怎么可能让客人留在飞机上？退一步讲，无论如何也要下来吃饭吧？或许林立果是让两位女兵留在机场，她们理解错了，要不就是林立果说错了，但意思是让两 位女兵在机场等候。而且这时，林立果还是打算第二天早上７时飞广州，半夜“鸡”叫那是林立果到北戴河后的临时变故。所以，林立果无论如何不可能让两位女兵 在专机上等候。

可能这两位女兵很少坐飞机，所以有些大惊小怪。如果小魏真的说起落架有故障，那也是小魏的猜测，她不是飞行员，她不懂。至于下飞机机组说检修飞机，可能是 不懂飞机的两位女兵听错了，或者是机组的口头语，飞行后检修飞机就是检查飞机。既然康廷梓说在山海关下飞机时没有人说飞机有故障，机组说的意思应该是检查 飞机。因为很快，机组全体一起把飞机的“眼”堵上了，都下了飞机。

康廷梓说：山海关的飞行后讲评会上没有人说２５６三叉戟有故障。

２５６三叉戟绝对不可能发生故障。如果有故障，潘景寅绝对不敢从山海关起飞。叶群、林立果再催得急，也不会飞。起飞不就是为保命吗？飞机有故障，上天不等于自杀吗？

而且，２５６三叉戟是当时中国的第一号专机。１９７０年四架三叉戟从巴基斯坦进口，２５６三叉戟是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座机，但飞的时间长一点，所以 就定了２５４三叉戟为一号专机。但是检查发现，２５４三叉戟的外壳被小鸟撞了一个小坑。这样就不能当专机了，２５６三叉戟承担了一号专机任务，全面改装， 把另外三架三叉戟上好的零件调换给２５６三叉戟，甚至调换了四台发动机中最好的一台发动机。２５６三叉戟主管机械师沈宝发天天“泡”在２５６三叉戟上，他 说，维修的时间太长了，老是不执行任务，就老得检修。所有的零件都摸熟了，一遍又一遍，保证没有任何故障。

７４、 “九一三事件”后紧急战备，为什么绕开黄吴李邱？

“九一三事件”发生前后，周恩来忽然成了“军委主席”。军委总机一号台回忆：１９７１年9月中旬，周恩来要电话比以往更多，亲自要电话的时候特别多，也特 别急。9月１２日晚，短短几小时，他要了２０多个电话，声音都沙哑了。凌晨1时，军委总机刘淑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要总机以最快速度把各大军区司令员叫到 保密机前，告诉他们在岗位上不要离开。几分钟内，总机把休息和没有休息的司令员们都叫到保密机前，等候总理指示，叫他们不要离开，总理随时要和你们讲话。 事后，一位军委首长对总机说，你们搞了一次大军区司令员的“紧急集合”啊。

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回忆：“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他刚入睡不久，电话急促响起来。是周总理的声音，你是曾思玉同志吗？我是周恩来。报告总理，我是曾 思玉。庐山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你听清楚了吗？报告总理，我听清楚了。你们立即进入指挥所，紧急备

战，你们少数同志知道就行了，封闭所有的机场，你听 懂了吗？我听懂了，坚决照办。曾思玉马上通知政委刘丰，副司令李化民和管作战的副参谋长唐皎。十多分钟后，曾思玉到达指挥所，通知武汉军区空军政委萧前， 关闭所有机场，实行空禁，把拖拉机、汽车停在所有机场的跑道上。

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打电话给曾思玉，他也接到周恩来同样的电话，弄不清是谁，又不敢核实，猜是吴法宪。曾思玉说：不是那个"胖子"，是那个"瘦子"，在大会讲话的那个人。张国华大吃一惊，是他？

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布置完了以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紧急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研究部署应付各种情况的措施。会前周恩来 和叶剑英共同拟定了向全军发出紧急战备指示，周恩来指定叶剑英处理林彪善后问题及战备事项，并让他转移到玉泉山９号楼待命应变。叶剑英连夜交代秘书准备军 用地图和卡车，马上搬家。

３时多，周恩来叫吴德立即到人民大会堂。吴德下午从丰台回来后，到吴忠家谈了很长时间，讨论对毛主席提出的第十次路线斗争应该怎样认识，是不是需要将毛主 席的谈话给市委常委或者市委书记先吹吹风，以免将来问题出来了，大家没有思想准备。直到后半夜１时多，也没考虑好怎么传达。吴德说，今天恐怕议不出来妥善 办法了，明天再说吧。回家后，吴德就吃了安眠药睡了，直到被电话惊醒。

吴德走进人民大会堂时，看到周恩来神色十分紧张，正在给各大军区打电话。周恩来对吴德说，北京军区要紧急备战，要让卫戍区派部队控制北京郊区的几个机场， 防止再有飞机外逃。吴德提出，战备问题，只跟我一个人谈不行，是否让北京军区和卫戍区的负责人一起谈。周恩来同意。北京军区副政委陈先瑞和北京卫戍区司令 员吴忠来了以后。周总理传达毛主席决定，首都立即处于紧急备战状态，指定吴德、吴忠负责，对林彪外逃事件要严格保密。吴德和吴忠商量后，向周恩来提出，卫 戍区政委杨俊生应该和我们一起参加工作。周恩来询问了杨俊生的情况，表示同意。接着周恩来布置了几项应急措施：一、要监视和搜索外逃的直升机，要人机并 获，将情况直接报告中央。二、派卫戍区部队封闭北京郊区几个机场，没有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也不允许任何飞机降落。在没有接到允许飞机起飞的命令或通 知时，发现有飞机起飞，要将其击落。三、卫戍区要加强对新华社、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等目标的警卫工作，对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附近地区也要增派部队，加 强警卫。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并部署北京地区防空降的作战任务。

吴德和吴忠回到卫戍区，首先布置民兵监视天空，卫戍区准备好了一部分摩托部队，随时可以出发到直升机降落的地点。同时派出卫戍区部队封锁机场，西郊、南 苑、沙河、良乡、东郊机场，真枪实弹，没有周恩来的命令，对强行起飞的飞机可以立即开枪，高射炮可以立即开炮。第二，要在机场设置障碍物，阻止飞机起飞。 第三，要将所有飞机上装载的油料全部抽空。

９月１３日，根据中央指示，为加强北京地区的战备力量，北京军区命令３８军的三个机械化师、坦克１师和炮兵６师共六个师，归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这样，卫 戍区原来四个师，就变成十个师了。那时不知道还会出什么事，不知道还会不会有飞机起飞，非常紧张，经过研究，确定了重点防御区域，北至南口，东到首都机场 一带，南达保定以北，９月１３日或１４日，部队进入预定位置。９月１５日，卫戍区召开作战会议，各个师负责人参加。当

时强调保密，下边不知道情况，执行任 务时，遇到一些问题，也老有人问，很不好办。最后报经周恩来同意，１４日或１５日，召开卫戍区师以上干部会议，讲了林彪叛逃的情况，传达了中央指示，与会 者都大吃一惊，林彪是副统帅啊，怎么说跑就跑了呢？

这一系列的应急措施，实际上内防政变，外防侵略，怕苏联乘虚而入。像这样重大的战略部署，按常规应该向中央军委、各总部请示报告，但为什么不按常规来办 呢？吴德和吴忠分析，黄吴李邱都是军委、总部的负责人，是军委办事组的成员，他们跟林彪可以说一伙的，虽然对他们没有采取措施，但不等于他们就没有问题 了。当时的情况很特殊，他们商量后决定，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必须确保卫戍区的部队置于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指挥下，要求卫戍区的机关、部队，来自军委、总 部的电报只收听，不汇报卫戍区根据中央布置的应变措施的情况。

黄吴李邱就这样被故意绕开了。

７５、 黄永胜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见林立果了吗？

九一三事件后专案组查到，9月１２日白天黄永胜在京西宾馆接见林立果，要警卫参谋费四金证实。费四金是黄永胜的“贴身保镖”，黄永胜到哪，费四金就跟到 哪，寸步不离。这可非同小可，如果黄永胜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与林立果见面，这可是一次极其关键的“会见”，说明黄永胜可能知道内幕，最起码知道“西谋”。 当时费四金并不知道这问题的重大，他每小时每分钟地回忆9月１２日那一天。因为也是没几天的事情，经过反复回忆，费四金实事求是地说，黄永胜这一天没有去 过京西宾馆。林立果我认识，9月１２日，黄永胜也没在别的地方见过林立果。

专案组本来想抱个“大金娃娃”，听了费四金的交代，顿时大失所望。但仍不死心，又专门提审过费四金多次，先给“糖衣炮弹”，无非是封官许愿、政治前途一 类。如果骨头软，就会“顺竿爬”，反正黄永胜已经倒了，再多泼点脏水又算什么？但费四金坚决地说，黄永胜没接见林立果就是没接见，我是党员，是军人，我要 对中央负责，对黄永胜负责，也对我自己负责，我不能作伪证。专案组还不死心，吹胡子瞪眼，拍桌子，各种高压手段都用上了。费四金也非常明白如果坚持说真 话，很可能自己的结局会很悲惨。黄永胜被抓后，费四金也被抓了起来，黄永胜是保不了他了。他如果作伪证，马上会被释放，而且还会有一个很“光明”很“灿 烂”的前途。可是，费四金坚持，一个人即使被开除党籍军籍，他也应该有良心。

专案组为了攻下费四金这个“堡垒”，专门把他押到京西宾馆对质。京西宾馆的干部、服务员好多人都众口一词，说黄永胜那一天见林立果了，还拿出当时的值班记 录。费四金是保卫干部，学过专门的知识。他一看，马上说这不是当时的记录，这是事后补记的。这个值班日记跨度好几个月，不仅钢笔水颜色一样，就是字迹也一 样，一眼可以看出是一个人写的，是伪造的，不可能好几个月都是一个人值班吧？费四金说，我认为这是事后追记的，不是原始记录，不符合当时情况。

最后，纪登奎又使出一招“杀手锏”，他对费四金说：别人都揭发了，就你没揭发。费四金说，我懂，我是组织上调来的，过去与黄永胜并不认识，我没有理由保 他。但是也不能因为黄永胜出了事，就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把根本没有的事情说成有。如果黄永胜９月１２日见了林立果，我决不会包庇他。不管有多大的压 力，不管有多严重的后果，费四金始终不改口，黄永胜在９月１２日这天没到京西宾馆，更没有见林立果。由于费四金始终说真话，最后在定黄永胜罪时才无法写上 这一条。要不然，大小“舰队”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见面就有了“铁证”，黄永胜将像林彪背着“伊尔库茨克”的罪名一样，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由此可以想见，有些“证据”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了。

７６、　黄永胜９月１３日是准备去广州吗？

中央专案组说：黄永胜到广州另立中央，费四金坚决否认。

费四金说，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那天，根本就没有说第二天去广州，不要说换洗衣服没有准备，就是天天要吃的药也没有准备。中央专案组拿出缴获的“飞机编组 名单”，上面有黄吴李邱的名字。费四金说不知道这回事，黄永胜根本没说要出差。一般黄永胜出差，都要提前讲，瞒谁也瞒不过我小费。因为出差在外，不是一天 两天，黄永胜起码要带换洗衣服以及吃的一堆药。每次出差前黄永胜都要说，小费，要出差。我就准备行李，把要带的装进旅行箱，把吃的药准备好。但这一次，黄 永胜一句话也没说过，肯定黄永胜没有出差的打算，更不知道到广州。

９月１２日傍晚黄永胜去人民大会堂是费四金跟着去的，一直到第三天才回来。黄永胜回到西山，烧了些文件。费四金只是觉得黄永胜的情绪低落，但他一直不知道 是林彪跑了，只知道跑了一架大飞机，以为吴法宪跑了，因为吴法宪那天没有到人民大会堂来。黄永胜的秘书吴秘书那天没去人民大会堂，问小费都谁参加大会堂的 会了？所以印象特别深刻。直到９月２４日，费四金随黄永胜到人民大会堂开会，被关进了学习班，才知道原来黄永胜有问题，他也有了问题！

正像费四金所说，他并不是黄永胜的“心腹”，比起李文普和林彪的漫长关系，费四金和黄永胜要短得多。他原单位是广州军区４１军１２１师，１９６８年黄永胜 从广州到北京，他也跟来了，是黄永胜办公室工作人员中时间最长的。跟黄永胜调到北京的工作人员都先后走了，费四金也在交班，准备到军委办公厅警卫处。接班 的警卫参谋小汤基本上都接了，只剩下一些经济账没交。如果费四金早两天走就走了，没想到九一三事件不期而遇，再也没走成。费四金交完班，准备回家结婚。结 婚证领了，回家的火车票也拿到了手，喜糖什么的也买了，却被突然关了起来。专案组认为费四金是黄永胜的“心腹”，把他当成重点。费四金告诉家里临时出差，火车票也退了，这一“临时”就是四年。先是关在亚疗一年，然后关到团河农场三年，放出来后，为结婚买的喜糖全长了毛。

解除关押后费四金在基层部队过渡一下，转业到地方，最后的职务“升”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再就业中心主任。不管在部队还是在地方，背着黄永胜这个“大包袱”，哪里都不敢用。如果费四金承认９月１２日黄永胜见了林立果，那就立了“大功”，决不会是这种遭遇，但费四金和他亲爱的妻子至今不悔。

小费不知道，因为他，使成千上万的无辜的人免遭噩运。

最近，我又见到了小费，小费已经成了老费。他拿出他的结婚证给我看，说他现在退休了，和他爱人经常自驾车到全国各地旅游，非常快乐。

７７、 郭玉峰为什么说黄永胜最冤枉？

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郭玉峰和时任公安部部长的李震是中央专案组的两员大将，他们在纪登奎的领导下，纪登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具体负责林彪案情。

郭玉峰认为：“林彪手令”不一定是林彪写的，元帅打了那么多年的仗，“两谋”（谋杀毛泽东，南逃广州）这么大的事情，叫小娃娃干？为什么不叫黄永胜干？郭玉峰说最冤枉的是黄永胜。为什么郭玉峰说黄永胜最冤枉？因为郭玉峰参加“两案”审理，最知情。

９月２４日，黄永胜被叫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从此失去自由。被抓时，黄永胜大叫冤枉，那声音很多人都听到了。确实冤枉，确实比窦娥还冤啊。

没几天，黄永胜的大儿子黄春光也被关了起来。

时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防止突然袭击办公室主任的黄春光回忆：９月１３日我一上班，值班参谋说，主任，出大事了，跑了一架三叉戟，是林家的，机上有谁不知 道。与林家有关，按一等专机准备的。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事？我马上问我家秘书，也不知道。又问父亲回来没有，没有回来。９月１４日、１５日晚上，邱会作的大 儿子邱路光给我打电话，你快过来，出大事了。９月２４日通知我们回家，我妈来电话，说爸出事了，让咱们搬家。过完１０月１日，我在办公室，把我弄起来，参 加学习班，老有人跟着我。
我想说我知道我父亲的事会把我怎么样，我不知道他的事，又会把我怎么样，当时真不知道要把我怎么样？我从侧面分析，我帮 助父亲烧东西是抓我的原因。为什么烧？主要是怕说不清楚，有些东西就清理了，我帮着烧。因为走廊有两个门，２３时多，秘书看见我帮着我爸烧东西，就揭发 了，说我划不清界限。纪登奎、郭玉峰找我谈，９月１６日晚，你帮你父亲烧的什么东西？我说我没帮。你的父亲烧了很多东西，把花盆都烧裂了。我说烧的是中国 共产党非常委员会的专案，还有一些策反信。纪登奎说：心不虚，烧这些干什么？策反信毛主席不是批过了？批过了也一样可以抓。

我被关了四年，在团河一年。李作鹏的女婿，王秉璋的秘书，林立果的女朋友张宁，都被关在亚疗。为什么不放我？因为对父亲定不了罪，还想从我这里挖东西。我 认为，父亲不知道林彪为什么跑？如果知道，一是不同意这样干，二就是同意干，也不会干成这样，这证明林彪不是自己想走的。

放出来重新分配工作。本来我是副团级，分配到司令部管理处军粮城生产队任副队长，我问处长，是队长、指导员管我，还是我管他们？当然不会让我干长，没多久让我转业，三个弟弟也都转业了。

父亲一直没有消息，１９７６年我们知道他被关在秦城。我们反复要求，要去看。谁告诉说可以看，母亲劳改，去不了。兄弟四人约好，老婆孩子十几口，浩浩荡荡 到了秦城。父亲

不见，不是监狱不让见，而是父亲故意不见。自从关进监狱，这么多年了，父亲从来没有见过家里人，也不知道家里人的消息，他能不想见吗？但父 亲说，我不能以这种身份见我的孩子，我要见你们，还我清白以后见。

我们既然来了，好不容易来了，不见到父亲我们不走。就在秦城那里呆了两三天，我写了一封信，恳求父亲见见，说你可以不见儿子，应该见见媳妇，都没有见过， 更没有见过孙子、孙女。父亲终于同意见了。监狱看得特别严，不许照相，别人还有与父亲在监狱里的照片，我们没有。但那次见面给我很深的印象，我第一个进 去，父亲非常苍老，像老了几十年，他说你不该给我写这样的信，摧毁了我的感情防线。
以后我们又去探过好几次监，每次半天。

父亲说，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他们要跑？父亲从小打仗，没有政治斗争经验，不是他胡说，根本不知道谋害毛主席。事实与罪名无关，打倒谁是黄永胜签字？林彪 惟一批的就是严慰冰，那是因为严慰冰写了很多攻击林彪一家的匿名信。而父亲没签过任何一个打倒谁的文件，要开除彭德怀党籍，父亲领导的专案组呈毛主席、林 副主席批示，专案组边请示边转上去，这就算迫害？父亲说，请律师有什么用？不相信律师。其实完全应该请律师，父亲不懂，没请，他自己为自己辩护。他始终认 为自己没事，我们是真心反江青的，抵制江青的，怎么与他们一伙？从我们到北京来就抵制，这在当时中央都知道，江青甚至反对我父亲出国访问。在“两案”公开 审理的审判现场，父亲还和江青互相瞪眼睛。

１９８１年，父亲在青岛一年半，我和三弟调过去照顾他。１９８３年春节前发现肺癌，４月父亲去世。临死屋子里连冰箱也没有，只能到外面买些冰，把没吃完的 饭冰上。父亲没写东西，不写。我说人家相信吗？写什么？一生认为最好的领导是谁？当然是林彪。跟林彪打仗多，痛快。我打仗怎么样？有史可查，关于九一三事 件我都说了，我写有什么用？有个几小时的录音带，留给儿女，算遗嘱吧。

临死黄永胜只讲了两句，我没有反毛主席，我没有反党。

７８、 九一三事件前一天是星期日，黄吴李邱在忙什么？

中将黄志勇回忆：9月１３日前，我去３０１医院透视检查，里面有人，问是谁，护士说是黄永胜，检查身体。我就不相信“九一三”这个事，他没参与。

１９７１年9月１２日晚上，总参谋长黄永胜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讨论，白天放假在家。上午他去西山指挥所的理发室理了发，用去了一 个多小时。然后黄永胜与大儿子黄春光散步聊天，又用去一个多小时。剩下的时间逗孙子玩。大孙子１９７１年5月出生，刚四个月，白白胖胖，正是好玩的时候。 又是黄永胜第一次抱孙子，所以格外疼爱。这时就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饭后黄永胜午睡，起床后看文件。直到晚上快8时才坐车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这一去就是 三天三夜。也就是说，九一三事件发生时，黄永胜正在参加周恩来主持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讨论。

黄永胜的警卫参谋费四金说那一天比较平静。为什么晚上快8时才走？因为毛泽东都是夜间

办公，白天睡觉，中央政治局也跟着调整了作息时间，晚上办公。所以周 总理召集会议一般都是在晚上 8 时半，提前五、六分钟到就行了。黄永胜住在西山，路上要走４０多分钟，时间由警卫参谋费四金掌握。

９月１２日这一天，军委办事组放假，没有集体活动，各人回去收拾“自留地”。所谓“自留地”，就是各自处理各单位的事情，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吴法宪、 李作鹏、邱会作都还兼着军兵种的第一把手，黄永胜是总参谋长，吴法宪是空军司令员，李作鹏是海军政委，邱会作是总后勤部部长。对于黄永胜、邱会作和吴法宪 来说，“自留地”都收拾得差不多了，他们一直在家，除了军委办事组的集体活动外，花插着就把“自留地”弄完了。而李作鹏 9 月７日、８日还在武汉陪同朝鲜人 民军代表团，才回到北京没几天。如果光出这一趟差还好说，李作鹏在 8 月陪江青到青岛去了一段时间， 8 月底从青岛又到连云港处理两派的问题。接着 9 月初陪朝 鲜人民军代表团的吴振宇到长沙、武汉等地，这一段时间基本上不在家。文革中事情很多很乱，几天不在家，就会积下山一样高的公文。所以这一天正是李作鹏种 “自留地”的大好时光，他在海军大院４７楼办了一天的公。快半夜接到周恩来让他处理停留在海军山海关机场的林彪专机，他完全不知道前因后果，周恩来什么都 没说，知情的吴法宪也没有对李作鹏说。李作鹏事后说，如果他知道前因后果，恐怕处理起来就不会是这种情况了。不过话说回来，毛泽东不下令，谁敢拦阻林彪的 专机起飞？

９月１２日这一天，对于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来说，是他一生中最混乱的一天。在黄吴李邱四个人中，他是最知情的一个，也是吓得最厉害的一个。９月１１日晚上， 周恩来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吴法宪参加了。毛主席指示，四届人大召开前要先开三中全会，会议一直开到凌晨 1 时。这已经是９月１２日了。吴法宪回到西郊驻 地，在家打了一阵乒乓球，放松放松。临睡前他告诉夫人陈绥圻，快要开三中全会了，我要准备在会上再检讨。因为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事情，黄永胜、邱会作和吴法 宪都作了检讨，黄永胜和邱会作的检讨过了关，只有吴法宪仍被吊在空中晃荡。那一天上午，吴法宪是在睡觉。中午吴法宪起床后，就叫车和陈绥圻、张秘书回到空 军大院。因为写检讨这个事比较急，要马上动笔，吴法宪的前两个检讨稿和一些文件都在空军大院。１２日下午陈绥圻找出吴法宪前两次的检讨材料，琢磨怎么帮助 吴法宪写第三次检讨。而吴法宪按周总理指示，仔细阅读了印发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然后抽时间处理了一些空军事务。晚饭前，他本来是要到京西宾馆 听邱会作谈毛泽东南巡谈话，这是他最关心的事情，可惜两个人阴差阳错，没有见上面。这样，吴法宪始终不知道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直到８０年代初出了监 狱，他才知道毛泽东说了谎话。他在回忆录谈到，毛泽东说他们不来找我谈，我去找他们谈。可是，我三次求见毛泽东，都被拒绝了。

那天晚饭后，吴法宪回到空司办公楼。下午紧紧张张过去了，晚上吴法宪还有一大堆事情。当时正开空军场校工作会议，他约空军政委王辉球、副司令员薛少卿晚上 8 时找来开会的空军八航校校长、政委谈话。约定的谈话结束，还有一些时间，吴法宪和王辉球就与空军文工团从部队调来的六个指导员谈话，解决派性问题。这个 谈话结束已经是９月１２日晚上１１时多了，周恩来打来电话，问吴法宪是不是调飞机去北戴河了？于是，让吴法宪魂飞魄散的“事件”开始了……

邱会作９月１２日这一天非常平静，上午他在总后召开国防工办会议，然后到西山看电影。邱会作的大儿子邱路光的女儿，也就是邱会作的大孙女１９７１年8月 ３１日出生在３０１医院，邱路光从新乡部队回家休假。按老百姓的习惯，小孩子出生十天，要庆祝一番。又

赶上星期天，邱路光妻子的表哥一家也来了，做了一大 桌子菜，又下挂面，又买馒头，吃了一顿热热闹闹的午饭。到下午６、７时，邱路光和父亲邱会作说了一会儿话，送客人走。晚饭前，邱会作去京西宾馆开纪委会 议，他和吴法宪约在好在京西宾馆见面，以前关于毛泽东南巡没跟吴法宪通气，怕他再捅漏子。阴差阳错，他们没有见上面。然后邱会作回到总后，处理公务。９月 １２日晚，因为心里烦，他多喝了几口酒。黄吴李邱都有吃安眠药睡觉的习惯，睡前公务员小张给邱会作吃了两三片安眠药。刚上床没多久，凌晨３时左右，邱会作 被总理的电话叫醒，叫他到人民大会堂，说有个重要的会，现在就去。邱会作晃晃悠悠到人民大会堂时，安眠药劲还正足呢。

林彪就这样指挥他的“大将”搞“政变”吗？

７９、黄吴李邱不知道“两谋”，为什么还被判刑？

１９８０年“两案”审理中，证实林彪集团主犯黄吴李邱被排除在“两谋”之外，邱会作更是与“两谋”没有瓜葛。特别法庭副庭长伍修权说：总参谋长黄永胜是个 主要人物，他的罪行特点是同林彪、叶群关系特别密切；吴法宪罪行的特点，是把空军的权力交给了林立果。李作鹏的要害问题，是由他放跑了林彪的座机。

可是，对黄永胜来说，关系密切就成了“罪状”吗？对吴法宪来说，空军的权力是说交就能交的吗？李作鹏就更冤了。“两案”审理小组取证组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总理不让飞机走，事后很清楚，如果说李作鹏那时放他们跑，也过分。如果说黄吴李邱与“两谋”无关，林彪这是在搞“政变”吗？搞“政变”能不依靠既是“死 党”又掌握军队大权的黄吴李邱吗？

１９７１年９月２４日，黄吴李邱被捕，分别囚禁。他们不约而同认为，他们反对江青、张春桥，绝对不反对毛泽东，连想都没想过。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５日，中共 中央１６号文件下发：凡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内处分的，应予撤销。黄吴李邱盼星星盼月亮，终于 盼到了云开日出。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干部政策的落实情况，邓小平说：在揭批“四人帮”中必须联系林彪。

１９７８年６月２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再一次说：要把“四人帮”揭深批透，非联系揭批林彪不可。邓小平说：林彪、“四人帮”早就勾结在一起阴谋篡党夺权。

１９７８年秋，邓小平说：有些事是毛泽东毛泽东的错误，但关键问题在林彪、江青这些人起了坏作用。……林彪、江青一伙的问题弄清楚之后，党内解决不了，就交给人民。邓小平提出在制订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同时，审判林彪、江青。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成立。

１９７９年７月２８日，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8月，邓小平提议在京西宾馆召开全国“两案”会议，把林彪、江青两个案子合起来，避免处 理上畸轻畸重。邓小平力主把林彪、江青集团合并在一起，并称“两案”，在原中央专案组材料的基础上审查。确定林彪集团由总政治部负责，总政副主任黄玉昆、 史进前牵头，从全军抽调保检法等单位的干部，在西直门总政政招待所办公。１９７９年国庆节后，陈云召开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认定林彪、“四人帮”触犯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党内审查结束，移交司法部门。

大人物一句话，黄吴李邱的牢饭不仅还得接着吃，还要上法庭“亮相”。

１９８０年夏天，中央成立“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由彭真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公安机关侦查案件，侦查结束后，应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 料、证据，一同移交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但是，“两案”却是公安机关预审的同时，公检法也在作业，美其名曰抓紧时间。更有意思的是，“两案”由党来领 导。案由党审，还叫审案吗？在这一系列完全不符合案审原则的背景下，虽然掌握军队大权，却对“两谋”一无所知的黄吴李邱，仍被特别法庭认定是林彪死党，给 予长长的刑期。如今３８年过去，黄吴李邱都已经走了，但他们的案情仍然铁板一块。整个看来，“两案”由党来领导。案由党审，还叫审案吗？

所以，掌握军队大权的黄吴李邱对“两谋”一无所知，仍被特别法庭认定是林彪死党，给予长长的刑期。

８０、　邱会作与九一三事件无关，为什么仍然被抓？

１９７１年9月１２日晚上，周恩来召集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参加人员似乎是有特别安排。黄吴李邱除了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在人民大会堂，另三位全在 各自的大院里办公。9月１２日前一天晚上的会，吴法宪参加了。吴法宪是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可是，９月１２日晚上的会议吴法宪没有参加。李作鹏、邱会作是组 员，不参加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合情合理，可是黄永胜参加，吴法宪不参加有些说不过去吧。

总之，９月１２日晚上，黄吴李邱中只有黄永胜一人被“隔离”在人民大会堂。李作鹏、邱会作直到９月１３日凌晨3时左右，才分别接到周恩来委托的电话，人民大会堂有重要会议，请现在就去。

李作鹏虽然也不清楚，但周恩来电话里要他处理山海关机场的林彪专机，所以他猜到一点情况，心里有点嘀咕。而邱会作在九一三事件前什么都不知道，猜不出周恩 来半夜召集政治局委员的紧急会议是什么内容，只是非常奇怪，这么急？听说周总理、黄永胜他们在人民大会堂修改政府工作报告，那也用不着半夜“紧急集合” 啊，会不会是倒霉的“庐山”又发作了？可是好长一段时间了，似乎都平静了。从北戴河那边的情况看，更不大像“庐山”。几个小时前，叶群还从北戴河打电话给 邱会作夫人胡敏，祝贺邱家有了大孙女，称赞邱会作给孙女起的名字好，还说女儿豆豆订婚了，要胡敏打个电话给豆豆祝贺。这个电话打了起码半个小时，看来，北 戴河不会有什么麻烦事，否则，叶群哪有心思给女儿办喜事……可是，半夜人民大会堂开什么紧急会呢？邱会作百般狐疑，被服务员引到人民大会堂会议厅，也没注 意是新疆厅还是四川厅。邱会作小声问先到的李作鹏，知道什么事吗？李作鹏说，可能是北戴河出事了。邱会作想，北戴河？林彪出事了？能出什么事呢？

9月１３日4时，周恩来向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宣布，今天晚上发生的事，你们不会感到突然吧？接着他提高嗓门说，林彪跑了，他坐飞机跑了。

９月２４日上午，黄吴李邱被通知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吴法宪想到要抓他了，因为文革以来，政治局从来不在上午开会，一般都是晚上。所以他到的最晚，安排好了“后事”。

邱会作这一天按计划要陪周恩来到首都机场送外宾。时任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处长的李连水回忆：周恩来通知，送外宾回来，他要与邱会作谈谈，看他的手势，抓还是 不抓邱会作。有传说邱会作的车开得太快，周恩来没有追上。这种说法很可笑，但为什么周恩来没有找邱会作谈话，还是个谜。也许是做做样子，布置好的警卫看到 周恩来进来后没有作手势，就按照计划，把邱会作抓了起来。

邱会作惊讶极了。在整个九一三事件中，黄吴李邱四大将中只有邱会作最“干净”，另外三位多多少少都有些瓜葛，惟独邱会作对“这一夜”一无所知。１９８０年 审理“两案”时，老战友万毅探监对他说，你没什么事，宣判完你就会出去了。邱会作相信了，连律师也没请，谁知道并没有放过他。

８１、　九一三当天，周恩来为什么召开三次作战会议？

周恩来接到北戴河８３４１部队转报的林豆豆说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彪逃跑的电话后，他返回会议室，要求所有参加会议的人不能外出，也不能打电话。同时在门 口布置警卫看守，不让里面的人出来，黄永胜就这样被“关”在了人民大会堂。一直到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从坠机现场回来，从专线电话中报回电报密码，报告机 上九人全部死亡的确切消息，周恩来才让所有在人民大会堂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政治局委员回家。周恩来秘书纪东回忆：黄永胜跑得很快，总理让我通知他 谈话，我到人民大会堂门口才追上他。周恩来与黄永胜又谈了２０多分钟的话，才放他走。

这就是说，9月１３日凌晨，周恩来通知所有政治局委员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时，黄永胜早就在人民大会堂。而吴法宪在９月１３日零时左右经周恩来同意，去了西郊 机场。他一直呆在西郊机场，直到9月１３日１３时多，吴法宪才在李德生、杨德中的“押送”下，来到人民大会堂。据吴法宪回忆录记载，周恩来、张春桥已经先 到了，他们两人同吴法宪紧紧握手，周恩来说：政治局准备集体办公。他和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和吴法宪在人民大会堂，李先念、李德生、李作鹏、邱会作在京 西宾馆，康生、江青在家里。很快，江青也来到人民大会堂，她也同黄永胜、吴法宪紧紧握手。她手里拿着一副扑克，要张春桥、黄永胜和吴法宪一起在东大厅玩。 吴法宪很奇怪，都什么时候了，还打牌！是想试一试我们的心情吗？反正我心里没鬼，打就打！就这样，我们四个人一起打牌，结果我和黄永胜一头赢了。江青看我 们没有异常的表现，就出去了。

吴法宪回忆：不久，周恩来进来，要黄永胜准备一下全军的作战部署，同时要我们通知副总长阎仲川和总参作战部人员一起来参加研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我要秘 书张叔良打电话告诉空军作战部和雷达兵部，要他们立即准备空军的战备情况和防空作战预案，向我汇报。１８时，空军雷达兵部一个处长向我汇报了雷达兵部的部 署情况，并带来了作战防空部署图。我听完汇报后，又进一步考虑和准备意见，准备晚上向周恩来和黄永胜汇报。

９月１３日２１时，周恩来召集黄永胜、吴法宪、阎仲川和总参作战部的人一起开会。首先听取阎仲川的汇报，然后听取吴法宪的汇报。黄永胜提出，南口方向没有 部署部队，这是一个空隙，应该立即调一个师去加强南口的防御。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说，黄永胜提出的这一

措施，经毛泽东批准，马上进行了实施。被架空的总参谋 长黄永胜不知道，副总参谋长吴法宪更不知道，其实早在９月１２日下午，毛泽东刚回到北京，就布置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调一个师到南口布防，黄永胜的建议早 就是马后炮了。

在９月１３日晚上的作战会议上，周恩来、黄永胜都认为，空军现在的防空部署比较恰当，特别是对苏联的防空作战部署很好，不要再作变动，主要是提高警惕，防 止空袭，防止飞机外逃，要作具体的布置，包括空军、海军、民航的一切飞机都不准起飞，不许再有一架飞机外逃，要坚决堵住一切漏洞，坚决守住空中防线。这些 都是空话，其实与南口驻军一样，早在９月１３日凌晨，北京卫戍区的部队已经进驻北京的各个机场，部队到位后，早上８时多，周恩来才对吴法宪说，已经决定对 空军、海军的机场，以及海军的码头各进驻陆军一个营，以保证安全，防止外逃。

黄永胜、吴法宪参加的作战会议开完，已经是９月１４日凌晨３时３０分了，周恩来要黄永胜、张春桥、姚文元住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要吴法宪和他住在东大厅。 而黄永胜、吴法宪仍然不知道，９月１３日下午，在他们这个所谓的作战会议之前，周恩来还召开了另一个紧急作战会议。

９月１３日凌晨到下午，周恩来派李德生到空军，纪登奎到北京军区空军，李先念、华国锋等分头到京西宾馆、海军司令部和总后勤部主持工作。并亲自打电话给 １１个大军和２９个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通报林彪外逃：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会上首先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我们要听从党中央．毛 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战备！

所有该打的电话都亲自打完了，周恩来让秘书纪东通知总参五位副总长张才千、阎仲川、王新亭、彭绍辉、陈健德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参加作战会议。这个会议总参 谋长黄永胜和副总长阎仲川参加没参加，还有待进一步查证。如果黄永胜参加了，吴法宪怎么没参加？如果阎仲川参加了，怎么他在晚上再一次参加作战会议？阎仲 川不会怀疑吗？为什么前一个作战会议不让黄总长、吴副总长参加？所以笔者倾向黄永胜、阎仲川没有参加９月１３日下午的作战会议。

周恩来在下午的作战会议上，除通报林彪外逃外，还拟定向全军发出紧急战备指示，部署了对北京地区的军队部署、京郊机场的军管，以及机动兵力的安排。周恩来 要求副总长们坚守岗位，加强值班，说他现在考虑的第一是打仗，第二是打仗，第三还是打仗。因为这时，中国还不知道２５６三叉戟上的九人是死是活。

周恩来在９月１３日白天还召开了一个具体的作战会议。因为２５６三叉戟出境后，总参、空军等有关部门报来的情报中，有一个异常情况，中蒙边境４１４界桩附 近，蒙古的雷达联络频繁。周恩来让秘书纪东通知空军、通信兵和总参有关部门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汇报，并要求带有关资料和地图。周恩来仔细看过我方和蒙方的 兵力部署、雷达分布后，初步认定，蒙军雷达活动异常，与林彪飞机有关。周恩来预感，蒙军在这个地域雷达频繁联络，有重大情况发生。提出加强这一地域的资料 搜集，认真进行分析，有什么异常及时上报。

看起来，这个会议也绕开了总参正副总长黄永胜和吴法宪。

也就是说，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当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三次作战会议，而身为总参谋长的黄永胜和副总参谋长吴法宪，只参加了一次，而且是装模作样的虚伪的一次。

８２、　九一三前一天上午，林彪为什么想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林彪一向不喜欢出头露面，更不喜欢与外国人打交道。他曾对警卫秘书李文普说：跟外国人说话要特别注意，不管你说什么，他们都会给你登报发表。所以林彪一向 慎见外宾。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曾让林彪接见斯诺。林彪曾在延安接受过斯诺的采访，而此时已经今非昔比，那时林彪是毛泽东宠爱的战将，现在他刚从摔 了跤的庐山上下来，谁知斯诺会问什么问题。林彪拖了几个月，最后还是没见。

林彪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是１９７１年６月３日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毛泽东接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林彪作陪。会见还没有结束，林彪就悄悄躲到湖南厅外面西北角的椅子上，直到毛泽东和外宾离去，他还坐在那里。

可是林彪在北戴河，却一反常态，非常关心中美关系的进展。有关中美关系的文件，如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中美间所有口 信来往，中央工作会议发的文件，总理同基辛格会谈的简报，以及总参三部编的国际问题资料，事无巨细，林彪让毛家湾统统送来。联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后，林彪认为新中国应该同美国搞好关系，这对新中国的建设大有好处，可惜中美为敌２０多年。现在美国总统尼克松主动伸出橄榄枝，我们不能再错过这个机会 了。

　　林彪几次提出他要见美国总统尼克松。９月１２日上午，林彪又说过一次，他要见尼克松。这天半夜就要“仓皇出逃”了，还有情绪关心“八竿子打不着”的尼克松？这合情合理吗？

　　惟一的解释是林彪根本就不知道当天夜里要外逃。

８３、　林彪在北戴河的最后三个月有反常行为吗？

林彪下了庐山，先到北京，然后很快就到了北戴河。

自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一直称病不出，既不批陈伯达，又不检讨。

１９７１年２月１２日，林彪到苏州养病，叶群和林立果陪同。

２、３月间，林彪到北戴河。林办工作人员都觉得奇怪，以前都是天热了才到北戴河，现在天这么冷，怎么去北戴河呢？却不知林彪是为了躲北京的批陈整风会议（华北会议）。

３月２６日，周恩来派专人将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送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批陈整风会议情况和毛泽东多次的批陈指示，以及拟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安排等。林彪表示很好，但仍不出山。

３月３０日和３１日，周恩来带黄永胜等六人到北戴河林彪处谈话，汇报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及毛泽东批示等（林彪专门有个讲话，9月被制成中央文件，都印好了，还没有下发，

九一三事件后作废。但奇怪的是也没有批判，无声无息了）。

４月１９日，林彪因北京的多次催促，终于回到北京。

４月２０日，周恩来致信林彪，送去有关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材料及毛泽东的批示，希望林副主席能出席会议，并讲几句话。林彪不表态。

４月２４日，周恩来再次报告：希望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更好。毛批示：我这几天不出门。林彪还是没有表态。

但是，林彪多次求见毛泽东，想当面谈谈，都没有回音。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

毛泽东南巡中反复说：对林彪还是要保，还是教育的方针。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而实际情况是，林彪几次要找毛泽东谈谈，毛 泽东却闭门不见。李文普说，林彪心情不好，曾要求面见主席。当时，毛泽东那边的电话至少是叶群打，我们林办有传闻，林彪想与毛主席见一下，谈一谈。但是长 时间毛泽东不作答复。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下了庐山，到南昌呆了两天，就回到北京，直到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４日南巡前，哪里都没去。毛泽东为什么一直坐镇北京？这似乎有点怪，不太符合毛泽东的性格。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毛泽东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正酝酿着一场新的“风暴”。

５月１日焰火晚会，毛泽东到了，林彪还没到，平时都是林彪先到。周恩来往林办打电话，林办秘书说，首长身体不好，上午的活动已经参加了，晚上就不参加了。 文革中上天安门是政治亮相，毛泽东出现，林彪不出现，马上国内外就会“地震”。周恩来坚持要林彪来，直到晚会即将开始，林彪才到。毛泽东虽然和林彪面对面 坐着，却没有与他打招呼，只与坐在身边的西哈努克有说有笑。电影摄影师一直等着毛林谈话再开机，却没想到，林彪闷闷地坐了几分钟，离席而去。电影根本没开 机，摄影师只是拍了一两张照片，周恩来为此着了一阵子急，但是也毫无办法，只好用了一张平时根本不可能用的新闻照片。从这张照片看，林彪低着头，满脸病 容，毛泽东与西哈努克有说有笑，仿佛林彪根本不在场一样。

６月９日，为了能见到毛泽东，林彪到钓鱼台“讨好”江青。江青借机要给林彪照相，林彪一向讨厌照相，更讨厌江青，但此时他不得不低头。林彪根本没有照相的 准备，连胡子都没刮，借江青秘书杨银禄的刮胡刀刮了胡子。可江青“麻烦”，照了一遍又一遍，反来复去，这才照了那张看“宝书”的大照片，登在《解放军画 报》７、８期合刊上。

可是，林彪就是这样被江青折腾，还是没能见上毛泽东。

６月１５日，林彪乘专列到北戴河，到９月１３日差两天三个月。除了八一建军节前坐飞机到北京参加八一招待会外，林彪一直封闭在北戴河，哪里也没有去过，也 没有主动和任何人接触。据在北戴河警卫林彪的８３４１部队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说：我们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象，只是觉得我们保卫的这位副主席从庐山下来后， 情绪不那么好，整日愁眉苦脸，不见一丝笑容。他外出活动原本就很少，这一段就更少了。

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说：事先没感觉林彪搞政变。他那个身体，白天晚上，觉也睡不好，

成天蹲在房子里不出来。

九一三事件前，林彪嗓子有点痛，为了能让林彪在国庆节发表讲话，３０１医院派了几个耳鼻喉科专家来给林彪看病。不久前，我见到了最后给林彪看病的常汉英教授，她说：毛主席怎么选这么个接班人，林彪这样的身体怎么能够接班？

当然，在现代化条件下，蹲在房子里不出来，也一样可以搞“政变”。可林彪林彪在北戴河，不仅很少外出活动，更不打电话，也没有接过电话。林办秘书说：林彪 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电话，一般电话都不接。电话都是叶群“专利”，就是周恩来打给林彪的电话，也常常被叶群截住。

不接电话，不联络人，林彪怎么搞“政变”？怎么能当“政变”的统帅？一个人就搞成政变吗？换句话说，林彪天天“窝”在房子里，像搞政变的架势吗？

８４、　林彪、叶群和林立果是一回事吗？

按说，林彪、叶群、林立果是一家人，一家人还能不是一回事吗？

但很多事实证明，叶群、林立果在骗林彪。

１９７０年春夏，林立果从庐山下来后，和周宇驰等人商量，争取和平过渡，但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除了写个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在上海空４军组建教 导队外，林立果还到深圳、沙头角拍摄了大量的地形照片，并察看了九龙的地形。到目前为止，林立果的这些行动，并没有林彪知道的证据。

林立果的“三个方案”，上策暗杀毛泽东，中策南飞广州，下策北飞苏联。毛泽东南巡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想在南方暗杀的“上策”还没有出笼，就夭折了。他方 寸大乱，马上让周宇驰等人商量“中策”，到广州另立中央。林立果则飞回北戴河，准备９月１３日早晨分别飞往广州。９月１２日晚上，王飞等人在空军司令部大 楼召集会议，拟定南飞广州的名单。会议开到一半，因周恩来查问西郊机场的飞机，也匆匆夭折。最后，只剩下“下策”——北逃苏联了。

叶群知不知道？林彪知不知道？

江腾蛟出主意，叫林立果调关光烈来北京，商量调火焰喷射器。叶群不知道，她质问王飞：为什么叫关光烈到北京？你找他有什么用？谁让你们找的？这说明林立果和叶群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叶群是否完全知道林立果的“两谋”，似乎也要打上一个问号。

至于林彪，对一切事情都不闻不问，他知道林立果的“两谋”吗？他向谁布置政变了吗？他有关于政变的指示吗？一切都没有证据。按照张清霖的说法，他们这一家三口人，是一个骗一个，叶群骗林彪，林立果骗叶群，而林彪什么都不知道。

是谁在鼓动林立果？林立果在北京“热火朝天”时，北戴河却一切如常，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参与“两谋”，也没有一个人揭发出林彪搞政变的阴谋。否则，１９７５年结束的

团河学习班“学员”不可能都分配工作，有军籍的林办工作人员仍由总政治部统一分配。

９月１２日，林豆豆想了解北京捎来什么东西，问李文普，天冷了，有没有带棉衣？有没有到银行取钱？李文普说得很肯定，没有，什么也没有带。

就这样慌慌张张逃跑国外吗？

８５、　林彪手令”怎么会有横竖两张？

九一三事件前见过“林彪手令”的人比见过《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人多，现在不少人还活在世上。可是，人们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林彪手令”有两个。这不 奇怪，因为除了林立果和周宇驰外，没有人同时见过两个“林彪手令”。出现在法庭上的，是周宇驰身上的那个，撕毁后又被拼起来的“竖的”。周宇驰身上的这张 “林彪手令”被拍成照片，作为林彪“发动武装政变”的“铁证”，广为宣布。林立果身上还有一张“横的”，被他带上２５６三叉戟，至今仍不知在何处。这个 “横的”看到的人很少，但至少胡萍和关光烈看见过。

林办秘书于运深第一个看到“林彪手令”，那是林立果刚从北戴河飞到北京的那个晚上，于运深认为是叶群与林立果之间有矛盾了。这时可能还只有一个“林彪手 令”，于运深看到的是“竖的”，而且也没有夹在红本子里。很快林立果发现一份“林彪手令”不够，因为林立果和周宇驰经常要分开活动，需要一个人拿一个当 “圣旨”，于是再“创造”一份。“林彪手令”上写两个人的名字，与“林彪手令”有两个一样，对谁有利呢？这是不言而喻的。

为什么弄成“竖的”和“横的”？一模一样不更好吗？或许是忙，没想那么多的细节？也可能是先写了一个“横的”，不太像，再模仿一个“竖的”。模仿也不那么容易，先模仿的“横的”也没舍得丢掉。

９月１２日傍晚，林立果在去北戴河前，从上衣兜里掏出来的一个小红皮本，小红皮本里夹着一张“横的”给胡萍看。这个小红皮本，大概是讲用报告。在坠机现 场，孙一先看见过，说明没烧掉。因此可以推论，夹在小红本里的“林彪手令”肯定也没烧掉。但是孙一先看时，小红本里已经没有“林彪手令”。可以认定，这个 “横的”被苏联人拿走了。虽然现在没人提起，但愿它早日“浮”出水面。

林彪会写两个“林彪手令”吗？

“林彪手令”上只有一句很含糊的话，“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按什么“命令”办？含含糊糊，还不是凭他们的一张嘴胡说。“林彪手令”的内容究 竟是什么意思？“林彪手令”是真实的吗？是谁写的？写给谁的？为什么会有“横的”和“竖的”两种“林彪手令”？文革后林彪几乎很少动笔，文件圈阅也常常由 秘书代笔，怎么可能一连写两张“林彪手令”？如果是林彪写的“林彪手令”，也不可能写两个；就是写了两个，也会毁掉一个，不可能让林立果把两个都拿走。

被周宇驰撕毁的还有林彪的一个“亲笔”纸条，是写给王飞转交黄永胜的。黄永胜在法庭上否认看见过这个纸条，王飞也否认看见过这张纸条。这个纸条与周宇驰无关，怎么会在周宇驰身上？这是不是也能为两个“林彪手令”做点注脚呢？

８６、　林立果回北京看牙，为什么要瞒着林彪？

１９７１年9月8日，李文普说：林立果突然去北京看牙，叶群对我说要瞒着林彪。林彪并没问林立果到哪里去了（因为这一家人并不是天天见面，几天不见的事情 是家常便饭）。晚上，林立果从北京打电话，说平安到达。我马上报告林彪、叶群、林彪点头说好。当时我感到林彪是知道的，叶群有意说假话骗我。

在当时，林立果到北京看牙是件平常的事，9月2日林立果就到北京看过牙。只因为他在北京策划政变，才使他回北京成了“政治”。而当时李文普不可能拿“政 治”眼光去想这件事。所以李文普的这段话非常矛盾，林立果到北京看牙，叶群为什么要瞒着林彪？既然叶群要瞒林彪，对李文普又有交代，李文普就不可能当着林 彪的面对叶群说林立果平安到北京了，他敢违背叶群的意思？本来李文普和叶群的矛盾就很深，要是依着叶群的意思，早把李文普赶走了，只是林彪已经习惯了李文 普，不放李文普走，叶群没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李文普当着叶群和林彪的面说了林立果回北京看牙，你李文普只是感到林彪知道，林彪一向宠辱不惊，面无表 情，林彪听明白了吗？真的知道吗？就是林彪知道林立果到北京看牙，又有什么呢？他知道不知道林立果借看牙到北京搞“两谋”呢？

张清霖回忆：9月8日，林立果跟林彪说回北京看牙，林彪不让去，只让守在北戴河，所以林立果是悄悄走的。叶群知道，在林立果走之前与林立果谈了半个小时。我当时与杨森（空军保卫部处长）商量把林立果扣住，杨森不表态，就算了。

如果真把林立果扣起来，林彪会不会出逃？九一三事件会向怎样的方向发展？

可是，谁敢把林立果扣起来？张清霖如果敢，他可能就不会与杨森商量。与杨森商量，如果杨森同意，那么杨森就要负责任，杨森哪里负得起这个天大的责任？

其实，最主要的是北戴河没有人敢对林彪说！

８７、　“林彪手令”是林彪写的吗？

“林彪手令”是不是林彪写的？因为“林彪手令”一直没有拿到公安部请专家鉴定，最后审理“两案”时是由总政保卫部鉴定的，因此很值得怀疑。

这里有一个问题，林彪在北戴河见过周宇驰吗？不错，周宇驰去过北戴河，但据林彪警卫秘书李文普和林彪内勤小陈、小张说，林彪在北戴河没见过周宇驰。

既然林彪在北戴河没有见过周宇驰，怎么可能写个纸条委托周宇驰呢？

从林彪的性格推断，不可能是林彪写的。林彪口述非常具体，而这个“手令”太含糊，照什么

办？不知道。而且用了个“盼”字，更不像林彪一贯下命令的口气。在 军界林彪从来没有当过副职，下命令从来是死命令，军令如山倒，坚决果断，从不说“盼”，也不可能用“盼”。“盼”有乞求、商量的意思，这倒像是没当过主官 的人在乞求什么。从“林彪手令”的内容看，明显是拉大旗作虎皮。

如果真是林彪的“手令”，为什么掌握军中大权的黄吴李邱没有动静？黄永胜调动了多少部队？邱会作准备了多少炮弹？都没有。更为可疑的是，林彪不向掌握军权的黄吴李邱下令，却让“娃娃们”拿着他的“手令”招摇，这可能吗？

林彪平时写字用白纸，军委办公厅服务处发的那种白纸，没有天地，削好的铅笔，字的大小一样。拼起来的“手令”让黄永胜看，那时黄永胜还没关起来。周恩来 问，像不像？黄永胜说又像又不像。周恩来也说，就是又像又不像。林豆豆是在审查她时第一次看到“林彪手令”，她说“像”，坚决不说“是”。别的事情或许可 以让步，但这件事决不后退，这是最后的底线。江腾蛟在法庭上两次说，他见到的“林彪手令”与出示的这份被周宇驰撕碎再拼起来的“林彪手令”不一样，字体不 像，他见到的“林彪手令”字更草一些。林办秘书也说，像林彪的字，还是“像”。

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说“像”？因为有人能模仿林彪的字，还不止一个人，这在林办不是秘密。林彪秘书李根生能模仿，张云生在回忆录中专门提到叶群让秘书李根生 模仿过。叶群说首长交代什么，李根生哪里敢去找林彪对质，只好乖乖模仿。叶群好捣鬼，经常盗用林彪的名义，所以她“鼓励”秘书学林彪的字。林办秘书有共 识，不能轻易模仿。李根生当时不在北戴河，但林办还有好几个人能模仿林彪的字。叶群自己就练过，林立果和周宇驰、于新野也练过，林立果练过好长时间，他们 几个都会仿。“手令”上的签名最像。熟悉林彪字迹的人中，有好几个人认为“林彪手令”不像林彪写的，林彪的字更草一些，倒像是林立果模仿的，比较生涩。

关光烈说：林立果给我看的“林彪手令”是“横的”，我认为是林立果仿的。关光烈曾任林彪秘书，他知道叶群叫他们学林彪的字，谁敢学？领袖的字，不敢学，后 来听说李根生学了。以后关光烈问李文普，“林彪手令”是谁写的？李文普说，可能是林彪写的。关光烈说，有人会写吗？李文普说，没人写。关光烈不相信，不会 写？怎么有多少个“林彪手令”？这就有假。林立果给我看后收起来，能干这种事？我看的，林彪不用红笔写，用铅笔写。文化大革命前关光烈给林彪当过多年秘 书，那时林彪身体还好，经常自己批字。关光烈熟悉林彪的笔体，他怀疑“林彪手令”有理由。林彪写字特殊，快。林彪的字就是他的字，有特点，别人写不了，只 有林彪才有这个风格。

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曾见过周宇驰在苦练林彪的签名，他当时还奇怪，练那个干吗？９月１２日晚林立果去北戴河前给胡萍看“林彪手令”。胡萍生前曾亲口对我说， 咱们看不出来，就看过题词，林彪本人的笔迹咱们也不接触。很明白的事，现在看，（手令）是假的，我写材料也写过。胡萍说：有一次在机场，周宇驰跟我讲起开 车，他有目的，现在想才有问题。周宇驰说，吴法宪不让我们开车，后来首长（林彪）对这事写了个命令。他就喊程洪珍，你把这材料拿来，红铅笔写的，３２开纸 那么大（手令也那么大），给胡萍看，五、六行字，前头写立果、宇驰，具体内容我记不得了，意思是开车在军事上有好处，掌握一门技术重要，这么个内容。下面 是林彪签名。当时胡萍不理解，开车这样的小事还要林彪说话？九一三事件后才明白，这个意思是叫他看是林彪亲自写的，先让你看这个东西，再叫你看“林彪手

令”，你不会怀疑。良苦用心，迷惑你，谁想到？胡萍说，所以我说这个“林彪手令”是假的，打着林彪旗号。

８８、　林彪知不知道林立果的“三个方案”？

林立果的“三个方案”，版本是谁的？存疑。内容是：上策谋杀毛泽东，中策南逃广州（香港），下策北逃苏联。现在看，上策和中策似乎是林立果的主意，下策似乎是叶群的主意。叶群去过苏联，会俄语。

李伟信交代：林立果说首长知道“三个方案”。

可是，林彪到底知不知道，没有证据。林彪没有给任何人布置过“三个方案”，也没有任何人包括时刻不离林彪左右的内勤小陈、小张听到过林彪说“三个方案”。 据林豆豆说，９月７日在她与林立果的谈话中，她曾问过，形势真的有那么糟？首长的态度怎么样？他知道吗？林立果说，首长还不知道，事情没考虑成熟前，不能 跟他说。

林豆豆是什么时候知道林立果的“三个方案”的？

９月７日上午，林豆豆刚到北戴河，还没有见到林彪，就被林立果拦在５８楼开车接走，林豆豆问，为什么叫我来？林立果说，主席在南方打招呼，主任（叶群）想 跑到苏联，当寓公，写回忆录。林豆豆问，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林立果说，主任不让告诉你，跟谁也别说。那为什么林立果还要与林豆豆说？是想看看她的态度，拉 她一起骗林彪？或在与叶群意见不一致时，希望林豆豆站在他一边？还是在林彪那里碰了钉子，要林豆豆说服林彪接受他拟定的行动方案？在他们三个人中，林彪最 信林豆豆的话，他觉得林豆豆从不骗他。总之，林立果对林豆豆“和盘端出”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林立果和叶群决定走，往哪里走？去苏联？去香港？林彪是否知道？怎么把林彪弄走——劝说？绑架？诳骗？显然，林立果的方案还在酝酿中，还相当不成熟，希望 林豆豆参与意见，也希望林豆豆与全家一起出走，更希望林豆豆站在他一边，一齐对抗叶群。林立果的“摊牌”，把林豆豆吓了一大跳。她马上表示反对。认为哪也 不要去，就呆在北戴河最安全，像朱老总那样当甩手掌柜。林立果说，有人要害首长，老头“猴”一样，关不了三个月，就没命了。谈了半个小时，姐弟俩谁也没有 说服谁，下午２时又接着谈。本来林立果９月７日就要回北京的，因为林豆豆的反对，这一天他暂时没走。但林立果决心已下，他认为形势非常不利，毛泽东要把林 彪抛出来了，坐着等死不如主动出击，说不定还有一线希望。他决定到北京看看形势，实在不行就鱼死网破。林豆豆不同意，并劝林立果不要到北京去，但林立果听 不进去。９月８日晚８时左右，林立果在回北京前，又来“争取”林豆豆。但姐弟俩坚持自己的观点，还是谁也没有说服谁。

在林豆豆劝说下，林立果当天没有返回北京，而是推迟了一天。

众所周知，林立果在九届二中全会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到南方看地形，乃至策划杀害毛泽东。叶群的言行呢？林彪的言行呢？却无人知晓。中共党史专家认为：迄今为止，不知道林彪与“联合舰队”有无联系，有关文件没有在这方面提出过确凿证据。

而毛泽东从庐山上下来却一直在紧锣密鼓，掺沙子，甩石头，挖墙角，到南方奔走，忙个不亦乐乎。
１９８４ 年５月，汪东兴对访问者说，毛主席南巡时主要讲林彪的问题。……每次谈话我都参加了，每次都谈庐山会议，说这是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显然，毛泽东对庐山会 议上的问题作了十分严重的估量，对华北组第六号简报作了十分严重的评价，而且认为事情还没有完结。他这次到外地，没有告诉林彪，这是与过去的做法不一样 的。在外地的谈话内容，不仅没有在中央会议上谈过，没有同林彪谈过，而且要求绝对保密。

在毛泽东眼中，不仅仅是林彪，黄吴李邱也成了眼中钉肉中刺。林彪没有动静，黄吴李邱就有动静吗？到最后的“两案”宣判，黄吴李邱每人的三条大罪中，都与“两谋”无关。

汪东兴说，黄吴叶李邱等人迟迟拿出来的检讨书，其实是敷衍了事。是这样吗？毛泽东南巡前，对黄吴叶李邱的检讨作了批示，除了吴法宪，他们都过了关。毛泽东 对邱会作说，你这个检讨是你自己写的吗？邱会作说是，毛泽东说，我死了以后，你就当国家主席吧。从口气中听不出讽刺，倒有一种赞赏。毛泽东在北京曾亲口对 黄吴李邱说，你们的检讨到我这就为止了。几个人都非常高兴，专门到京西宾馆吃了一顿饭表示庆祝。这之后，除了吴法宪和叶群似乎日子还难过外，黄永胜、李作 鹏、邱会作都一身轻松，以为庐山会议的检讨真过了关。所以当李作鹏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那里得知毛泽东南巡讲话时，非常震惊，第一个反应就是，不是说没事了 嘛，怎么又“兜”出来了呢？而且“纲”上得更高了，矛头似乎指向了林彪。

毛泽东周游南国，会见“各方诸侯”，不仅点了黄吴叶李邱的名，还点了林彪。说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说过了头嘛。什么 “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说穿了是树他自己。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 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要动军队干坏事，听你的？毛泽东在杭州说，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 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陈伯达搞的是反革命游说，我搞的不同。

作为党主席，就能到处游说，搞掉党的惟一的副主席吗？到底谁在搞阴谋诡计？！

８９、　叶群为什么叫林豆豆等人到北戴河？

９月５日晚，叶群从黄永胜那里得到毛泽东南巡的谈话内容后，连打了好几次电话，要林豆豆到北戴河。林立果也给林豆豆打了电话，劝林豆豆到北戴河。

林豆豆不想到北戴河，她想和叶群保持距离。而且叶群一直不希望林豆豆在身边，怕她到林彪那里说她的坏话。现在突然如此热烈地要求林豆豆到北戴河，甚至带着强迫的意味，让林豆豆很惶惑。

叶群和林立果的电话谁先谁后？电话里是怎么说的？把林豆豆叫到北戴河是谁的主意？林彪的？叶群的？林立果的？为什么叫林豆豆和张清霖、张宁一块去北戴河？

不知道叶群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突然叫林豆豆到北戴河？林豆豆分析：叶群的目的是让林彪

看看张清霖和张宁。7月叶群见过张清霖一次，当时张清霖感觉叶群对他挺满意，叫他到协和医院进修四年。

这一段时间，林豆豆和张清霖关于恋爱一句没说，林豆豆跟他谈了不少事，毛家湾怎么“联合”起来骗林彪，怎么背着林彪修游泳池，毛家湾前盖房子，就在眼皮底 下，林彪却不知道。林豆豆还领他看叶群的长廊。张清霖越听越害怕，上边和下边相差太多，上层太复杂。知道得越多，张清霖越不想呆在毛家湾，更不想去北戴 河。

过去也发生过突然叫去的事情，倒也不觉得太意外。林豆豆身体一直不好，这两个月，又能吃又能睡了，身体还好。但这个夏天她不准备去北戴河，而且这时林豆豆正在“倒霉”，非常不舒服，不想动。

林豆豆一百个理由不想去北戴河。

可是叶群一再命令，并要准女婿张清霖和准儿媳张宁也一齐到北戴河。还要求他们坐飞机去！怕林豆豆不来，叶群骗她，说林彪病得快不行了，你还不来看一看父亲，再不来就看不上了。这最后一着杀手锏起作用了。

这样，9月8日上午，林豆豆和张清霖、张宁一起到西郊机场，坐飞机来到北戴河。林豆豆哪里想到，一个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就要发生了。

９０、　林豆豆为什么不敢向林彪报告？

林豆豆9月7日刚到北戴河，还没有进安排好的房间，就被林立果拉走了。林立果迫不及待地向她讲了毛泽东南巡批林的内容，并粗略地讲了“三个方案”。林豆豆吓坏了，一切她都没有想到，但是她的头脑还冷静，立即表示了反对。尤其对林立果的激烈想法，更是一百个不赞成。

林立果本想乘送林豆豆他们来的那架三叉戟飞回北京。由于林豆豆的反对，林立果推迟了一天回北京。 9月7日中午到北戴河的三叉戟空机返回北京。

虽然林豆豆一到北戴河就立即知道了林立果的阴谋，但她没有向林彪报告。她当时的想法是，如果她向林彪报告了，林彪会马上追问叶群。以前有过多次教训，林豆 豆报告林彪后，林彪马上去问叶群，叶群就整林豆豆，甚至逼她自杀过。所以，没有证据，林立果和叶群都不承认，叶群反过来会置林豆豆于死地。而且林立果还只 是设想，报告林彪，徒惹林彪生气。林彪那种身体，再经不起刺激，准大病一场。

在林办帮助过工作的官伟勋说：林豆豆曾对他说过，叶群严格限制她与林彪接近，以免她向林彪透露叶群封锁林彪的、不想让林彪知道的东西。林豆豆说，刚开始我 想多给他（林彪）讲一点情况，开始还可以，后来越来越不行了。一是叶群限制得越来越严，再就是林立果知

道了也不高兴。所以我有时去北戴河，都不能在那里多 住，多住几天，李文普他们就催我走，说再不走，林立果有意见。还有就是，你给他（林彪）讲什么，过一会儿他就忘了，忘得干干净净。有一次我告诉他（林彪） 一件事，我嘱咐他（林彪），千万不要跟叶群讲。我刚走，他（林彪）就忘了。忽然想起这件事，把叶群叫来问是怎么回事。叶群一听就知道是我讲的，下来对我又 是骂又是打，把我整了一顿。从那以后，我就更不敢给他（林彪）讲什么事了，他年纪大了，记不住。

９月７日，林豆豆曾一度决定向８３４１部队报告，但她很快又决定不报告了，最好能在林办工作人员中把问题解决。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再也没有机会了，这是最后一次！

９１、 《五七一工程纪要》是怎样被发现的？

林立果怕万一和平不成，早就做了第二手准备。１９７１年3月２１日至２４日，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在上海密谋，由于新野执笔，草拟了《五七一工程纪 要》。这只有很少的人知道，据江腾蛟说，他都不摸底。王飞也说在九一三事件前他没有见过这个东西。李伟信没参加讨论，他在门口转来转去，倒个水什么的。因 为李伟信是林立果从上海空四军调来的，与空军机关很少接触，空军副参谋长王飞问这是什么人？周宇驰对他讲，这是上海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的副处长李伟信，搞 录相技术的。在九一三事件前，见过《五七一工程纪要》还活着的人只有他了。

９月１３日晚，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吴忠审问了李伟信。他跟周宇驰、于新野坐直升机逃跑未遂，三人商量自杀。周、于自杀了，李伟信放了空枪，被抓获。他 交代有一个《五七一工程纪要》，吴忠听不懂，他当时只想审清李伟信为什么要叛逃，根本想不到还有一个大阴谋。吴忠拍着桌子骂，你他妈的胡说什么，什么工程 不工程的。吴忠审完李伟信，对吴德说，这小子他妈的太不老实。周总理打电话问收缴到什么东西。吴德报告，外逃的直升机上还有一些材料，写着“Ｂ－５２”、“眼镜蛇”一类，我们都看不懂。录音也听不懂，碎纸片也没有对出来。我们不懂这方面的技术，工作很慢。周恩来说：你告诉公安部，由他们派人解决。公安部部 长李震、副部长于桑来了，经过公安部技术处理，录音和碎纸片很快都弄清楚了。

９月１５日傍晚，空军学院林立果的“据点”没人了，报纸仍然放在门口。送饭的人进去发现一个红色的拉链本，交给行政处副处长王兰义。王兰义翻开第一页，也 看不懂，把本子交给处长张帆。张帆随手放进办公室的柜子里，也没锁。因为他们都是学习班临时任命的几个干部，当时上边都乱了，没人管，也不知道交给谁，更 不知道“主人”还会不会回来，总之没太当回事。9月１６日、１７日吴忠带人来，是张帆接待的。传达５７号文件后的午夜2时，张帆把本子交给政委殷古风。 １０月8日晚１９时半，空军学院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任安平、政委殷古风写了一封信给空军政委王辉球和副司令员曹里怀，今送去关于王兰义收存和上缴叛国分子 林立果笔记本子调查报告一份，并附有王兰义本人的交代和揭发材料。请阅示。王辉球、曹里怀当即报告周恩来，这就是《五七一工程纪要》。

这里疑点很多。林彪飞机刚飞出国境后，周恩来就下令切断了通往林彪办公室的所有电话，包括北戴河的电话。而且命令毛家湾留守的８３４１部队二大队占领制高 点。有材料说，第二天林立果在北京的五个据点也由卫戍区派出了部队搜查。那么，这个神秘的小本子怎么可能堂而皇之放在桌子上？怎么可能过三天后才发现这个 小本子？空军学院的“据点”里面

乱糟糟的，该烧的都烧了，连避孕套都扔到火堆里，为什么独独留下如此重要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小本子？

在这个“据点”里，李伟信是最后收拾残局的人，可据他交代，《五七一工程纪要》写成后，他没有见过。是真没有见过吗？李伟信是活着的人中惟一交代有《五七 一工程纪要》的。如果他也没看过，那九一三事件前就没有活着的人见过《五七一工程纪要》了。写有《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本子摆在如此显著的位置，生怕别人看 不到，这很像有意安排。李伟信是“据点”里最后走的，他怎么会没有看到？如果李伟信没有说谎的话，是不是可以这样设想，是林立果身边的“眼线”故意放的， 他虽然把《五七一工程纪要》汇报了上去，甚至复制了。但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东西，总要有个出处吧？所以故意放在那里，让群众发现。

林彪知不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

官方认为林彪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但惟一的根据是李伟信的交代：林立果说首长（林彪）叫先搞个计划。除此之外再没有证据证明林彪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

林立果一向拉大旗作虎皮，因此林彪十之八九被蒙在鼓里。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五七一工程纪要》没有人见过定稿，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定稿呢？空军副参谋长王飞说，里面的话很多像是周宇驰说的。

据党史专家分析，《五七一工程纪要》里有的话老谋深算，有的话相当幼稚。

王年一说，假如林彪看过，他会不会同意，这是不难推断出来的。

９２、　毛泽东南巡从什么时候开始警觉？

１９７１年8月１４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南巡。之所以选择这个日子，是因为毛泽东要等周恩来回到北京，才开始他的南巡。在毛泽东南巡前，周恩来安排了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8月9日，周恩来陪来华访问的缅甸总理奈温访问广州。临走他致信毛泽东：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毛的护士长）同志以保密电话告我，或告（王）海容转告。

8月１２日，周恩来返回北京，下午他到毛泽东处汇报，并请示四届人大的召开时间。毛泽东告诉他，国庆节后召开四届人大。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 达毛泽东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指示。会议决定由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组成筹备小组，着手各项准备工作。并于近期由周恩来率张春桥、黄永胜、李先念、纪登奎 五人去北戴河向林彪作工作汇报。

就是说，国庆节后召开四届人大的信息要当面告诉林彪，看你还按兵不动！

8月１６日，除李先念外，周恩来等赴北戴河。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分别向林彪汇报了宣传、党务、生产、军事等工作情况，周恩来汇报了国际形势。汇报结 束，周恩来说根据毛泽东提议，党中央决定在国庆节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各项准备工作正逐步展开。

８月１８日，按部就班南巡的毛泽东突然离开武汉，曾思玉赶到东湖宾馆，问汪东兴，怎么主席突然要走？汪东兴说，主席历来是说走就走。毛泽东南巡到南昌，行 动明显急了。时时警惕的毛泽东更加草木皆兵，突然改变行程，连汪东兴都认为毛泽东有些做法不合常规。当然啦，毛泽东认为林彪得知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召 开的确切消息，而他南巡又说了林彪那么多坏话，双管其下，他认为林彪必有所动。
但是，林彪在北戴河没事人一样，稳如泰山。

８月２７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稿和会议召开方式的改进意见，即会前召开人大常委会和预备会议，不公布代表名单等。

８月３１日，周恩来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纲。

９月２日，毛泽东在南昌同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谈话。程世清讲到三点：７月周宇驰曾两次到南昌，并运来一辆水陆两用汽车，要江西仿制。７月底他用飞机把水陆 两用汽车拉走了。程世清还谈到林豆豆对他说，你见主席也说说，叶群好多事包括到政治局开会，瞒着首长（林彪）。林立果也不知在下边干些什么。

毛泽东没有说话，望着窗外若有所思。

９月３日零时，毛泽东专列到了杭州，停在笕桥专用线上。一直陪毛泽东南巡的汪东兴在毛泽东与各地负责人谈话时都在座，并和华国锋追记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 这个谈话内容经毛泽东改过，专送在北京坐镇的周恩来。汪东兴说："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但毛主席并没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 人家没有作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

９月４日，周恩来收到由汪东兴和华国锋追记的毛泽东讲话稿。

不知道这是不是毛泽东在试探周恩来。因为毛泽东南巡半个多月了，还是没有人敢把毛泽东南巡谈话的消息透露给林彪，林彪在北戴河雷打不动。周恩来与林彪走得很近，这个谈话矛头直指林彪，周恩来会不会成为告密者？毛泽东此举一箭双雕，既"动"了林彪，又考验了周恩来。

周恩来当然明白毛泽东的意思，在毛林之间，他要站在毛一边。

９月６日，周恩来不动声色，主持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稿。

周恩来经受了毛泽东的考验，守口如瓶，但终于有人密告了林彪。

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和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分别透露了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这样，"蛇"也动了，"虎"也动了。一生中有着丰富军事、政治斗争经验的７７岁高龄的毛泽东，有着敏锐的嗅觉，对付林立果这个毛孩子和叶群这个妇道人家，简直易如反掌。

９月８日晚上，林立果回到北京。

就在林立果从北戴河回到北京积极“活动”的这个晚上，周恩来一切正常，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文件，次日送毛泽东。

而毛泽东紧急了。据汪东兴的说法，杭州有知情者暗示毛泽东，杭州有人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碍事”，一些多次接待过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

不过，可以肯定，毛泽东肯定还有另外的情报渠道。

毛泽东当机立断，９月９日凌晨，他突然让专列转移到绍兴。９月１０日毛泽东吃过午饭，又突然要离开杭州，他似乎知道杭州空五军政委陈励耘的“活动”，对他 分外警惕。说不通知陈励耘。汪东兴说，不通知不行，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毛泽东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汪东兴说，那也不行，会打草 惊蛇，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毛泽东打断，还有一个，空五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于是，毛泽东与他们谈话半小时。汪东 兴调专列，１６时毛泽东专列开出杭州。临走，没通知任何人，据汪东兴说，但陈励耘来了。他没让陈励耘上专列与毛泽东告别。
２２时，专列抵达上海。虽然上海准备好了住处，而毛泽东到上海一向是要住宿的。但这次毛泽东就住在专列上，汪东兴对附近的油库也加强了警卫。要不是等下乡的许世友等了１５个小时，毛泽东当天就会离开上海。

９月１１日，周恩来与奉毛泽东之命，专赴长沙听毛泽东谈话的华国锋见面，然后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有人说周恩来不知道毛泽东南巡讲话，有书面文件，有当面 谈话，又有汪东兴的通报，铁证如山，周恩来怎么可能不知道！看来，在九一三事件中，毛泽东是要周恩来当他的同盟者。

９月１１日中午，毛泽东和许世友、王洪文谈完话，让他们去吃饭，然后谁也没告诉，突然离开上海，“归心似箭”，一路驶回北京。

按毛泽东计算好的时间，他应该是天黑后抵达北京的。但是，在济南没有见到杨得志，杨得志下部队去了，赶不回来。所以９月１２日中午，毛泽东专列抵达北京丰台车站。

在专列上，毛泽东与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谈话，把他南巡一路的讲话又讲了一遍。毛泽东说：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人，陈的后面还有人。谈话结束，毛泽东让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在南口布置一个师，张好了“口袋”，守株待“兔”。

随行的汪东兴将毛泽东到京的情况报告周恩来，并报告了叶群。

林立果１６时左右还一切如常，甚至回毛家湾洗了个澡。但得知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后，林立果慌了。１８左右２５６三叉戟机组接到命令，飞往北戴河。林豆豆报告８３４１部队后，周恩来打电话给叶群查问飞机，并要到北戴河看望林彪同志。北戴河终于慌慌张张地“动”了！

一切如毛泽东之意，毛泽东真是料“敌”如神啊！

９３、　谁是毛泽东安插在林立果身边的“眼线”？

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是从什么渠道打听到的？是故意泄露？还是林立果真有“眼线”？

毛泽东离开上海，王维国电话告诉了林立果。离开上海，不一定马上回北京，路上还可能停留几个大城市，比如济南，比如天津。本来毛泽东到北京还会晚一些，据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准备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汪东兴打电话一问，杨得志下部队了，专列就没有在济南停更长时间，直接“杀”回北京。

毛泽东返回北京极其机密。那么，谁能知道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了呢？除了毛泽东身边的人，别人不可能知道，林立果也不会例外，借给他三头六臂他也不可能知 道。9月１２日下午，林立果曾打电话给留守毛家湾的８３４１部队二大队值班员，说给他烧洗澡水，他要回毛家湾洗澡。那时家里很少有澡堂，烧热水也是一大难 事，所以林立果洗澡大都是回毛家湾，但要提前通知烧澡水。１６时左右，林立果回到毛家湾洗澡。9月１３日凌晨１时左右，中办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 的张耀祠突然打电话给毛家湾，二大队副大队长蒋廷贵从梦中惊醒。张耀祠劈头就问：林立果在毛家湾吗？蒋廷贵说在，张耀祠问：是在吗？！蒋廷贵说，是在啊， 他下午要洗澡，让我们给烧洗澡水。张耀祠说：不对，你去看看。蒋廷贵有些犹豫，以前从来不到保卫对象家中，尤其是半夜，怎么可以进首长家中看呢？张耀非常 果断地说：叫你去看，你就去看，怕什么？快点。蒋廷贵说是，立即到值班室，值班员说，林立果下午洗完澡就走了，一直没回来。张耀祠听后说，人家都跑了。我 命令你，立即进入一级战备。……

如此这般，林立果下午还从容洗澡，肯定是得到毛泽东回到北京的消息才紧张起来的。那9月１２日下午，是谁向林立果报告毛泽东回到北京的呢？当时并没有人因 密告毛泽东行踪而当成林彪死党被关押，并且至今没有见到媒体披露。这个不太正常，毛泽东秘密回到北京，局外人不可能知道，如果毛泽东身边的人把毛泽东回北 京的消息透露给了林立果，马上就是一条大罪状，怎么可能让他逍遥法外呢？是毛泽东故意把秘密回到北京的消息透露给林立果，就是要“打草惊蛇”，就是要让林 立果“跳”起来？

毛泽东真正紧张是9月8日在杭州，而这时正是林立果从北戴河坐飞机到达北京开始策划“两谋”的时间。为什么林立果9月8日晚飞回北京刚一“动作”，深夜毛 泽东在杭州也“动作”了？把专列调离杭州。林立果计划南逃广州后，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另立中央。而毛泽东偏偏让广州军区也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 他的南巡讲话。包括毛泽东对陈励耘，汪东兴对上海虹桥机场油库的戒备等，决不是巧合，肯定有人通风报信。

林立果的活动范围非常小，他也非常注意保密，外人插不进脚。这说明在林立果这个小圈子里有“特务”，是谁？很多人也在怀疑。或许还不是一个。周宇驰、于新 野肯定不是，因为他们那么坚决地自杀，说明他们是“铁杆”。林立果信任的左右手是周宇驰和刘佩丰。其他围在林立果身边的其他人就很难说了。是谁报告远在杭 州的毛泽东？有人说是程洪珍，直接通汪东兴。他用什么手段通知汪东兴？那时通信还不发达，电台没有，电话要通过总机才能要到杭州，他敢吗？写信更不敢。从 程洪珍后来的境遇看，不太像。程洪珍精神不正常了，对象也吹了，只身一人回到老家，父母都已经去世，由兄嫂抚养。生活困苦，已经去世多年。

这个深知林立果秘密的“眼线”不一定自己发报或打电话，他可以通过一个“组织”。那么是谁？

从毛泽东的行踪看，如果毛泽东没有“眼线”，他怎么可能对林立果一伙的“活动”了如指掌？知己知彼，一向是久经沙场的毛泽东的秘诀。要知道，战争年代，我 们党的地下工作曾经做到国民党的高层，蒋介石身边就有共产党的“眼线”，包括胡宗南、傅作义等国民党高官身边都有共产党的“眼线”，有的还不止一个，甚至 能“冬眠”几十年。在毛泽东眼中，刘少奇还不算可怕，他没有掌握兵权。而林彪不仅军权在握，还把一儿一女都安插在空军，这不能不让毛泽东百倍提高警惕，他 肯定会在林彪、叶群、林立果甚至林豆豆身边安插“眼线”。那时，毛泽东在人们心中如同神一般，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除了“铁杆”，一般情况下都会倒向毛泽 东，心甘情愿为毛泽东当“眼线”。

林立果等人要谋害的是毛泽东，不能公开进行。既要一些人供他们驱使，又不能让这些人了解底细，这是无法解脱的矛盾。林立果谋害毛泽东的计划迟迟定不下来， 办法想了一大堆，但哪一个都不行。事到临头，谁也不敢干。叶群一再催促动手，还专门给王飞打了“抽鞭子”的电话。毛泽东每年外出，都是在国庆节前才回来。 林立果估计毛泽东要在9月２３日、２４日才能回到北京，所以并不是很着急。到9月１１日，还没有商定。当夜，林立果接到上海王维国的电话，毛泽东离开了上 海。他顿时大惊失色，痛哭流涕。但王维国不知道毛泽东什么时候到北京。

毛泽东回到北京，让汪东兴告诉叶群。不仅让林立果“跳”，还要“通知”他，让他更高地“跳”。

９４、　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怎么能是资敌罪？

毛泽东南巡时反复说，不能告诉北京。但是，毛泽东的本意是想完全封锁他的南巡讲话吗？是真不想让林彪知道吗？不，他想让林彪知道，他太想让林彪知道了。因 为林彪不知道，就不动。不动，就抓不住他的“辫子”。毛泽东一路上说了林彪那么多的“坏话”，字字句句，都是“大棒”，就是要激对方“跳墙”。按毛泽东的 想法，“北戴河”只要知道了他南巡讲话，必然要跳起“三丈高”，决不会乖乖地把头伸到案板上等着挨宰。而传话与不传话，是毛泽东的试金石。毛泽东自信，他 不让传话，还是有人会传话的。

毛泽东的用意很明白，他就是要打草惊“蛇”，敲山震“虎”。

可从8月１６日到9月6日，毛泽东南巡都２０多天了，他的谈话被他自己的命令死死“封锁”，“诸侯”们个个守口如瓶。“北戴河”死一般安静，“蛇”不动，“虎”也不动。这怎么行呢？毛泽东急了，总得让某些人“立功”吧？

那时，别说天高皇帝远的广州，就是北京，也只有很小的圈子里知道高层分歧，甚至上了庐山的一些中央委员，都看不清庐山真面目。于是，毛泽东让汪东兴通知广 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刘兴元，向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传达他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这在毛泽东南巡的省份里绝无仅有。此举一箭三雕：既给林彪透个信，又可以 发现“死党”，同时也给广州军区的高级干部打个“预防针”，别跟着林彪跑。

毛泽东南巡没有到广州，而是把广州军区的“诸侯”召到长沙。或许是因为四野从东北一直打

到海南岛，之后四野司令部就在广州组建了广州军区。所以广州军区是 四野南下的“根据地”，林彪是四野司令员，在四野的威信非常高。林立果制定的方案中第二个方案就是“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对张耀祠 说：林彪搞了好久，我说了一次（指１９７１年８、９月间南巡谈话），广州军区开了个２０００人的干部大会，林彪就不敢去了，只有往北走。１１月，毛泽东在 一次会议上说：南巡我讲了一路，一路都讲，无非是讲了一点材料。陷得比较深的是广州，他们现在搞得比较好，其次是武汉。

９月５日，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从长沙回到广州，召开广州军区２０００多名师以上干部大会，由刘兴元“吹风”，传达了一个下午，晚上接着传达。 规定了三条纪律：不准记录，不许传达，不准向北京报告传达的内容。毛泽东南巡讲话矛头直指林彪，广州军区师一级的干部都传达了，却不准往北京传，不准林彪 本人知道，这是一种战术呢？还是一种策略？反正是欲擒故纵。如此一来，怎么可能对林彪保得住密？毛泽东就不相信，广州军区２０００多名师以上干部中就没有 人“胆大包天”？

果然，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钻进了毛泽东的“圈套”。他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纸上偷偷记了几笔，回家顾不上吃晚饭，先给周宇驰打电话，约定传 达完后把情况传到北京。２３时３５分，于新野打来电话，顾同舟讲了一个多小时，并说了他的疑问。除主席提到副主席（林彪）外，主持会议者丁盛和传达者刘兴 元都没有提到林彪。在那种时候，毛林不可分，怎么就分了呢？我想到，主席指示很多，决不止传达的这些。确实，涉及到林彪的内容，刘兴元在传达时有所保留， 但这也够厉害的。顾同舟没有当面“聆听”，而林立果听的是传达的传达，总还是要争取最“原始”。周宇驰对顾同舟表示嘉奖，说你在关键时刻立了一功。林（立 果）副部长让你再整理一份文字稿，派人送到北京来。顾同舟连夜整理出几十页的材料，并附一封信，让自己妻子坐飞机送到北京。原定９月６日到广西桂林的周宇 驰，马上改变计划，下午，他在直五机组的保驾下，驾着直升机，和于新野飞往北戴河。

毛泽东南巡第一站选择了武汉。８月１６日，毛泽东刚到武汉，就在专列上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谈话。到毛泽东离开武汉，与刘丰谈了三次，矛头直指林彪。毛泽东 本意是指望刘丰向林彪密报，没想到刘丰遵守“纪律”，老老实实地把毛泽东的狠话都咽到了肚子里。９月６日，副总参谋长李作鹏陪朝鲜人民军代表团到武汉，刘 丰忍不住了，吞吞吐吐说了几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

李作鹏觉得应该向总参谋长黄永胜通通气，所以当天回到北京，李作鹏向总参谋长黄永胜作了汇报。黄永胜是李作鹏的上级，通通气总比毛泽东南巡说了一路更“理 直气壮”吧？所以审理“两案”时李作鹏在这件事上没有罪。黄永胜马上用电话报给叶群，黄永胜的判决书上有一笔，罪名和顾同舟一样。刘丰虽然没上军事法庭， 但也没逃掉严厉惩罚。

顾同舟哪里能想到，传话也传出罪来了。他被扣上“资敌罪”的帽子，九一三事件后就被抓了起来。１９８０年判了１１年刑。顾同舟想不通，既然你对林彪有意 见，为什么不当面谈？林彪几次想见你，你不见，反而到处散布林彪不来见你，在背后说林彪坏话，这符合组织原则吗？你高高在上，平安无事，而我顾同舟只是传 了几句话，又没有造谣。更何况林彪那时也没有被宣布为敌人，而是你的亲密战友、党中央副主席，我怎么就成了“资敌罪”呢？

９５、　１９７１年８月，毛泽东为什么要南巡？

１９７２年5月，周恩来在一次会上说，毛泽东为什么要南巡？去年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文件发给军事系统６０多份，可是军委办事组黄永胜他们就扣住了，只发 了7份，传达范围非常狭窄。去年７月被毛主席发现了，说要继续跟各地打招呼。毛泽东南巡时说，批陈整风汇报会，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 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汪东兴回忆：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后，揪出了陈伯达。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先后召开了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但是都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毛主席南巡，想推动这个问题得到深入的解决，以加强党内的团结。

毛泽东南巡是真想加强党的团结吗？《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指出：毛泽东尖锐地提出林彪问题，表明他不仅不再信任林彪，而且认为林彪已成为反对他的另一个司令部的头头。

毛泽东晚年身体健康时，每年都要坐专列外出巡视，返程一般在9月底。１９７１年8月１５日１３时，毛泽东开始最后一次南巡，历时２９天，除个别谈话外，共 谈话１３次。毛泽东接见了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上海、江苏、北京等省市和武汉、广州、福州、南京、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本来毛泽 东还要找济南军区杨得志谈话，因他出差未果。

参加谈话的名单如下：刘丰、刘建勋、王新、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白崇善、王洪文、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等２０人。

８月１６日，毛泽东到武昌，首先同武汉军区兼湖北省负责人刘丰谈话。又同刘丰、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王新谈话一次，同调国务院仍兼湖南省负责人的华国锋谈话。毛泽东离开武汉前，又与刘丰谈话。

８月２８日，毛泽东到长沙，与华国锋和湖南省负责人卜占亚谈话，同广州军区刘兴元、丁盛、广西壮族自治区负责人韦国清谈话，又同华、卜、刘、丁、韦集体谈话一次。

８月３１日，毛泽东到南昌，同南京军区兼江苏省负责人许世友、福州军区兼福建省负责人韩先楚、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谈话两次。

９月3日，毛泽东到杭州，下车前，同浙江省负责人南萍、陈励耘、熊应堂谈话４０分钟。毛泽东在静候他讲话后的“回音”。

９月6日，北戴河得到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终于有动作了！

９月8日晚，毛泽东突然提出转移专列。

９月9日凌晨专列转移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因为林立果他们提出轰炸毛的专列，汪东兴借口防晒，让在专列顶上搭一个棚子。

９月１０日中午，毛泽东又突然提出到上海，随行的警卫部队措手不及。午饭前，战士与当

地驻军打了一场篮球友谊赛，全身都汗透了。战士们打完球，洗了澡，洗了衣服，衣服还湿淋淋往下滴水。中队长陈长江命令用雨衣把湿衣服包起来，立即出发。

临走毛泽东与南萍、陈励耘、白宗善谈话。

１３时４０分，专列由绍兴返回，１４时５０分抵达杭州站。

１８时１０分，毛泽东专列到上海郊区虹桥机场专用线。毛泽东一反常态，没有下火车，而以前到上海，都要住在顾家花园，只有这次例外。汪东兴布置警卫，尤其是机场油库要放两个干部队的队员。虹桥机场油库距离专列只有１５０米，因为林立果他们提出了炸虹桥机场的油库。

当晚，没有找到许世友，毛泽东只与上海市负责人王洪文谈了几句。

9月１１日近中午，许世友坐值班飞机赶到上海，毛泽东与他和王洪文谈话两小时。之后毛泽东没有留他们吃饭，打发他们走后，毛泽东马上让发前卫车。毛泽东专列由三列火车组成，前卫车、后卫车和中间的主车。随卫的干部队１００名队员分布在三个列车上，当然主车最多。

１３时１２分，毛泽东专列开动。

１８时３５分到南京，停１５分钟。到蚌埠２１时４５分，停车５分。

9月１２日零时１０分，到徐州，停车１０分。

2时４５分，到兖州，没有停车。

5时，到济南，停车５０分。汪东兴布置张耀祠打电话，要中办值班室通知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到丰台站，毛泽东要与他们谈话。

7时４０分，到德州，停车２０分。

１１时１５分，到天津西站，停车１５分。

１３时１０分，到丰台。谈话到１５时多。

１５时３６分，从丰台开出，１６时5分到北京站。

１９８４年5月，汪东兴对访问者说：毛主席南巡时主要讲林彪的问题。……每次谈话我都参加了，每次都谈庐山会议，说这是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显然，毛泽东 对庐山会议上的问题作了十分严重的估量，对华北组第六号简报作了十分严重的评价，而且认为事情还没有完结。他这次到外地，没有告诉林彪，这是与过去的做法 不一样的。在外地的谈话内容，不仅没有在中央会议上谈过，没有同林彪谈过，而且要求绝对保密。

毛泽东“周游列国”，会见“各方诸侯”，不仅点了黄吴叶李邱的名，还点了林彪。说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说过了头嘛。 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说穿了是树他自己。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 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要动军队干坏事，听你的？毛泽东在杭州说，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 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陈伯达搞的是反革命游说，我搞的不同。

作为党的主席，就能到处游说，搞掉党的惟一的副主席吗？

毛泽东的所有谈话汪东兴都是陪者，甚至毛泽东还同汪东兴单独谈过一次。

毛泽东南巡的所有谈话都是一边倒，除了毛泽东，别人都是听众。

还是那句话，毛泽东背后猛烈抨击林彪和黄吴李邱，符合组织原则吗？

毛泽东多次强调“三要三不要”，那么是谁在分裂我们的党？

现在看，同意设国家主席，称天才就是反党纲领吗？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南巡，就不会有九一三事件。

９６、 林彪是怎样当上党中央惟一的副主席的？

林彪一向没有官瘾，而林彪的“官”都是毛泽东提议的。

１９５８年，毛泽东提议林彪当政治局常委。这时林彪身体好一些了，出来多一些。但中央开常委会，叫林彪去，他不去。１９５８年２月，毛泽东到上海，看望林 彪，坐了将近一小时。林办和毛办的秘书退出，叶群有时在场。接着八大二次会议增加林彪为党中央副主席，之后排名就是毛刘周朱陈林邓了。林彪挂着党中央副主 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还是当“甩手掌柜”，没有具体分工，冬天到广州，３、４月到上海、苏州，夏天到北戴河。

１９５８年开军委扩大会，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自己身体不好，不能参加反军队教条主义的军委扩大会。信是他自己写的，毛主席亲启，直接送到中南海， 毛泽东签字后退回。１９５９年林彪上庐山，秘书关光烈跟着去了。不存在林彪夺彭德怀军权的问题，这时林彪在党内、军内的地位已经在彭德怀之上，只是没有具 体工作罢了。周恩来找林彪谈话，传达毛泽东的意见，由林彪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全军的事都要管。林彪叫秘书关光烈给周恩来打电话，他的身体担 当不了国防部长。关光烈回忆，林彪在楼上住，我在楼下住，叶群拦住我，叫我不要打这个电话。叶群对林彪说，毛主席这么信任你，说了也没用，干脆就别说，我 来帮你。后来林彪再没谈这个事。１９６０年春，林彪叫关光烈给军委办公厅的萧向荣打个电话，让叶群当办公室主任。林办秘书都知道，林办的大权握在叶群手 里，所以叶群希望林彪的官越大越好。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宣告文革全面发动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７月２４日才发开会

通知，汪东兴受毛泽东之命，几次打电话催正在大连休养的林彪马上回北 京。专机停在大连，林彪知道，“骑”上去就下不来了。他托病不出，写了报告，说他不接受当“接班人”。以前罗荣桓活着时就请他向毛主席说过他不想干。毛泽 东在林彪报告上批示，还让他干。林彪把有毛泽东批示的报告撕毁扔进痰盂，以示他的坚决，叶群则小心地从痰盂里捞出碎片粘好。

毛泽东坚决要林彪“出山”。周恩来亲自劝，江青也给叶群打电话，叫叶群和林立果回北京。林彪没办法，只好说，不让林立果回北京，叫叶群回去就行了。这时大 连已经发生武斗，外面很乱。林彪临走，对林立果说，你在这里好好复习功课，过一段大学开学，好好上课。林彪对林豆豆说，你先不去北京，好好呆着，我过几天 就回来。实际上林彪走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吴法宪的女儿金秋说，８月７日，林彪坐专机从大连到北京，吴法宪到机场接。本来想讨个好，见林彪毫无喜气，脸色阴 沉，吓得连话也没敢讲，赶快溜掉了。

林彪一推再推，最后到北京时，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开始一个星期了。林彪警卫秘书李文普说，汪东兴安排林彪住进有空调的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我们刚到，毛泽东 就赶来与林彪谈事。林彪还是说身体有病，不愿接新职。毛泽东大怒，骂林彪想当明世宗（明嘉靖皇帝，虔诚道教，不问政事），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

毛泽东为什么再三再四要请出林彪呢？１９６７年５月，毛泽东与外宾谈话时说，（发动文化大革命）当时有很多人仍然不通，我只好将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带到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才得到半数多一点的同意。从会议的时间上也可以说明问题，正式会议前还有几天预备会，主要内容是传达毛泽东７月２４ 日、２５日的讲话。邓小平宣布，毛泽东决定正式会议开５天。邓小平、刘少奇、陈伯达讲话，再开３天小组会，最后一天再议一下，通过文件。实际上这个会议不 得不又延长了７天。原来，毛泽东得不到多数的支持，所以一定要林彪当“援兵”。林彪回北京的第二天，８月８日晚，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讲话，表示支持 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８月１２日全会闭幕，接着开中央工作会议，解决思想不通的问题。林彪在会议第一天讲话，讲了文革问题和干部问题。

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主要工作是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会议有五件大事，一、毛泽东支持了红卫兵，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 的信；二、毛泽东指责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的“路线错误”，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三、毛泽东在全会上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明确指 出党内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四、通过《十六条》；五、毛泽东突然提出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并提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选名单，会议发了有毛主席批示的重新排名 的文件。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非常奇怪的是，会议没有罢免党中央副主 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副主席的乌纱帽却“莫名其妙”的丢了。林彪“跳”到了第二位，成了党中央惟一的副主席。

８月１２日，林彪在全会上宣布，改选结果不见报，表明他还是想找台阶下台。但８月１８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就泄露了“秘密”。林彪站在毛泽东身边，发 表经过毛泽东审阅的重要讲话，这已经“不打自招”，说明党中央在人事上有重要变动。会后新华社的报道，按全会选举结果重新排了座次。就这样，林彪成为中国 第二号人物就满世界都知道了。

林彪警卫秘书李文普说，林彪曾几次流露不想干这种角色。

９７、　设国家主席是毛泽东的陷阱吗？

１９７０年４月１１日２３时３０分，林办秘书于运深遵照林彪指示，打电话给毛泽东秘书：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 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 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现在公布的这一段话，看不出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的意思。可是这段话的前面呢？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是回答，而不是自作主张。因为林彪有一个"仍然建议"，就是 说，林彪以前是这样说的，某人说了不同意见，林彪这段话回答了这个不同意见，所以才"仍然建议"。某人的不同意见是什么？为什么省略掉了？而且，林彪的三 条中有两条是关于设国家副主席的，是不是也是回答某人让他当副主席的意见？总之，在林彪这个电话记录前，还应该有某人一段重要的话。原来，汪东兴传达了毛 泽东让林彪当国家主席的意思，并当成大喜事让叶群立即报告在苏州的林彪。所以才有了林彪回答的这段话。

１９７０年３月８日，汪东兴从外地回到北京，受毛泽东委托，向中央政治局传达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指示。最后汪东兴传达了毛泽东一段话：要不要设国家 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由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吴法宪回忆：林 彪照例是没有出席中央政治会议的，会后汪东兴请叶群向林彪转达。汪邀请吴和叶群、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到他家里坐一坐。大家从中南海的新华门进去， 一直到了靠水边的小楼，进了汪东兴的家，在客厅坐了一会儿。话题自然转到设国家主席上，汪东兴说：毛主席曾经说过，要设国家主席的话，只有林彪同志才能 当。叶群和我们都很高兴，我认为这是毛泽东对林彪的特别信任与关怀。当时汪东兴也很兴奋，因为"九大"以来他同我们一直是搞在一起的。

这里有个疑问，汪东兴是毛泽东的心腹，他老是向叶群和黄吴李邱透露毛泽东的信息，毛泽东怎么能容忍他吃里扒外？为什么没有处理他？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 "放长线"。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大力主张设国家主席，并说代表８３４１部队。如果没有毛泽东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意思，汪东兴怎么 敢？更重要的是，为什么陈伯达被打倒了，而汪东兴却能在毛泽东的保护下安然无恙？
但是，林彪没有回应毛泽东让他当国家主席的这段话。

林彪到底是怎么想的，毛泽东摸不到底。

１９７０年４月初，毛泽东特地带上张春桥到苏州去看望林彪，说要住在苏州。叶群忙着让工作人员收拾房子，后来毛泽东又改变主意，让林彪到专列上去见他。林 彪把刚送给他的东方红一号卫星上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录音带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和林彪、叶群说了不短的时

间，叶群还专门整理了一个谈话稿，在广州军区的一次干 部会议上传达过。毛泽东对林彪说，你要考虑接班人了，让小张（春桥）当总理怎么样？林彪说，还是应该重用那些跟您打仗的红小鬼。

这次会见，毛泽东没有提让林彪当国家主席的事情，林彪也没有回答谁当国家主席的事情。双方都在刻意回避？表面看，这次会见毛泽东最关心的是劝说林彪上庐 山。林彪说：我要上更高的山上去，我要上“五台山”。林彪知道毛泽东心里是想试探他如何应对当国家主席的问题，但是毛泽东又不直接问。而林彪则装糊涂，根 本不提这件事。但林彪心知肚明，知道无论如何是要回答毛泽东的。经过一番深思熟虑，４月１１日，林彪让秘书于运深给毛泽东秘书打了电话，回答了前面提到的 三条。

吴法宪回忆：１９７０年５月１７日下午，因林彪准备带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去向毛泽东汇报军委工作，黄吴李邱四人先到林彪住处汇报工作，谈到设国家主席的问 题，说毛主席说过，一个是设，一个是不设，如果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林彪当即表示：我不当这个主席，这个不妥。应该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 才名正言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国家主席，没有一个元首，这样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国家的主席，国家的元首，只有毛主席来当，别人都不合适。但是毛 主席年纪大了，当国家主席要出国访问，别的国家元首来还要回访，毛主席出国有困难，可以设副主席，副主席可以出国对其它国家进行访问。我也不适合当这个副 主席，我的身体不好，不能参加活动，不能出国访问。要设国家主席还是毛主席来当。

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回忆：当时，总政治部负责汇集全军讨论宪法修改意见。几次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意见总是对立的。我觉得，事情越来越复杂了，矛盾 不是通过工作得到化解，而是交锋之后反而加深。李德生虽初到中央，却深感中央斗争的复杂，他小心地保护自己，不轻易发表意见。此举得到毛泽东的信任，李德 生成为毛泽东九一三事件中的重要力量。

其实，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完全由毛泽东一手操纵。他先把当国家主席的意思强加给林彪，再批判林彪就是想当国家主席。可是林彪从始至终也没有说过要当国家主席，这强加的罪名似乎幼稚可笑。

９８、　是谁制造了张春桥这个“大诱饵”？

１９６８年３月杨余傅事件后，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调任总参谋长。因为黄永胜在来北京任职前就在会议上公开批评过江青，江青怀恨在心。“九大”以后，她和 以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组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甚至江青无理取闹，阻止黄永胜出国访问。因毛泽东出面干预，黄永胜才如期带团出国。

奇怪的是，这之后江青似乎缩回去了，张春桥倒“横空出世”。

１９７０年３月１３日晚上，周恩来遵照毛泽东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成立了筹备四届人大的工作小组，周恩来牵头，组员有张 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吴法宪。还成立了宪法修改小组，康生任组长，组员有陈伯达、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经毛泽东同意，关于设国家主 席的问题，由宪法修改小组研究。如果毛泽东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为什么还要让宪法修改小组讨论？这一讨论不就“钓鱼”了嘛？问题是有的讨论者并不知道，糊里 糊涂上了钩。

宪法修改小组就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的会议室开始讨论了。据吴法宪回忆，从一些小的问题开始，逐渐形成两派，陈伯达、我、李作鹏是一派，康生、张春桥是一 派。尤其是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争论更加激烈。尽管当时矛盾很大，但还算正常进行，甚至依据“九大”党章，写上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 班人”这句话。

４月１４日下午，李作鹏被周恩来派到青岛办事去了，纪登奎也因事没来。会议参加者只有四个人，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吴法宪，双方各半。到底设不设国家主 席，又是一场激烈争论，势均力敌。最后康生说，保留意见吧，以后提交政治局讨论。最主要的矛盾上交了，应该和平共处了吧？接着讨论国家机构，吴法宪提出： 国务院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但康生和张春桥坚决反对，说再写重复了，毛主席也不同意写。吴法宪回忆：其实他们的意见应 该是对的，可当时张春桥的几句话引起我的反感。这时陈伯达出去打电话，张春桥抓住机会，不紧不慢地说：有人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挂，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 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

在当时那种“红海洋”的气候下，要是普通老百姓说这几句非常反动的话，非抓起来枪毙不可。为什么张春桥如此胆大包天？当然，如果书生陈伯达在，可能会注意 到张春桥话中的某些细节，想一想张春桥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后台，打死他也不敢。可是陈伯达不早不晚躲出去了。张春桥相信，吴法宪这个“大老粗”肯定爆炸，所 以张春桥就“开炮”了。

果然，吴法宪气得发抖，无名火一下冲到脑门上。“三个副词”是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的话，张春桥竟敢否定？吴法宪认为张春桥不仅讽刺了他， 也把矛头指向了林彪。没有多想，吴法宪大声说：张春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指谁说的？请你解释清楚。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 列宁主义是谁提出来的？你这句话过份了吧？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张春桥这里不写毛泽东思想，那里不写毛泽东思想，你算不算堆砌？你说赫鲁晓夫何时天 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你指的是谁？

吴法宪哪里想到，他的悲剧，林彪的悲剧由此开始。

现在看，张春桥绝对是故意的，或许是鹦鹉学舌？林彪和黄李邱，个个谨小慎微，夹着尾巴，也都有头脑。相比之下，吴法宪是个会咬钩的“鱼”。而吴法宪认为他 一通上纲上线，也把张春桥吓了一大跳，谁不怕被打倒？张春桥急了，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吴法宪更加激动，问毛主席在 哪里说的？我怎么没有听到过？张春桥一时语塞，他拿不准，把毛泽东“卖”出去，对自己有利还是无利。吴法宪觉得占了理，更加大声地说：你今天吹这样的风是 干什么？用意何在？中央政治局的人刮此风，刮到下面就会越刮越大。今后中央怎样解释？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你们不赞成，天才地、全面地、创造

性地三个副词你也 反对，你们不准称天才，你想借口毛主席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我坚决反对你这种谬论。这个大帽子太大了，康生立即合稀泥，说好好，在国务院的前面加上以 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就是了。吴法宪说：我是个人意见，写不写由你们决定。因为我是宪法修改小组成员，我要提出个人意见。

会场上吵得热火朝天，陈伯达打完电话，磨磨蹭蹭不敢进来。等会场平静了，陈伯达才慢慢走进来，吴法宪埋怨陈伯达关键时刻不在，陈伯达小声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吃完晚饭，继续讨论。吴法宪气鼓鼓的，不再说一句话，陈伯达也不说话，只有康生和张春桥说，最后一次讨论就这样“一边倒”结束了。会后，吴法宪迫不及待报告了林彪、周恩来和黄永胜，他们三人都支持他。头脑简单的叶群甚至认为抓到了张春桥的尾巴。

张春桥的话太不简单了，他是鹦鹉学舌，所以才敢把矛头直接指向林彪。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意思，给他装上十个胆子他也不敢。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策略，他一定把手下分成两帮，他们争斗，他就可稳坐钓鱼台。否则他们联合，矛头就冲上了。

８月１５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为九届二中全会准备的文件。首先审议宪法修改草案，吴法宪他们几个人都没有想到，设国家主席和以毛泽东思想为 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都写上去了，康生和张春桥一句话也没有讲。所有的文件都顺利通过，一场“暴风雨”就这样过去了。

林彪认为，庐山会议上还会有问题，还会提出意见来。

但是，庐山上张春桥依然沉默。

值得注意的是，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活跃极了。８月２０日，东道主程世清对吴法宪说，昨天毛主席上庐山，汪东兴对他说，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 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原来“不设国家主席， 林彪往哪里摆”的出处在这里。吴法宪被关起来后却移植到叶群头上，成了林彪篡党夺权的主要罪证。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作了更正，说那是被逼供信逼的。当 时，吴法宪听到程世清讲的汪东兴这话，非常高兴，因为他也亲耳听过汪东这样说。吴法宪认为这肯定是毛泽东的意思，汪东兴不敢假传圣旨。不过，吴法宪至死也 不可能想到，张春桥成了“大诱饵”，汪东兴也成了“大诱饵”。不仅要钓他这条“胖鱼”，还要钓林彪这条“瘦鱼”。
张春桥在“三人会”上说的那一番反动话，钓出九届二中全会林彪的长篇讲话，钓出华北组第六号简报，钓出陈伯达，钓出黄吴叶李邱的检讨，最后钓出了林彪机毁人亡的九一三事件！

９９、 毛泽东为什么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

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上，在几乎一边倒讨伐张春桥的声浪中，历史惊现了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但是，在报纸上公布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却显示风平浪静，其中有一 句“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毛泽东没有像面对面撤掉彭德怀一样，撤掉林彪，而是不动声色，把矛头指向了陈伯达。毛泽东在《我的一 点意见》中，首先说“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最后毛泽东又故意写上“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

两人一致认为……”。所有看过的 人都会认为，毛泽东要揪出陈伯达了，而林彪仍然是毛泽东的铁杆同盟者。可谁能想到，毛泽东揪陈伯达是揪林彪的前奏。现在想，毛泽东是一石二“鸟”，对陈伯 达是“惊”，对林彪和林彪同伙（不包括黄吴叶李邱）则是“安抚”。因为没有揪出林彪的意思，林彪同伙会继续活动，这样才会有更多的“小辫子”。

其实，仔细回味毛泽东的这个“意见”，有一句是冲着林彪的，那就是“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或许林彪深得其味？他几次请求面见毛泽东，缓和一 下双方的紧张关系，并求得毛泽东宽恕。但毛泽东像当初打倒刘少奇、罗瑞卿等人一样，拒绝见林彪，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林彪明白毛泽东是把他当成敌人了。

“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怎么是说林彪呢？

以后毛泽东南巡时对华国锋又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原来空军才能炸平庐山。

这个毛泽东念念不忘的“典故”，出自庐山上正在修建的小机场。

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回忆：在庐山会议前，我提前到庐山看毛主席要住的房子。到了庐山一看，在安排毛主席要住的房屋上边，正轰隆隆炸石头，时任江西省委负 责人的程世清事先也没把这件事告诉我。我问，这是在搞什么？程世清说，在修飞机场。我不解地问，怎么能在这里修飞机场？这块地方大，飞机降落比较安全。你 们在这里修机场，是经过哪里批准的？程世清说，是军委批准的。我又问，你是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程世清想了一想，命令是前天收到的。我又到现场去看了一 下，飞机场已经快修好了。我说，这个机场就在毛主席住房的上面，这样会影响毛主席休息和办公的。程世清说，那怎么办？我当时没有答复他。回到杭州，我就把 修机场的事向毛主席报告了。毛主席问，谁下的命令呀？我说不知道。毛主席说，你打电话问问总理，他知道不知道。我打电话给周总理，他也说不知道。我说，这 可就麻烦了，你也不知道？周总理说，我问一下。他问了总参谋长黄永胜，黄永胜说他知道这回事。因为当时有些老同志要去庐山开会，坐汽车走盘山路不行，坐飞 机又快又安全，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机。周总理问，你这么决定，报告了中央吗？黄永胜说，他报告了林副主席。周总理对我说，是林副主席批准的。我报告了毛 主席，毛主席没说什么，点了一下头。

庐山上修直升机场，林彪知不知道？

周恩来“追”到黄永胜那里，没再往林彪那里“追”。就是周恩来“追”到毛家湾，也是叶群接电话，叶群会说林彪知道。林彪身体不好，许多事情要叶群出面，林 彪的意见、指示、批示都要由叶群把关。下面向林彪请示必须通过她，她可以推延请示、婉言谢绝，自行处置，甚至假传“圣旨”。毛泽东１９７１年南巡时说，我 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黄吴李邱）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

所以，林彪到底知不知道庐山上修机场，很难说。在“太岁”头上修机场，非同小可。如果林彪知道，为什么不请示毛泽东呢？按照他的“原则”，他一定要请示毛 泽东。现在看，林彪知道的可能性很小。从现有资料看，机场一点点大，也不是秘密工程。是为了政变吗？没有证据。这时林彪的地位虽然有些动摇，但矛盾还没有 激化。林立果搞《五七一工程纪要》

是庐山会议以后，１９７１年３月的事情。

１００、　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有什么错？

一个国家怎么能没有国家元首？这是国际惯例，也是施政需要。在中国，党领导一切，国家主席没有什么实权，主要是用于外交。国际交往讲究对等，人家国家元首 来了，党主席或者国务院总理去迎接，显然不合适。国家主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就有，刚开始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１９５４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 过的宪法提出设置国家主席，由刘少奇担任。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国家主席刘少奇就被打倒，恨“乌”及“屋”，甚至连国家主席这个“屋”也成了“洪水 猛兽”。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才重新恢复设置国家主席，延续至今。

从这段历史看，设国家主席在中国也顺理成章，根本没错！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的讲话没有提到设国家主席。上庐山前，他提到过，包括周恩来、康生在内的大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主张设国家主席。当时议论让董（必武） 老当国家主席。在下午和晚上的小组会上，林彪讲话得到绝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欢迎，上庐山的２５５位中央委员，几乎一边倒。中将黄志勇说，我在西南组，我们都 希望主席当国家主席，最后听主席定。我们召集人是谭甫仁和吴法宪，聂帅、李先念都在我们组，没有什么激进的人，我们好像挺平静。

林彪不管是当接班人前，还是接班人后，处理中央传阅文件的原则，都是毛泽东画圈我画圈。林彪秘书张云生说：在文化大革命中，看不到林彪对中央处理重大问题 时的独自表态与毛泽东指示有抵触之处。他反对过于突出自己，“副统帅”、“三忠于的光辉榜样”，他都要秘书一律划掉。而且几次说，不能出版《林彪语录》， 出版的要一律没收。

在同意不同意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也不例外。林彪要看毛泽东的态度，所以叶群从汪东兴那里摸底。叶群与汪东兴的关系非常密切，汪东兴胃大出血，儿女当 兵，叶群都忙前忙后。汪东兴肯定毛泽东没有反对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对林彪说，谁要设谁去当，反正我不当，我劝你也不要当。这表明，虽然毛泽东说了好几次不 当国家主席，但直到庐山会议上，他仍然没有反对设国家主席。如果毛泽东坚决反对，毛泽东的“忠诚卫士”汪东兴怎么可能在小组会上带头提出让毛泽东当国家主 席，与毛泽东唱反调？１９７０年8月２４日下午，汪东兴在华北组说，另有一点建议，根据中央办公厅机关和８３４１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 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还要说明的是，在华北组会议上，没有一个人提议林彪当国家主席。奇怪的是，毛泽东大骂陈伯达，却不对汪东兴发怒，只 让他写了一个检查。为什么汪东兴写个检讨就过了关？而陈伯达却被打倒？无理可讲。

中将曾思玉说：他是第一次看见毛泽东震怒。庐山会议第三天，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扩大到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组的第一召集 人，曾思玉作为中南组第一召集人参加。毛泽东把桌子拍得山响，非常严厉地批陈伯达，说我们共事３０多年，你阴一套，阳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政治局在 山下商议不设国家主席，大家没有发表不同意见。上了山你就变了卦，搞突然袭击，你是个地地道道的变色龙！我毛泽东是不当这个国家主席的，要当，你陈伯达当 好了，你们去当！当时陈伯达的脸涨得紫红，一句话也没说。这之后，陈伯达就被“监管”了。他悲凉地说，这恐怕是我最后一次上庐山了。

谁要设国家主席，谁就是想当国家主席，这是什么逻辑？

林彪向毛泽东表态不想当党的副主席，那么他是不是想当国家主席呢？林彪不是不知道国家主席只是一个空架子，又主要是递交国书等外事活动。而这正是林彪最厌 恶的事情，林彪特别不喜欢与外国人打交道，这话他同李文普等人说过。１９６８年１０月，林彪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巴卢库和他热烈拥抱，林彪回来 后说，和洋人打交道，实在受不了。更何况他的身体太差，有时走路都走不了，怎么可能胜任繁重的外事活动？关于选上林彪当接班人，关光烈曾问过李文普，首长 愿意不愿意？李文普说，你还不知道？他没那么大的官瘾。李文普说，我没听叶群说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这样的话。但从林彪口中，我们倒听他讲过 连副主席也不愿当。他不仅这样说，也还有让毛主席当主席，他不当国家副主席的交代，我记得是叫于运深秘书写的。我们认为他不愿当副主席从他身体状况、不愿 接见外宾和他对当“接班人”的态度来看是有可能的。

本来设国家主席是国家体制的一个具体问题，提建议、酝酿、讨论，都无可非议。党史专家王年一说，在党的会议上，在党的中央全会上，一个党的副主席，为什么 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一个意见对也罢，错也罢，为什么不由全会作出讨论作出判断？退而言之，就算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党的一个副主席，想当国家主席，为什么 就算“反党”、“反革命”？更何况林彪根本不想当。看来，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是一个典型的“欲加之罪”。

１０１、 “林彪第一个号令”为什么没上“两案”起诉书？

“林彪第一个号令”是林彪案中的重要证据之一。为什么从“两案”起诉书中拿掉？

１９８６年8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共中央大事年表》，第一次为“第一个号令”正名，明确指出林彪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而 作出的指示。１９８９年9月，中共党史专家苏采青在《中共党史研究》撰文，说明“第一个号令”不包括疏散中国党政军领导人这项任务。这是毛泽东的决策，周 恩来安排，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

１９６９年3月，中苏边界发生了珍宝岛事件，苏联边防军吃了亏。8月，苏联边防军报复，偷袭了在中国新疆伊犁地区正常巡逻的中国边防军，造成重大伤亡。两 国关系恶化到极点。苏联在苏中边境上陈兵百万，战争一触即发。关于中苏关系，苏联分成两派，主战派和主和派，以柯西金为首的主和派占了上风，他们主张谈 判。柯西金几次想接触中国总理周恩来，阴差阳错，没有搭上话，急得团团转。最后总算和周恩来达成协议，双方派副外长级的代表团谈判中苏边界问题，约定１０ 月２０日，苏联谈判代表团到中国北京。

事后看，苏联不想和中国打仗，是诚心诚意的。但是，事前中国极不放心，１９６８年刚发生了苏联入侵捷克斯诺伐克事件，就是苏联借口谈判，占领了捷克的机 场，从而控制了整个捷克。中国极担心捷克事件在中国重演，尤其是１０月２０日苏联政府边境谈判代表团到北京的那一天，北京更是紧张万分。所有的中央领导人 都到了外地。甚至林彪下令，机场四周要埋伏部队，准备大棒子肉搏，决不能让苏联人占领机场。

１９６９年国庆节，是中国的２０年大庆，照样在天安门城楼举行阅兵。虽然中国领导人上了天安门城楼，但是中国生怕苏联发射原子弹，在天安门城楼后面停放着 一架直升机，随

时载走中国领导人。事后看，中苏战争虽然没爆发，但不能说战备就错了。珍宝岛战役后，苏联不仅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而且已经把原子弹对准中 国的北京等大城市，确实是一触即发。在这种形势下，能不战备吗？敢不战备吗？你高枕无忧，万一战争来了，哭都来不及。国庆节后，毛泽东下令：除周恩来到西 山主持战备外，其他所有领导人，包括被打倒的领导人，全部疏散到外地。毛泽东到了武汉，林彪随后到了苏州。北京只有周恩来和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留守，而 他们也进了西山。因为林彪“疏散”到苏州，总参机要局去了电台班子。六部电话，还装有通往北京的红机子，夜晚也响个不停。总参作战部和国务院都是两套班 子：前指和后指。当时各单位还要疏散家属子女，后来形势缓和，才算了。

１０月１８日，林彪到达苏州的第二天下午，叫秘书张云生给总参谋长黄永胜打电话，口授了加强战备的四条指示，同时叶群电话里报告了毛泽东秘书。黄永胜在当 晚１９时布置给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因为针对不同兵种，指示略有不同，所以不止一个，还有第二、第三、第四个。阎仲川为了传达和查询方便，将林副主席指示编 为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由前指作战组用电话下达全军。

紧急战备是毛泽东搞的，全军战备疏散是毛泽东的指示，林彪只不过是“传声筒”而已。毛泽东是军委主席，再借林彪几个胆子，也不敢擅自发布什么号令，更不敢 搞“第一个”。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听到“第一个号令”说“烧掉”，而不说收回的原因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执行林彪的“第一个号令”，直到一个多月后， 部队纷纷请示是不是回营房，林彪才想起大批的部队还在野外挨冻，下令班师回营。如果毛泽东认为林彪篡党夺权，他一声令下，就可以让全军立即回营，为什么还 继续执行疏散？叶群以为毛泽东“烧掉”是保密，其实毛泽东是不满，不是对内容不满。内容是毛泽东的意思，他不会对自己不满，他不满意的是“第一个号令”这 个标题。 阎仲川调到总参谋部的时间不久，不懂得“一号”的重大意义，那是毛泽东独有的“称号”，毛泽东的卫队是第一中队，毛泽东在各地住的楼是一号楼， 别人怎么能冠以“第一”？毛泽东得知后很不高兴，说“烧掉”。他反感的只是“第一个号令”的“第一”，谁能发布第一个号令？应该是他统帅毛泽东自己嘛，怎 么能是你林彪？你林彪怎么能发布“第一个号令”？这不是篡权吗？全部症结就在这里。不能不承认，由于这个“第一个号令”，本来就疑心多多的毛泽东对林彪的 认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怀疑林彪在阴谋政变。

九一三事件后，“第一个 号令”成了林彪的“大阴谋”，说林彪借口战备，背着毛泽东擅自发布的，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于是，总参包括阎仲川在内的“第一个 号令”执行者蒙受不白之冤，成为“专政对象”。“第一个号令”之前的战备疏散，也被当作“脏水”泼到“第一个号令”的头上，说是“第一个号令”迫害老干 部，把他们赶出北京。

到１９８０年审理“两案”，关于“第一个号令”分歧很大。海军说是“阴谋”，总参作战部认为不是“阴谋”，是正常加强战备。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孙玉恒带本部 的８个人，分头回忆，大家讲的没有什么出入。当时中央军委的战备电报，没抄送江青，江青还大发脾气，专门查过。总政“两案”取证组专门调出总参作战部的作 战日志，一页一页他细看。记得清清楚楚。经手的人很多，完全正常的工作程序，几分几秒，谁下的命令，传达给谁的，从上到下，全是按组织系统，不存在搞阴谋 的问题。

总政取证组认为：这个事太大，不是哪一个人能处理得了的。中苏紧张，部队进入一等战备，有毛泽东划圈。那么，“第一号令”是不是阴谋？是不是夺军权？定不了。总政也觉得不好处理，最后上报，由“两案”总负责人彭真拍板，定不住，去掉！

“第一个号令”的罪名就这样从林彪头上拿掉了。

１０２、 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林彪讲话，毛泽东事先不知道吗？

毛泽东主持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问谁讲话？林彪说他想讲几句。毛泽东说好，请林彪同志讲话。１９７０年８月，毛泽东南巡谈到九届二中全会，说林彪那个讲 话，事先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事先连个招呼都没有打。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慌手脚。

事情真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吗？完全不是。

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汪东兴悄悄从毛办把张春桥当总理的文件拿给陈伯达看。

这是故意挑起矛盾呢？还是激将法呢？

林彪在台上讲话时，叶群在台下对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说，１０１（林彪）在讲话前请示了毛主席。确实，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毛泽东和林彪关上 门说了半小时还多，以至推迟了４５分钟开会。叶群在门口“警卫”，防止江青闯进去。因为林彪在抨击张春桥。林彪问过毛泽东，可不可以讲（张春桥）？毛泽东 说，可以讲，但不要点名。这些话，叶群通报了黄吴李邱和陈伯达，她对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说，要在各组表态拥护林彪讲话，坚持设国家主席和天才的观 点。但发言千万不能点张春桥、康生的名，更不可触动江青。陈伯达当面问过林彪，是不是这回事。林彪承认是有这回事情。

林彪讲话很少让人写稿子，他自己写。想几天，今天想一条，明天想一条，没成句的话，两个字一行，三个字一行。一张纸上写两三个字，啪丢在地上。他体系形 成，叫秘书整理整理，就够了。别人不用，就叫于运深，怕别人来得慢，在林办干得最长的秘书就是于运深，一般一两年就走了。弄讲话，前一个钟头讲，叫于秘书 来。于秘书写一行，再看一张纸，又是一个观点。不要编句子，要原话，林彪脑子好使，拿稿子就讲。林办秘书于运深说：林彪要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讲话，让准备一 个稿，搜集北京突出政治有些什么效果，还强调要发展经济，林彪没有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办秘书宋德金说：林彪让准备五个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德、 日由弱变强的资料。

自从吴法宪汇报张春桥的反毛言论后，林彪决定抨击他。但是，抨击张春桥，这不是个一般的问题，会不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林彪警卫秘书李文普说：在庐山开 会前讲不讲那番话，林彪曾表现出犹豫不定的样子。上车前，我在旁边，曾听见林彪问叶群，这话今天讲还是不讲？叶群说，要讲。九届二中全会后，林立果打电话 给林办秘书张云生，骂叶群瞎指挥。

林彪在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中，说了这样一段话：“这个宪法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非常好！这是 ３０条中间，最重要

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林彪还提到，“你们大家是不是觉得老三篇不起大作用呀？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起作用。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 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林彪还说，“说毛主席的学说没有发展，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深思，尤其是在中央工作的同志深 思。”

党史专家于南说：林彪的这段话明显地是对着江青集团的，因为康生反对学习“老三篇”，康生、张春桥不同意在宪法上写“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

因为有“二月逆流”的前车之鉴，林彪批判的矛头只能围绕要不要“三个副词”、要不要“天才”、要不要“国家主席”这些表面文章上。这“三个副词”最早见于 １９６６年８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６日，由林彪署名实际上是张春桥起草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照抄。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八 届十二中全会，讨论九大《党章》，毛泽东两次提出删去《党章》草案中出现的“三个副词”。有人说这是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新《党章》不写不好吧？毛泽东说， 党的代表大会有权修改以前的任何文件。因此，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九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都没有写上这“三个副词”。不知为什么，林彪、甚至周恩来都没 有注意到？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出台后，周恩来从北京调毛泽东在《党章》上批示来看。毛泽东南巡时说，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 定了，为什么不翻开来看看？康生、张春桥等明知毛泽东不让写，写上也会被圈掉，但在修改《宪法》的过程中，吴法宪攻击他们时，就是不明说。故意到庐山会议 上说，不是我们不写，是毛主席不让写。

当晚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委员和各大组召集人会议，吴法宪提出播放林彪讲话的录音，会议一致通过。第二天用了一天的时间，上午开大会听林彪讲话的录音，播放了 两遍。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参加了，下午讨论。在播放录音时，有人提出要印发，到会者鼓掌通过。周恩来让汪东兴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对汪东兴说，他们都同 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毛泽东还嘱咐要由林彪审定后发。这个印发稿，是根据录音整理的，林彪没有稿子，是即兴，都是“吹”毛泽东。毛泽东也在现 场，他并没有当场反对，怎么会有“反革命”的味道呢？

陈伯达在华北组发言，说宪法写上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针是经过严重斗争的，现在竟有人胡说“三个副词”是一种讽刺，这是想搞历史翻案，这种否定天才的 人是历史的蠢才等。８月２５日上午，华北组六号简报发到各组，坚持设国家主席、叫嚷揪人的呼声更高更急，几乎成了一边倒。有的组通过决议，宪法草案一定要 写上设国家主席，一定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２００多位中央委员全对准张春桥，“千刀万剐”之声不绝。把江青、张春桥等人吓坏了。江青率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那里告状，又哭又闹。毛泽东认为这不是 反张春桥的问题，与“二月逆流”一样，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对毛泽东，反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他们名义上反对张春桥，实际上是反对我。所以毛泽东 突然变脸，下午，他主持各大组召集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评陈伯达等人的发言违背九大方针，强调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毛泽 东说，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提了，要我当国家主席就是要我早点死。你们再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会议决定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 六号简报。

８月２６日、２７日休会，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批评了他们，要吴法宪检讨，并将吴法宪手中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天才的几段 语录》转给毛泽东。毛泽东找了一些人谈话后，８月３１日写了７００多字的《我的一点意见》，给陈伯达定了性，说他搞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 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９月１日，各大组学习《我的一点意见》，开展对陈伯达、吴法宪的批判。９月６日闭幕式上，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会后，毛 泽东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等非常措施，并在全党开始了批陈整风运动……

看来，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九一三事件。而这一切，是从得到毛泽东同意的林彪讲话开始的。

１０３、 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为什么不写检讨？

有材料说林彪下庐山后，坚决不写检查，是这样吗？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说，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曾写过检查，是让新调来的秘书王焕礼写的。送上去没有，不知道。王焕礼也承认他帮林彪写过检查之类，但是不是检查林彪并没有说，也没有让他送。

毛泽东南巡时说：他们心里有鬼，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个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 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林彪当然要负责任……林彪犯的错误，全军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他应当做检讨，我已经向政治局建议。

这就是说，毛泽东没见到林彪的检讨。他不会放过林彪，他一定要林彪检讨。也就是说，一定要让林彪屈服。毛泽东喜欢别人检讨，这些检讨抓在手里，就是小辫子，既能让检讨者夹着"尾巴"，又能从检讨者的字里行间抓出把柄，有利于再打倒。

刘少奇、邓小平等等被打倒的大人物都一再检讨，希望老人家宽恕。当然，毛泽东放过谁他心里是有谱的，刘少奇是要让他死的，而邓小平一开始打倒"待遇"就不 同，汪东兴安排邓小平一家搬到江西南昌一所军校的将军楼里，禁闭了一段，又让邓小平到附近的工厂劳动。单独关押其实是最重的刑罚，人是群居动物，需要与人 交流，而单独关押几年十几年后，人就不会说话了，而且往往会出现严重的精神病。如此看来，毛泽东对邓小平只能是"冷藏"，需要时会将他从"冰箱"里拿出 来。

林彪深知此道，他至死没有检讨。

林彪为什么不检讨？我们从林彪的角度考虑，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有什么可检讨的？林彪晚年虽然当上了毛泽东的接班人，上了《党章》，但是林彪没有一点点 权，调动一个班的兵力也要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林彪知道，毛泽东最怕他手下的接班人夺权，所以所有送到林彪办公室的文件，林彪都不表态，送毛泽东，或送周 恩来，他乐得当甩手掌柜。如此说来，林彪不管事怎么可能犯错误？而且林彪深知毛泽东的禁忌，最怕别人结帮，所以林彪从不与人来往，生怕毛泽东怀疑他拉帮结 派。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的讲话句句吹毛，称天才，是称毛泽东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是请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怎么就成了反党纲领？怎么就成了篡党夺权？

林彪没有认为自己有错。既然没有错，写什么检讨？起初，林彪还想找毛泽东解释，却几次碰了钉子，这在过去是没有的。过去只要林彪求见毛泽东，毛泽东根本不 见。１９７１年五一劳动节，林彪已经没有了见毛泽东的心，他本来不想去天安门。经周恩来做工作，林彪勉强上了天安门城楼，坐在毛泽东对面，中间隔着一张桌 子，桌子上摆着一些果品和饮料。但是毛泽东视林彪于不见，故意与身边的西哈努克有说有笑。林彪低头坐了几分钟，悄悄地走了。此时林彪已经彻底明白，毛泽东 是要卸磨杀驴了。但林彪采取任何措施，坐在屋子里等死。

１０４、　是谁制造了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

１９６９年3月3日，中共“九大”之前，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该收尾了，他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九大”文件上中央文革不要加了，（它） 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康生主持“九大”《党章》草案时，写上了“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毛泽东 审阅时改为“设立必要的精干的机构”，确定“九大”以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

这样，江青等人虽然如愿进入“九大”的中央政治局，但他们在中央政府和军队里却没有职务。江青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是个闲人。而林彪不仅是军委副主 席，而且成了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加上军委办事组的黄吴叶李邱，在毛泽东眼中，林彪掌握了军队大权，目前又太“红”，而且没有了压制他的对手，会疯狂冒 尖，这是很危险的。

一直怂恿林彪吹毛泽东的毛泽东要降温了。这时刘少奇已经成“死老虎”，不再需要个人崇拜了。

早在１９６８年9月，毛泽东修改《人民日报》社论《世界人民胜利的航向》一稿时，删掉了绝大部分的毛泽东思想的词句，还删掉了这样一段话：“毛泽东同志天 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的典范。”同时，毛泽 东写了一句话：“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

１９６９年５月３１日，毛泽东到武汉，住了将近一个月。刚到梅岭一号，毛泽东就要工作人员把四周挂的毛像和毛语录统统摘下来，一个不留。毛泽东对工作人员 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话，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 义，也不是辩证法。

其实，林彪说的一句顶一万句，是文学中的夸张，就像李白的“白发三千丈”一样，为什么硬要把它变成科学的语言呢？

而毛泽东甚至更加明确地说：四个伟大，太讨厌！

毛泽东看“九大”纪录片，半截愤然退场，说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有什么意思！

６月１２日，根据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

说今后不经过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 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１９７０年４月初，毛泽东审阅两报一刊编辑部为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稿，删掉了林彪关于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 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毛 泽东并批了一大段话：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 志研究一下。

林彪看后没有表态。

在打压林彪的同时，毛泽东扶植林彪的反对派，因为他需要平衡。

“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名正言顺，江青等一伙“文革”功臣也该“告老还乡”了，否则，会功高盖主。这是毛泽东没有给江青等人实职的原因。“九大”削弱了 王张江姚的势力，扶植谁成为林彪的对手呢？周恩来？周恩来一向做实际工作，又跟林彪关系不错，他不可能成为林彪对头。还有谁呢？制约林彪，还得起用王张江 姚中的一个。江青冲冲杀杀可以，弄不了理论，王洪文太嫩，姚文元是个书呆子，只有张春桥能拿上台面。

４月初，毛泽东专门到苏州看望林彪。毛泽东明明知道林彪看不起张春桥这个“不知从哪里来的小记者”，但故意在见林彪时带上张春桥，甚至对林彪说准备让张春 桥当总理。其实毛泽东从来都没有让张春桥当总理的意思，可张春桥并不知道这是张空头支票，于是有了冲锋陷阵的动力。

７月２７日，中央政治局审查两报一刊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稿，陈伯达和张春桥发生争执。张春桥坚持社论稿中的新说法：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 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陈伯达主张用老说法，去掉“毛主席和”四个字。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说：这件事要请示主席。周恩来到上海陪毛泽东会 见外宾，当面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似乎并不在意，说这一类应景文章，既然政治局已经讨论过了，我就不看了。至于提法问题，这无关紧要。毛泽东让汪东兴代他 圈去“毛主席和”。７月３０日，周恩来写信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可是，毛泽东并不是不在意，而是非常在意，一年多后，毛泽东南巡，多 次说：他们争论中的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嘛！

８月１３日，因修改宪法，吴法宪与张春桥又起了冲突。吴法宪哪里知道张春桥背后有毛泽东撑腰，是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波德纳拉希时，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讽刺。

这样，所谓的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冲突加剧。

上了庐山，林彪在毛泽东支持下，向张春桥开炮，得到了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虽然林彪没有点名，但江青集团惊慌失措。而毛泽东坚持支持了江青集团，打倒了陈伯达，黄吴叶李

邱频频检讨。痛打落水狗的毛泽东决不放过林彪，他一路南巡，矛头直指林彪。

１０５、　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从什么时候开始？

应该说，林彪早就把毛泽东看透了。早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就曾在笔记本上斥责毛泽东“凭空胡来”，“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看来，林彪不是不了解大跃进等三面红旗的问题，但是，为什么林彪又在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上热捧毛泽东？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林彪骨子里同意刘少奇等人的做法，但在表面上还维持着为毛泽东大唱赞歌。到“九大”前，毛林矛盾开始显露出来。

毛泽东让林彪和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林彪不同意毛泽东的那一套，赞同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针对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林彪提出“民富国强”，要林 立果搜集资料。周宇驰把这个情况对空军副参谋长王飞说了，王飞说好，真像政党的样子，没钱富不起来，自力更生当然对，可资金原始积累困难。１９７０年八一 前夕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写成的。

非常奇怪的是，九一三事件前，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印刷几百万几千万册。当时吴法宪虽然下令收回一小部分，但仍然有大批的“白皮书”流传民间。但是，九一三事 件后，“白皮书”一本也不见了。但是，林立果的这本小册子并没有批判。如果像《五七一工程纪要》一样，被公开全文批判，我们就可以知道里面的内容。但是，直到今日，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仍无影无踪。那么只能解释为，里面没有被批判的内容。
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中提到我们搞社会主义，主要是搞政治，也搞经 济。我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建立在现代经济的基础上。这是林彪的一贯思想，林彪在“七大”发言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解释，首先说共产党的名字，中间有 个“产”，就是说，共产党就是要搞生产。林彪说：“我们谈政治谈党，首先就是经济问题。我们是拿“产”字作旗帜。我们有的同志实际上不注意“产”，忘了 本。共产党不注意“产”，那就大大不合格。我们奋斗的集中目的做什么呢？是要“产”，不是私产是公产。大家发财，大家生活得好，所以要革命。”

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林彪支持陈伯达强调“促生产”。而毛泽东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七、八年再来一次。所以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报告连看也不看，另由张 春桥重起炉灶，林彪念的是张春桥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叶群让秘书勾出重点，哪里要拉长声，哪里要念慢一点，而林彪事先连一眼也没看，念得结结巴巴。

虽然林彪在“九大”被毛泽东确定为他的接班人，并被写进《党章》。但他们之间的分歧却越来越多，包括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包括打倒那么多的老干部，包括设国家主席，到九届二中全会分歧达到高潮。

（全文完）